



#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十七 2022.05

一位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的战时日记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

彭剑斌 水晶 | 小说家

张旭汀 高雅的边缘人：为什么亚裔热衷学习古典音乐 | 书评

冯琳 阿母的故事——毒品、艾滋病如何进入彝族女性生活世界 | 田野中国





## 小 说

小说家 | P5 水晶 彭剑斌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15 小恶 李一洋  
P21 春的答复 李懿  
故事群岛 | P27 卡帕纽斯 普里莫·莱维  
P31 出版社 戴内斯·马查多·本托  
P33 无人亮灯 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  
P37 某个讨人嫌的表姐 卡洛斯·富恩特斯

## 非虚构

长乐路百业指南 | P45 近况 杨樱 伊险峰  
田野中国 | P53 阿母的故事 | 彝族女性的生命叙事① 冯琳  
P61 退休工程师一家 | 三线建设者的生命史① 刘博  
生活亲历者 | P67 马里乌波尔的送别 | 战时日记①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  
P71 季民和春生 | 定海桥往事④ 路明  
局外人 | P75“我们的未来也在这里吗？” Christopher St. Cavish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79 开门！东京警视厅！ 吉井忍  
小鸟文摘 | P85 汶川地震后读北川县志：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 熊景明  
P91 高雅的边缘人：为什么亚裔热衷学习古典音乐 Xuting

## 档 案

Newsletter | P95 疫情里的次生名词迷惑了谁 /  
P113 “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的” 方可成  
P99 互联网上，人人都可能知道你是谁 张依依  
P105“只有付不起钱的女人才会受影响” Snufkin  
P109“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源，就是培养完整的人” 曾梦龙

## 专 栏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15 上苍保佑他国人民不饿死 /  
P119 你们看到了世间的烟，却没看到人心里的火 王永智  
荒诞笔记 | P123 天气不错啊，各位长官！ 伊险峰



电影《镜子》(1975)剧照

# 小鸟回答 Vol.17

## 小鸟 | 小鸟回答

五月了。祝所有人有别人拿不走的春天。

上个月说，“这个憋闷的春天是不是已经让你绝望了？”

我们幼稚了。

在提供绝望扼杀希望的创意大赛中，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以至于我们人迅速地就进入到时空宇宙的开盲盒状态。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早上睡醒之后发出天问：“今天是 14 天的第一天吗？”后来，你就要去猜，他们对空间有什么新的想象，对于空间的理解不断刷新，而且他们很热衷于对每个人的空间进行精细划分。

开始的时候，还会觉得科层制官僚体系抹杀人的情感和身份。比如他们是父母吗？他们有父母吗？他们是上海人吗？他们也会讲上海话吗？他们家住在哪？他们有邻居吗……官僚体系会把这些抹掉。但即使这样，我们也知道一个人会有底线的。

后来，发现不是啊。他们在硬隔离之前，先把人心与人心之间的互通硬隔离起来了。我只能说，权力这东西太让人享受了。他们控制不住他们自己了。权力让他们发起癫来。人类可能未必总能理解彼此的苦难，但赋权之后的膨胀都是相似的。每一个哪怕只被赋予了微小权力的人，无论他具备怎样的能力，都有可能把这微小扩张到极致。

而且眼见得，他们上瘾了。

ii

**我于今天，更深刻地理解肖斯塔科维奇所说的话。**

有时候，人们说到或写到德国死亡营的头子喜爱并理解巴赫和莫扎特，等等。还说他们听舒伯特音乐时流下泪来。这些话我不相信。这是谎话，是记者撒谎。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真正理解艺术的刽子手。

但是这些不断传说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人人这么希望暴君成为艺术的“赞助人”和“爱好者”呢？我想有几个原因。首先，暴君是又卑鄙又聪明又狡猾的人。他们知道，对他们的肮脏勾当来说，如果他们装出一副风雅饱学的模样，那要比露出无知、粗野的腔调有利得多。让那些动手干这种事的人，那些爪牙去当粗汉好了。爪牙是以粗鲁为荣的，但是大元帅必须始终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智者。这样的智者有一套庞大的机器为他服务，写书做文章赞扬他，还代他写演讲稿，代他写书。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有一大批研究人员为他准备书面材料……

至于那个所谓崇拜莫扎特的死亡营主管，他有一个负责思想的助手，助手又有自己的助手。一般地说，只要找一个受害者就行了。这个受害者说，莫扎特是个优秀的作曲家，那个刽子手在场，听到了，于是把他绞死，而把关于莫扎特这句话放在自己嘴边，好像是出自他自己的思想。他两次抢劫了这个受害者，抢走了他的生命，还谋得了一份遗产。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说：“瞧他多么有教养，多么

聪明，多么文雅。”

那些把市民摁在地上拖到车里拖进方舱破门而入声称执行任务甚至声称他也没有办法的人，他们会在脱下他们不管什么颜色的制服之后，成为一个莫扎特的爱好者，他会懂声乐的几种唱法？他会读书？他会成为一个懂得欣赏人类艺术的人？别逗了，他们不会。

4 月末的读书日，有马屁精们又祭出了那蒙羞的书单——对，那个书单里每一本书的作者都如肖斯塔科维奇所说，遭受了两次抢劫，“抢走了他的生命，还谋得了一份遗产”。

布罗茨基说，“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对，他没读过。

iii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更多更好的东西，让他们害怕。**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说：

“我早就想过，真正的诗歌，就其本身，就其本性，独立于所谓内容之外——是反警察的、反法西斯的、反暴力的物质，不知人们何时何地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自由的胜利。官僚体制隐约地感觉到这一点。日丹诺夫觉得他不喜欢阿赫玛托娃，其实他痛恨的是与他自己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任何真正的诗歌中，体现在阿赫玛托娃伟大的诗篇中。‘何必吞吞吐吐？’这位大官僚听诗歌朗诵的时候隐约感觉到了。在诗歌的语言背后他嗅出另一层思想——并非没有原因。这种思想就是对自由的肯定。他模糊地仇恨诗歌，仿佛在梦中，但对诗人的仇恨是十分清晰的，因为他们也是一种权力。哪个国家允许身边存在另一种权力？国家越强大，管理得越好，权力越集中，国务活动家越疯狂地仇恨自己的竞争对手——诗人们。这是嫉妒。”

所以，我们坚持每个创作者，继续你们的创作。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小说家们，继续创造。爱写爱情就写爱情，爱写校园就写校园，爱写迷茫就写迷茫，爱写性写性。写接近于永恒至少是更久远的东西，让他们嫉妒的东西。

iv

原谅我们，引用了好几个苏联人的话，因为我们身在上海，上海现在就是人类新世纪的古拉格。而此时此刻根本不止一个上海。我们引用这些人类的精华，让听到的人精神不被粗野侮辱践踏。

v

上一次，我们说，警惕所有宣传。有读者写邮件表达不同意见，文本如下：

关于您说的“小说只能是小说，不要宣传”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政治宣传或者意识形态方面，当然是要警惕的。可是如果是社会热点，会不会写小说的人只是想引起大家的反思与探讨，而不是为了让更多人看，有更多的关注度呢？也许写关于拐卖的小说不是为了宣传什么，也不是“蹭热点流量”，用“指责”来说似乎不太妥当（当然您是用的“不会指责”，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您认为这是在“蹭热点流量”）。我相信会关注和投稿小鸟文学的朋友是真心喜爱文学和阅读的朋友，是会沉下心来思考的人，这样的人的目的也不会是“蹭热点”。最近拐卖新闻占据大家的视野，那么有些人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关注和反思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我个人认为社会话题是写作中会被探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们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收到上海封城题材的小说了。比写微博还要快。我直觉写好的概率不高。

我觉得“蹭热点”这个词，听起来是不大好。它是这个时代的粗鄙语言汇集而成的粗鄙评价体系之一。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提醒：每个认真的宣传者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位过去的同事在四月初的朋友圈里说，有人批评他这几天的文章中“我们”“他们”这样的词用得有点多。他说他在这个时候，可能比一般人更懂得什么是想象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我认为即使如此，也应该谨慎使用。

如前所述，如果立志于写诗与小说，那要写让他们嫉妒的东西。

vi

**但是，我们还是出了一期增刊。**

是啊，有点分裂。那些东西让我们愤怒，让我们做出应急反应。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声音。（看，我们反对的复数人称“我们”“他们”，因为愤怒而发出急迫的声音——这些称号一直强调要警惕的东西都在这几句话里暴露无疑）。是啊，百十年来都有一个让所有人纠结的巨大管理象限——“紧急不重要”“重要不紧急”“紧急重要”“不紧急不重要”，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就是“救亡与启蒙”。

总是有一些突发的东西，让你放下重要的事。心想，至少这些东西是有记录和档案价值的。就是这样，我们觉得应该保留这些文字。一个月时间之内，我们见识了各种文体，使我产生毕加索一样的艺术幻觉，本来历时性状态的历史中的种种面孔如今共时性地存在于一个头颅之上。

vii

说到此处，有一位程序员发微博私信跟我们说，“你们的作品不单单是文学作品，更是很好的精神滋养品。在程序员这个群体里，恰好需要这样的东西存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被代码、技术文章、卖课、贩卖焦虑与 996 裹挟，他们真的很

需要你们这样的作品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发这段私信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把你们作品的 pdf 放到 github 上，让更多的程序员知道它们的存在，请问这样可以吗，这些 pdf 本身是我作为你们会员自己下载下来的，这样公开分享可以吗？如您有收到，还请回复一下，感谢！”

我们已经私下里回复过他了。在这里也跟所有人再说一次：会员可以免费下载所有小鸟文学杂志，并“鼓励把作品带给他认为值得分享的人”。下载特刊，无需会员。

viii

### 封面的鸟。

叫“白领翡翠”。鸟纲、佛法僧目、翠鸟科、白领翡翠属。

ix

### 本期内容预告。

本卷会发一篇来自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日记。作者是人类学家马强老师的采访对象“老谢”。马老师说：“通过他的日记，俄乌冲突不再是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政治的波诡云谲，而是能让我们感到战争中普通人的脉动与呼吸，触碰心灵深处的情感，以及战争阴云下的悲惨命运。”

五月小说家是彭剑斌。彭剑斌的作品风格多变，这一回让人想起塞林格，不光是语言的节奏感，还有那种在年轻尚可挥霍的时光里调入一丝沉重现实的质感。塞林格的配方很常见，说是大众偶像绝不为过，但彭剑斌跳出了流俗。

田野中国栏目本卷会更新一篇凉山女性的故事。一个完整的个人生命史，和毒品、艾滋纠缠在一起。作者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博士论文做的是凉山彝族女性的艾滋风险叙事。她希望将论文中有关毒品、艾滋病如何进入彝族女性生活世界的内容以个人生命史的方式展示出来，因此有了这篇“田野中国”，《阿母的故事》。

有一篇书评推荐，书是《亚裔美国之声》，这篇叫做《高雅的边缘人：为什么亚裔热衷学习古典音乐》的文章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亚裔会在象征西方文明精髓的古典音乐界“扎堆”？答案并不完全在于教育传统，更是音乐背后的种族认同。

长乐路百业指南继续更新，这一期故事的主角在上海封控期间有了自己的宝宝，祝贺！哦对了，上个月的微博误报，荒诞笔记要在本卷才结束。因此读者还能看到一期荒诞笔记。这一期说被扭曲的语言。

x

### 五月了。祝所有人有别人拿不走的春天。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Tarun Ram](#) on Unsplash

小说

# 水晶

彭剑斌 | 小说家

一个苦难的劳动者和一只枯燥的灵魂，  
他们在这里碰到一起

我哭！我看见黄金，竟不能一饮！

——兰波《地狱一季》

在立中真假难辨的讲述中，我脑海里逐渐浮现出一幅画面：他的姑父带着他的父亲在山地上寻找水晶王。他也说不清楚，姑父究竟如何透过地表轻而易举地锁定目标。或许他的秘诀就是首先观察植被的长势及土壤的湿度——如果地底下埋着一颗水晶王，我的乖乖，连上面的草丛都长得丰美一些，连树叶的颜色都显得鲜艳一些，连地上的苔藓都滋养得肥厚一些，踩上去松软弹足，跟走波斯地毯似的；刨开植被，表层的土壤即使一年四季不下雨也可以挤出水滴；往下挖几米，所见每块石头都是长条石，嵌满了指甲大小的亮片，朝向都出奇的一致，像是游弋在几亿年前的深海鱼群，瞬间被凝固成化石。以上征象足以断定，在地下若干米深处，那十二个面的水晶王正嵌在中心位置，俨然一位仪态威严、光芒四射的国王，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水晶矿石层层簇拥着它，有六棱柱体，也有三棱柱体。有一回，立中的父亲和几个叔父一起连夜继续挖掘一个深邃的大坑，他的姑父站在一旁焦急地指挥着，叮嘱他们等下千万别碰坏了水晶王，而边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晶矿石已经被他们糟蹋了不知道多少。突然，一束亮光的锋芒射进每个人的眼睛里。“水晶王！”姑父兴奋得大叫一声，所有人都站在那里不动了。

立中说，那场面还真他妈的有些感人呢。

我和立中是在七中入校时认识的，这所县办中学就设在我们镇上。那时我和他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又影影不离地度过了三年初中时光。尽管后来我们曾经阔别了十年，其间只短暂停两度重逢，而其他时间里都得不到关于对方的任何消息，但我始终相信我们的友情还是一点都没被改变。这么多年过去，我确实已经很少去回忆他了，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又再次偶遇。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小型印刷厂的普通车间工人，也可以说是最低层的穷苦劳工。

周末，我去找立中玩。下了公交车，就看见那些和立中一样显得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工人（有几个还是名副其实的童工）端着寒碜的饭碗在厂门口附近游荡，像是清风吹得他们在那摇晃。他们认真地往嘴里塞着饭菜，有人犹豫要不要把肥肉扔到地上。一个嘴唇上沾着菜叶的老头，两眼浑浊、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你找谁？我说找立中。他突然热情地问我，你是不是他老乡啊？我点了点头，他便说：“啊，这么说我们也是老乡喽？我和立中是一个地方的。”可我对他根本没有好感，所以只给了他一个威慑的眼神。他终于不敢多嘴。

我转身朝立中的宿舍走去。老头竟又朝我追过来，“我带你去……”他说。我立即将他斥退了。一名留着长头发的工人在一旁大声嘲弄他；他以出人意料的敏捷朝那人扑去，然后人家早已跑远。他便又转身去掏一名童工的下身；小家伙正在全神贯注

地吃饭，一下子跳起来；一伙人全都笑得东倒西歪。

立中的宿舍在二楼，必须通过一条狭窄的铁梯。我登上梯子，一抬头才发现上面还站着几个人，因为梯子只有一人宽，他们必须等我上去才能下来。他们就像从高更的油画里走出来的人，站成一堆，目光呆滞地望向我，显得木然、迟钝，既不苦恼也不快乐，在等待时既无期盼也不焦急。也许只是在数我的脚步吧！我发现其中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似乎还记得我，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曾递给他一支烟。他认出了我，这使得他多不自然，仿佛衣服上扎了很多刺一样。他时不时向我投来不安的一瞟，一张拿不准要不要微笑的脸憋得通红。我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听到他鼻孔里使劲地吸溜鼻涕的声响。

“立中！立中！”——我大声嚷嚷，像一阵旋风冲进他的宿舍，我猜想他肯定又是在睡觉。他总是睡不饱的样子。结果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担心这次又来得不巧，因为即使扎在这种低劣生活的泥潭中，他倒经常给自己安排一些让人觉得好笑的活动。比如，我有时过来找他玩，别人告诉我他打篮球去了，或者一个人跑到鬼知道什么地方散步去了，又或者骑自行车到镇上去打一个很长的电话。还好，这次他立即从厕所里现身了。他对我笑了笑，感到由衷高兴，又像有着难言的苦衷。就是这样的表情，要不还能怎样？我感觉自打我认识他起，他就没怎么变过。

立中马上开始发愁，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招待我。后来他终于想到一个主意，信誓旦旦地说要带我去爽一下。他知道有一个地方，两块钱就可以看一晚上毛片。有一次他一个人跑去看，旁边刚好坐了一个女的，他便摸了她的手，还抓了她胸部。那女的什么也没说，虽然有些紧张，但是什么也没说。“可我还没等录像放完就起身走了。那女的肯定莫名其妙。她很年轻，很丰满，长得也很好看……”

“可是你怎么敢？”

“有什么不敢？她一个人啊！”

我认为他根本就是在鬼扯，那种地方不可能“刚好”坐着一个年轻好看的女的。这怎么可能！一个又年轻又丰满又好看的单身女人——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看毛片——还“刚好”坐在他旁边任他乱摸——这种事情他也能碰上？这种事情他也敢乱编？我妒火中烧：狗男女。

我冲上去将他扑倒在床上，正准备一根一根地拆他的肋骨，却发现他的整个胸腔都在震颤，间歇性的狂笑传到声带那里消失不见，没了笑声，只有随时熄灭又随时爆发的阵阵喘息，特别滑稽。我一下子变得快乐起来。我压在他身上，说：“叫爷爷，快叫爷爷！”他笑得几乎断气，那笑声却卡在喉咙里喘呀喘的怎么也喘不出来。寂静地笑了很久，立中的喉结终于“咕噜”涌动了两下，像吐出两个气泡：“爷爷……爷爷……”那笑声才顺畅地冒了出来。我说：“哎！哎！爷爷还没吃饭呢。”他咯咯笑着，抬起一根手指冲着天上一指，大声吼道：“好！去吃饭！”

我们将到镇上去吃饭。立中对着镜子把头发梳了又梳，脸上露着微笑。我朝镜子里望去，他的嘴奇怪地显得歪，使他看上去有了一丝腼腆。我们上路了。他命令那个一脸可怜相的童工把自行车借给他一用。我虽然乐意看着这样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但为了立中着想，我还是奉劝他：“对你的工友客气一点嘛。”

“嘿嘿！不用怕，他是我儿子。”说完他撒腿就跑了起来，因为照他估计，我听了这句准会照着他背上就是一拳。而我确实正有此想法。他今天显得格外兴奋。我那些阴郁的念头一扫而光。

天已经黑了，黄色的路灯在马路两边的上空形成两条安静的长龙，它们惊讶地望着脚下这些人。立中用自行车驮着我，朝热闹的镇中心驶去。一束耀眼的灯光直射我的眼，接着便是乱了分寸的汽笛声，自行车剧烈地晃动起来。我们差点撞死在一辆迎面疾驰过来的大货车上。我没受到一丁点惊吓，甚至有点说不上来的失落。立中也沉默了很久，他放慢了速度，倍加小心地掌握着方向。“我们差点死了。”他最后说了这句。我冷静地想：是的；可是对于生命，立中竟然比我还留恋。

我们不约而同地只要了一瓶冰啤酒。我和立中一直保持着这种默契。读初中那阵，我们激情满怀，经常在凌晨四点钟同时醒来，然后像两个幽灵一样流窜在各个教室里，摸黑熟练地偷光所有学生的钢笔。那些钢笔，后来大部分都被我们扔掉了，只留下几支用起来称心顺手的。我们偷过各种东西，每次都兴奋得要死。最刺激的经历是到校门口的小卖部去偷零食，趁着晚自习的课间休息十分钟，大家都闹哄哄地挤在柜台前买东西吃，这个时候最容易得手。小卖部的老板是本地人，据说心狠手辣，如果被他逮到，绝对没什么好果子吃，所幸我们从来没有失手过。那些放纵的经历曾经刺激过我们不甘平庸、躁动不安的心。但现在这两颗心早已冷静下来，甚至不屑于在一个重逢的日子里喝得烂醉。我们慵懒地碰一碰杯，不紧不慢地啜一口冰镇的啤酒，像是为了让自己更冷静。

我们边吃边聊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题。我可不能跟他谈正经事，一说到那些，他又得发愁。他二十五六了，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在外面混了这么久，却还背着一身债，这是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坚持下去。“就说买彩票吧，”他灌了一大口酒说，“如果每次都买我生日这个号码，到现在早就中500万了！可惜，”我低着头吃菜，等他说下去。可当我抬起头时，发现他早就没有说下去的意思了。原来这家伙认为他把该说的说完了。他一边嚼着菜，一边想别的事情，神情显得特别平静，目光却并不坚定。

我们回到厂子里。立中竟然对那个借给他自行车的孩子说了声谢谢，不过语气有点捉弄人。那小孩就像白痴一样，任人摆布，有时也把嘴唇抿得尖尖的，好像在表明他也会生气。我真他妈觉得：我的好哥们立中在这样一群人中间真是显得太不起了。立中摇摇晃晃地走进凄清冷落的宿舍，闭上眼睛倒在铁架子床上，嘴里叼着的烟头在蚊帐上烫出一个新的窟窿。“日他娘！”他咒道。不一会儿他又在那里发出笑声了，原来他正躲在蚊帐里看一本文学杂志，书页上落了一大截烟灰，他也懒得抖掉，一翻页就将它夹在书缝里了。我钻进蚊帐，在他身边躺下，他的枕边放着好几本这种杂志和一大堆旧报纸。我抱着他，开始抚摸他的身体，他吆喝一声：“别骚！”他从那叠杂志中拿起一本递给我：“有很多故事蛮感人的。”我百无聊赖地翻了翻，确实挺感人，只不过都是些骗人的鬼话。我把脸埋在那堆散发出怪味的被褥里，故意发

出了鼾声。立中的声音像是从老远的地方传来：“兄弟，你没得救了，连这些故事都不能感动你。”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每一个漫长的夜晚，立中就这样坐在这张光线明显不足且散发着异味的铁床上，内心平静如水地翻看着这堆下流杂志和几个月前的报纸。青春对他来说，就只剩下这样一份悠闲惬意的需求了。想到这里我就激昂起来，用拳头猛捶立中的背，有一拳可能击中了他的脊椎，他发出很惨的叫声，从书本上仰起他那张枯瘦而黝黑的脸，嘴巴张得大大的，两只黑眼珠吃力地转向我，那表情既痛苦又疯狂。我看到他眼里似乎泛出了泪光，便笑吟吟地望着他这副奇怪的模样，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在这一刻感悟到了什么。

我们搂在一起聊了起来。说的东西可笑极了。我们回顾了一起行窃的岁月，他至今还后悔那一次他将从教务处偷来的崭新扫帚以过低的价格卖给了镇上棒冰厂老板的公子——我们班上一个满脸粉刺的怪人。至于那些我们在晚自习后躲在厕所的墙根下召开的会议，他今天想来还是觉得至关重要，因为每一次会议都及时调整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还谈论起初中的同学，他认为每一个家伙不是白痴就是怪胎，要不就一肚子坏水。他那时跟班上很多同学有过深入的交往，比我更了解他们的鬼把戏，他说：“有的人比我们坏一千倍。”而谈到那些女同学，他断定她们都是骚货，却个个装得一本正经。总之，他认为没有一棵正苗，全都在发育的时候就长歪了，但对于这一切他才不在乎呢，世界和别人怎么样并不妨碍他睡大觉。听立中聊这些的时候，我简直觉得，我之前把这家伙想得太简单了。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在理解人事方面，并不比我这个大学生肤浅。他的脑瓜好使，他海侃的那股劲儿让人觉得没有他理解不了的事，至少他床上这一堆杂志和报纸上的事他早就研究得十分透彻了。他天南海北地乱吹一气，又戛然而止，捏腔捏调地说：“不过有一件事我琢磨了很久，甚至做过很多次试验，还是没搞明白。我得请教你这个大学生。那就是——椭圆形的面积是怎么计算的？”

我叫他找来两颗钉子和一根绳子，用粉笔在地上画出一个椭圆。“妈的！原来椭圆是这样来的！”他惊骇地叫起来，“我现在明白了。”画出椭圆后，却任凭我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起那复杂的计算公式了。后来还是立中告诉我该怎么计算椭圆形的面积，他通过一番疯狂的推论后得出了正确的公式。

立中抽烟抽得可凶了，而且他抽的都是最便宜的烟。他一抽烟真是迷死人，因为他会不经意地现出一副似沉思又似心不在焉地应付着这沉重的现实的模样。你会觉得这个操蛋的社会虽然置他于步步田地，却仍然拿他没有一点办法。他经常从嘴里冒出一句刚刚学来的不知哪个地方的方言：“介是为什么哩？”那戏谑的语气就好像他早已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了。但他终究只是一只可怜的虫子，这个我十分清楚。有多少人就像蚂蚁一样！似乎他们细小的身躯、木木的表情承载不了任何重大的意义。在我无知的一生中，我曾从内心鄙视过无数这样贫乏的灵魂。我不否认，富人们永远不会引起我的这种感情，在我眼里，财富使他们拥有了优雅的姿态，从而很少能被我深刻地记住，他们炫目的光环使我避之不及，往往无法真正了解这高贵的一族。而另一些人——我之所以常常接触到他们，显然因为我也是当中的一员——他们麻木走在大街上，他们的生存让我厌恶，又深感同情，因为我敢肯定：他们从未被人爱过，以后也不会。他们不仅心灵困乏，而且身无分文，前程灰暗，脸上却永远挂着动物般的笑容。对任何人来说，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我带着愤怒的同情心面前，他们的形象才显得无比丰满。对于这样一群人，我一刻也无法忘怀。这些可怜的虫子！又是多么可恶啊，我委屈地想，倒是让他们把我记住试试！那一定比任何事情都困难。他们只是想着：尽快把这一生过完算了……唔，也许就是这样。这唯一的、愚蠢的目的使他们无暇旁顾。

天哪！难道对我的好兄弟立中，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要知道，我们简直可以说是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虽然我们确实在彼此的生命中缺席了十年，但友谊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折损。即使在那些我几乎难得回忆他的岁月里，只要偶一想到他，心里就充满了自豪。但是阔别十年又骤然重逢之后，从他身上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具体的东西能使得我如此自豪——他多么普通啊！我立刻意识到：在这里面，显得如此重要的便是不渝的友谊，它一直在我们的心底成长着……

这么一个其貌不扬、丢进人群中就很难分辨出来的人，肯定早已消失在许多曾经认识他的人的记忆里了。我以前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他并没想要别人记住他，甚至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摆脱人们那对于细微事物的顽固记忆。而首当其冲的，或许就是他最好的兄弟——储存了最多关于他的记忆因此也是他最急于摆脱的人。无论我们的友谊多么坚不可摧，不管中考结束后、离校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和另一个兄弟一起）坐在学校围墙外面的桥洞里抽着烟聊得多么激动、多么难舍难分，都一点也不妨碍他从七中毕业之后，仿佛是有意地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整整两年。打毕业的那天起，以后的每一个给我们兄弟聚首提供便利的日子里，他都没有出现过。首先是去七中看成绩的那天，他没有来。在学校公布的中考成绩榜单上，我一眼看到了立中的成绩，考得非常差；而我和另外那个兄弟则一道考上了一中。然后是每一个寒假和暑假，那些只要他来我们家就绝对能见到我的日子里，他都没有来。立中家住在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所以整个初中三年，他都没有喊我们去他家里玩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只能被动地等着他来找我。那年头，电话线还没牵到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远距离的联络仍然只能靠写信，但无论是学校还是我们家里，都从来没收到过他的信。高中期间，我和好几个人生轨迹各不相同的初中同学都保持着通信——他们有的在差一点的中学上高中，有的去了别的城市读中专，还有的留在七中复读——但是他们也都不知道立中的下落；我和另外那个兄弟虽然只同校不同班，但也经常在一块玩，时常念叨那句“遍插茱萸少一人”，并且忍不住去想：我们的好兄弟立中，他究竟流落在何方？

我俩曾无数次推测过他的下落：考得那么差，升学是不可能的；死也不大可能，一个少年的死无疑会传遍十里八乡；留在七中复读更不可能，那样的话我们早该知道了……我们推断来推断去，最终觉得他要么去了广东打工，要么留在家里锄地，要么就是去了别的学校复读。前两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太了解立中了，他虽然脑瓜子灵活，但是对于读书他是真的点也不上心。

高二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从教室外面的马路上开过去一辆中巴，让我突发了奇想。那辆中巴上扯着一条横幅：“祝××中学初三学子考出水平！”下课铃一响，我兴冲冲地跑到那位兄弟的教室里去找他：“那我们就推断他是去了别的学校复读好了，不管是哪所学校，只要没出县，就肯定要来县城参加中考……”那位兄弟听了也激动不已；尽管我们心里都清楚，找到他的机会太渺茫了——本来根据我们之前讨论的结果，他去复读的概率就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抱希望，但这样一次行动本身却能证明我们的友谊多么伟大，多么感人——至少足以感动自己。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从七中毕业之后就转到别的学校去复读的话，那么也应该是去年来参加中考。为什么不是一年前想到这个办法？

“那我们就推断他去年也考得很差，于是又复读了一年好了。”

想到自己的兄弟竟然这么背时，我们都觉得特别可乐，都哈哈大笑起来。也许是因为我们脑海里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立中在七中的时候，就经常是一副愁眉苦脸的倒霉模样。

傍晚，我们来到街上，开始一家一家旅馆、一间一间招待所地问过去：这里有没有安排中考的学生住来？如果回答说有，我们就挨个房间去打听：立中！立中！有没有一个叫邓立中的人？喂，小孩儿，你认识邓立中吗？

和往后漫长而空虚的岁月相比，那真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年纪。我们才跑了三间招待所，就在一个挂满了湿毛巾的房间里找到了立中。

地板又湿又滑，被沾满灰尘的鞋底一踩，像是拌了一屋子的水泥浆。有两个披着中分、打着赤膊的学生靠在门框上抽烟，他们吐烟子时没有一次不把那愚蠢的嘴唇用力撅起，好像必须靠下嘴唇使出吃奶的劲才能将烟子撬出去；其中一个手里还捏着一玻璃瓶快见底的汽水，每抽一口烟就将吸管啜得滋滋地响。

立中盘腿坐在离门口最近的那张床上摸自己的嘴唇——他的嘴唇哪怕在夏天也老是干涩开裂，他几乎一辈子都在撕他的嘴皮。

“恩呀，是立中吗？”

“哪个在喊我？”他迟缓地站了起来。

我和那个兄弟顿时很来火，冲上去把他压倒在床上，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是你爷爷！是你爷爷！你爷爷在喊你！你这个王八蛋，我操你妈的！我操你妈的！我操你妈的！”我们并没有跟他闹着玩——如果当时倒在床上的是你，你就知道什么叫拳拳到肉。立中双手护头，痛得五官都移位了，可还是忍不住咯咯乱笑，甚至都忘了还手。

原来这家伙不好意思留在七中复读，就转到隔壁乡的乡办中学去复读了——在那里连鬼都不认识他。而且鬼知道他怎么想的，他不光是转去了更差劲的学校复读，还主动留了一级，从初二开始复读。如果我们去年也曾这样来找过他的话，哪怕是跑断脚也不可能找到他的……

推导出椭圆形的面积公式，让他大大地兴奋了一回。他开始脱光衣裤，只剩下一条裤衩。“我去洗个澡，你先看看那些杂志。”他老是忘不了那些杂志。立中出去之后，我发现这屋子里还有一个人——坐在另一张床上的一个童工。他竟然只是干坐在那里，那副神态就好像他早已习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那病毒一般的寂静。他的嘴角还残留着浅薄的笑的嘴脸，显然他刚才一直在欣赏我和立中之间的胡闹，而对于自己的存在，他早已意识不到了。他甚至不会去想：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撒泼胡闹？为什么他们快活我他妈还得在一旁老老实实地傻看着却不到处羞耻？看到这个混蛋就这样对待自己的尊严，像对待一条狗一样，我很想告诉他：我真是痛恨他，恨不得给他一顿拳脚。看到我望着他，他终于从别人的快乐中挣脱出来，他似乎吓了一跳，感到极不自在。他低下头去整理一下他坐着的那张床铺，似乎以此表明，那是他自己的床。他坐在那里并没有错。他红着脸，有时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又赶紧往别的地方瞟去。有两次，他甚至想哼一句歌，但马上又胆怯了。我想，他就像被一场戏吸引着入了神，那场戏谢幕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孤身处在黑夜里的荒野上，他一定十分渴望逃离这可怕的地方，却没有勇气迈开脚步。

这时走廊上的电话铃响了，小家伙终于迎来了脱身的机会。电话是找立中的，他便在浴室的门口轻轻地敲了一下：“立中，你的电话。”那声音就像一个羞涩得快要哭出来的姑娘。立中开了门。他终于大松了一口气，郁郁寡欢地走下楼梯，消失在夜色中。

立中几乎光着身子去接电话。他的普通话真是笑死人了。“喂。喂，你好！”但紧接着他就用家乡的方言说了起来。突如其来无聊将我裹了起来，我一头栽倒在床上，终于翻开了一本杂志。那些故事千篇一律，主人公似乎都是那几号人。我正在纳闷：这个风尘女子不是嫁给那个退伍军人了吗，怎么这会儿又变成了这个喜欢做慈善事业的富商的情妇，搞得他在她和糠糟之妻之间陷入了两难，并于灵魂深处引发了一场关于爱情与伦理、私德与诚实的价值之辩？过了一会，我才恍然大悟，那已经是另一篇故事啦。每一篇故事里都有一个婚姻的插足者，每个出轨的男人都特别像哈姆雷特。立中在那边听着电话，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刚才偶尔有几句飘进我耳朵里，什么“要不要告诉家里”啦，“怎么赔偿”啦，“严不严重”啦，“先别想那么多”啦，这会儿只剩下立中不停地说着“嗯。嗯”。

“有点倒霉……”立中告诉我。原来电话是他哥哥打来的。他哥哥在东莞的一家五金厂的车间里做事，因为也还没娶老婆，所以经常像发了疯一样卖力干活。今天凌晨，干了一通宵之后，他困得直打瞌睡，结果右手中指被冲压机切去了一小截。我说：“啊？”“现在在医院，止了痛，他叫我别告诉家里，免得他们担心。”立中笑了笑，“真的是什么倒霉事都让我家里碰上了。不过还好，不算太严重，只是切掉一点点而已。”我说：“厂里会赔钱吧？”他吸了一口烟说：“肯定赔！不赔我会闹翻天！”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不过，后来我和立中讨论了一下，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厂里不但会出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应该还会有一笔抚恤金什么的，反正这段日子里，他哥只管躺在医院，该得的钱一分不会少。“不过，那太痛了。我哥运气一直不好。我们兄弟运气都不好。”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此事，疯狂的本性又抑制不住了。我们开始开一些下流的玩笑。

他说女人，他一点也不陌生，只是还没有谈过恋爱而已，所以他请我讲一些恋爱中的趣事给他听。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也给我讲他的一些奇遇，仍然是邓立中式的真假难辨的奇遇。比如，他在乡里的中学复读的那会儿，竟然被选为班长。班主任十分器重他，因为他看起来忠厚老实，成绩在当地来讲还算拔尖的，所以经常请他到家里吃饭，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班上有好几个女生总是会望着他出神，而他则一门心思地只想着和她们做那件事，结果这个念头反而吓得他不敢靠近她们。在冬天，他经常在课堂上脱了鞋将脚塞到前面的女生的屁股底下。我以为我听错了，叫他再说一遍。“你不相信？”他好像觉得这事理所当然，“我那时有好动的习惯，喜欢脱了鞋把脚搭在前排同学的凳板上。我前面坐了一个女的，经常在课间和我开玩笑，不过我开始还不知道她那么淫荡，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了凳子有点晃，那女的就起身拖了一下凳子，我为了稳住，便把双脚往前伸了一点，结果她坐下来时便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脚上。你想看，大冷天的，那一下真暖和啊，兄弟！”他说着就咯咯笑，还兴奋地拍拍我的脸，“可是她竟然装作不知道，骗鬼哦！那么大一坨东西硌在屁股底下，竟然毫无察觉，你说可能吗？我的脚在那里待了一阵就不安分了，我缓缓地动着，把一只脚尖慢慢地探到她的那个地方，一节课不停地磨来磨去！哈哈！以后每次只要我把脚搭到她的凳上，轻轻地踢她一下，她便把屁股抬起来，好让我把脚塞进去。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天，没有哪个发现。”我觉得这一切太不可思意。我问他：“下了课你们怎么办？”“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啊，照样开玩笑。”“那时多大啊？”“大概十五六岁吧！”我们就这样聊了一晚，如天方夜谭，兴奋不已，一直到凌晨五点，才开始有了睡意。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震耳的音乐吵醒了。看来又多了几个疯子。一个打扮得很入时的小伙子扮着鬼脸来到我和立中睡觉的床边，拍打立中的脸：“黑鬼！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不用干活了，厂子快要倒闭啦！哈哈！你放心睡吧！”立中也早就被录音机吵醒了，不过他还想再睡一会儿。这时他睁开一只眼睛对那家伙咆哮：“你叫老子怎么放心地睡嘛？你这个杂种！”看到这情形，我就知道，他们关系还不错。不过，我真的不喜欢那家伙。他幸灾乐祸地大笑：“不骗你，今天真的不用上班，厂长亲自跟我说的。等下来跟你决一死战。”他摇头晃脑地出去了。我看钟，只睡了两个小时，不过够了，我觉得精力充沛。对面床上的小家伙还在沉睡中，他张大了嘴巴，鼻孔里发出哀鸣般的微弱的鼾声。也许昨晚他一直被我们吵得无法安眠——我和立中一聊起来就忘了这屋子里还有别人。刚刚跑出来的那家伙马上又兴冲冲地跑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盘摆好的象棋：“来！来！决一死战。你这个黑佬！”他简直有点自我陶醉地笑着，一进门就大声嚷嚷。立中一看，立即爬了起来，连衣服都没穿。因为这宿舍里连一张桌子和椅子都没有，他们两个就蹲在那张没有人睡的空床上厮杀起来。我一下子觉得特无聊，重新躺倒在床上，打算再睡上一觉。我最后望了一眼立中，他把背弯成一张弓，黝黑的皮肤底下降起一身的骨头，那简直是另一个形象：一个苦难的劳动者和一只枯燥的灵魂，他们在这里碰到一起，愤怒地控诉着立中——一个可笑地活着并剥削自我的剥削者，一个令人气愤地抛弃了理想和责任的主人。

我脑子里一片昏昏沉沉，好不容易才睡着。差不多到中午我才醒来，立中盘坐在我身边，十分投入地边看杂志边用两个手指摸着自己的嘴唇。他一看到我醒了，便破口大骂：“你他妈的终于醒啦，爷爷肚子都饿瘪啦！”他决定午饭就在厂里吃，他可以在食堂里多打一份饭，因为他实在太饿死了，恨不得立马吞一碗米饭下去。其实我知道立中没有钱，又不愿我请客，毕竟我是客人。这个畜生！打来了饭，我们就坐在床沿上吃，那些菜被我们扔了一地。吃过午饭，我们到镇上闲逛了一下午。当然又少不得动用别人的自行车。立中教我认街上的车，随便一辆车，他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牌子，什么价位，是国产车、合资车还是进口车，产地是哪里。他告诉我，他以前在汽车美容店干过几个月，学了一点皮毛，但现在全忘光了，除了那些车标一个没忘。我问他，你还干过什么？他说数不清，服装厂、五金厂、塑料厂、模具厂、食品厂、印刷厂、汽车美容店……还有很多，他自己都记不起来了……我说，你进过那么多厂，如果随便在哪个厂子里一直干下去，你现在就是老师傅了，你就可以带徒弟了；你每进一个厂就要学一门手艺，好不容易掌握了，又换一个厂，又要重新去学，然后就把前面学会的全忘了，你永远都是新手，永远不能精通，你为什么呀？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以后究竟想要干什么，你到底考虑过没有？他惊讶地瞪着我，像瞪一个怪物，吼了起来：在一个厂子里？一直干下去？你去试试！我说，就算实在待不下去，要跳槽，你可以在同一个行业里找啊，这样你之前积累的经验都用得上……

“看到没有，迈凯伦！”一辆造型夸张的跑车从我们面前小心翼翼地开了过去，他正好以此岔开话题。

“是啊，迈凯伦，我听都没听说过。可是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立中有点赌气地讲述起他的另一段奇遇。他说他在汽车美容店上班的时候，差点爱上一名有夫之妇，那女的每隔十天就开一辆红色的迈凯伦过来，点名让他洗车。她不像别的车主，把车扔在那里自己忙别的去了，她会站在一旁欣赏立中干活，还会一直陪他聊天。她每次都会带些他以前没吃过的糕点过来给他和他的工友们吃，不过她从来不亲手给那些工友，而是一股脑儿地全丢给他，让他去分。她老爱问他有女朋友没有，摸摸摸过女孩子的手，是否还是处男。立中就说，手还是摸过的。那女人就扑哧一笑，笑得“口红都从嘴唇上坐了起来”——我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总之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我尴尬地等着故事中不堪入耳的部分，但立中竟然就这么仓促地结束了他的讲述，以一句强说愁式的感慨：“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就知道，对他来说，要讲下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他毕竟不了解有钱人的生活，不要说在床上如何，即便是约出去吃个饭，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细节。与其说他会爱上一位贵妇人，不如说那只是他出于无聊而做的一个梦而已，就像他信以为真地认为他确实亲历过的诸多奇迹一样。

那些奇迹，我亲眼目睹的只有两次，都集中发生在短短三天之内。其中之一便是我们歪打正着地在招待所里找到了他。那是第一次重逢，我以为我们从此不会再失去联系。结束了第二次中考之后，立中决定先不着急回家，而是留在一中陪我们玩两

天。傍晚，我们拉着他一起到街上去打台球。走在路上，我们进去店里买包烟的工夫，一出来就看不见他的人影了。我们有所不知：商店旁边有一条短短的巷子，他从那里跑了。

第二天中午，我和那位兄弟正在一中的食堂里吃饭，他郑重其事地跑来道别：他找到他失踪多年的姐姐了，他必须马上赶回家去。这就是发生在立中身上的第二个奇迹。——和充斥在往后漫长的、注定虚度的一生中那无数甜腻的、虚头巴脑的、假得仿佛贿赂的命运似的“巧合”相比，那真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人生阶段哪！——

根据他的讲述，我们刚进去买烟，一个载客的摩的司机——可能是为了抄近路——就拐进了旁边那条巷子。他觉得那个摩的司机特别像他们村里的某个人。他撒腿追了上去，追到巷口的时候，又顺手召了一辆空摩的，一路尾随着。如果一直跟下去，立中担心身上的钱不够付车费，好在送完客人之后，那人就骑着空车朝郊区驶去。立中冷静地跟着他，一直跟到他家里。那是两间临时租来的简陋的小木屋，灯光昏暗，人影摇曳……他在屋外紧张地徘徊，观察了很久，直到确定里面那个女人是安全的，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的相处是和睦的，甚至在听到她发出好多次笑声之后，他才终于走进那间小木屋里……那真是如假包换的奇迹！不存在对命运的贿赂，因为他从来没有为这个姐姐祈祷过任何一位神仙——他从小就认定这个姐姐死了，在父母和村民们的口中，那个和她同一天从村里消失的男人被渲染得一无是处，甚至凶暴残忍。可是现在，他却亲眼见到姐姐活得好好的，那个男人在外面勤勉地劳动，回到家里对她说听计从，他们生下的小女孩活泼伶俐，都已经会踩在凳子上帮爸爸妈妈舀饭了……

立中说他再没心思陪我们玩，他必须连夜向父母汇报这个喜讯，同时替姐姐夫探探口风，看二老是否愿意接纳这一家三口。

我和立中第一次奇迹般的重逢，因为另一次奇迹般的重逢而迅速中断。我们只待在一起重温了三天的兄弟情谊，从此他便再次在我的注视下消失，直到几年之后再度重逢，可那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那一年，我从大学毕业，尝试过不同的工作之后，感到前途一片灰暗。一位玩得好的大学同学打电话给我，得知我处境艰难、心灰意冷，他竟然哈哈大笑。他说他们单位在招人，待遇如何好，工作如何轻松。我有点儿心动，答应他周末过去看看。他却叫我立马辞掉工作去报到，晚一点就会被别人捷足先登。

我一点也不怪我那位同学，因为他——就跟后来的我一样——是真的相信那个由高层们精心编织的财富神话。跟你们想象中的情形有所偏差，在这里不存在暴力，不存在胁迫，甚至不限制人身自由。全靠精美的谎言、能把自己都绕进去的诡辩、从一切细微处入手却又毫不刻意的关怀、甚至不惜把心窝子掏出来的自我剖析，让人不知不觉地卸下防卫，努力想要去理解——那个令他们如此激动、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你的崇高事物，究竟建筑在哪一层逻辑基础之上？他们津津乐道、无比崇尚的光荣理想，到底是以什么经济学原理为现实支撑？然后在某个发出“叮”的一声的时间点上，你突然想明白了，逻辑的难题被你攻克了，你觉得一切如此奇妙，再没有比这更简单明晰的道理，再没有任何思维比这一思维更具有形式感和几何美，像是某种晶莹剔透的矿物晶体在你脑中以慢动作旋转闪烁，仿佛幸福的命运向你呈现了一朵玫瑰，你突然感到幸福溢出了胸口，突然变得和他们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种幸福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

我忘了我是如何辗转联系上立中的，总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至少其困难程度与数年杳无音讯不相匹配。第二天他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同样毫无困难的是，立中瞬间就理解了我之前费了老大劲才理解的一切。他脑子里那“叮”的一声出现得特别快，快得令我担忧：他是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聪明而假装理解了？但是听到他躲在屋里打电话四处借钱，我才明白过来：他是真的笃信这一次可以翻身。

没多久，他把他弟弟叫来了。他弟弟笑起来憨憨的，一副智力不逮的样子。他完全不可能理解，那对他来说太深奥了，听久了就会头晕，但他又完全不必理解，因为“反正我听我二哥的”。

我事业的起步非常迅猛。短短一个月，不但成功发展了一名“家人”，而且家人又发展了家人。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事业可悲地陷入了漫长难熬的停滞——我、立中和他弟弟，都没能为我们这个小小家庭带来新的成员。

为了付房租，我们只能继续打电话四处借钱。我们不得不啃馒头吃青菜度日，有时甚至还要靠别的家庭接济。之前被我们想得非常通透的那个简单而美妙的道理，我们都不敢再去细想回味。别的家庭中，不断有成员向家长请了事假，去了老家或别的城市，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最煎熬的时候，一场自内而外的灭顶之灾解救了我们——高层们因分赃不均引发了械斗，整个组织被公安机关取缔了。我们一行六人乘着夜色逃往一个偏僻的村子。那附近有一片刚建成不久的工业区，我们打算在那些工厂里找一份事情先做着。

我们像蟑螂一样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有人睡床上，有人打地铺。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天中午，我刚从外面的洗澡房用冷水冲完头回来，推开房门，只见一个哥们正打着赤膊躺在地板的凉席上，鲜红的嘴唇一张一合地跟他们聊着什么。我愣住了。因为我越盯着他看，越觉得他像一只又短又肥的虫子，那松松垮垮的内裤丝毫不能赋予他人的属性；而相反，虫子的属性在他光溜溜的、完全独立于周遭环境的身体上，立体起来、膨胀起来，吞噬了一切。后来，我至少用了三年时间，才把这个无比恶心的印象从脑海里清除出去。

那时，立中打听到有几个老乡在附近打工，便跑去借了两辆自行车，我们两个骑着车到镇上转了一天，打听工作。太阳晒得睁不开眼，我们停在一片树荫下面乘凉。我问立中恨不恨我。

立中撕着嘴皮，腼腆地笑笑，赶紧低下头猛吸一口烟，“莫提了……”

我隐约感到立中苍老的内心深处（至少在那一刻是苍老了）掩藏着一股子不安：他不好意思见证了我们的愚蠢，更不好意思让我因为自己的愚蠢而背负上了巨大的亏欠——对他的亏欠。是他，让一个他向来认为比他优越的哥们，丢了脸，露了怯。他不好意思。

没多久，我们都先后找到了工作，我继续跑业务，他则和弟弟一道，在不同的工厂车间回来跳槽，似乎永不安分。他没有再联系我。

四年之后，我在中山古镇推销灯饰，坐在一辆公交车上，看到窗外一间灰头土脸的工厂门口，像远古时期的巨石阵一样，一堆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工人七零八落、或站或蹲地端着碗在那里吃饭，从他们当中，我一眼就认出了立中……从镇上回到厂里，正好赶上晚饭时间。立中丢下自行车，以冲刺的速度跑到食堂，又打了两份饭菜来。我们照例把菜扔得满地都是。这时，那个老头进来了。他那双贼眼就像一对忠诚的奴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要先为他探路。经过昨天下午的事，他自然对我耿耿于怀，但还不敢明显地表露出来。立中抬头看了他一眼，也马上厌恶地扭过头去不再看他。正当这老头被他弄得狼狈不堪、很没面子的时候，立中又迅速改变了主意，冲着他热情地打了声招呼：“你好，老乡！吃过饭没有？”可怜的老头受宠若惊，立即以双倍的热情同立中寒暄起来。其间，他的目光一直躲躲闪闪地在我和地板之间瞟。我以为他要多管闲事，叫我们别把菜扔在地上，没想到他却冲着那些菜啐了一口，咬牙切齿地说：“妈妈的，比猪食还难吃！”看得出来，他是想用这句话来恭维我们。最后他终于结结巴巴地把话题扯到了正事上（他是这家厂子的门卫，就像立中说的“一条看门的老狗”）——“呃，这是你朋友？”是的。立中说。“他今晚在这里过夜？”“当然。”老头便提出，立中应当填一张单子叫厂长签字，免得让他为难。立中当然不答应。“签个卵字，”他说，“你当我们是贼吗？他又不是头一回来，他昨晚还住在这里。”但这老头竟敢再三要求“这事得按规定办”。立中坐在床头，闷着脑袋一个劲地抽烟，那气氛有点紧张。我以为他会站起来扁这老头一顿。可最后他却低着头不声不响地出去了。过了几分钟，他拿着厂长的批条回来了。老头赶紧向立中解释：“我也很为难的”，并不停表示歉意，立中只不咸不淡地说：“哦，哦，哦。”老头走了之后，我问立中：“这么快就批了？”立中居然神气起来，说厂长只不过是他儿子，不过还是他众多儿子中比较听话的那个。我们又一起骂了那老头一通。后来我跟立中说，明天一早我得回去上班了。

“也好。”他说，“明天我也要做事了，兄弟，不可能像今天这么走运。听说下午厂里来了一笔订单，十有八九会连着赶几天工，说不定还要加夜班，有时候做到大半夜。第二天早上又是八点钟上班，还不能请假。唉，想起来就脑壳痛。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兄弟！你说为什么不在一个厂子里干下去——干久了会要人命的啊！你会觉得你不是在做事，是在卖命，总觉得换个地方应该会好一点吧？卵嘞，后来才发现，到哪里都一样。像我们这种人，一辈子就这样了，就卖命吧。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我想跳槽，老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干，谁吃得消呢？你总想休息几天吧？但是人家不给你休息，事情不能耽误，几百万的生意不能因为你说累，搞得交不了货。那就只能辞工喽，等休息够了，再花时间找呗。可是时间过得好快呀，一晃就混成了这副模样……我还记得那一次，你们到招待所去找我，好开心啊，那时根本想不到以后的生活会是这样，连想都不敢想，真的……你看：我家里虽然也是农村，但从小我爸连锄头都没让我摸过，我也一直认为那些卖力气的事嘛，应该是别人去做的，我哥、我姐，或者我弟，谁能想到呢，收拾行李从那间招待所里出来以后，所有的事情就已经被决定了，没办法挽回了，以后就只能在社会上苦混……就好像命中注定的一样。”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

我去洗完澡回来，发现又一个一眼便可以看出少不更事的家伙坐在立中的床上，同立中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他简直像个中学生，不过他不像别的童工那样胆怯、寒碜。他大胆地同立中东拉西扯，看似超然、对立中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其实这傻瓜内心里倒是挺崇拜立中的——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他讨好似地（又故意显得漫不经心）谈到立中的弟弟，说以前立国也在这家厂子做事的时候，跟他是最能玩到一块的。接着他向立中问起立国的现状。立中坐在那里，低着头，我拿不准他是在敷衍他呢还是在认真倾听。他对那人的问题总是给出最简洁的回答，却又能做到（鬼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每问必答，没有透露出丁点的不耐烦，而这无疑又极大地鼓舞了对方提出新的问题，就这样，两人把这场沉闷的谈话持续了个钟头。我干坐在一旁，真是烦躁得要死，又不屑于加入他们的交谈。我差点就要被他们无限放缓的谈话节奏催眠了，这时那小畜生却站起来说要请我俩吃夜宵。立中说：“不用啦，大家都不是很宽裕。”于是终于告辞。我怒不可遏地大骂那小子不识趣，立中却笑笑说：“这孩子还可以。”

立中洗完澡后，又一个奇怪的家伙跑进来。这人给我一个很鲜明的印象：他的样子非常精干，说话走路都匆匆忙忙，似乎漫不经心，又似乎对某个早已认定的目标迫不及待。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写黛茜时，说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的味道。当时这个人给我留下的这种印象也越来越明显——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似乎在向金钱致敬，尽管他每次提到钱的时候，都装出满脸不屑的表情。不过，立中对这家伙倒也蛮客气。他向立中打听：“看到肥佬没？”立中说：“没有。这两天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子。”“妈的！”那人说。立中关切地问他：“怎么样？他带来了没？是不是真的有十二个面？”那人急败坏地说：“这头肥猪很可能在撒谎！”他们又站在门口谈了一会儿。我听到他们说“开采”“资金”“国家允不允许”什么的。然后那人就慌慌张张地跑了。

我问立中：“怎么回事？这人是谁？”

“哦，他呀？”立中说，“我工友。他老子在老家做点小本生意，也算是赚了些钱，所以他老是异想天开。上个月他听销售部的肥仔说起他们村里发现了水晶矿石，他脑壳顶上就开始冒傻气了，想跟他老子要一笔钱，到肥仔的家乡去开采水晶。他天天缠着肥仔，让他回家去带点矿样过来。最后肥仔也动了心，因为他答应给他一笔佣金嘛——如果开采的话。肥仔回了趟家，这两天好像过来了，却一直没见着他父亲，他怀疑他去找了别的主顾。”

“水晶？”

“是啊。不过我怀疑肥仔是在吹牛，如果真的是十二个面的水晶矿石，那不得了——那是水晶王呢！”

我何尝听过这个？虽然水晶这东西并不罕见，但我却从来没去琢磨过它，不觉得它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从来没想到它是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的。我突然很好奇水晶矿石是什么样子的。

立中说：“形状很规则，一般都是六棱柱体，透明、光滑、棱角分明。”

“哦？大小都一样吗？”

“不一样。有大有小，”他比出小拇指，“小的只有这么点，大的像砖头那么大。但形状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无论大小？”我开始觉得有点神奇了。

“那当然，就好比相似三角形……”

我顿时想踹他两脚。我受不了他一本正经地张嘴就来，更受不了自己还老是听得津津有味。我说：“说得好像你见过一样，你怎么知道这些破玩意啊？”

“我怎么知道？我老家是全国有名的水晶矿床，还上过报纸……”

“你老家？还全国有名？我怎么不知道？”

“难道我以前没给你讲过？那是九十年代的事了，我只有几岁……现在当然没什么人知道了。那时，我爹他们兄弟几个成天只顾着挖采水晶，连田土都荒废了，我叔叔他们说还种什么田喽！后来，我家里差不多堆了一屋子的矿石……”

“那些矿石呢？后来都被你们家当成白米饭吃了吗？”

“他妈的！你爱信不信……”

“我信你个鬼！有一屋子水晶，现在还至于落魄到这步田地吗？”

“看来我真的没有跟你讲过……那时，国家的勘探队不是到我们那里勘探吗？结果挖出一颗水晶王。我告诉你，有水晶王的地方就绝对有有大量的水晶矿石……当时我姑父不是正好在国家地质勘探队吗……”

“立中，你这个畜生！你怎么就有个姑父在那种地方上班呢？”

立中无辜地笑了笑：“我说了你又不信，可偏偏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安排他去那里上班的，国家给他分配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我爹立中呢。那时，国家不是规定了所有的水晶矿石只能由政府开采吗？不过，我姑父已经听到风声，说很快就会允许私人承包开采，只要拿到政府的开采许可证。于是，我姑父就从勘探队辞职回到家里，只把这事跟我爸说了。不过，那时还是不能开采，所以我姑父整天带着我爹满山坡转悠，探测哪些地方有矿，都做好了记号。一年之后，政策果然下来了，于是，我们家便在做过记号的地方挖了几个坑，占领了大部分矿，等别人反应过来，已经晚了。这时他们才明白，为什么我们家把田土都荒废了一年。”

“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有矿呢？”

“你傻啊？我姑父不是勘探队的吗？这东西难得了他？”

接下来立中讲述的内容——关于他姑父如何勘探水晶、他父亲和叔父们如何挖到水晶王，关于开采商们如何找上门来骗走他们的矿石，关于那一大箱子钱，我都半信半疑。但我没有再打断他，我完全陷入了他用声音描述的那个神奇的、黑白分明的世界，那样一个世界恰恰因为黑白分明而显得颇不真实，但不管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愿望作了一定程度的夸张，还是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他别有用心地编织的谎言，我都听得入了迷。

堆了一屋子水晶矿石之后，立中的姑父就说，不要再挖了，太辛苦了，还是应该先找到开采商，要不挖了也是白挖。

事情传开来，省城的记者一脸疲惫地来到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回去之后立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报道，说是发现了水晶之乡。没多久，一些主顾陆续找上门来。至于他们如何跟姑父商讨开采事宜，如何敲定将来的合同条款，年幼的立中一句也没听明白，或许是觉得枯燥无味，干脆没仔细听。他只讲了一个令他记忆深刻的画面：有一个号称很有钱的开采商，五根手指上至少有三根戴着金戒指，捻起一颗水晶矿石，对着太阳翻来覆去地看，一条七彩的光谱在他鼻梁上颤动，搞得立中无比期待他的结论，可他最后只说了一句：“有点玄。”真搞不懂他什么意思。成批的开采商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有的人很没诚意，连立中的母亲劳神为他们沏好的茶都忘了喝上一口，但来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带一口麻袋来，临走时也不会忘记装一袋矿石走，各种尺寸的都装一些，说是带回去鉴定一下，看是不是具有开采价值。就这样，这些人总共带走了几百公斤的矿石，有一个竟然趁他们不注意偷走了一颗水晶王。

“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相信这些自己找上门来的开采商了。这些人只是嘴上说自己多有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钱。”立中说。

直到那个香港人提着一箱子钱找上门来。那一箱子钱，立中说，他姑父估计了一下，至少有一百万。香港人来了之后，也不急着谈生意、看矿样，就说好困呀，好累呀，“你们计里的三落太难久啦，累洗我啦”，说立中他们那里的山路很难走，他很累了，只想睡觉。立中赶紧把床指给他，他二话没说倒下就入睡。他睡觉时，那箱钱就摆在墙角，连锁都没锁。一家人紧张得要死，香港人躺在床上鼾声如雷，立中的父亲就坐在门口死死地守着那箱钱，一步也不敢离开。从此，那个香港人就在立中家里住了下来。“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招待他呀！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住不住得惯……我们生怕怠慢了他。他倒是挺随意，有啥吃啥。我们那里逢二五八才赶一次集，不赶集的日子可能连肉都没有，他也能吃两碗米饭，打一个饱嗝，说‘七得好饱好饱’。”他喜欢喝立中家里自酿的糯米酒，餐餐都要陪立中的父亲喝上两杯。他不像前面来的那些人，他一点也不着急，不说要开采，也不说不开采，更不急着走，每天就跟着立中的父亲和姑父到山上去转悠。那一箱子没上锁的钱就摆在立中家里，立中的妈妈成天提心吊胆地守着它。只要村里一有陌生人出现，他妈就特别紧张。那时，有一对外地来的中年夫妇，连续两天跑到村里来收鸭毛——“巴掌大点地方，哪有那么多鸭毛？”他妈说。立中的父亲就专门到镇上买了两条大狼狗回来拴在家里，后来收鸭毛的两口子便再也来过了。人家都担心得要死，他自己却跟没事人似的，仿佛那箱子钱早就被他搞丢了一样。

有一天，香港人在饭桌上宣布：他已经决定了，他百分之百地相信立中的家人，同他们合作他根本不需要担什么心。他说，这里的人个个都很纯朴，就算不是为了做生意，他也愿意多跟他们打交道。他决定马上回香港调动资金、选购设备，至于请

专家鉴定他也觉得没有必要了（他果真没带走一块矿样），因为立中的姑父就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人格也足以信赖的专家。他说，这些天来他受到了这辈子最好的款待，为此请允许他拿出一笔钱来作为酬谢。他的意思是给他们十万，如果他们愿意，他不在乎再多给几十万。但立中的父亲代表全家婉拒了这份好意，他一分钱也没要。他说：“我们不要这个，”——这个憨厚朴实的农民，甚至羞于说出“钱”字，而且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吃力，“你给我这个，我不开心；我开心，因为你是这个，”他朝香港人竖起大拇指，“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朋友。”那香港人流着泪，依依不舍地走了。

那场面还真他妈的有点感人呢！可是，我脑子里想到的却是他床上的那堆杂志。我说：“唔……立中，香港人和你父亲都很了不起嘛……简直就是他妈的圣徒！我感觉跟他比起来，我他妈的啥也不是，畜生都不如。”

立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换作是你，你肯定会要。换作是我，我也会要。但问题是，现今这世道，你我都碰到这种好事。问题就在这里：你觉得这都是我编出来的，现实中从来不会发生。有时连我自己都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怀疑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那时还小，根本就理解不了这种事情。别说我，大人们也不理解。我印象中，香港人走后，我叔叔他们还怪罪过我爸呢：就算真要了那笔钱，谁又能说我们半句闲话？但事实就是我爸一分钱也没要。他可能是不敢要；也有可能觉得这是香港人对他的考验，通过了这次考验，以后有的是挣钱的机会。但真实情况如何，我爸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我现在倒觉得，幸亏他没要，不然，后来发生了那种事情，他很难说得清楚的。”

“后来？那香港人回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突然被自己这个问题拉回了现实，不由得打量了一下立中身处的这个猪狗窝般的环境，心里似乎有了答案：“他……是不是再没回来了？该不会又是骗你们的吧！”

“他死了。”立中一声叹息，“当天晚上就死了。”

“啊！怎么死的？”我竟然感到一丝莫名的兴奋。

“被我们镇上两个后生杀死的。唉，可能他真的是有点天真，去过我们家之后，便以为我们那地方的个个都那么安于本分。他大大咧咧地提着那箱钱去了县城，因为买了第二天的票，便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酒店住了下来。他哪里知道自己早就被人一路盯梢上了。在酒店的房间里，那两个王八蛋用水果刀捅死了他，抢了他的钱跑了。”我惊愕不已，想不到结局是这样。我们沉默良久。我突然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太不自在了。这种不自在的感觉现在就开始笼罩着我。过了很久，我说：“立中，那你们家现在还可以找人开采水晶啊。”

“水晶早就不稀罕了。”

“那个香港人死后，你们家就没找过别的开采商吗？”

立中沉默了一会儿，好像不愿意提起某件事情一样。后来他说：“当时出了这么大的事，在我们那里影响很坏。县公安局派专案组来进驻我们村，查了好些天，成天在我们家出进。村里人都有些幸灾乐祸，甚至传言说专案组是专程来审我爸的。他们也确实缠着我爸问了很多问题，可能只是为了搜集线索，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们已经认定了我爸是幕后主使一样。我姐就是在那时离家出走的。她后来跟我说过，她是承受不住那种压力。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村里的一个后生，也就是我姐夫。他们这一走，我们家的嫌疑就更大了。有人甚至提议让警察将我们全家控制起来，同时分派警力去追拿我姐。我爸也急了，去追啊，谁不去追谁是王八蛋！他那时忙着应付警察，根本脱不开身，女儿被拐走了，他巴不得警察去帮他找回。他其实是一点怀疑我姐夫的——如果香港人真是他杀的，那我姐在他手上岂不是很危险？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挺佩服我姐夫的，那种情况下还敢带我姐出走，一点也不怕惹火上身。好在那时警察已经查到了关键线索，没多久就破了案——是我们镇上的人干的。破案那天，我爸大哭一场。他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水晶矿石都倒进了粪池里，说，自从挖了水晶，就没给我们家里带来好事，来的都是些骗子、拐子、杀人凶手，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那么好的人，还把人家的命给搭进去了，以后都给我离那灾星远一点。”

从那以后，立中全家再也没有指望靠开采水晶来致富了，又重新回到了长满荒草的庄稼地里，仿佛一艘沉重的货轮，刚一望见岸却突然掉转船头，复又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大海。看到立中家丢弃了矿坑，邻居们纷纷将它们占领，并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上面。但最后，他们也没有找到一个靠谱的开采商。过了几年，水晶便没那么值钱了。

那天夜里，我们并没有聊得很晚。立中很快就酣睡了，他的呼吸似乎有点沉重，从喉咙里艰难地滚出，然后痛快淋漓地喷向空气中，像是从内心深处向这个世界吐出的一口口痰。我想，他一定在睡梦中惊恐地忏悔着，为某种他能想象到的可怕的罪行及下场，向着他的同伙——所有和他一样受苦的灵魂，向着他从未曾善待过的自己，向着他的父亲，不停地忏悔。我侧过身去，轻轻抱住了我的苦难的兄弟。“别骚！”他闭着眼睛吼道，然后发出一串短促而响亮的笑声。



彭剑斌

笔名鳜膛弃，1982 年生，湖南桂阳人。著有短篇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不检点与倍缠绵书》。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 小说

# 小恶

李一洋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我要描述的是一种隐晦的东西，  
它比空气更难以名状，却同样无所不在

那个上午有两件事值得被记录：第一，一场战争开打了；第二，坐在我对面的蕊初点了一份凯撒沙拉。

战争发生在离我十分遥远的两个国家之间。据新闻说，除了给股市和金价带来一些震荡，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但不是说这里没人关心；不是说这里的人们不知道，在那些他们从未听闻的城市中，有炸弹被投落，有战车被肩扛式火箭击毁，有眼睛熄灭在废墟之下；不是说战争各方的拥簇者不曾争吵，亲友间不曾因价值观的分歧而决裂——但在任何一国的领事馆前都不会有人高举“反对战争”的标语，米价不会暴涨，猪肉供应暂时稳定，不会有人在工作场合争论谁是侵略者、谁是法西斯，即便战争被提起，也仅仅是一种谈资，就像阿森纳与利物浦之间的一场小组赛，关注的人激动片刻，多数人无动于衷。但那场战争真实地发生了，且正在发生着。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蕊初说，她在生酮，中午只吃沙拉。她对妮可这样说，拒绝了中午一起吃麻辣香锅的邀请。她的头发比上周短了些，染成亚麻色，微微卷曲的发梢压着浮雕般精致的耳廓。她说，她去理发了——话题在她们之间迅速切换着——找了位酷似金宣虎的造型师，造型师的名字叫 Akira（あきら？她念的是 A-ki-rua）。她说，湖南人 Akira 在大阪的发艺学校研修后回国开了自己的造型工作室，擅长剪日式清楚系的发型，从不为了推销护肤品而 PUA 顾客，不办卡。妮可说，把名片推给她，快。蕊初说等等，她先下好单——酱料该选威士忌千岛还是摩德纳油醋？

收到老任的消息，我关闭正在浏览的新闻，拿出笔记本，屁股离开椅子。蕊初的视线从手机转向我，瞬间又返回屏幕上的支付页面。我猜那是她当天第一次注意坐在对面的人——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这个人是她的新同事，除了名字和在国外成长的经历，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但她与我是说过话的，在我入职的第一天，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她问：melancholy 怎么发音？她不确定重音该放在哪个音节。meh·luhn·kaa·lee。我告诉她后，她显露出一副不信服的样子，她说我的发音方式与她当初学的不一样。我说，反正北美人就是这样念的。这样啊，我学的是英式发音。她说。

我敲了敲虚掩的门。那是老任的门。

有同事说，老任总是照着梁文道的风格穿衣服。我知道梁文道，《锵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和《一千零一夜》我看了很多年，他念的那些白字给了我不少自信，使我领悟中文好不好跟念不念白字没必然关系，然而当我尝试回想他的样子，得到的却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记得他的头是光的，戴眼镜，脸不怎么好看，除此之外都像打了马赛克。至于他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款式的帽子，对不起，我没留心过。事实上，我认为一个人的外表与他是谁也没有必然关系。那不值得被回忆。

然而，当我一推门，看见坐在办公桌后的老任，一个完整的、栩栩如生的梁文道油然映入脑海。他戴着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外边披着说不清是蓝还是紫的针织衫。那是一身聪明的装束。他的头发同样不甚茂密，仿佛只差

一顶帽子——顶毛呢材质的灰色鸭舌帽——就能跟着音乐走出茫茫夜色。

What's up？他的开场白轻松得过头了，刻意了，于是我知道他要谈的必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他会指出我某一方面的问题；他会委婉地批评我的失误。面试时他说过，判断一家公司是否 people-oriented 很简单：看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能否开诚布公。我相信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老板；因为说那句话时，他腰杆笔直，眼睛看向我的眼睛，胸腔共振得像个白人。况且老任是 Emory 毕业的，Emory 的 MA，但不知为何，说着 what's up 的他让我想到的是那种会出现在乡土电视剧中的村干部形象——仿佛即将说服我答应开发商的拆迁条件。或许“图谋不轨”这个形容太严重了，但称他的语气“别有深意”并不夸张。

上课还习惯吗？我坐下后，他问。那只是客套，“还不错”“挺好的”都是他想听到的答案。但我想表现自己，于是强调那些阅读材料都是我在高中时读过的东西——Stanton, Woolf, the Federalists——文章不难，难点在于如何向英语程度有限的学生解释，还有那些绕来绕去的句子……

长难句，他打断我。我们管那种句子叫长难句。我点头。句子又臭又长又难懂，难怪叫做“长难句”——it makes perfect sense。老任继续：“我知道将一件事解释得让所有人都明白有多困难，哪怕是一件非常非常 intuitive 的事。你的课我旁听过两次，我觉得很好。你讲得很透彻，很贴近学生的生活。”

我道谢，说我想尽量用简洁的语言上课；那应该是一种我自己能轻易表述的语言，也是学生们能轻易理解的语言。他倾听着，像在捕获一个新奇的概念。“这个说法有意思。你能表述的语言，他们能理解的语言……但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

我等待。

符合国情的语言。他压低声音。彼时的他看起来不像梁文道了——不像一个读书人了——而像一个神秘主义者，一名准备揭示命运的占卜师。不受控地，我尝试把符合国情四个字转换成英文。那是我在 ESL 班时养成的心理怪癖：遇见一个不能理解的概念时，我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转用另一种语言去解释：就像小时候的我面对一个英文生词，总是试着在汉语中寻找对应的词汇。但那不是生词，每个字我都认识，也似乎听人用过；我无法领会的是，要我符合的究竟是哪些国情。我等待说明，而老任只是世故地笑着，差一点我就能听见他从嘴边收回的心声：“这不用我说吧。”

那种讳莫如深让我想起我爸。那是在送我去洛杉矶机场的路上，我们刚吵过——为了我去中国工作的决定——尚处在沉默的休战期，他握着方向盘，视线不离公路，冷不防地开口：“在那儿少说话。”他没继续下去。但我听得出来，这句话的背后藏着年轻时在国内栽过的许多跟头。我时常从他以及同一代移民身上感受到一种酸葡萄味的愤慨，好像在说：对，他们生活得更好了但那又如何？他们还是无法随意地谈论一场千里之外的战争。他从不对我说太多；他们不愿检视手臂上的旧疤；他们将淤血藏入心中，时隔多年，这些血液酿成了黑酒，只偶尔满溢出一两朵浮沫。我没多问，因为在我身上，话多从来不构成问题；反而，很多人认为我不够 outspoken——不够心直口快。在我成长的国家，含蓄是不自信的体现，因此我才想着在一个视谨言慎行为美德的地方生活。在这儿，我以为我会更自在。遗憾的是，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一愿望成了对他人生的背叛。

“最近不是在讲与制宪会议有关的文章吗？”老任随性地说，仿佛这仅仅是临时想到的例子，仿佛这不是此次谈话的重点。“我知道让学生们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他们就无法深度地解读文章，which means 答题会很困难。你的意思我懂：你想让他们感同身受，好理解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这很好，可是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讲解时没必要牵扯过多的‘意识形态’。他们要考美国人的考试，不是变成美国人——你懂我在说什么吧？”

他被自己的反讽逗乐了。我默不作声。我在思考。我想领会而不得的是，那场 1787 年在费城举行的会议提及了什么，使一个两百多年后的培训班老师也必须三缄其口；是“无代表不纳税”？是三权分立？是任期制？……直到我醒悟：我往错误的方向思索着。我本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

有学生反映？我问老任。我忍着不说出那个能更准确描述此类行为的词——我的中文够好，在这个国家待得也够久。“没有，没有，你想多了。”黑框眼镜背后的眼睛睁圆了，他摆着手，流露出一丝恐慌。直觉告诉我我离真相不远，但直觉无非是一种自以为准确的臆测；我深知，直觉很可能是错的，毕竟我的学生们来自国际高中；他们读过狄更斯，读过马克·吐温，甚至读过一点删节版的奥威尔；当被问及什么是 diversity、为什么 tolerance 对于一个社会是必要的，他们能用英文侃侃而谈。我不愿承认在他们之中已有人感染了那种卑劣之恶。我乐观地寻找理由：也许，老任是在担心我和学生之间产生误会。

“Anyway，就是提醒你一声。”他比先前更爽朗地笑着，更梁文道地笑着。“小事情，你留个心就好。”

的确那就像一件小事被翻篇儿了。余下的时间，他与我聊起了暑假的课程计划；他告诉我，除常规的考试培训外，我们还会开设科幻文学课、美国历史课、职业探索课、基础拉丁语课，甚至他还邀请了一位从纽约归国的导演，教学生们如何专业地赏析艺术电影。“我们会全英文授课。”他兴奋地说，“我想让学生全方位 immerse 在英语语境中。我想证明：我们不止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我假装听得津津有味，每半分钟应付一句“哦哟”“这样啊”“挺有趣的”之类的话，直到我好像真的被他的宏图大志吸引了，并为自己能参与其中而感到振奋，而片刻前埋藏甚深却隐隐鼓动的心结已无影无踪。我为什么该感到矛盾？我为什么不能心安理得？我若那么在乎畅所欲言的权利，我便不会坐在这，便不会与他交谈。

事实就是这样。

当我回到工位时，外卖已摆在蕊初的桌上。那是一个颇有质感的牛皮纸袋，袋口用蜻蜓翅膀似的绳结系着，像一个早于塑料时代的手工制品。应该说作为随用随弃的外卖袋子，它是别致的，使人能够相信里边的食物是经过精心调制的，是有机的，是清洁的。在美国，沙拉更为普及，但很少有人如此用心地包一份外带沙拉。你能在超市的

冷藏区中找到各式各样的同类商品；生菜、小番茄、苦菊等等被积压在一碰就哗啦作响的塑料袋内，包装的配色鲜艳、奇丑无比，连最不挑剔的消费者也会质疑那些蔬果的新鲜度。正因如此，我从不买袋装沙拉，我宁愿吃垃圾食品中的垃圾：薯片配可乐，可当我看着蕊初的外卖，竟然想着自己也该叫上一份。

蕊初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仿佛对午餐没一点兴趣。外卖员送得太早了，还有半小时才是午休时间。她肯定没在备课；一天中的某些时段，总应该被漫无目的地消磨。她在做些什么呢？（我按下回撤，点亮屏幕，好奇着）只有想象能够穿透隐私的屏障。只有想象不受视角的束缚，无需非此即彼；她在看小说，在翻阅与男友的聊天记录，在与我看同一新闻——当读到炸弹被投下、战车被击毁、空洞的眼睛缓缓熄灭时，她会作何感受？——或者，在我想象她的同时她也想象着我。在一个人的想象中，这并非不可能发生。

妮可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后，用指尖戳了戳她的头顶。她慌乱地拨了拨头发，弄乱了Akira 精心打理的发型。我的想象告一段落。

你饿吗？妮可小声问。饿，饿死了。蕊初回答。那还是一起去外边吃吧，妮可劝诱。蕊初指了指桌上的外卖袋，摊手。妮可轻巧地拿起牛皮袋，“哇哦”了一声，看向袋子上的外卖单。这家店啊，她说。那该是一句表达惊喜的话，却藏匿着某种遗憾，某种戒备。

怎么？果然，蕊初问。

这家的凯撒是蛮好吃的。妮可欲言又止，又不吐不快。但你没听说吗？他们用自来水洗菜。

蕊初怀疑地看了纸袋一眼，说不可能吧。

反正我是宁可信其有的。妮可语重心长。

蕊初说，小心点是没错，但不吃太可惜了。

你是舍不得那几十块钱吧？说，剪完头发是不是破产了？妮可笑。

蕊初说去死。

好啦，要不要 take risk 你自己决定。说完，妮可离开。

蕊初的眼睛没有重返屏幕。她低头盯着桌子上蜷起的左手，拨弄指甲底端的倒刺。她的手指纤瘦、白皙，留着桃色的指甲，捏成鸟嘴的形状，每逮住一片翘起的皮屑便奋力一拖，留下淡淡的血痕。从拇指至小指，她专心致志地重复这套工序，透着杀伐果断，好像没有事情比这项工作更值得关注，没有什么能够打断她，包括我的注视。她的长睫毛时而轻颤，不知是在忍受刺痛，还是因为内心的天人交战。她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份沙拉。她是矛盾的，她是焦虑的，而那样的她是美好的。

忽然——正当我重新打开有关战事的新闻时——她抬起头，长舒了一口气，如同一只从海面探头换气的海豚，看样子，她终于有了主意，她活动着手指关节，拂走了残留在桌面上的细雪般的皮屑，将手伸向外卖袋。她解开精心系上的绳结，从袋口中捧出了盛着罗马生菜、紫甘蓝、小番茄、土司干等食材的透明沙拉碗。她撕掉有磨砂感的纸封条，掀开碗盖。她看着她要吃的美味。

一次在课堂上，有位聪明且上进的学生问我，能否推荐几本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的原文读物。我向她推荐了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这是一本好书，却不是一本好读的书：我预料在她看第一遍时有很大概率会半途而废，她会在作者千折百转的语句中迷失，会常常困惑于文中的“她”或“他”指代的究竟是谁，会无法“提炼”小说的“中心思想”（一个在他们问题中常出现的词）。但只要她不放弃地读下去，或在放弃后重新拾起，她终会抵达一个新的境地；她会发现，那些考试中本来晦涩的文章变得清晰易懂，而这还不是最微末的附加价值；某个瞬间，她会像拉姆齐太太一样见到一束光，两短一长地闪烁着，照亮灯塔与她之间黑沉沉的海域；在那束光中，她会看清她自己。这是我推荐那本书的真正理由。

也是在《到灯塔去》中，我依稀记得，伍尔夫借拉姆齐太太的口吻描写过一个果盘。在女主人公的眼中，那些葡萄、梨子、香蕉，还有布满粉色螺纹、形似犄角的贝壳，被精巧地摆放盘中，像一盏从海王的宴会上带回的奖杯，或一丛铺挂在酒神肩膀的葡萄枝。很遗憾，我想象不出同等美妙的比喻来形容蕊初的沙拉。是的，她手中的不过是一件商品，但我能感受到，那是一碗美好的东西，因为必定曾有一双手，将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形状或体积的食材安置在最赏心悦目的位置；在它们被封起前，必定有一个人——无论他或她是谁，或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在心底希望它们会被欣赏，被享用。菜叶上更不见一丝泥土或一滴水珠残留，就像蔬菜生来便是这般洁净，从土中拔出不用冲洗即可食用。

蕊初用附送的木叉子拨了拨最顶端的一颗小番茄，咬着下嘴唇。她应该是满意的。她无须相信一个道听途说的“内幕”——假如店家偷懒用生水洗菜，他们又何必精心摆放食材、费力设计包装？叉子流连在番茄的表皮，将刺未刺；她会随时开始吃，尝了第一口，沙拉就是她的，她会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在那之前，出于某种我猜测不出的动机，她抬起头，望向我的方向。一瞬间，她发现了我的注视；我在注视她的沙拉。难为情地她笑了笑，说她饿了，想早几分钟开饭。看上去不错。我找话说，以缓解我们之间的尴尬。

是吧。她这样说着，一叉捅进了汁水充盈的果实。

一家母婴医院被导弹击中了。

那是第一发两吨 TNT 当量的空地导弹。梭形的弹头嵌入了一间位于建筑物中央的病房，于几秒钟后引爆。病房中的人感觉肺中的氧气被一股巨大的吸力排出，随即他们被弹片撕碎。楼体被炸开一个半月形的缺口，藕断丝连的承重墙支撑着尚未倒塌的楼层；残缺的尸体挂在断裂的水泥边缘，一条肉嘟嘟的腿坠落，被外露的钢筋穿透；一位燃烧的母亲抱着怀中的新生儿从窗户跳下。四周刮起强风，暗红的浓烟升腾而起，宛如炼狱；没有玻璃是完整的，窗户尽成空洞的眼眶，即便有人在爆炸时维持着意识，也不会记得听到过什么，因为冲击波在瞬间震裂了他们的耳膜。他们体验了生平持续最久的一次耳鸣。

几分钟后，有人开始尖叫。有人拖着血肉模糊的下肢试图爬出废墟。不久，尖叫化作

哭声和不可辨识的语言。人们大声求救，呼叫亲人——但还来不及控诉。控诉和复仇是生者的特权，而此时，没人真正脱离了死亡：高温中的瓦斯罐和酒精瓶随时可能爆炸，墙壁像饼干一样崩碎，血液不断从被弹片割开的大动脉中涌出。更不用提那些本应待在保温箱中的早产儿。

在尚未丧失活动能力的人们准备自救时，医院的解体开始了。如同一张缓缓闭合的嘴，缺口上方的楼层向一边倾斜。终于，当缺口缩小至某个角度，承重墙坍塌了，建筑的上半截于刹那间砸下，顺着断裂处的斜面滑向地面，将缝隙中的尸体同尚存一息的伤者绞压成肉泥。一声巨响后，有什么啪嗒啪嗒地从头顶掉落。那不是雨，是碎尸和染着鲜血的水泥块。

更多的哀嚎传来。更多的心脏停止搏动。

在市政府派出的救援队中，顺利到达现场的有一辆消防车和两辆救护车，其他车辆在空袭中尽被击毁。遍体鳞伤的救援人员推开车门，在呛人的烟尘中看到一片颓垣败壁。医院的倒塌已成事实，不再有建筑等待抢修，建筑已碎为千万块，堆积成一座垃圾山，从山脚到山顶零零散散地横着人形的轮廓：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完整，有的残缺。废墟上鸦雀无声，于是救援队只能挨个将躯体翻转以确认生死。死的，死的，死的……当他们检点完废墟外围后，他们必须一路摸着瓦砾和玻璃渣爬向废墟的顶端。在那儿，等待他们的是更多尸体——如果运气好，也会有三两个生者。至于废墟内的人，在挖掘机抵达前，他们无能为力。

几日后，搜救终止，死伤被统计。五十三人在那场袭击中直接丧生，其中包括十一名儿童，伤者不计其数。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被摧毁的第五家医院。被袭击方又一次发出谴责，指责袭击方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将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交诉讼。

袭击方的答复一如既往。他们坚称，他们只袭击军事目标。

在机场时，我已有所察觉。

我指的不是空气。成年前，父母常在暑假期间带我回国；我熟悉那种从机舱踏入廊桥后便能闻到的浑浊味道——二氧化硫，或其他什么有机气体——当然，还有挥之不去的溽热感：汗珠堵塞毛孔，头脑被热风吹得昏昏沉沉，用不了几分钟，咽部开始发紧，“人们为什么老是吐痰”这一疑问获得解答。不得不说，与南加州的阳光和海风相比，那的确是一种直观的反差，以一个我的学生们在 essay 中用滥了的词形容：a cultural shock。但我早已理解，在这儿，适应污染是生活的一部分，且适应对我而言从未构成问题。一个月后，我已丝毫不觉得空气刺鼻，并习惯了在出门前瞄一眼 PM 指数。没错，长期吸入污染物可能导致鼻炎、肺癌之类的健康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在忍受吗？我没什么特殊之处。

我要描述的是一种隐晦的东西，它比空气更难以名状，却同样无所不在，乃至一开始我无法决定该以哪个瞬间切入陈述——是在帮人拿下行李后没听到“谢谢”？是在准备登上摆渡车时被人一步抢先？还是在斑马线前没有车为我停下？似乎所有例子都是恰当的，但似乎又没有一个事例能真正抵达“问题的核心”（格雷厄姆·格林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好名字）。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仍没想透这件小事与遥远的战争，与多年后蕊初的一个行为，究竟存在何种关联。我只是盲目地相信：混沌中它们被同一根蛛丝牵引着，如同那个人尽皆知的说法：亚马逊的蝴蝶扇动翅膀，得克萨斯将刮起龙卷风。事情发生在一辆电梯上。电梯通向机场轻轨的站台，站满了下飞机后赶往市区的人。我被七横八竖的行李箱逼得缩在一角，小心不挤压左手边的孕妇肚子，又想尽量远离从右手边飘来的口臭——可能是谁吃了韭菜。若不是轻轨站的标识太过令人迷惑，我宁愿爬上一道又一道的扶手电梯，绕远去站台。但现在回想起来，站在满员电梯中的我其实是兴奋的，因为终于我重新体会到了“人气儿”——人与人之间不再多疑地保持距离——而这正是我经久不衰的儿时记忆之一。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高兴；我以为我回到了故乡。

有人放了一个含蓄的屁，我憋气，忍住不笑，还有两层抵达站台。接着，是一声打火机的脆响，随后有烟雾传来。我张望，看见一个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他穿着略显肥大的西装，打了条红领带，淡蓝的烟雾从指间升起。做生意的？公派出国考察的官员？我凭刻板印象猜测，但重要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距他眼睛十几公分的前方，有一个标志：一根点燃的香烟被一条斜杠划过。

出国前，我父亲是抽烟的，而且据他自己说，抽得挺凶。我始终记得一个画面：在云雾缭绕的客厅中，脑门与桌面齐平的我依偎在他身边，他一手摸牌，另一手朝地上抖着烟灰。出国后，他几乎在一夕之间放弃了这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癖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穷，而烟贵；其次，能抽烟的公共场合着实不多。想象一下，当他用刷盘子的钱刚买了一包 Parker & Simpsons，正准备在商场门口点上一根，某位素不相识的白人老太太过来一脸严肃地说“you shouldn't smoke here”得是多么扫兴。总之，在不能吸烟的地方吸烟，是人人有权指责的恶行，但平心而论，我很少管闲事。我说过，我的性格过于内向，即便有义愤填膺的时候，也总会等一等。身边总有一两个幻想自己是帕特里克·亨利的白人。

于是，在电梯中，我还是皱眉等待。西装男的身后站了一个肩宽背厚的小伙子，他死盯着手机，一言不发。我左边的孕妇将脸转向墙壁，清了清喉咙。她感到不适；她该说点什么——我天真地站在她的立场考虑——即便不在意公共利益，她也该为胎儿着想。她不用疾言厉色，一句“这里不能抽烟”足以使西装男羞愧万分。我等待着，除了机械运行和有人嚼牙花子的声音，轿厢中听不见任何动静；烟味和口臭继续合谋，窃取愈加稀薄的氧气。电梯门上方的数字跳了跳，再向上一层我就可以脱身，但我忽然感到一种不曾体验过的愤怒。我想挤过前方密不透风的肉墙，趁男人不注意一把拽下他嘴中的烟头，踩在脚下。我想告诉那个 shithead，那个傻逼：叫你他妈的给我抽。想象着，计划着，我侧身擦过一条汗哒哒的手臂，拨开一双肩膀，踢开一只粉色的行李箱。除了烟味，我已能嗅到从他头发散发的“霸王”洗发水味（几年前有人从国内给我爸带了一瓶）。我抬起紧握的拳头，向他的嘴边伸去。

然后，电梯打开了。刹那间，电梯里的人像溃堤的洪水一般涌出，融入站台上的人流中，

同时电梯外的人开始朝轿厢内推搡，我被裹挟着，一只皮鞋踏上了我的脚，某人的臂膀将我撞到一边。电梯门再次闭合时，我的心跳和血压已平复如常，若不是鼻孔中残留的烟味以及被踩痛的脚背，顷刻前的情景已变得像一场动荡不安的梦境。直至不久前，我一直记挂着如果“如果我夺下了西装男的烟头，打了他，他会作何反应？而如果发生了争斗，电梯中的旁观者会站在我这一边，还是漠然走开？我的行为是否正义？能否产生影响？使我愤怒的究竟是什么？当怒火褪去后，留给我的又会是什么？轨道旁气流翻涌，下一列轻轨即将停靠。我加入了纷乱得不知何处是尾的队伍。

蕊初没有吃完沙拉。

吃下小番茄后，她将木叉插在一摞生菜中，拿起手机。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口没能让她百分百满意。她没再拿起叉子，而是若有所思地打字，偶尔回首张望，显得犹疑不定。我顺她的目光瞥了一眼；她应看见妮可尚未离去。妮可使向她招手，使了个透着股神秘劲儿的眼色，她立即起身，险些打掉叉子，挤过逼仄的过道时腰又碰上了桌角。我隔着桌子感到一阵震动：那想必是挺疼的一下。她却眼也不眨，小跑着赶向召唤者。因为距离，我无法看得那么仔细了，也听不清她们之间的交谈。她俯在妮可耳边，嘴唇轻盈翕动着，妮可似笑非笑地应答。其实我还是能听到一点点声音的：她们的嘀咕窸窸窣窣，宛如虫鸣，虽然内容不详，但毫无疑问，那是一种属于阴谋者的声音。你知道的，办公室从来都是密谋的温床——当你在清晨或午后走进办公室，而房间中只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时，他们多半是在羞辱老板或分享跳槽计划；发觉你的入侵后，他们眼神闪烁，交谈戛然而止，待重新开口时，音量已高得不自然——但我无意探听秘辛。我的兴趣只在观察和想象。

归来后，蕊初变得不一样了。她将沙拉推到一个不碍事的角落，拿起手机，专心滑动了几下，放置耳边。在电话接通前的空当中，她静默着，眼目低垂，呼吸轻缓，面容犹如一尊观音塑像。她是如此笃定，如此闲适，令我又一次想到坐在幽暗房间中的拉姆齐太太；像在一上午的烦忧过后，她意外地获得了某种启示——并非凭借循环往复的潮汐声，或礁石上的灯塔；在我所在的内陆城市，窗外只有沙尘飞扬和此起彼伏的喇叭——但无论是谁或什么开导了她，她的心意已定，她已不左右为难，自此之后，再没有风暴撕扯她的内心。

然后她抿了抿干燥的唇，迅速地换了一口气，开始说话。

她说，你好，我在沙拉中发现了一根头发，我想退货。手机号码是……

她说，对，是头发，一根长头发，如果需要，我拍给你看。

她说等等，接着放下电话，捧起沙拉，放在一张靠落地窗的空桌上。背对我，她捧起手机，对着阳光下的沙拉点了一两下屏幕。

她说，拍好了，该怎么发给你？退货时上传可以吗？

她确认，会退全额吗？

她问，那么你说的代金券在哪拿？

她嗯了声，说，好的，下次报我的电话就能享受优惠对吗？

她说谢谢，但在挂断前又想到了什么。

她问，那沙拉要退给你们吗？我的意思是说，会有人来拿走吗？

忽然她咯咯地笑了——对方肯定抖了一个极机智极有趣的包袱。她说没关系，她说谢谢，她说再见。

挂断后，有短暂的一刻笑容还未从她的脸上褪去，她旁若无人地将手指相扣，伸展至头顶，微微向后拉伸。正午即将来临，她踮起脚尖，拉着筋缓慢转身，从上衣的下摆露出一小截肌肤和一个杏仁形状的肚脐，像是要让胴体饱饮初夏的暖意。她的发丝上荡漾着浮光，鼻侧的几粒雀斑像星宿一般错落有致，透光的衬衣下，小巧的乳房隐隐挺立。她是自由的，所以她是快乐的，而因为她是快乐的，那个瞬间的她动人无比。我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她未曾注意有人看她——即便是当时的我，也未曾自觉。她一溜烟逃离了办公区，与已在自动门前等候的妮可会合。这一次我仍听不见她们说了什么；这一次，是叽叽喳喳，是欢声笑语，是在一场长达数载的瘟疫结束后，你会在大街上听到的声音。门打开又关闭，她们消失。

办公室中已没有什么值得我看的。我也该去吃饭了。我从我的工位挪向过道，途中经过蕊初的办公桌时，看向被遗忘的沙拉。那些食材看起来依然新鲜、美味，但若你仔细端详，的确会在一丝紫甘蓝和一片鸡肉间发现一根头发。那是一根极细、发梢微卷、亚麻色的头发。

在这儿，没有谁能评判谁。

我继续走。



李一洋

一个成长于海外的中文写作者。  
养猫；做饭；爱用分号。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Hulki Okan Tabak](#) on Unsplash

小说

## 春的答复

李懿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她喜欢观看掺了人工香精的生活切片——  
观看，即是保持距离。

此时她已踏入了三十岁的人生大关，用姨父的话来形容，便是“花期已尽”。这句俗气且残酷的评语并没有叫她觉着羞恼——或许是因为她仅是一项守恒钟摆运动，于两房一厅的私人住宅和高耸入云的友邦广场间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犹如考试卷上一道干巴巴的物理应用题；或许是因为她过早地遗忘了青春（一个梦幻的、从未被真正拥有过的青春）：半露天走廊里的窃窃私语、汗臭、胆怯却不乏渴望的眼神、睡意朦胧的一个吻，以及学校天台水泥地上仍留有余温的香烟头。

又或许，她其实压根没听清别人在说什么。那些事关婚姻与生育的疑问、轻飘飘的打量、孤独终老的预言与诅咒——它们淌过笨重的白瓷盘，还未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流失在了清脆的碰杯声里。总而言之，于嘈杂、湿润、光线刺眼的酒楼家庭聚餐上，在幼童的尖叫与哭闹包围下，她坦然地注视着表兄妹的孩子们，双手文雅地搭着雪白桌布，面部长时间维持一种没有焦点的微笑，就像会议桌上半梦半醒的边缘角色。

她时常是半梦半醒着的（起码在旁人看来）。眼睛——既不深邃也不凸起，稍嫌太小又欠缺保养，眼角浮起几道皱纹——长时间维持着虚焦状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手机背后擦不干净的玻璃镜头；嘴角朝上，法令纹左右对称，昭示着肉体的干涸和衰竭；肤色不够白，也没有日晒充足后甜蜜的焦糖色，而是泛着无精打采的黄，正如衣柜深处的陈年白衬衫。

她的沉默总叫人略感不适，这大概是从前诸多相亲与约会皆悉数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些从父亲的办公室里拖着沉重脚步挪入茶餐厅的小职员，那些被姨妈表姑怂恿着穿上锃亮黑皮鞋的大学生，那些在微信对话框里徘徊不定最终失去踪迹的陌生人，还有那些在本地独立书店讲座或现代艺术展上侃侃而谈、自命不凡的画家、诗人、学者、话剧演员——业余、粗鄙、不乏才华也同样欠缺天赋：

于活动结束后的酒吧小酌间歇，戴着半旧不新的鸭舌帽，他们抬起疲惫的双眼，朝她投去若有所思的视线，口中还在咀嚼烤串（被微波炉草草加热，干而无味），手指则虚握着半空的啤酒瓶，仿佛那就是他们日复一日竭力挣扎的阳具。

偶有夜不归宿的日子。一些幽会，对象通常是某个不同部门的男同事，在提前半个月订好的特价酒店房间里。浴缸和落地窗、地毯里挥之不去的香烟味、不知所云的油画装饰、喝了一半沦为烟灰缸的可乐罐，和微凉的白床单（被床头灯照出一种肮脏的昏黄色）：她开始发福的身体半被掩埋、半暴露在外。正是一具为随葬而烧成的陶俑，还未得到应有的爱抚，就已被遗弃在了泥土深处的寝宫之中。

窗帘通常是要拉严实的，但也有拢不紧的时刻，似乎他们暗地里需要从现实中借得一点安慰，以此弥补爱情不在场的缺憾。夜色便趁机透了进来，闯入一个不该有白天黑夜之分的没有时间的欲望的腹地（和赌场一样，酒店用人造光与隔音墙再造了一个个小小的世外之地）。渗着霓虹灯的光，夜晚是浑浊的。它悬浮在中央空调的冷风里，

包裹着床上那场正在发生的、仓促的交媾，如同羊水包裹着赤裸的胎儿。

结束后，她懒得洗澡，仍躺在原处，面朝外侧。身后，情人微微打着鼾，枕边的手机还在播放抖音视频。这些天来，对方老是一沾枕头就睡过去了，因为疲惫，也是因为想不出要和她说什么话。而她——既不是睡着，同样不是醒着。空气中弥漫着石楠花的腥味，让她想起了大学时代的春天。躁动的、熏人的春天，漂浮着柳絮和尘土的春天。那时她是话剧社的活跃社员之一，在舞台上表演过对生活一无所知的少女，也演过为生活出卖肉体的妇人。演技不怎么样，成绩下降了不少，但那股春意已经生在了她的骨头缝里，所以她继续演了下去。她想起了草草装订好的剧本、击打耳膜的心跳，还有上台前的腹式呼吸：松弛的肚皮因为吸气的动作逐渐绷紧。那是她的第一个导演教会她的。他说声音要从腹部出去，而不是喉咙，不然坐在后排的观众会听不清台词——她想起了那位个头不高、语速极快的导演：演出结束后，在 KTV 包厢的酒瓶丛中，他把脑袋枕在她的肚子上，像是在听着什么、等待着什么。走了气的粤语歌、跌落于潮湿地板消失不见的骰子、只剩下汁水的果盘、屏幕上逐字逐句亮起的歌词——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年他毕了业，跑去做了销售顾问，倒也是在意料之中：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商科。

她躺在床上，就想着这些。甚至于不是想着，而是再经历一回。她的寿命比任何人都要长，因为在脑海里，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过去的日子，正如小孩子重复地去读同一个童话故事、看同一本绘本。也就是说，她不是在重温过去的喜悦（因为那里并不存在着什么喜悦），而是从重复中得到平静。这和临死前的走马灯可能是同一个道理。如此这般的重复于她而言很是常见：在一家三口寂寥无声的晚饭桌对面，香港无线新闻台也是这样重复地播放着家具、房地产和借贷广告。一整年下来，有些新的广告进了来，有些旧的广告退了出去，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卖的商品、代言的明星和提供的服务，都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它们被新闻里欧亚大陆的战火灼烧着，溶解复又凝固，成了一团难解难分的半固态胶状物：纱窗随风扬起，年轻夫妇偎依于意大利皮质长沙发的怀中，新生儿躺在德国榉木婴儿床上。油漆未干的新屋宽敞明亮——英国的油漆——这新屋是他们靠背负贷款换来的安乐窝，也是下一次向银行或来路不明的金融公司借钱时备受瞩目的抵押品。

现代都市人美好的娃娃屋剖面。不消说，与她毫无瓜葛，可她却爱看，看得津津有味。她喜欢观看掺了人工香精的生活切片——观看，即是保持距离。比如仿琥珀的赛璐珞项链、安迪沃霍尔的印刷海报，以及独立书店橘黄灯光下的黑胶唱片。既是色彩斑斓的视觉毒品，也是社会地位安稳的参照物，观看它们的感觉就像是吃麦当劳一样——是对味蕾的刺激，同时亦符合心理上的预期。同理，她也喜欢新八佰伴一楼化妆品专柜旁精致漂亮的售货小姐们。她喜欢她们紧贴腰肢的制服、微蹙的双眉与年轻气盛的气质。她们同样部分地属于商品。诚然，她从未在四周镶嵌了灯泡的水银镜前逗留过、任由一双双纤纤玉手往脸上涂抹遐瑕霜、阴影和腮红：摩西渡过红海，她则是穿过死物的海洋，径直走向扶手电梯，然后向上、向上，直到踏进七楼的超级市场。在这过程中，她对身边的事物仿佛浑然不觉，然而视线却是涣散的，从眼球表层向四面八方辐射开，捕捉着她感兴趣的一切：

挂在扶手电梯旁墙壁上厚重的镀金镜框；

玻璃柜里沉甸甸的 Zippo 打火机；

柔软、干净的毛绒玩偶（它们的下半身是擦手毛巾，就像人鱼一样），堆在漆味未散的藤篮中；

包裹衣物的淡灰蜡纸，于经验老到的售货员手里沙沙作响；

等等等等。

她有朋友，多是泛泛之交。她们当然不能理解她对这类事物只停留于观赏层面的热爱——中学时期遗留至今的两位老同学、一名只在凌晨三点向她倾吐苦痛心声的网友（恋爱、抑郁症和暴饮暴食，一个陈腔滥调的死循环）、在外地的几个大学室友，以及最近刚联系上的旧同事 Kathy——

一位不招女人喜欢的女人，在新环境里搭不上新的知己，便杀了个回马枪，十分果断地痴缠上了她：前年考上公务员，大概快要结婚了；未婚夫也是公务员，于人前露过两次面。一次是在 Kathy 的二十五岁生日烧烤聚会上。他穿得像是个设计师，一身棉麻，头上戴了一顶软毡帽，站在木麻黄树荫里一脸的郁郁寡欢；一次是周日的下午茶，永利酒店的咖啡苑，可以瞧见内庭花园与泳池的好座位。他来作陪了一会儿。隔着鸟笼形状的点心架子，她看不大清楚对方的表情，只能听见对面情侣俩冷战时震耳欲聋的沉默。他什么也没吃，光顾着晃荡冷饮里稀里哗啦的碎冰块；前脚刚走，Kathy 后脚就哭了。

Kathy 经常是要约她出门的。说不上来是惧怕寂寞，还是爱慕虚荣。试衣服、饮下午茶、看电影、去海边野餐、探索新开的网红店，然而其注意力永远只在手机上。有太多的小玩意儿要买，有太多的综艺要看，有太多的照片需要被美白、祛痘、拉长、缩小。贴了碎钻假甲片的十指在屏幕上晃动，修长的四肢缠绕着木制咖啡桌，这类画面总会让她幻想出一只得了白化病的盲蛛：

在白色丝网上跃动的白色躯体。白色的手，白色的脸，白色的脚踝。白手帕，白衣领，白耳机。

——夜间动物，眼盲耳聪，从百货商场到应允来宾用闪光灯自拍的多媒体展览，栖息在每一个精心雕琢的小角落里。现代时髦女性的总和、典范和巅峰。无所畏惧，除了爱情的挫折——连那点挫折也是无伤大雅的、可爱的，年轻的生命里不可或缺的调剂品……

她离不了这种被人造琥珀包裹着的西洋景。Kathy 也迫切地需要她：她的平庸、她的顺从和她的寡言少语。

四月，澳门终于是宜人的了。街道被阳光洗净，风吹散了冬天的阴冷和湿气。车流、商铺的通风管道与学校运动场上的哨声，它们是这座小城的轰鸣、它活过来的迹象。人们露出了胳膊，走路时不再缩着脑袋躲避凄风苦雨。热天还在前头，还在可见却也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只蜥蜴试探性地吐出舌头又迅速缩了回去，酷暑短暂地触碰着石砖与树叶锯齿状的边缘，行人只会在额头上渗出几点薄汗。城市，这座喧嚣中犹如

钟乳石般缓慢扩张的峡谷（宛如一颗蛀牙上恶臭的龋洞），每一个行走其中的人都能感觉到（但未必意识得到）它逐渐增快的脉搏。新一年的生机带来了同等分量的兴奋和恐惧。几个月来头一回地，于下班的路上，她被唤醒了。在摩肩接踵的游客群中，滑过耳边的交谈声、车轮胎的摩擦声，和沿街商铺门口员工的哈欠声——是这些声音将她拉出了水面。

回家太早，漫步却也太迟。街上已经点了灯，霞光仍残存于楼厦缝隙深处。既像是来自海上、又像是由树丛中诞生的清风温柔地拂过人群。南湾湖在夜色里暗了下去，岸上的人只能看见独木舟划过影影绰绰的湖面。倚着湖边骑楼走廊的栏杆，她眺望了片刻，朝向西南方向，即湖心岛喷泉和落日的方向。良久，她感到不耐烦了，也觉得不满足，因为看来看去，她并不能从眼前的景色里总结出什么特别的东西。一颗空荡荡的心脏置身于空荡荡的自然之中；一具笨重的躯壳，深深陷进了水泥地里——她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愚钝（她自幼以来就无法摆脱的根深蒂固的特质）。那不得其门而入的焦灼感……

家里不待她坐下便已开了饭。照例是三个饭碗围着一荤一素两道菜：蒸鱼的鱼皮黏在了瓷盘边缘，清炒时蔬火候过了头。浅灰和淡绿，贫瘠得使人不忍多看。

饭后，母亲朝她努努嘴，她就在沙发上坐下，双手埋进金银纸堆，叠起了元宝。元宝么，买现成的虽然方便，可不够诚心——母亲每年清明节前都这么说，顺理成章省下一点不值一提的零钱。

……山一样堆积在茶几上的元宝，烧给外公外婆，烧给爷爷奶奶，烧给几个快要记不起名字、不幸早逝的旧相识，也烧给生活在内地刚刚去世的小姨婆。铁桶歇在脚边，内里熏得黑不溜秋的，即一张等着吞食冥币的死人的嘴。她挪动小腿，小心翼翼避开了它。一旁的母亲又开始讲起了小姨婆的事迹：年轻时没考大学，进工厂做女工，爱上了有老婆孩子的车间主任——对方好巧不巧，又是优柔寡断的性格。小姨婆为此不惜和娘家人闹翻，搬进集体宿舍。因着‘破坏他人婚姻’的道德污点，升不了职，分不到房，结不了婚，多少不堪、多少纠葛、多少怨憎……一个不幸的女人。长辈们说起小姨婆，总会用那种语气、那种用词，那种深感厌烦的惋惜口吻——茶余饭后的谈资，翻来覆去的旧话题。等人老了也就无事了。退休，靠积蓄杳无音信地活着，直到上个月煤气公司上门催收，这才发现她已死去多时。报警、运尸、火化、海葬。一块反骨沉入海底，就此消失殆尽——不幸的女人啊！母亲沉浸在陈腔滥调的感慨里，兴奋得嗓音都在发颤：

多么不幸。没有老公，没有小孩，没有陪伴也没有传承，做了鬼还得靠平时不来往的亲戚烧纸钱救济。

她知道母亲为什么喜欢这则寓言。对于尚未家的女儿而言，它是个教训；对于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来说，它是个安慰。现在，寓言有了个正儿八经的结局，讲起来就更称心如意了。她便点头，手上动作不停（你大可以说，她是在殷勤准备着主人公应得的报酬），但心里其实分不清那教训究竟是什么——是要嫁人，要生子，要子孙后代逢年过节都不忘在自己的肖像前上一炷香，还是不要去爱，不要去恨，不要纵身跃入使人精神失常的火堆之中。

可能两者皆是。

她站起身，跨过铁桶（有那么一瞬间，她未曾生育的下体正对着那张即将燃烧的圆嘴），挪进厨房好煮一壶开水。她渴了，鼻子发痒，掌心灰扑扑的，浮了一层金银纸的红金色粉末，难以洗净。她回忆起小时候参加的中式婚礼，新娘子的面颊与眼睑同样浮着这层华彩，纸钱糊在喜宴的女主人脸上，于宴会厅灯下闪闪发亮，于是她不可避免地又想到了小姨婆：

封面是雷峰塔的泛着霉味儿的黑白家庭相册的角落里，一张单人照。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姑娘，面孔微微朝上，厚嘴唇略显粗鄙，眼睛凝视着镜头右侧，粗辫子斜在身后。和她一样，算不上丑陋，更算不上漂亮。她懒洋洋地想，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孤零零地活着，又孤零零地死了。取下脚上的拖鞋，她追打起水槽旁的一只蟑螂。红褐色的外壳，棕黄的斑点，一节小拇指的大小，被她击成一滩肉泥。广告单页的一个小角就是它的裹尸布，垃圾桶即为它的坟场。她开窗，楼下羊肉火锅店的膻味儿顺势涌了进来。俗世的香气，平白吊起楼上居民们的胃口。街对面娱乐场外墙的灯恍惚照亮了她的脸。她探出上半身，注视着当铺密密麻麻的霓虹招牌、桑拿浴后门口抽烟闲聊的男人，还有远处的新葡京酒店：一把倒悬的宝剑，光芒万丈，连夜空也为之变色。生死对这世界全无意义的年轻女工，和同样无意义的害虫，她思索着两者间的联系，一边轻轻哼起了情歌。

手机在蟑螂的游乐场里震动。Kathy 给她发了微信，提醒她这周末的约定——

她（他们）买了话剧票。演出就在旧法院的黑盒剧场，离她家近得很。这仍是 Kathy 的主意，她为此还特地空出半个下午的光阴来梳妆打扮，甚至一周前就谋划好了当晚衣着的搭配。毫不稀奇，因为看演出的人本身也是演出的一部分——正是在这合法的、理直气壮的窥探之中，观看者才愿意承认：自己原来也是渴望被人偷窥的。星期六，无所事事的晴天，于 Kathy 狹窄的卧房里（犹如甲板之下幽暗的船舱），她半坐在床沿、半依靠着双腿悬空臀部以上的身体，依着对方的愿望，目不转睛地观察起镜前的女人。那是幕布背后的准备阶段：

腮红刷通体橘黄，在颧骨上轻柔地转着圈儿，扑出淡淡的血色。LED 灯围着镜框亮着白光。粉尘，打着旋儿，从半空中缓缓下落，应当是胭脂，混在粉底液与香水刺鼻的芬芳里，无疑即将沉入她们的肺部、由内到外装饰起她们的身体。

为了打破这漫长得叫人无法忍受的瞬间，她问起晚上演出的内容。

女人丢下刷子——静默的表演被中断了。凑近镜子，Kathy 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自己的脸，随后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似乎是在责怪对方问了个不得体的问题：

“好像是个爱情故事，我记不清了。”

想了想，她又补充道：“一个朋友推荐的，叫我去支持一下本地剧团……”

说完这话，仿佛是觉得已经尽了什么义务似的，她站起身，开始抚平裙摆上的褶皱。桌上，瓶瓶罐罐深处，手机兀自响动，在玻璃丛中激荡出震天动地的波纹，但 Kathy 不做理会，仍专注地欣赏着镜面里自己的身段。

“肯定是阿龙打来的，催我们呢。”她撅着嘴，手上拈起唇线笔，“——你倒是帮忙接一下！”来电的确实是她的男友。发现不是 Kathy 接电话，他的态度便缓和了许多。两人悄声说话时，Kathy 正忙着往嘴唇上敷一层粘稠唇蜜。她就一边偷看，一边和阿龙闲谈：他提醒她晚上可能会下雨，接着——正如 Kathy 所料——要她们快点出门，因为之前约好会在翠华吃饭（是星际酒店三楼的那家翠华餐厅，漂亮的门面，有些旧了，里头戴着金项链的赌客和拖家带口的本地人混成一堆）。时间卡得很紧，他说，更何况在黄金时分，一个人是很难独占三人的空位的。

她知道后者才是他焦虑的真正原因，闻言，心里不由地生出些许怜惜之情。

在这之后，对话剩下的只有寒暄。如此寡淡、卡顿、晦涩，像一阵灰扑扑的雾，从听筒里钻出来，把她整个地淹没了。然而阿龙不愿挂电话。他不停地讲啊讲啊，颠三倒四、毫无逻辑可言，几乎是胡言乱语，又因为含混不清，大半部分的内容都遗失在了无线电波里。她茫然地听着，连嗯嗯啊啊式的敷衍应对也做不到了，视网膜里只剩下那对红肿的、血淋淋的嘴唇。

中途他问道：“有什么想点的菜？”

想了想，他又补充道：“上次叫的叉烧饭不错？”

她抬头一看：镜子里的嘴唇消失了，剩下一双眼睛，比从前明亮，但含着怒气，直直地望着她；一双手，依旧是美的，向她伸过去；一把嗓子，忽地变得沙哑，朝她下了命令：

“把你手机还给我……”

八点钟开始的演出。吃完饭（一顿多么无趣的饭！菜单和人一样，一年到头都没多少变化），三个人尴尬地并排走着，往旧法院的方向走去，拦住了不少在他们身后企图超车的行人。口罩蒙着脸，她悄悄把鼻子露出来，闻到了嫩叶酸涩的气味。顺着殷皇子大道，在葡文学校花纹繁复的深蓝瓷砖外墙下，一股风——席卷了雨的味道，宛如一条小溪，流经了她的身体——

这是一个难得的夜晚，她想，这是一个让人心生希望的夜晚。

她张开十指，再握紧双拳，似乎是要从这空无、湿润的夜晚里抓取出什么东西一般。

……她忽地感到难为情：没有化妆，脸上泛着油光，衣服半旧不新，鞋也沾满了灰。左肩挂着皱巴巴的帆布包，右手捏着矿泉水瓶，“看上去像是个要饭的，”她暗自说道，随即把塑料瓶塞回包中。一个落魄、蓬头垢面、枯干了的人——

她的视线避开了人行道旁的玻璃镜面，但眼角还是忍不住捕捉到了此刻的影像：香槟色的水银镜，生了潮湿的斑纹，不祥地将人摄入进去。今天，她同样扎了个麻花辫。三把长发，缠成一股，沉重地拉扯着头皮、敲打她的后背。这或许是个宣言，也可能是含蓄的招魂仪式，用以召唤出血液里的某种联结、母系亲缘关系中的世代流传之物……她意识到自己是在渴求着一些强烈的、高密度的、足以击溃她坚实外壳的——什么呢？拐了个弯，新八佰伴出现在正前方（水泥柱子般敦实的方形大厦，已经永远摆脱不了它头衔里的那个“新”字了）。她突然话多了起来，仿佛那阵鼓起女人裙摆的风同样鼓起了她的魂魄。她知道他俩不曾再在旧法院看过戏，便开始详细描述这栋建筑：它高大、空阔的走廊，灯光和墙壁皆是惨白，把人照得像鬼一样；它现如今黑不溜秋的剧场，观众席上摆着一排排折叠椅——坐得人腰酸背痛；它一楼年久失修、少有公众涉足的右翼：墙壁因着后天补漆的缘故，白得十分不均匀。一扇窗户，玻璃上陈列着裂痕，下半截用木板胡乱遮盖好，眯眼看去，能见到房间里面杂七杂八地堆着不祥的旧物。最后是天花板，破了个四方形的大洞，露出一条条钢筋，像一张竖着尖牙的血盆大口。“还有那些导演、编剧们：演出开场后，总要躲在最后一排、黑暗的角落里，悄无声息地，一双双眼睛直往观众们的后脑勺上扫……要是发现有谁偷偷拿出手机看一眼时间——指不定心里会怎么想！”

另两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Kathy 由鼻孔里轻哼了一声，说不清是附和还是嘲弄；被女友遮挡着，阿龙脸上的神情是看不清楚的。他只低声应了句“是么”，于是她剩下的话又吞回了肚子里，然而心跳仍未慢下去。天上下起了小雨，棉软得像白砂糖。她撑开伞骨，愈发听不清小情侣的声音了，只知道两人慢了半步，跟在她后头，打着同一把长柄伞……口罩仅盖过下巴，她用伞面遮掩着，以此避开行人审视的目光（那一张张没有表情的脸，没有面孔的脸，没有病菌的脸，雪白的脸……）。她深吸一口气。夜晚是美的，光这一点便足以补偿她所受到的冷遇了。透过雨幕，路灯将万物染成了金色。人、地砖、柏油马路、来来往往的私家车，以及英皇酒店招牌上那顶扁平的皇冠：流光溢彩，可到底有些陈腐，过了时，和现代格格不入的风格反倒成了它魅力之所在……一顶上个世纪的旧皇冠，那个时代的欲望纪念品，褪了色的假黄金。

“——好像快要倒闭了。”她身后，Kathy 在说话，模糊不清地：“赌场，英皇好像只关赌场。他们要留着酒店。”

她便想象出一个空茫的大厅（她毕竟不曾踏进过英皇）：墙面铺着红天鹅绒，绿色赌桌空无一物，纸牌烂在了地毯里，无人看护的水晶灯黯然失色，以及一座无形的钟——自然，现实中还在运作赌场是时间以外的，没有钟，没有表，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那将会是一座庞大的时钟，每隔一小时便敲响一回。无人在场，无人见证，钟摆只为时间本身而摆动。

她的大脑胡乱地运转着。这是思想活跃起来的征兆。不过想法皆不清明。她听见阿龙应和道：“关赌场，可见经济不好——也不知道多少人要失业了！”然而想必诸人心里并不为此觉着苦恼。就像在报纸上看到什么人跳楼自杀或是意外死了，嘴上总得简短哀悼几句一样。

……他们到得太早，仍有半小时的空余。旧法院大门洞开，灯光是死寂的白，对这场雨无动于衷。等候的人渐渐变得密集，多为花枝招展的小年轻，成双结对的，不是情侣就是好友。她抱起双臂，身体初时如同一尊缺胳膊少腿的石膏雕像，后来却开始微微颤栗，即冻僵了的人回温时的典型反应。发丝与衣料上残留的雨滴被室内高温蒸发了——那些散发着神秘的腥气的喃喃细语、那些心照不宣的眼神，和那些等待着亲吻的红唇——人群向外散着热。那是动物的热，肉的热，使人头昏脑涨的热……她翻开场刊。旁边，Kathy 与阿龙讨论着故事内容，两人皆是心不在焉的语气。她便读起简介，一字一句，可什么都读不懂：字从眼睛里进去，又从嘴巴里出来，唯独没在脑袋里留

下印记。

——某一刻，心有灵犀一般，她抬起头。越过在淘宝上专心拣选甲片的 Kathy，她望向阿龙的双眼，以及他近乎少年般青涩的面容。两人长时间对视着，一言不发……闪电刺入她的指尖。一种痛楚——既是生理的亦是心理的——撕裂了她。

工作人员开始放行。她把票夹在场刊里，随着人们往楼上走。梦游的步伐，她听任四肢动作，由着它们自顾自地做机械运动。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她想，在视野的盲区里……灾害将临的预感麻痹了她的大脑……她在时间之外、平静地观看着这一切，同样也在时间以内、备受煎熬地经历着这一切：楼梯平台贴了张大海报，演员们的侧影模模糊糊地印在上头，不知是品质低劣还是有意为之。二楼，剧场仍是黑漆漆的，但亮黄色的光束又从观众头上打去，熏得人眼睛直冒热泪——倒成了头顶悬挂灯的剧中角色。她挑了二排正中央的座位，一屁股坐下，也不张望另两人跑去何处。可能已经坐好，可能临时改主意偷跑出去喝酒约会，也可能是又吵了架、一拍两散各自作乐去了。眼下她是孤身一人，却又和千千万万名男男女女同为一体。情欲在她的肉身上燃烧，时针在她的胸膛内旋转。她抖着腿，汗从额角往下淌。她直觉知道外面雨势大了，哪怕隔了一堵堵墙、一个人和他们一张张骚动不安的嘴。饱含海潮气息的雨、无声无息地把人淋透的雨、轻飘飘的雨……

灯暗了下去。有人在淅淅索索地往舞台上搬动道具。戏即将开场，一个不知头尾的故事。后颈汗毛竖起，她期许着这个故事，满腔热忱也失魂落魄。不明白地，她说不清楚，只恨此刻不能有一声爆炸、一道雷鸣……她沉醉在被人注视的幻想之中，直到台上的演员念起了独白，她才堪堪醒来。



李懿

1993 年出生于澳门，法语专业。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 卡帕纽斯

普里莫·莱维 | 故事群岛

如果在另一个世界，我见到了希特勒，  
我会理直气壮地朝他脸上吐唾沫，  
因为他从来没有让我屈服。

我嘛，你们都认识，虽然那时我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之前在集中营的时候，我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条纹衣裳，胡子刮得比平日里还要糟糕，头发也剃光了；但外表无关紧要，根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至于维达尔，我就要好好跟你们讲一讲了。维达尔是个矮胖的男人，到了集中营里，他个头还和从前一样，只是脸上忧伤松弛的褶皱，还有身上耷拉下来的皮肉，证明他曾经的肥胖。他是个来自比萨的犹太人，和我同一批被带走。

他不招人爱，也不招人恨。由于他的矮小和不足，从第一次见面起，就被别人排除在正常的交往范围之外。没错，他已经死了。其他人也都死了，为什么我非要特别提到他呢？

我们一起在泥地里干了好几个星期的活。在那个处境恶劣的地方，大家都可能会摔倒，跌进湿滑的泥坑里。但是，每个人心中还保留着一丝作为人的高贵，我们想尽办法不让自己摔倒，或是将摔倒的后果降到最低（你们肯定注意过，猫能神奇地保持平衡，这赋予了它们不容争辩的优雅）。跌倒在地的人很不像样，引人发笑，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上来，但就是这样，而且一直如此，这大家都知道。

而现在，维达尔不停地跌进泥里，比任何人都要频繁——只要轻轻一撞，他就会跌倒，甚至连撞一下都用不着，有时显然他是故意跌进去的。只要有人说他几句，或者打他两拳，他矮小的身子就扑向泥坑，好像那是母亲的怀抱。对他来说，好像保持直立就像踩高跷一样，违背自然、充满危险。泥坑就是他的避难所。他成了个小泥人——从头到脚都是泥，泥就成了他的保护色。这些他也不知道，痛苦留给他的一点点清醒认知，让他明白自己很滑稽。

他很爱说话，说起话来没完没了。总是讲自己如何遭遇不幸，跌倒，被打耳光，受人嘲笑，活像假面戏剧的丑角“普钦奈拉”，丝毫不会幻想如何挽回一点颜面，遮掩一下那些最不光彩的事情。相反，他会浓墨重彩，强调自己的遭遇中最滑稽、最羞耻的一面，从他讲述时流露的那丝静心，可以猜测，这是很久之前的欢宴留下的习惯。

你们认识像他这样的人吗？很有可能。但如果你们认识，你们就知道，这类人喜欢阿谀奉承，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具体的目的。如果我们俩在日常生活中相遇，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奉承我。在集中营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他都要赞美我气色不错。我对他怀有同情吗？没错，我可能也同情他，虽然我比他好不了多少。但那时同情没什么用，因为什么也做不了，那像落在沙滩上的雨滴，刚刚感知到就消散了，只在嘴里留下空虚饥饿的滋味。

一九四四年是维达尔生命的最后一年，这就是那年他的样子。要是我和你们说，我和

所有人一样，尽量避免和他接触，请你们不要吃惊。因为显而易见，他处于一种需要别人的状态，在这些人面前，人们总是觉得受到了某种情感要挟。

那是九月里炎热的一天，泥潭上方响起了空袭警报。这警报声与意大利的不同，不是重复一个音调，而像是在嗥叫（就是这样的声音，而让我吃惊的是，它的官方名称正是“嚎叫”），调子忽高忽低，就像野兽发出的长嗥。它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让我想到德国神话故事《尼伯龙根之歌》[2]，它与赫达的神兽与船艘头表现出的恐怖气氛特别相称。我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设计，抑或是受了无意识的投入，这声音不只是一个信号——它是战斗的口号，一种反抗，是愤怒和吼叫，也是哀叹。我有个秘密的藏身处，是我找到的一条地下通道，那里堆着几捆空袋子。警报响了，我下到那里，发现维达尔已经在那了。他说了好多话，很客气很热情，但我却没有做太多回应。紧接着，我要打个盹的时候，维达尔开始向我讲他的悲惨经历，我已经不记得他讲的了。外面，警报声的悲鸣过去后，天空只剩下漠然的寂静：它苍白而遥远，但充满威胁。忽然，我们头顶响起一阵声响，我们看到楼梯顶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那是拉伯波特，他手里拎着一只桶。他像看到了我们一样，喊了一声“意大利人！”然后把那只桶扔下来。桶沿着楼梯一路滚下，叮叮当当地响。

桶里装过汤，但几乎是空的。我和维达尔用勺子认真地刮着桶底，从里面挖到了几口剩汤。那些日子，我们总是日日夜夜随身带着一把勺子，以备不时之需，就像十字军战士的佩剑。这时，拉伯波特已经骄傲地走下楼梯，来到我们身边：他不需要别人施舍汤，但也别指望他送汤给你。

拉伯波特那时应该有三十五岁。他是波兰人，毕业于意大利，学的是医学，确切地说，他是在比萨学的医学，这就能解释他对意大利人的喜爱，以及与维达尔——这个小子比萨人的奇怪友谊。我说这友谊很奇怪，是因为拉伯波特强悍精明，善于保护自己，令人钦佩。他像偷猎者和海盗一样，狡猾又残暴，可以轻而易举把没用的文明教养全都抛在身后。集中营里的他，就像丛林里的老虎：对弱者任意欺凌，对强者回避躲让。他总是会见机行事：贿赂，或者打架，或是勒紧腰带忍饥挨饿，或是撒谎和屈服，一切要看当时的情况。

他不仅保持了自由生活时的充沛体力，还留有一种强烈的享乐意愿，还有对知识的渴求。没错，这就是他的关键，正因为如此，虽然我觉得他是敌人，但他在一起总是很愉快。这时候，拉伯波特慢慢走下楼梯，当他走近时，我们就能清楚看出，之前桶里的东西都去哪儿了。他的一项专长就是：警报的嗥叫声一响起来，他就在混乱中冲进厨房，拿上战利品，在防空军队赶到之前逃跑（拉伯波特这么干了三次，每次都完美地成功了）。而第四次，整个警报期间，这个聪明的强盗一直乖乖地待在自己的工作队里。戈尔德本想效仿他，却被当场抓住，第二天就被当众绞死，行刑场面颇为壮观）。“你们好呀，意大利人。”他说，“你好呀，比萨人。”然后就是沉默。我们挨着躺在袋子上，直到外面再也没传来什么声响。没过多久，就像那时常发生的情况，维达尔和我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眼前挤满幻象（睡着并不需要躺下，我记得有一次休息的时候，我站着就睡着了）；可拉伯波特没有睡，虽然他也讨厌工作，但他是那种热血刚烈的人，受不了懒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在石头上磨，时不时往上面吐一口唾沫。但这还不够，才过一会他就训斥起维达尔，这时维达尔已经在打鼾了。

“醒醒，维达尔！你梦到什么了？奶酪饺子是吧？奶酪饺子和基安蒂葡萄酒，米勒街的食堂里，6.5里拉就能买一份，还有那牛排，真他妈的爽[3]——黑市的牛排装满盘子。”

（拉伯波特意大利语说得很好，但说脏话的时候就说波兰语；这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波兰语的脏话十分丰富）。“还有玛格丽特……”说到这儿，他做了个快活的表情，响亮地拍了一下大腿。

维达尔已经醒了，身体蜷缩着，小脸苍白，带着一个凝固的微笑。几乎从来没人主动和维达尔说话，我觉得他一定受不了。但拉伯波特经常和他说话，和他聊起比萨和比萨人，带着一种真挚的怀念，尽情回忆过去。在我看来，对于拉伯波特来说，维达尔显然只是个能让他放松和神游的契机。但这些对维达尔来说，是友谊的象征，这珍贵的友谊，是一位强者慷慨给予他维达尔的，是男人和男人的友谊。

“怎么，你不认识玛格丽特吗？你从来没和她在一起过？你还是不是真正的比萨人？哈！（拉伯波特就是这样说的：“哈！”就像拉伯雷[4]笔下的英雄，沉醉于爱情和美酒，但仍然身体强健，思维清晰敏捷）。那女人有起死回生的本事：白天是安静、纯洁、温柔的淑女，到了夜里可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这时，又响起了一声长鸣，紧接着又是一声。声音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但离我们越来越近，就像疯狂开过来的火车头。然后大地颤抖起来，有那么一瞬间，天花板上的水泥房梁跳起了舞，仿佛是用橡胶做的。最后是两声预料之中的巨响，爆炸之后，是金属被炸毁的划拉声，伴随着这声音，我们也从痛苦焦虑中松了一口气。

坦诚地说，我不是特别害怕爆炸。我当时太迟钝了，那种惰性混合着一种斯多葛主义[5]的自我克制。我愚蠢地认为，那些炸弹不是炸我们的，所以不会伤到我们。我的身体的确感到恐惧，但是它没能占上风。我没有费力逃开，我留在了之前的位置。维达尔爬到了一个角落，脸埋在胳膊肘里，好像在挡的耳光。他高声祈祷着。

又传来了声可怕的嘶鸣。你们都知道，炮弹的呼啸声是什么样的，那是魔鬼的声音。我常常想到，那些邪恶的工匠故意让炮弹有这样一种声响，表达了对野蛮行径的渴望，并向轰炸对象发出傲慢的最后通牒。我从袋子上滚下来，撞到墙上：又是一声爆炸，近在咫尺，几乎面对面。接着，巨大的气流向上升去。

拉伯波特笑得合不拢嘴。“你吓得尿裤子了吧，是不是，比萨人？还没吗？别急，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你胆子真大。”我说。

“这不是胆大的问题，是有理论依据的。这是几率的问题：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现在，我累了，这种疲惫很古老，深入骨髓，我觉得难以名状。这不是所有人都感受到的那种疲惫，它不像暂时的麻痹，遮住了幸福和自在；那是一种缺失，一种彻底的空洞，像截肢一样。感到虚弱是我的常态，就像一把射光子弹的枪。维达尔和我一样，可能他没有我的意识那么强烈。其他人也和我们两个一样。拉伯波特的话，他的存在方式，他的活力，在其他情况下，我本来会很欣赏（就像现在，其实我很欣赏他），

当时在我看来，他不合时宜，令人厌烦。就算拉伯波特在里面能吃饱喝足，他是波兰人、医生，是逃避苦役和举办地下宴会的大师，但我和维达尔，我们两个“穆斯林”<sup>[6]</sup>和他在一条船上。要是我们的命不值两个钱，那他的命也贵不了多少，令人恼火的是，他还不愿意和我们一样。所以说到理论和几率的事儿，我不想听他讲。我有其他事要干：睡觉，要是上面的情况允许我睡着的话；要是不能睡着，我就像每个深思熟虑的人那样，安安生生地体味自己的恐惧。

但要避开、忽视或者说服拉伯波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们睡什么睡？我正准备立遗嘱呢，你们却要睡觉。没准要炸死我的炸弹已经在空中了——我可不想错失机会。”

“如果我自由了，我想写一本书，阐述我的人生哲学：《拉伯波特·克拉西博士，善与恶的几何学》。而现在，我也只能把它讲给你们两个软蛋听了。要是你们觉得有用，那再好不过。要是没有用，而且假如最后幸存的是你们，而不是我——这当然很奇怪——你们就可以在外面讲讲，或许会对有的人适用。当然，我倒不是很在乎，我也没想做一个有益的人。”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在我疯狂的青年时代’<sup>[7]</sup>，我吃过喝过，爱过，结交过形形色色的朋友，我离开了黯淡无味的波兰，来到你们意大利。在意大利，我学习过，旅行过，大开眼界。做所有这些事时，我都睁大双眼，没漏过一丝一毫；我曾经很勤奋，我相信不会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多更好。我的生活一帆风顺，我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没有消散，而是留在我心里，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没有让它们褪色，而是保存起来。后来我就到了这儿。我在这儿已经二十个月了，二十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算着人生这笔账。现在还算划算，还有许多富余。只要这笔帐还没有到负数，我就坚不可摧，每人敢碰我。要让这笔帐变成负数，还得在集中营里再待许多年呢，或者需要很多天的酷刑。再说了（他轻轻抚摸了一下肚子），只要大胆敢干，就算在这里，也能时不时找到点好东西。

因此，万一你们谁幸存下去了，而我死掉了，你们可以给感兴趣的人讲讲我的故事，你们就可以说，莱奥·拉伯波特已经得到了他期望的一切，他不欠别人的，别人也不欠他的，他从未哭泣或祈求怜悯。如果在另一个世界，我见到了希特勒，我会理直气壮地朝他脸上吐唾沫，因为他从来没有让我屈服。”

他的演说忽然被打断了。两名防空炮兵由一名集中营头头领着，闯进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被赶出来了，外面已经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声音，他们叫我们清理废墟。

后来，我只短暂见过拉伯波特一面，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只有几秒钟时间。正是这最后一面，将他的样子像照片一样定格在我脑海中。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因病躺在集中营的医务室里。从我的床铺那里，可以看到两座棚屋之间的一段路，雪已经很厚，积雪上踩了一条路。这里经常有医务室的勤杂工走过，他们两人一组，用担架抬着死去的人或垂死的人。我觉得，他们这段路的终点是堆放尸体的地方，最后这些尸体将被运往比尔克瑙的焚尸炉。

一天，我看到两个抬担架的人，其中一个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身材高大，胖得非常寻常，在这种地方绝对很罕见。我认出他就是拉伯波特，于是下床来到窗边，敲了敲玻璃。他停下来，对我做了一个愉快、又意味深长的表情，然后举起手，夸张地打了个招呼，担架上的人歪向了一边。

两天后，整个营地被清空了，当时恐怖的情况众所周知。我有理由断定，拉伯波特没能幸免于难，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尽我所能履行他托付给我的事。

[1] 古希腊神话传说人物，围攻忒拜城的七雄之一，夸口说连众神之父朱庇特都不能阻止他，被朱庇特用雷电击毙。在《神曲》地狱篇第十四歌中，位于第七圈第三环，因蔑视上帝受火烧的刑罚，但依然骄傲狂妄。

[2] 《尼伯龙根之歌》，德国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

[3] 原文为波兰语。

[4] 弗朗索瓦·拉伯雷，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主要著作是讽刺小说《巨人传》，讲述巨人国王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神奇事迹，两位巨人力大无穷、智慧超常，品德高尚。

[5] 古希腊哲学学派，强调顺从天命，恬淡寡欲。

[6] 指集中营里的弱者、无能的人和被淘汰的人。

[7] 原文为法语，引用法国中世纪抒情诗人弗朗索瓦·维庸的诗句。



普里莫·莱维

意大利著名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第 174517 号囚犯，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作包括《这是不是个人》《元素周期表》《终战》《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等。1987 年 4 月 11 日，莱维从都灵寓所跳楼身亡，官方推断原因为自杀。

译者：陈英 孙璐璐

《卡帕纽斯》(Capaneo) 选自普里莫·莱维短篇小说集《莉莉斯》。译文由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授权。  
Copyright © 1981, 1994, 2016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state of Primo Levi c/o Giulio Einaudi Editore

##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Darius Bashar on Unsplash

## 小说

# 出版社

戴内斯·马查多 | 故事群岛

我不像那些懦弱的女人，  
她们必须依靠他记录在每本书尾页的名字，  
才能免于被遗忘。

他书房的几乎每一本书的末页上都用铅笔记着她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也许她们换工作过于频繁，却又不想和他失去联络，所以才出此下策；也许是他在阅读某一本小说的时候，随手把她们的电话抄在了书页上，以确保随时都能找到她们中的某一个互诉衷肠。更糟糕的是，除了她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偶尔还会在书页上发现一两句情话，因此，每当他借给我侦探小说或是散文，以此和我分享他的狗屁文学情节时，我总是在读到末页的时刻，倍感苦涩。

我从来都没有因为那些记录而大声抗议过。那是他的过去。当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他就警告过我，我可以调侃他的一切，唯独不能对他过往的岁月指手画脚。然而，面对他那漫长过去，以及那无数记有字句的尾页，我的自尊心变得不堪一击。当你身为某位作家的情人，却从未启发过他的创作灵感，也从未在他的每周专栏里出现，那种滋味是很难熬的。事实上，他小说人物的身上，总有其他女人的影子（那些丑陋的、胡言乱语、满口龅牙的婊子）。他信誓旦旦地说那些人物的原型是我，但我知道，她们与我无关。

证据就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书的尾页上写过我的名字。他把我的名字纹在了右臂上。然而，他从来没有把它写在书页上过。就仿佛我不知道纹身是可以用熨斗烫掉的一样，他似乎也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看到那些不同版本的书卷尾页上的字句后，会抱有怎样的心情。现在的我明白了，当时我也有错。我从来都没有给过他想念我的机会。每天下午，我都会出现在他家楼下，等着他下课归来：每天上午，我都会打电话祝他早安，而每天夜里，在我睡觉之前，我都会为他的爱而祈祷。在认识他三周之后，我甚至辞去了自己的工作，以便他可以在想见我的时候随时找到我。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能亲自到场，陪在他身边，而不是让电话沟通拉远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不像那些懦弱的女人，她们必须依靠他记录在每本书尾页的名字，才能免于被遗忘。

然而，我发现，对于那些陷入爱情的作家（或者说，那些被某个女人选作情人的作家）来说，他们需要一定剂量的痛苦来激发自己的灵感。对于那些因为生活的戏剧性或是距离而带来的痛苦，他们甘之如饴。他们和狗一样，更喜欢吃鸡骨头。所有被记录下来的女人都比我更老，而且远不如我性感。她们的名字和电话被用铅笔记在书房里每一本书的末页，它们是一剂反复施加在我生命里的痛苦，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后遗症。她们是幽灵。我确信，她们过去同意让自己的名字在书页上反复出现，唯一的目的是让它们在未来折磨我。

因为她们，我开始在我们共同买回的书籍的最后几页上写我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正如我那些信奉女权主义的朋友们所说的那样，我不需要我的作家情人，或是任何其他人，用铅笔写下的短短一句话来定义我。我可以，也应该用我自己的手来书写关于我自己的定义。我开始冷静而有计划性地构想一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某一天，他随意打开一本书，可以在书的末页发现某段我为自己写下的感悟。

我从很早之前就开始模仿作家的笔迹了，也许在未来的某天，连我自己都会开始混淆我们俩的字迹。最重要的是，我要设法在所有的新书的末页都写上我自己的名字，以确保那些女人将无法再占据那个原本就属于我的地方。

几个月过去了，那段时间里，我严格地执行着那项书写任务。书的数目并不小。我以每周两本的速度阅读。就这样，六个月内，大约有48本书的末页上都出现了我的姓名。渐渐地，我也开始把我的地址写在书页上。由于总是重复书写相同的词语，我感到厌倦了。因此，我开始模仿一种微型传记的写法：我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紧跟着写下一连串令人不安的超现实主义短语，比如，“像安东尼奥的老婆一样走路，脚踝上有一只眼睛”，或是“一个蓝色小洞里的黑穴”。写作逐渐变成了我的一种恶习。荒诞的微型传记渐渐演变成了越来越长的句段、没有精心押韵过的诗歌、思想、渴望、嫉妒和复仇的梦想。它们从某本书的末页开始衍生，有时甚至需要横跨三本书的末页才能收尾。然而，任何文学上的努力似乎都无法战胜那个巨大书房里的幽灵。有时候，当我在作家的家里把常用书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来之后，不得不把那些婊子的名字从书页上擦掉，然后写上我自己的名字。为了写下自己名字，不得不把另一个名字擦掉，这是莫大的耻辱。因此，单单写下我的名字，姓氏，还有荒唐的微型传记，已经无法满足我了。我还必须写一些情感丰沛、具有疗愈效果的诗歌，以此讲述那名蹩脚的作家如何如何爱我，谈论他的忠诚，以及我在生活里获得的成功。文学创作和感情进展都非常顺利。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本关于量子物理的书本的末页发现了一首他写于1986年的诗歌：《致有着象牙色双腿的多情夫人》。正是因为这首诗，我的第一本长达十五卷的诗集诞生了。为了写完这本诗集，我整整六天都在伏案写作。那些天里，我不眠不休地写着十四行诗，以此忘记他献给别人那些诗句。我必须承认，为了不停地写作，我在书桌边拉了两次屎。但最终，我写完了那本十五卷的诗集。

这本诗集改变了本世纪的文学史进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不仅仅是因为每个读到这本诗集的人都对它爱不释手，也因为它的诞生标志着我与那个忘恩负义者关系的彻底终结。我渐渐开始摆正自己的位置。每天上午，我不再给他打电话，也不会再去他授课的地方接他。我只会偶尔在凌晨时分进入他的房子，悄无声息地从他的书房里拿走几本书，然后继续埋头写作。我的沉默似乎让他颇为担心，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他曾因为找不到我而打电话报警。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我继续写作。我的一位朋友向我借了一本名为《作家的鬼脸》的短篇小说集。我当时并没有记起那本小说的尾页写有我那长达十五卷的诗集中的某一部分。我把它借给了他，并未带有任何其他用意。当他翻到记有诗歌的那一页，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把那些诗歌称为“我的疯狂之作”，还说它们让他惊叹不已。对此，我并没有向他作过多的解释，我只是向他坦言，在书页的边缘写作已经成为了我人生的意义。

在电话里，我的朋友提到了我那荒谬的天赋，还说有一个出版社有意向出版一些未经雕琢的作品。他所说的那些细节我记不清了，但一周之后，我就和阿纳哈尔伯出版社签下了第一份合同。正因如此，当我获得了塞万提斯奖这份殊荣，评委会请我发表一段个人的获奖感言之时，我忍不住想把这段讲话献给阿纳哈尔伯出版社。谢谢，我的同事们，感谢你们对我无限的支持。非常感谢。

## 戴内斯·马查多·本托

古巴青年作家、记者，1986年生于哈瓦那。她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墨西哥、美国等国文学杂志和小说选，2019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九十個哈瓦那》，2021年入选《格兰塔》“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目前在美国迈阿密大学攻读现代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 译者：周好婕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在读博士。主要译作有波多黎各作家路易斯·内格龙的短篇小说《花园》《为了瓜亚玛》等。



《出版社》(La editorial)，选自戴内斯·马查多·本托短篇小说集《九十個哈瓦那》(Las noventa Habanas)，Copyright © Dainerys Machado Vento, 2019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o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Mitchell Luo](#) on Unsplash

## 小说

# 无人亮灯

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 | 故事群岛

“你要小心这位先生，  
他有着一双狐狸似的眼睛。”

很久以前，我曾在一个古老的大厅为众人读故事。最开始，一抹阳光透过百叶窗的褶皱漏进大厅里。渐渐地，阳光轻柔地拂过几位宾客的头顶，最后照在一张桌子上，桌上摆着屋主已逝亲人的相片。我艰难地吐出字句，仿佛是一架内部风箱已经损坏的手风琴。在最前排的椅子上坐着两位孀居的老人——她们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她们的岁数已经很大了，但后脑的发髻还是显得异常饱满。

我已经读得筋疲力尽，目光频频脱离书本，抬头看向众人。我不得不留意着自己的目光，以免总是投向同一个人。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于每时每刻都望向其中一位遗孀那苍白的脸庞。那是一张恬静的面孔，它仍旧沉浸在对某段往事的反复追忆之中。有些瞬间，她的眼眸看起来像是被烟熏过的玻璃，后面空无一人。很快，我想起大厅里还坐着许多身份尊贵的客人，于是努力让自己投入故事的情境，更加生动地讲述起来。在某一失神的瞬间，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有几只鸽子在屋外的一尊雕塑上走动。而后，我又看见在大厅的尽头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她正把头倚靠在墙壁上；她波浪状的头发披散着，当我的目光从她身上掠过时，仿佛看到了一株攀附着废弃房屋的墙壁不断生长的植物。我懒得重新去理解这个故事，也不想向观众过多地解释故事蕴含的深意；然而，有时候话语和表述习惯本身便可传递故事的含义。在我本人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的时候，就惊奇地听到有宾客发出了大笑声。我重新望向那位把头倚靠在墙上的女人，我猜她也许已经察觉到了我的目光。

为了不再被女子扰乱心神，我把目光转向了窗外的那尊雕塑。尽管我仍然在读故事，但思绪已经落在那尊不谙世事的雕塑上——她的身体所展现的，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人物的形象。也许，比起自身展现的人物形象，她更能理解那些鸽子：她似乎默许了它们在她的头顶上徘徊，允许它们栖息在她的身体所倚靠的那根圆柱上。忽然之间，我发现又看向了那个倚在墙上的脑袋，而就在那一瞬间，她闭上了双眼。接着，我努力使自己重新燃起最初几次阅读这个故事时所产生的热情——故事围绕着一个想要自杀的女人展开：女人每天都来到一座桥上，试图自杀。然而，女人的计划总是落空，因为她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阻挠她的行动。当听到“某个夜晚有人向女人求婚，而女人被吓得跑回自己家”这个桥段的时候，我的听众们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把头倚在墙上的女人也笑了起来。她靠着墙转过了头，仿佛正把头垫在枕头上。我已经习惯于把目光从女人身上收回，然后再投向窗外的雕塑。我试图弄明白雕塑上刻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但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出任何严肃的形象；也许那个人物已经不会再像生前那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了，他的灵魂把时间都用来和鸽子玩耍了。我开口说了些什么，话音刚落，众人又被逗得发笑起来，这令我有些意外：我看向那两位遗孀，其中一位夫人的脸上显出了特别悲伤的神色，而我发

现此刻有人正偷偷地望向那位夫人脸上烟熏玻璃似的眼睛。某一次，当我把目光从那位把头倚在墙上的女人身上收回时，并没有看向窗外，而是望向了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我恍然看见有火焰在桌上燃烧；一些听众循着我的目光望去，发现桌上只有一个陶瓷花瓶，里面插着红色和黄色的花朵，花瓣上落有一抹阳光。

我把故事讲完时，喧闹声四起，人们上前将我围住。就在他们纷纷开始发表自己对故事的评论时，一位先生讲起另一个关于自杀的女人的故事。他想要把故事讲好，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述。而且，他转弯抹角，迟迟不切入主题。我望向其他宾客，发现他们都不耐烦地听着。所有人站在原地，尴尬而不知所措。那个披散着波浪状头发的女人向我们走来，我看了她一眼，又望向窗外的雕塑。我不喜欢听那位先生讲故事：看着他搜肠刮肚寻找词语的费力模样，我饱受折磨，感觉就像看见窗外那尊雕塑开始伸手抓捕鸽子一样。

我周围的人不得不继续听那位先生讲故事；他讲述的时候带着一种愚蠢的固执，仿佛在向身边的人宣告：“我是个政治家，我知道如何即兴演讲，也知道怎么讲一个故事才能让诸位感到有趣。”

那些听众里有一个前额略显奇怪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的头发与前额的交界处有一道深色的印记，那颜色看起来仿佛是刚被剃掉浓密胡须、抹上粉的下巴领上显示出阴影。这样一来，他的发际线看上去向后退了不少。我看向那个披散着头发的女人，却意外地发现她也正在打量我的头发。这时，那位政治家讲完了故事，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我却并没有兴致为他叫好。一位孀居的夫人开口说道：“诸位，请坐。”我们都坐下，大伙松了一口气；但过后我不得不重新起身，因为其中一位孀居的夫人来向我介绍那位头发呈波浪状的年轻女人：原来她是那位夫人的侄女。他们邀请我坐在一张三人位的大沙发上，我的一侧坐着夫人的侄女，而另一侧则坐着那位前额微秃的年轻男子。那位侄女正欲开口说话，年轻男子打断了她。他抬起手，指尖朝上——活像是一柄被风折弯的雨伞的伞骨，开口道：

“我打赌，您不爱与人打交道，大约只能和树木交朋友。”

我正在暗自猜想，他把发际线剃了一块，也许是让额头看起来更宽。听到这话，我忽然产生了某种作恶欲，于是回答道：

“您千万别这么想。您可不能邀请一棵树去散步。”

我们三人大笑起来。他那剃过的额头向后仰了仰，然后继续说道：

“说真的，树木是那种会永远默默守护在身边的朋友。”

那两位孀居的夫人呼唤着侄女的名字。她起身的时候，露出一个不悦的表情。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这才发现原来她是一个身材魁梧、个性强硬的女人。

当我转过头的时候，遇到一位年轻人。那个前额被剃过的男子向我介绍这位年轻人。年轻人看起来刚刚才梳理过头发，发梢还留有几点水渍。我在童年时期，也曾留过那种发型。那时候，祖母曾对着我的发型说“你的头发看起来像是被母牛舔过一样。”刚来的年轻人坐在了原先那位侄女的位置，开始与我攀谈：

“哦，我的老天，刚才讲故事的那位先生，简直是顽固不化！”

我本来很想对他说：“那您呢？简直太有女人味了？”但我最后只是问他：

“如何称呼？”

“你问的是谁？”

“那位……固执的先生。”

“啊，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有个贵族的名字。他是个政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总是能当上文学会的评审员。”

我望向那个剃过前额的男子，他朝我做了个手势，仿佛在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当遗孀夫人的侄女回来的时候，她抓住“娘娘腔”的一只胳膊把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这样以来，“娘娘腔”发梢上的水滴便抖落在了大衣上。然后，她说道：

“我不同意诸位的说法。”

“何出此言？”

“……我很奇怪，你们居然不知道树是怎么和我们一起散步的。”

“怎么和我们散步呢？”

“它们迈着长长的脚步，重复出现。”

我们对她的这个想法表示由衷赞扬，她的情绪变得高涨起来：

“它们反复出现在道路两侧，为我们指明方向；当我们离它们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时候，它们会聚在一起，朝我们的方向张望；随着我们渐渐靠近，它们又会彼此分开，为我们让路。”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某种戏谑的神情，仿佛是在掩饰一种罗曼蒂克的想法。羞怯和快乐交织在一起，让她的脸变红了。然而这个迷人的瞬间却被那个娘娘腔打破了：

“不过，每到夜晚，树木会从林子里的四面八方跳出了袭击我们；有些树木弯下腰，仿佛只要迈出一步，就会朝我们扑来；它们还会在半路拦截我们，然后不断张开、收拢枝桠，以此吓唬我们。”

遗孀夫人的侄女再也忍不住了：

“天呐，你讲话的口气，活像白雪公主！”

就在我们几个放声大笑的时候，她忽然说想问我一个问题，于是我们起身来到了摆着鲜花和瓷瓶的那个房间。她倚在桌子上，将整个身体都靠了上去。她将手指插入发间，然后问我：

“请您说实话：您讲的那个故事里的女人到底为什么要自杀？”

“哦！您应该去问她。”

“那您呢？您不知道她的答案吗？”

“要想从梦中之人的嘴里得到答案，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她微微一笑，然后垂下目光。这样以来，我可以将她整张嘴巴的轮廓尽收眼底。她的嘴巴很大，嘴角扯向两侧，唇边浮现的笑容似乎永远也不会收拢。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那张湿润的红唇。也许，她能透过低垂的眼睑感受到我的目光，又或者她会料到，在这样的寂静里，我并不会做什么好事。因为，她把头低得更深了，把整

张脸都藏了起来。

而现在，她把整团头发都展现了我的眼前。在波浪状头发的发旋处，一小块头皮隐约可见，这让我想起了在风里被吹乱羽毛而露出皮肉的母鸡。我愉快地想象着那颗脑袋是一只人形的母鸡，硕大而温暖：头发就像是纤细的羽毛，散发出了一种细腻的温热。

她的其中一位姑妈来到了房间——那位并不拥有烟熏玻璃色眼眸的夫人，她给我们拿来了几杯酒。侄女抬起头，姑妈对她说：

“你要小心这位先生，他有着一双狐狸似的眼睛。”

我又联想到了母鸡，于是回答道：

“夫人，我们可不是在鸡圈里！”

当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尝了一口酒——它实在太甜了，让我有些反胃，这时候她开口问我：

“您不好奇，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吗？”

她努了努嘴，似乎想把嘴唇埋进酒杯里。

“没有。我更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刻在另一个人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或者，假如此刻我身处别处，又会做些什么。”

“请您说说看，如果您此时身在别处，您会做些什么？”

“恰好我知道：我会把这杯酒倒进那个花瓶里。”

有人邀请我弹奏一曲。回到大厅之后，那位有着烟熏玻璃色眼眸的遗孀夫人正低着头，她的姐姐坚持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那架钢琴很小，很旧，而且有些走音。我不知道该弹什么曲子。然而，就在我刚刚开始弹奏的时候，那位烟熏玻璃色眼眸的遗孀夫人忽然发出了一声悲泣，我们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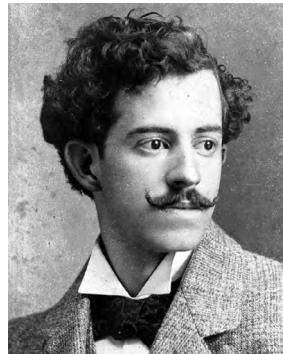
她的姐姐和侄女把她扶回了里屋。过了一小会，她的侄女走了出来，向我们解释说，自从姑父过世以后，她的姑妈就听不得任何音乐。姑父生前，他们二人非常相爱，那爱意一直延续至昏沉的晚年。

宾客们都纷纷笑了起来。随着屋外的天色越来越暗，我们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但是，始终没有人把灯打开。

我是最后几个离开的人之一。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不小心被家具绊了一下，就在这时，那位侄女拦住了我：

“我想请您办一件事。”

但接下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头靠在了走廊的墙壁上，然后抓住了我的衣袖。



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

二十世纪中叶乌拉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有着散文诗的特点，情节简单，节奏舒缓，用词松弛而慵懒。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最初是以作曲和钢琴演奏开启艺术生涯的，后来，他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受重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日益绽放出愈加璀璨的光芒，影响了科塔萨尔等众多后辈拉美作家。

译者：周婷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在读博士。主要译作有乌拉圭作家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的短篇小说集《无人亮灯》、波多黎各作家路易斯内格龙的短篇小说《花园》《为了瓜亚玛》等。

####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Tuva Mathilde Løland](#) on Unsplash

## 小说

# 某个讨人嫌的表姐

卡洛斯·富恩特斯 | 故事群岛

难道这就是一个因乏味而完美，  
抑或因完美而乏味的家庭？

在这个家里，没人会提起“那个人”。连她的名字都没人记得。她只是“那个人”。一想到她，一些人会在胸前划起十字来，另一些人会开始窃笑，还有一些人则会感到不快。大家颇费了些心力，才说服这家的家长，堂娜皮埃达·基罗斯·德·索罗利亚，让她相信“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才让堂娜皮埃达塔<sup>[1]</sup>相信，她已经能够放心地从床上起来，在位于洛斯莱昂斯沙漠<sup>[2]</sup>空空荡荡的家中走动，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害怕会碰到可憎的“那个人”。

“您再也不用遵守那个诺言了，堂娜皮埃达塔。现在，您不仅能下床走路，甚至还能换衣服呢。”

索罗利亚家的寡妇强加给自己的诺言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躺在床上，第二部分是，合衣躺在床上，既不能从床上起来，也不能换衣服，直到“那个人”离开。事实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生活要好得多，至少尚可忍受。在一家之主堂费尔明·索罗利亚去世后，这间位于沙漠中的大房子一直被哀伤笼罩着，直到他的女儿，安娜·费尔南达·索罗利亚，和年轻的会计赫苏斯·阿尼巴尔·德·利略结了婚，这间房子才恢复了以往的生气。这场婚礼轰动一时，所有人都说这两人简直是天造地合的一对。安娜·费尔南达——高挑，白皙，一头茂密的黑发散在肩头，眼神中饱含某种给人以启示的坚定和亲昵，嘴唇半开半合，恰到好处地露出一口珍珠般的皓齿，印第安人般的颧骨高高地耸立在绝对典型的西班牙皮肤之上，她走路的方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明明踮着脚尖，落地时却发出重重的声响——这一切似乎都给新郎严肃、乏味的性格添上了彩。注册会计师赫苏斯·阿尼巴尔·德·利略脸上庄重的神情，和蔼却疏远的微笑仿佛是他刻意用来营造自己形象的，尽管他已经是个二十七岁的成年男人，样貌却很不像“男子汉”，反而像个还没长毛的青春期男生：完美无瑕的面部肌肤，苍白的两颊，唇上一撇金色的、长长的八字胡，但这并不能抹去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人们觉得赫苏斯·阿尼巴尔是个年轻的、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阿波罗<sup>[3]</sup>，一头卷曲的金发，以及一种完全算不上矫健、只能说是虚弱的行为举止，消耗着他精致的、贵族般的身体，而他身体的本质，只有在卧室里，在他裸露他娇弱的、中等身材的身体时，才格外明显——安娜·费尔南达就是在新婚当夜发现这一点的——这位年纪轻轻就拿到执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具有过分强大的男性力量，他赤裸着身体，一次又一次地仰面倒在害羞的、立即用床单遮住自己身体的安娜·费尔南达身边，用言语宣告着他获得的性满足，然而，在下一个瞬间，他又开始用行动宣泄他持续更新的、永不枯竭的性饥渴……

自从在圣诞节期间举办的著名诗人卡洛斯·佩利塞尔<sup>[4]</sup>的诞辰纪念日上认识安娜·费尔南达后，赫苏斯·阿尼巴尔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了，他压抑着自己，努力不去想这个

女孩很有钱，她可是新一代百万富翁的女儿，这个百万富翁被大权在握的政客和上千合同在手的专卖人保护着，还和没落乡村贵族基罗斯家的一个女儿结了婚，使她没落的就是使她丈夫发财的东西——在墨西哥发生的政治变化帮了她的丈夫一把，却害了她。然而，现在是赫苏斯·阿尼巴尔成了那个和富裕之家联姻的穷光蛋。尽管富裕，却与别的富裕之家迥然不同。

赫苏斯·阿尼巴尔·德·利略本想在婚礼后离开索罗利亚家的旧宅，离开位于墨西哥城西南端的洛斯莱昂斯沙漠，一个荒凉的、永远不合时宜的地方：这里有一片地势陡峭的森林，森林里满是弯弯曲曲的小径和散发出阵阵清香的松树，还能清晰地看到阿胡斯科山<sup>[5]</sup>，它是如此的贴近、如此的浩大、又是如此的渺无人烟，它如此突兀地闯入人们的视线，甚至让人忘记了不远处的那两千万居民。他本想好好领略城市的进步、摩登、安全与舒适，见证圣菲<sup>[6]</sup>以及从圣菲到托卢卡这一路上的共治领地的飞速发展，在这些城市中，一切令人感到愉悦的事物都尽在掌握之中，电影、商场、餐馆。

他忽视了安娜·费尔南达的意愿。位于洛斯莱昂斯沙漠的家是索罗利亚一家人永远的家，她的父亲死在这里，她的母亲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这间大房子，哪怕是去到一间和它一模一样的——陈旧的、被抻开的、空空荡荡的——房子里。想都不要想，年轻的新娘用散发着香水味儿的手捂住新郎的嘴，上面还粘着男方爱的黏液，赫苏斯·阿尼巴尔，岂止是想都不要想，永远别想从这里搬出去，尤其是，绝对绝对别想着堂娜皮埃达一死，就能搬出去了，要是他这么想，安娜·费尔南达就会把她的丈夫从新房里赶出去，因为仅仅是这么一想，就有可能要了大家长堂娜皮埃达的命，要是这样他仍旧坚持要搬离沙漠去圣菲的话，她，安娜·费尔南达，就再也不会让她的丈夫碰她一下。

然而，注册会计师德·利略不仅深深地爱着安娜·费尔南达·索罗利亚，还十分尊重她，因为她既青涩，又坚决，这两种特质在她身上交相呼应，令人着迷，让赫苏斯·阿尼巴尔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对她的渴望之中。这次他的妻子会要求他做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头五年的婚姻带给他们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一切都逐渐消失了。和新婚之夜的幸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对夫妻逐渐形成了一个让他们不再幸福的信念，那就是，为了相爱，他们永远不能提及爱。

“你别这么固执。”

在安娜·费尔南达拒绝丈夫的请求之后没过多久，他们的女儿路易莎·费尔南达出生了，从那天起，安娜·费尔南达就开始抗拒赫苏斯·阿尼巴尔的碰触，她不得不在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星期，为自己日渐肥胖而感到恼火，为了恢复她引以为傲的苗条身材，她不得不遭受更多的苦，因此，她拒绝再次怀孕，而她的信仰又促使她拒绝任何避孕措施，于是，只有在每个月的“安全期”，她的丈夫才被准许与她发生性行为。

看到安娜·费尔南达侧卧在床上，手里拿着剪刀，将避孕套的尖头一个一个地剪下来，赫苏斯·阿尼巴尔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笑还是该生气。原本这位年轻的丈夫还幻想这些避孕套能给这个家带来安全和快感。

“教廷禁止使用这些秽物。”

这位丈夫爱着妻子。他不想挑她的刺。其实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安娜·费尔南达本身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于是，他接受了，就算某一天他幻想着自己或许能够截掉她的这一部分，也马上就能清醒过来，因为他知道，在他妻子心中，对上帝的爱要远先于对他<sup>[7]</sup>的爱，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讽刺，有些滑稽，但在他逐渐接受了事实后，当他在固定的那几天行使他的妻子赋予他的恩典时，安娜·费尔南达高呼的不再是赫苏斯·赫苏斯<sup>[8]</sup>，而是阿尼巴尔·阿尼巴尔，或者简简单单的，“我的爱”。“至少你可以叫我‘小土狗’。”一天晚上，丈夫亲热地说。

“说什么呢。那可是狗的名字。”在安娜·费尔南达转过身，背对他念诵玫瑰经之前，她又转过头来，面朝着赫苏斯·阿尼巴尔，如同撰写碑文一般地总结道，“你别傻了。不谈爱，才能感受到爱。”

赫苏斯·阿尼巴尔每天都要在沙漠和位于起义者大道和麦德林大道的办公室之间往返，这并未给他造成任何困扰。从墨西哥城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都需要花费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够测试墨西哥国民性格中的冷静和克制，那就是城市中的通勤。他常常在路上听音乐。他买了一些卡斯蒂利亚语<sup>[9]</sup>的诗歌朗诵带，听的时候，他能感受到灵魂中生发出一些本就存在却一直蛰伏着的东西。他也思考。有几次，多亏了加尔西拉索<sup>[10]</sup>和塞尔努达<sup>[11]</sup>，他甚至做了一些可能实现的梦：最后，安娜·费尔南达终于屈从于丈夫不容置疑的爱，接受了婚姻中一些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并把它们和生理上的享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还有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安娜·费尔南达同意搬离沙漠中那间老朽的、让人不快的、阴森的大房子。还有一个被明令禁止的梦：尖酸刻薄、沉默寡言的堂娜皮埃达塔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一个更好的……

对于赫苏斯·阿尼巴尔那些尚未言明的愿望，安娜·费尔南达并不是毫不知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沙漠中的房子不仅越来越破旧，而且越来越无从修补，这里一个漏水点预示着那里一面墙即将潮湿不堪，那里一块嘎吱作响的地板预示着楼下的天花板即将坍塌，而且，家里这位上了年纪的夫人还死死地撑着最后一口气，然而，赫苏斯·阿尼巴尔已经渐渐明白，就算他的岳母死了，他的妻子也会继承她的怪癖，以及她们对已经不在人世的一家之主堂费尔明的记忆，而这些会把他们永远地留在沙漠里，堂娜皮埃达塔或许能够去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安娜·费尔南达和赫苏斯·阿尼巴尔不能：这间世代承袭的大房子会把他们永远地系在过去，永远地系在未来。

赫苏斯·阿尼巴尔下了班，走进一间巨大的客厅的悲伤中，除了一架从来没人弹过的钢琴和许许多多背靠着墙的椅子，这间大厅什么也没有。墙上连一张画也没有，玻璃落地窗大开着，面对着一个潮湿的庭院，这个院子看起来很是桀骜不羁，全然不顾园丁付出的辛劳，按照自己的意愿恣意生长。

就在这时，丈夫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能够驱散所有孤单愁绪的想法，不仅如此，他甚至打算开展一些修缮工作。

“为了什么呢？”他年老的岳母叹起了气，“房子就应该和人一样，会老，会死……这

房子已经是间老房子了，它已经活了不少年月。人们都能看得出来。”  
“安娜·费尔南达，我们没有朋友吗？来参加婚礼的那些人？亲戚们？你难道不想偶尔邀请他们来做客吗？”

“哎呀，赫苏斯·阿尼巴尔，你知道的，照顾妈妈这件事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现在我根本没心思办什么聚会……”

“那些来参加我们婚礼的人。他们看起来很和蔼。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只是熟人。”

“亲戚……”

安娜·费尔南达十分震惊，因为她的丈夫第一次提了一个还过得去的建议。

当然了，他们当然有亲戚，只不过离得有些远罢了。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索诺拉和锡那罗亚，蒙特雷或瓜达拉哈拉[12]，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都来到了墨西哥城，但是，他们都把自己的根留在了曾经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国家，人口迁移的趋势是由战争、武装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北边漫长的、变动着的国境线、南边泥泞的、未开化的国境线、发展中心的交替、野心与野心的失落、爱与恨、未兑现的承诺与积重难返的恶习、对安全的渴望与危险的对抗决定的。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从城郊到城市中心的苦旅中，赫苏斯·阿尼巴尔想，这个国家已经稳定下来了，此时邀请那些远亲来做客是个忠厚之举，而且这件事本身还很有趣，充满了教育意义，因为所有亲戚肚子里都有一箩筐趣事，可以满足这位小伙子、这位尚未得到满足的丈夫时刻警醒的好奇心，与此同时，他也急于最大化地淡化他身上的巴斯克[13]遗存，摆脱他人强加在他身上的“西班牙移民”或者“来美洲发财”的标签。给自己泡一个墨西哥化的澡。

他叫人来整修了客厅，亲戚们开始陆续到达，安娜·费尔南达很满意，甚至表现出了某种热情，在这之前，她根本没有，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光彩照人”的机会，而现在，她能够顺理成章地布置房子，还能顺便把自己从照顾母亲的苦役中解救出来。

来自瓜达拉哈拉的、上了年纪的舅舅一刻不停地历数着基罗斯家的家谱，一直说到最后一个仍然在世的基罗斯，也就是他本人。来自蒙特雷的、年纪轻轻的侄子已经创建了一个致力于助力北方科技发展的机构。来自索诺拉的、担当着行政职务、还颇有进取心的侄女已经和加利福尼亚企业联合会取得了联系。来自普埃布拉的阿姨琼尼塔得了关节炎，四十年来她一直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下午她都要去美丽的索莱达教堂念诵玫瑰经，那里有着美丽无边的蓝色穹顶，但是，现在这对她来说已经变得非常吃力了。琼尼塔的姐妹普里菲卡西翁因为贪食，吃了过量的杏仁糖、奶糖、糖渍甘薯以及其他普埃布拉特有的美味甜食，已经去世了，而且——是谁让她这么做的——这件事发生在长达十天的、为了纪念阿托查的圣婴[14]而进行的天主教斋戒之后。（远房）表兄弟埃尔塞维尔刚刚才从马塔莫罗斯跑出来，谁知道他卷进了什么麻烦里，不是关于女人就是关于毒品，或是关于走私，谁知道这个没头没脑的人犯了什么事。来自锡那罗亚的索罗利亚家的双胞胎正在寻找一个会唱歌的人，他们想去马萨特兰组建一支三重唱乐队。表姐妹瓦伦廷娜·索罗利亚是从米却肯州的莫雷利亚赶来的，这可是少有的事，因为大家向来觉得她是个闭门不出的老处女，甚至都不去教堂做弥撒，当然了，她会定期去银行领取按月发放的、她贪婪的父亲堂阿密尔卡尔的遗产。

“不知道她会不会向圣安东尼[15]祈祷，请他赶紧把她嫁出去。她应该已经四十出头了吧。”来自索诺拉的侄女说。

“表姐瓦伦廷娜应该做过修女，但后来她坚持不下去了。”来自蒙特雷的表兄弟评论道。看着远房亲戚一批批地到来，赫苏斯·阿尼巴尔觉得自己已经找到让沙漠里的大房子变得更有生机的方式，同时，他还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了解这个由血缘关系连接的家族的独特之处，不仅如此，他还成了阿斯图里亚斯人和他亲爱的同胞之间的中介，试图拯救他们之间存在的令人生疑的关系。

大家把来自瓜达拉哈拉的特奥菲拉阿姨叫作09阿姨，因为她整天都在电话里抱怨这抱怨那。来自韦拉克鲁斯的基罗斯一家一整天都在点唱机前听博莱罗舞曲，不管到哪里，他们都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就像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16]一样。来自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古杜拉阿姨一再强调她的家是件“珍宝”，真是咬文嚼字。来自梅里达的帕尔梅尼德斯叔叔看起来实在太像个小孩了，以至于到了晚上，要是他在军营门前跑过，士兵们都会向他大吼：“站住！站住！”

这些轶事在持续进行的家庭拜访中被口口相传，带来不少爽朗的笑声。

难道这就是可能实现的幸福，难道这就是家庭的温暖，尽管它有时庄重，有时幽默？难道这就是一个消极却幸福，抑或积极却不幸的家庭？难道这就是一个因乏味而完美，抑或因完美而乏味的家庭？或者说，难道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只是一个符号的组成部分，这个符号能够被接受，也总是被接受，它代表着我们值得获取的幸福份额，这是一个永远不完整，却又永远完整的份额，因为死亡是一条独断专行的界限，它既不会变动，也没有任何缓冲，尽管没有人愿意死去，留下悲伤的、绝望的、不幸的一家子？

赫苏斯·阿尼巴尔在心中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最终他还是娶到了这个家里最漂亮的的女人，而他出色的、邀请散落全国各地的姓索罗利亚和姓基罗斯的亲戚来家中做客的想法清除了他们夫妻之间日益增长的嫌隙，因为他们以夫妻的面貌出现在亲戚们面前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也不得不表现得更加恩爱。

“很好，”安娜·费尔南达说，“米却肯州的表姐瓦伦廷娜来了，这可真是太好了。我甚至都不记得她的样子了。或许因为她实在是姿色平平。”

她边对着镜子化妆，边补充道：“我接待这些亲戚，是为了出风头。你得清楚这点，赫苏斯·阿尼巴尔。别以为我做这些是为了你。”

表姐瓦伦廷娜到达的那天，根本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于是，她就一直待在指派给她的房间里，直到晚餐时分。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安娜·费尔南达讽刺地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确实，已经四十多岁的表姐瓦伦廷娜拥有一件类似天资的东西，她不仅能够不引起他人的注意，还能够在人群中消失，像蜥蜴一样，把自己变成供它们攀爬的树或石

头的一部分。然而，在任何场合下，礼节都是必不可少的。看到安娜·费尔南达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等待表姐瓦伦廷娜靠近并亲吻她的脸颊，赫苏斯·阿尼巴尔站了起来，无视妻子某种略显尖酸刻薄的表情——仿佛她的表姐配不上这个最基本的、证明一个人拥有好教养的礼貌——对瓦伦廷娜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亲吻了她一侧的脸颊，紧接着亲吻另一侧，但是，由于两个人的脑袋在同一时间做出动作，在这两个印在脸颊上的吻之间，还插入了一个不小心落在嘴唇上的吻。

他笑了。但表姐没有。她退开了，脸上带着的并不是羞涩、而是严厉的神情。在赫苏斯·阿尼巴尔的鼻尖还残留着一股苦涩、辛辣的味道，尽管很快就被一股麝香味的香水和一股肥皂厂特有的洁净味冲散了。

她站立着，两手交叉放在小肚子上，穿着一身黑，黑色的长裙和黑色的短靴，还有黑色的长袖外套，脖子光溜溜的，没佩戴任何饰品，就这样，表姐瓦伦廷娜沉着冷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像是身处很远很远的地方，根本不在场似的。看起来，没有任何事物能搅乱她脸上平静的表情，过于平静的表情，就像是被人冲压过，要被做成一枚波旁王朝的纪念币一样，换句话说，你只能看到她的侧脸。因此，在看位于身侧的事物时，瓦伦廷娜根本不需移动脑袋，因为她纪念币式的、尖利的侧影已经把她的双眼分到了脸的两侧。

她身上没有丝毫生趣、邪念抑或糟糕的幽默感。她只是一张严厉的面具，面具下是面对外部世界时一种严厉的不在场。她的面孔和躯体一样，都是枯槁的。皮肤紧紧地贴着骨头，中间没有任何阻挡，皮肤努力地想与骨头融为一体，而骨头又热切地想在皮肤上凸显自己。

她所有的头发都被向后梳起，束在发髻中，她的宽额，她向内凹陷的太阳穴，她充满了探询的——一次鼻头的颤动泄露了这一点——长鼻子，还有她干裂的嘴，几乎看不到嘴唇，紧紧地闭着，就像一个没有任何裂缝的扑满。什么样的硬币才能穿透她？什么样的牙刷才能刷净她的牙齿？什么样的吻才能撩拨她的舌头？

表姐瓦伦廷娜沉默地向在场所有的人问了好，就像天空中一只遥远的鸟。赫苏斯·阿尼巴尔看着她，感受到一阵焦虑，他不由得问自己，这焦虑到底来自哪里？瓦伦廷娜和任何一个曾来拜访他们的亲戚——无论是基罗斯家的还是索罗利亚家的——都不太一样。很显然，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她是“吃独食”[17]的。

晚餐时发生的事证明了这一点。来自韦拉克鲁斯州的、无比健谈的阿姨说起韦拉克鲁斯狂欢节的奢侈排场，来自蒙特雷的、疯狂自信的侄子一笔笔细数着他经手的大量款项，然而，表姐瓦伦廷娜一直紧闭着嘴，不发一言，直到心绪不宁的赫苏斯·阿尼巴尔终于鼓起勇气，向她发起一场注定会戛然而止的谈话，尽管如此，至少他试图与这位古怪的亲戚对视。但是，在她终于抬起眼注视他时，他的眼睛却看向了别处。因为他在她的眼中读到了停战的求告，他意识到，坐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丑陋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且害怕自己沦为他人笑柄的女人。

就在这一刻，年轻的丈夫心中萌生出了一种“保护”欲，一个完整家庭的任何成员都不会产生这种欲望，因为他们对自己都有着充分的信心，他们已经拥有了对宗教的虔诚（我们会上天堂），或对职业成就的虔诚（我们要去银行），根本不需要获得他人的保护，也不需要保护他人，只有像他这样来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佬”才会这样，就像那句流行语形容的那样，他们总是穿着双草鞋，戴着顶巴斯克贝雷帽。

赫苏斯·阿尼巴尔自嘲地笑笑，用一种同谋的眼光看着表姐。他们两个不就是混入这个家庭内部的外人吗？两个避难者[18]？两个被放逐的人？

瓦伦廷娜·索罗利亚到底是谁？赫苏斯·阿尼巴尔思考着这个问题，进入了梦乡，他做了好些梦，一些梦里满是肉体的交缠，另一些梦里又是些过于形而上的东西，尽管每一个梦都非常短暂，其中却有些固定不变的东西：表姐出现在每一个梦中。

醒来之后，在每天都要进行的、充满男子气概的上泡沫、刮脸的仪式中——对某些男士来说，这是最佳的反省和做计划的时间——这位年轻的丈夫一直在想：他妻子的美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表姐的丑一样。

然而，在这一对美与丑的对照中，赫苏斯·阿尼巴尔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身具有的重量使它重重地落到了它的头上，同时，由于得到了释放，它又轻轻地向空中飘去。是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是美还是丑？是谁制定了美与丑的法则？如果一种形式没能表现出比形式更多的东西，却毫不羞愧地把自己视为一种不凡，那么，它是美的吗？相反，如果一种形式确确实实是不凡的，那么，它会是丑的吗？是什么给形式注入了灵魂？除了真真切切的真相，精神的外在表现还能是什么？缺少了灵魂，再漂亮的身体迟早也会将真面目暴露于人们眼前，人们会发现，它只不过是镀上了金的烂铜罢了；相反，灵魂能将丑陋的形式转化为，毫不夸张地说，一种比任何外在形式，比如，一具漂亮的尸体，更美好的东西。

这些都是对赫苏斯·阿尼巴尔来说完全陌生的想法，它们或许是他每天从洛斯莱昂斯沙漠到华雷斯区[19]的通勤路上聆听的诗歌的沉淀。是另一种背诵加尔西拉索的方式，“我生来就是为了爱你”；是另一种背诵贡戈拉[20]的方式，“所有的一切都为情人们服务”；是另一种背诵佩德罗·萨利纳斯[21]的方式，“要是眼睛能看到声音，哎呀，那我将如何看你”；是另一种背诵巴勃罗·聂鲁达的方式，“我的心寻找着她，而她却不在我的身边……”

下楼吃早餐时，他往院子瞥了一眼，看见瓦伦廷娜正在散步，她垂着头，与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黑，却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她光着脚。既没穿鞋子，也没穿袜子，就那样光着脚丫踩在草地上。赫苏斯·阿尼巴尔有种感觉，就像来自蒙特雷的表兄弟形容的那样，这位奇怪的表姐看起来就像个失败的修女，她似乎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某种忏悔仪式。突然，他第一次看见，一抹满足的微笑出现在她干裂的嘴唇上。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他脱掉了脚上的皮便鞋，走到草地上，加入了瓦伦廷娜。他立即明白了她这么做的原因。草坪的清新给人以享受，而用来遮羞的、粗糙的鞋底只会破坏这种享受。光脚走在草坪上不只令人感到愉悦，甚至还能撩拨人的心绪。与地面的接触就像有人在脚底板上挠痒痒一般，愉悦的感觉甚至直冲上太阳穴。

瓦伦廷娜并没有看他，于是，赫苏斯·阿尼巴尔穿上鞋，出门去上班了，他清楚地知道，

这天晚上家里还会有来拜访他们的、来自天南地北的亲戚们——来自新莱昂州的表兄弟、来自韦拉克鲁斯州的阿姨、来自纳亚里特州的两个从瓜达拉哈拉搬过去的亲戚、来自莫雷利亚的表姐瓦伦廷娜——以及安娜·费尔南达和赫苏斯·阿尼巴尔本人准备的晚宴。他没什么好担忧的。安娜·费尔南达是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她会确认菜单、雇佣侍者、摆好餐桌、为每位客人安排好位置。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一切如常。

就是为了这个，丈夫才计划了一系列的家庭拜访。安娜·费尔南达绽放了。照顾妈妈不再是她远离赫苏斯·阿尼巴尔、为自己找些乐子的唯一托辞。赫苏斯·阿尼巴尔感到非常满意，一开始是因为他终于能睡在一个仅仅属于他的房间里，远离他们的孩子路易莎·费尔南达的哭声，后来，等到他们的孩子有奶妈照顾之后，是因为不用再重启分享大床的仪式。

现在，安娜·费尔南达已经梳洗完毕，正在整理房间。她心情不错，没来烦他。赫苏斯·阿尼巴尔再也不用为了要在床上满足她或者要在餐桌上和她搭话而担忧了。

为了留足更衣的时间，准时参加晚宴，丈夫提前下班回家。为了确保安娜·费尔南达已经完美地打点好了一切，他特意从餐厅走过，却意外地听到一声惊恐的叫声，厨房还传来一阵罕有的喧嚣。他赶忙向厨房走去，看到瓦伦廷娜正在与一个年轻的、皮肤黝黑的侍者争执。侍者看起来非常激动，正试图围抱并亲吻表姐，而表姐则奋力反抗，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怒火，因嘴里塞满的食物而逐步减少的怒火。

赫苏斯·阿尼巴尔用力推开侍者，在他的嘴上打了一巴掌，侍者充满忿恨地看着他，说了句：

“我现在就走。”

但是，在走之前，他又转过身来，对男主人说：

“有人在厨房工作的时候，年长的女人可不应该进来。她们只会让我们产生欲望。”“因为我很想吃东西，而且很饿。”瓦伦廷娜展示出了她人性中的另一面，用一种充满孩子气的声音说道。

“请原谅，先生，”侍者接着说道，“我以为她想……”

“好了。”经过一番思考后，赫苏斯·阿尼巴尔说道，“留下来吧。完成你的工作。”

他看了看表姐。

“我理解你。”

侍者很可能生生地把微笑憋了回去，继续他尚未说完就被打断的句子：“我认为您是在帮这位女士。”然而，这个墨西哥小伙目光中透露出的歹念正在向赫苏斯·阿尼巴尔宣告：“要是您喜欢她，那就归您了，毕竟您才是这里的主人……”

事实上，赫苏斯·阿尼巴尔无比渴望加入这场目光——或者，目光缺席——的游戏，游戏的主角是侍者、瓦伦廷娜和他本人，他感到非常满意，唾弃着所有让他莫名其妙的诱惑。

在用餐的过程中，侍者把盛着火鸡和其他佐料的大盘端了起来，目光情不自禁地瞟向安娜·费尔南达裸露在外的肌肤，但他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避免了看向瓦伦廷娜包裹一身黑衣中的胸膛，而后者，为了避免与侍者对视，一直充满感激地看着赫苏斯·阿尼巴尔，感谢这天下午他及时的出现保护了她。

所有人都愉快地交谈着，他们的兴致都被安娜·费尔南达安排的活动勾了起来，当城市南部不可避免的停电突然开始的时候，在座的人同时发出了不可避免的惊呼：“啊！”与此同时，赫苏斯·阿尼巴尔被一种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力量支配，他试探性地在餐桌下伸出了一条腿，触碰到了瓦伦廷娜的脚尖。

表姐马上把脚缩了回去，但是，就像担心下一秒电就会来似的，她又把脚伸了回来，轻触着赫苏斯·阿尼巴尔的脚。他们就保持着这个动作，直到电来了为止。

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们的下一个假期，他们去过或者即将要去的地方。只有瓦伦廷娜一言不发，就像哪儿都没去过似的。

所有的人都在喝白兰地的时候，她挑选了一杯和缓的龙舌兰。

晚餐过后，所有人都聚在一起聊天，男主人试图忽视表姐投来的目光，但对他来说实在不简单，他不停地告诉自己，这类事情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的，两个相隔如此之远的人如此之快地靠近，其中一定有着更深刻的原因，更何况他们两个都不是——从来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轻浮的人，是因为赫苏斯·阿尼巴尔觉得光着脚走路，或者前进厨房吃点东西，都是令人感到愉悦的行为——他是这么想的，是这么想的吗？——同时，也是无比自由的……

他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恳求黑暗能够再次降临，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调情。然而，他的祈求没能实现。互道晚安时，赫苏斯·阿尼巴尔飞快地在表姐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吻，但是，在那之前，他们鼻子贴着鼻子，互相感受着对方近在咫尺的呼吸，就这样持续了好久。

“晚安。”

“明天见。”

声音压得极低。（赫苏斯·阿尼巴尔：“命运会帮助我们。”）

男主人十分清楚表姐瓦伦廷娜被分配到了哪个房间。待到破晓时分[22]，赫苏斯·阿尼巴尔悄悄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来到了瓦伦廷娜的房门口。她用钥匙锁着门吗？男主人推开门，进入一片被床头小灯照亮的空间中，这盏小灯与其说是贞洁的，倒不如说在撩拨我们的男主人的心弦。

瓦伦廷娜正等待着他，她站立着，光着脚，穿着一件胸口饰有绣花的长睡袍。

## 二

不，不是因为她只被邀请在这里待三个晚上，这就意味着此时此刻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消散，被遥远的距离抛入遗忘的深渊。这一次，就这一次，瓦伦廷娜屈服于被禁止的享乐，因为她十分确信这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因为她对爱充满渴望，而在她表妹的丈夫的怀抱中，她找到了爱，虽然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爱，却是她感受到的最热烈的爱，因此，一切都是值得的，她管不了那么多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因为任由自己被赫苏斯·阿尼巴尔热烈地爱着，她感到一

种解脱，她不再因为自己长相丑陋，因而在生活中遭受了不少伤害而憎恶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离群索居。

不，她什么也不是，她的生活什么也不是。这就是让她困惑、让她顺从、让她胆怯的原因。她只不过是一条被这个男人汹涌的爱情洪流淹没的小溪罢了。是他，赫苏斯·阿尼巴尔，直到上一刻还被忽视的、表妹的丈夫，他竟是激起她情欲的罪魁祸首，在那天以及接下来的三个晚上，他简直把瓦伦廷娜迷住了，赫苏斯·阿尼巴尔温柔却坚定地褪下她熨得笔挺的丝绸裙和带扣的黑衬衫，一把摘下她的发髻，疯狂地亲吻她，几乎让她透不过气来，他把她放倒在床上，对她说，有时用他的话语，有时则用他的沉默，先是请给我一分钟瓦伦廷娜我没有更多的要求然后是给我一个小时的享受再然后是让我整晚都与你待在一起他对瓦伦廷娜说对自己说瓦伦廷娜你苦涩的辛辣的味道简直叫我发狂你散落的头发就像一片满是蛇群的热带丛林你赤裸的胴体如此完美如此丰满它隐藏在你修女般的服装中叫人难以看穿，它和你脸上严酷的表情是如此的不相称，你的脸伪装着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与它的伪装毫不相称这伪装使你的身体成了一个让人目眩神迷的发现瓦伦廷娜你是知道这点的不要捂住你的脸你要知道这是你的秘密一张隐藏了身体的秘密的脸，要是我没有勇气脱下你的衣服，那我怎么能看透你？因为不是你瓦伦廷娜把我带到了你身边是我从现在开始是我来到你身边是我找到了你是我不再想离开你是我赫苏斯·阿尼巴尔为你着迷为了你陈旧的沉睡着的充满耐心的花蕾在灵魂的尽头等待着我你知道吗瓦伦廷娜？现实折磨着我就算我们彼此相爱只是一个谎言也是这个谎言给了我的生命瓦伦廷娜·索罗利亚是我的生命我的真爱我的妻子她期望着又渴望着表姐瓦伦廷娜你注意到了吗？占有你的时候我身上突然生发出了一种温柔的残暴这是你带给我的让我浑身颤抖你可以为了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而恨我就算你再恨我我也只会更加爱你而且你不会恨我的不是吗？你无需试图向自己解释任何事你只需要知道：就因为是你所以你征服了我你是我从未享受过的欢愉你给予我的每分每秒填满了我灵魂中空虚的沙漏瓦伦廷娜多好呀我们俩抱在一起从一边滚到另一边打我骂我吧我的爱你会看到无论你给我带来多大的伤害都不会损毁你对我的好我要亲遍你的全身从你的脚板心到你的头顶我不想做你生命中第一个或最后一个男人我想做你唯一的男人表姐瓦伦廷娜我的爱我对你的爱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那就是无可救药的爱发现你让我成为了顽固的赫苏斯，要是你抛弃了我我将不安地度过每个日夜你是我内心的平静我的自由我的肚脐我的指甲我的消化道我的睡眠瓦伦廷娜你将我从意识的枷锁中解救出来义务忠诚习俗让我能够做我自己痴情于家中丑女的人在我看来没有人能比得上这个丑女我对她的热情无人能敌她是我完完全全属于我不属于任何其他人因此没人敢羡慕我没敢把你带离我的视线带离我的身边我是你唯一的男人爱着你我的爱你完完全全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人你是我欢愉我从未享受过的欢愉我审慎的热情的瓦伦廷娜难道之前你就知道你体内充斥着如此之多的巨响如此之脆弱如此之柔软的爱的能力你知道吗？至少我不知道你别觉得惊讶你永远不要觉得他帮过我因为这不是事实是你帮了我是你把我从一切谎言和一切丑陋的幻想中解救不出来你别说丑陋永远别像刚才那样说话闭嘴记住这点你就是你与众不同永远别再说感谢了别再这样说受到恩惠的人是我瓦伦廷娜我和你一起是因为你帮助了我宽恕了我我想成为有权利爱你的人就像星期五那样就像此刻星期六这样还有明天星期天在你走之前瓦伦廷娜想到你要走我简直无法忍受就像一支箭插在了我的心上就像射在赤裸的圣塞巴斯蒂安[23]身上那样而你阴郁的目光就是那张射出了箭矢的弓我的爱是因为这样我才爱你因为你的眼窝发黑因为你的嘴唇干瘪因为你死神般的颧骨因为你蛇窝般的长发因为你的双手就像毫不害臊的爪子一样在我周身摩挲你清瘦的身躯在我更清瘦的身躯之下我和你瓦伦廷娜和赫苏斯我们的身体就像是自婴孩时期就期盼着与彼此相遇一般我们的相遇被谱写在星辰中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铭心刻骨的爱情我们深爱着彼此我和你表姐我的心肝被禁止的表姐下流又纯洁的表姐瓦伦廷娜要是你抛弃了我你知道的我会为你哭泣失去你的伤痛永远无法痊愈我是为你而生的也会为你而死因为我是那个发现了你真正的美丽的人只有爱你的人才能见识你的美丽因为我发现了你我不能放弃被我发现的这具绝美的尘世之躯我不能在凄楚中辗转难眠忘记我曾经是你专属的地图绘制员你的航海家你的征服者因为你的身体是专属于我的土地表姐瓦伦廷娜你的身体是我的祖国因为我是你的情人和你在一起之后我才了解了之前从未享受过的欢愉因为我爱你瓦伦廷娜这对我来说是非同一般的对你来说也是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会爱上你也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竟然会委身于我所以我们的每一次欢愉都是一种让人震颤让人煎熬的无比伦比的罪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这就是我在无意识中找寻的东西你呢？

我一直觉得我生来就是为了让人烦扰的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也能被爱因为我与众不同还因为你丑陋瓦伦廷娜还因为你丑陋

你不让我觉得因为有你我是美丽的吗？

不瓦伦廷娜你要知道你是丑陋的这样一来你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因为没有其他人敢这么告诉你

我是丑陋的赫苏斯

丑陋丑陋丑陋你是我的堕落之源是我一直热望的朝着一场意料之外的爱情进发的冒险先是请给我一分钟瓦伦廷娜然后是让我整晚都与你待在一起再然后是让我与你共度余生

丑陋

让我看看你的心瓦伦廷娜然后我会把我的交给你

我会告诉谁我爱你？

我会告诉谁我们相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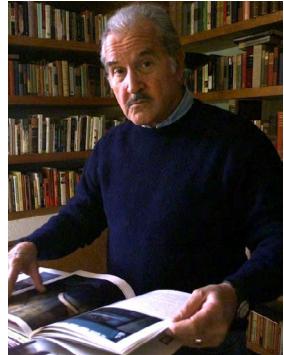
## 三

吃完晚餐后，大家都离开了大厅。只有瓦伦廷娜还待在大厅里。对她来说，夜晚尚未结束。

这时他走了进来。

所有人都走了。所有人都藏起来窃窃私语。  
只有瓦伦廷娜还在等待他的出现，对她说，他，赫苏斯·阿尼巴尔，是唯一有吸引力的东西。  
他的目光告诉她：“我在找寻再一次和你独处的机会。”  
他们看着彼此。  
其他人都试图转移目光。  
她知道一个保护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怎么样才会演变为一个异性所具有的吸引力。  
她又找回了第一次见赫苏斯·阿尼巴尔时的状态。  
她根本不在乎其他任何人。  
她根本没听别人在背后议论什么。  
丑陋女人的运气是那些美丽女人渴望不来的。  
她看起来像个异装癖。  
只有瞎子才愿意和她结婚。  
在那些好的家庭里确实会发生这种事。  
还有，安娜·费尔南达对赫苏斯·阿尼巴尔说的话。  
你要抛弃我，和这个滑稽可笑的人在一起？我根本不需要摆出一副看不起你的样子。  
无论如何，你是我的丈夫，我们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起了誓。我永远不会抛弃你。永远不会和你离婚。你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有本事你就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和我说些什么。你选择她是为了满足你无边的虚荣心，为了证明你比她美好得多？是因为你无法接受你比你的妻子丑陋得多？我们在不合时宜的时间粉饰了房子。  
亲戚们都离开了。  
堂娜皮埃迪塔躺回到自己的床上，准备，用她自己的话说，去“那边那个更好的居所”。  
安娜·费尔南达再也没有邀请任何人来家里做客，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培养她的女儿路易莎·费尔南达，用最严格的天主教道德来规训她。

- [1] 此处的堂娜皮埃迪塔即前文提及的堂娜皮埃达。在西班牙语里，皮埃迪塔 (Piedita) 是皮埃达 (Piedad) 的指小词，指小词一般用来表示亲近，传递情感。
- [2] 现在提到洛斯莱昂斯沙漠，一般指的是洛斯莱昂斯沙漠国家公园，是一个距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约 20 公里的国家公园，始建于 2005 年。文中提到的应为现国家公园所在的地区，在作者写就该作品时，国家公园尚未建造。
- [3]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光明之神、文艺之神，同时也是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是众神之王宙斯和女神勒托的儿子，月亮女神阿缇密丝的孪生弟弟。
- [4] 卡洛斯·佩利塞尔 (1897-1977)，墨西哥作家、诗人、博物学家、政治家。
- [5] 阿胡斯科山是一座位于墨西哥城西南端的火山穹丘，最高海拔为 3930 米。火山穹丘常见于火山口内或火山的侧翼，是一种圆顶状的突起，看起来类似某些植物的球根。
- [6] 圣菲，美国新墨西哥州州府，是统治新墨西哥殖民地的据点和传教、贸易的中心。1848 年美墨战争后，为美国占有。
- [7] 这句话既是字面意思，还有另一层意思，赫苏斯·阿尼巴尔的名字 Jesús 和耶稣的名字 Jesús 相同，所以这句话也能理解为“对圣父的爱要远先于对圣子耶稣的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上帝的三个位格。
- [8] 赫苏斯的名字与耶稣基督的名字相同，安娜·费尔南达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 [9] 卡斯蒂利亚语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西班牙语。西班牙共有四种官方语言，分别为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与巴斯克语。
- [10]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1491/1503-1536)，西班牙黄金世纪著名的诗人、军事家。他的田园诗和爱情诗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
- [11] 路易斯·塞尔努达 (1902-1963)，西班牙诗人，“二七年代”的代表人物。
- [12] 这些都是墨西哥的州和城市。
- [13] 此处的巴斯克指的是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
- [14] “阿托查的圣婴”是幼年时期的耶稣的别名，流行于墨西哥地区。
- [15] 圣安东尼即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又称里斯本的圣安东尼，是一位天主教圣人，有“福音博士”和“异端之徒”之称号。时至今日，他仍然是天主教最著名的圣人之一，天主教徒在遗失物品时常常向他请求协助。
- [16] 原文是 El Metropolitan de Nueva York，也可能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 [17] 尽管这里用了“吃独食”这个表达方式，但表达的只是它字面的意思。即瓦伦廷娜独来独往，吃饭时不愿与别人同食。
- [18] 原文是 trasterrados，一般用来指因西班牙内战而远赴墨西哥避难的西班牙人。
- [19] 华雷斯区是墨西哥城的一个区，建造初期，尤其是在墨西哥革命前，被用为富裕阶层的住宅区，现在是一个拥有博物馆、住宅区、办公区和商业区的街区，其中最出名的是拥有许多著名景点的“玫瑰区”。
- [20] 路易斯·德·贡戈拉·伊·阿尔戈特 (1561-1627)，西班牙诗人。
- [21] 佩德罗·萨利纳斯 (1891-1951)，西班牙诗人，散文家，是“二七年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 [22] 原文 la hora de los lobos 在西班牙语中指的是夜晚与黎明之间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常常有人死去，常常有人出生；在这个时刻，人们的睡眠是最深沉的，人们的噩梦是最真实的，失眠的人会感受到极大的恐惧；这个时刻也是幽灵和鬼怪最活跃的时刻。
- [23] 圣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殉道圣人。据说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期间被杀的。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他常被描绘成双臂被反绑在树桩上，被乱箭所射死。



卡洛斯·富恩特斯

墨西哥著名作家、文人、外交家，西语美洲文坛最出类拔萃的作家之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1977 年，荣获西语美洲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1987 年，荣获素有“西语世界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塞万提斯文学奖。1994 年荣获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译者：徐恬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主要译作有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长篇小说《感谢火》，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短篇小说全集》（待出版）、卡洛斯·富恩特斯短篇小说集《幸福之家》（待出版）。

《某个讨人嫌的表姐》选自卡洛斯·富恩特斯短篇小说集《幸福之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 非虚构 近况

### 伊险峰 杨樱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想知道，  
我们长乐路上的朋友们他们都怎么样了。

辉哥闲不下来，做了志愿者。每天穿着蓝袍子防护服，跟着发抗原收抗原，通知去做核酸，发物资的时候，不要你去领，一定要送到家门口。

他家门口是社区中心，他儿子小七是社区吉祥物及灵魂人物，辉哥太太 Emma 是这个四十几户人家的社区团购专家。

辉哥承包长乐路的中通快递，在上海已经快十五年，熟悉长乐路每个空间、弄堂和门牌号，熟悉三教九流，擅长与各色人打交道。

有钱或者背景深厚的人，经历封城起初短暂慌乱之后稳下阵脚，各种渠道物资充裕；辉哥认识的那些各种跑江湖的人，本来就靠觊觎各种机会搵食，封城之后，这些江湖人士先出场，他们生存机会更大，而且确实会赚一些钱。但这食利空间巨大，很快就会有租约的、擅长跟政府打交道的人、政府背景人士的代理商们循味儿而来，市场就不再归底层的江湖人士所有了，而且他们往往就此被指责为投机倒把，是最先被打击打倒绳之以法的对象。

辉哥认识的江湖人士，帮蒲园度过最初窘迫时光，卖些小菜，避开所有检查，那时检查并不像今天这样穷凶极恶。价钱贵当然会贵一些，也不离谱。

辉哥很早就有通行证，但小七大少没打过疫苗，所以辉哥牺牲收入，四月里可以狠狠赚钱的那一个月他就甘心做志愿者。

即使蒲园成了防范区，辉哥也不出去，他可能还是害怕。在他家门口的社区中心里，他不时会宣布他对周边疫情的新发现，他有三四个软件还是小程序，查周边阳性，他会说襄阳北路全是，后来又说长乐路上只剩下我们这里才安全。他也会说快递和外卖的不安全，都是中队长，都是拼了命的，他批评这些同行们。

到五月初，人呆得烦躁且呆滞，Emma 和辉哥有时会生气。辉哥大声说，明明已经做好了事，为什么还要再做一遍，你就是看我不顺眼！Emma 说，对，我看你不顺眼不是一天两天了！晚上，有人看到辉哥在弄堂里跟人聊天，聊到不能再晚了，回家，门锁着，辉哥并不喊 Emma 开门，辉哥喊“小七开门！”有人路过，看辉哥讪讪坐在门边玩手机。隔一会儿，又听辉哥喊小七开门。门有响动，辉哥回家了。

辉哥下定决心还是要出去工作。在院子里说，每天要做核酸，每天要做抗原。跟社区也商量过了，闭环，出去了门，就不回来了。晚上，有人看到一个骑助动车的大白站在门口，问谁家这么晚还有快递，大白说我是辉子，叫 Emma。Emma 拿一方便袋交给辉哥，说这是牛奶，橘子，又说洗发水和沐浴液都放在前面的包里了。有人问辉哥，公司有宿舍吗？没有。辉哥带去一个行军床。辉哥说挺好，有热水。

出去工作的辉哥，有时在群里发照片，南京东路现在是这样的；延安路下面每个路口都有路障；到处都是关卡；我可以给你们带昌平路肯德基，我请客；公司有一批玉米要不要；公司有西瓜，7 块钱一斤有人要吗；公司有鸡蛋，35 块钱一板你们统

计一下；很快，他就会带着玉米，带着西瓜，带着鸡蛋之类回来，停在门口，里面的人有志愿者沈老师，有保安老罗，有 Emma，拿着酒精喷包装，辉哥照例说，现在哪条路哪条路不能走了，你们要什么，你们有什么要送出去的东西。很快就走了。很高兴看到在很小很小的一个局部，辉哥，还有他们家很小部分很小部分地恢复了正常。虽然小七夜里十一点多会大呼着爸爸妈妈往外面跑，Emma 大喊着小七你回来，爸爸臭臭。



到五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了。长乐路上现在最多三种声音。救护车的声音，它们是到一妇婴的。新的、多出来的是几乎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有的。一阵狗的嘶咬声，街上的狗都变成野狗了，他们会抢他们的物资，过一段还可能会抢地盘。还有越来越多的警车的声音，这路上没有多少人和车，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威严，那么威严地使用他们的高频喇叭，好像发生了天大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长乐路上的朋友们他们都怎么样了。

#### 01

和小胡上一次见面是在他同乐坊的新店里。冬天，他的清酒店从襄阳北路搬到了西康路，一个新开的工业园区，颜料厂改的，开业的时间比他宣称的晚了大半个月，冬夜里小胡的店是那个园区里唯一的光源。“真的，我就是被忽悠了。”他坐在我对面，喝朝日纯生，我吃一碟毛豆。后厨还得磨合，毛豆煮的时间短了点儿。

这是他那天晚上说的唯一一句抱怨。胡老板，丹尼尔，1988 年生的进取青年，那天晚上主要负责向我展示“别人恐惧的时候你应该贪婪”，每报出一组新业务，就跟着掩饰不住得意的大笑。十四家店，同时开张。浦东浦西，从茶泡饭到原生态火锅，绝不重复。一张会员卡，吃遍十四家。

“我的人生就是吃喝玩乐。”小胡意气风发。

小胡是我长乐路上认识的第一个生意人，来自湖北潜江，据说是新晋小龙虾之乡。

当时他在襄阳北路那家店还没有与公路商店合作，挂牌“御田酒场”，主打关东煮。

小胡原来做葡萄酒进口。后来自己做 bistro，除了这家 10 平米的清酒 bistro，还有隔壁的红酒 bistro。当时他说，全中国出了上海这片梧桐树覆盖的区域，bistro 开不起来。“至少五年之内开不起来。”

不过冬天在御田酒肆那次，他说他已经改变看法了。bistro 生意现在可以开到上海之外了，他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和那个 14 家店的宏图一样，财务预算已经在 excel 上一字排开，他推开门毛豆给我看手机，斩钉截铁。

4 月 9 日的时候跟他打过一次招呼。他说挺好挺好，吃喝充足。又问店怎么样，答曰全关，配以三个捂脸的表情。当时全上海的话题是物资。每个人能不能吃得上饭，是日常问候开场白。

又过一个月，美团外卖每日都有新的小餐馆和小酒馆上线，上海还有一个“酒吧服务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发布，又问他有没有搞到复工证，进入保供行列。

早上发的消息，午饭之后回复来了。“老早就是保供企业了，但是街道不让营业。”

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问店是哪家店，人在哪个区。这才知道小胡因为某些原因一直住在酒店，襄阳北路的店因为周边社区疫情严重没有复工的可能，唯一还在争取的就是同乐坊这家新店。

然后对话就中止了。

又问 Mia，小胡的合伙人，她说眼下就是硬撑。想 2020 年的那一次，年初四开始停业半个月，3 月初恢复，尚且到 6 月才缓过气来。这一次简直不敢想。

他们眼下遇到的荒谬局面，还有包括财务在内的大部分员工都在浦东，28 日之后再也无法过江，银行 U 盾被封在浦西的办公室直到现在，一分钱也取不出来。而公司每月的流水还要正常支出。Mia 现在一个重要工作是借钱。

“现在还不能乱。一定要稳住。思路这个时候要特别清楚。”Mia 说。她应该默念这几句话很多遍了。唯一庆幸的，是那系列的 14 家新店，还没来得及开。她传授保持心智正常秘诀：看看神秘事件之类的消遣视频，万万不要看朋友圈。身边朋友的各种近况就足以让她胆战心惊。她也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丹尼尔一直住在酒店里。

黄昏的时候小胡发消息来：“前面睡着了。”跟着两个捂脸的表情。

#### 02

英姐让我体谅警察。“他们四十多天没有回家休息了。暴躁是难免的。”

我跟她说起我前两天出门被反复盘查的经历。主干道每两个路口就有一组警察盘查各种码各种证件，动辄说你阻碍交通违反防疫法，非常凶。英姐说这是“人家的工作”。“我们什么事都不干，人家天天超时工作。”

我问英姐店里怎么样了，能不能做点线上外卖生意。

“保供跟我不搭界的。”

“好多人都开了呀。”

“我连自己家门都基本上不出去。关键是我被关在家里啊。”

“你楼下不就是 624？”

“去年着火之后就没有住了。”

去年长乐路 624 着了场火。石库门房子电表老化，从三楼烧下来，没有太严重，但消防灭火把楼浇得透透的，后来英姐还对我惋惜，史明智的那本《长乐路》都泡了水。我早该想到她和黄老板已经从长乐路 624 号的阁楼里搬出去了。

624 号是长乐路夜生活中心，是马路牙子对瓶吹精酿啤酒小视频的发源地。老板娘英姐早年做水果和鲜花，后来改卖酒，与时俱进，2017 年开始卖起精酿。但英姐的销售秘诀不在于酒，而是人格魅力。她有点像日式居酒屋里对男女小青年忧愁烦恼一目了然的老板娘，宽容豪爽，可以做任何人的树洞，任何人的调节器。甚至有一人一时没有钱买酒，也可以改天过来做几天搬酒小工抵账。

英姐和丈夫老黄这种性格，再加上对平民小店惬意夜生活的混搭想象，让公路商店在 2018 年找到英姐，挂牌“公路商店 &624”，带来各种亚文化青年，又扩散到更大的人群。英姐掌握了宝丽来营销秘诀，从 2017 年就开始为顾客拍即时照片，如今从门框一直贴到天花板和空调外壳，和滑板少年们在门上贴的口号贴纸一起，成为 Changle 624 的视觉标识。去年底公路商店拆伙，英姐也是淡淡的口吻，没关系的，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

后来便是那场火。

英姐现在住在静安寺那一带。她羡慕我敢出门，说自己虽然也是一例阳性都没有的防范区，但是小区不让出去。吃的一直都有，团购，“团什么吃什么”。她对抗焦虑的方式也是团购。集中注意力，每天都在团购群里等着团货。

长乐路 624 号背后的社区阳性多。封城前两天，它们就已经堵死了每一个出口。快五十天了。英姐不知道他们那里有过孕妇方舱求救；也不知道有过集体冲小区大门——他们每个楼门都已经是封上的，说明他们已经冲过一道口了；当然，更不知道有一天突然从他们那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持续了很久。

有人拍了两张照片给她。一张是 624 门口，蓝色的架空线挡板墙，挡住了贴满宝丽来的店面，悬铃木的叶子葳蕤，门口路边停着一辆大众，落满灰尘，不知道停了多久。另一张是更远一点的整个长乐路，原来在架空线入地的工程板对面，是共享单车一辆接着一辆拦起来的另一种封锁线，半条长乐路变成停车场，只有挂满物资的跑腿和外卖走在窄道中间。离镜头最近的，是封锁用的不锈钢栏杆。

### 03

莫先生还是那样老派。他是英姐在长乐路的老邻居，早年英姐还在开水果店的时候，他的茶叶店“一品香”就紧挨着，同甘共苦。后来街道整顿，两家店中间隔开了几家，后来英姐水果店改头换面，莫先生心有不甘，去年夏天，茶叶罐头普洱纸包统统后移，在临街的玻璃后面摆出一溜酒柜，也卖起精酿。

我看微信里的聊天记录，上一次还是他发给我的今日头条文章，《年轻人为什么爱坐在长乐路的上街沿上》。

“管控区。谢问候。居家隔离，足不出户，什么时候解封，天知道了。”莫先生在 5 月 10 日的时候说。又说：“长乐路上疫情不乐观。小区住房条件差的，阴性劝到酒店隔离，政府买单。”

莫先生不住在长乐路，应该住在自己买的房子了，不会太近。安徽六安茶叶厂供销员莫先生从来都是看大局势的人，1990 年代他到上海来卖茶叶，沿着苏州河走遍劳动力密集的纺织厂印染厂，等待结账的功夫便在街头看上海时髦的男男女女，觉得这是好生活之大趋势体系。茶叶厂专倒闭之后他自谋生路，搬到上海开起茶叶店，借的还是当年积累的老客户，选在“要人”出没的长乐路——他用慢一拍的语速细数附近所有大型酒店的名字——这些人的流动就会带来信息，而信息，莫先生认为，是做生意顶顶重要的。比如他的近邻 624，就有要人指点，顺利搭上青年文化快车。莫先生是把国家历史大事和领导人动态当作日常聊天重要背景的人。上次聊天去问他茶叶店为什么也计划卖啤酒，他从 1992 年南巡讲话一直说到总理亲自问网红小贩“葱油饼阿大”以此叫停了上海 2017 年那一拨封墙打洞。“我喜欢研究一点商业。”他说。

他的茶叶店里悬着一副字。他问我，这个字看着一般是吧，晓得为什么我还要挂在正当中伐？

我看了看，不晓得。他说，写的字不怎么样不要紧，传说中这个写字的人是要紧的。哎，懂伐？字呢，是你们蒲园门口的好，真正书法家。有底蕴。

后来查蒲园的题字，果然，谭泽闿先生，还写了《文汇报》的报头和“招商局”招牌。10 日那天，他又发来天问：“深圳的防疫措施，是否在上海有效？”

11 日早上 9 点，他转发公众号文章：《世卫总干事：中国冠病清零正常“不可持续”》。这是 10 号深夜的消息，想来莫先生也是早上起床就看到了，一时间有点兴奋。

到了 11 号晚上，除了外交部发言人对某些拿政治挑事的人的批评，这条消息各种各样的版本在网络上已经基本不可见。

### 04

小顾是最早跟我说生意惨透惨透的人。他羡慕好几个朋友都去跑闪送，“跑腿费不得了，一天小跑跑也有一千多，电瓶车，跑不远。空的时候还能帮自己送些东西。”

那时候物资紧张，整个上海的生活所需都在跑腿摩托车踏板上。

小顾家在杨浦。他和父母还有两个弟弟一起被关在家里。吃喝都有，今年的生意是不想了。当时他说。

小顾在长乐路“周休七日”做店员，他们在新天地广场的新店开业之后，原本只是小比例的面包蛋糕提高了份额。长乐路的这一家停业装修，封城前几天，那扇洋气的可以往上支起来的临街大窗户已经装好了。

一个月以后再去问候，他对“惨”的形容突然具体起来。

他在想象公司厨房。淮海中路那家门店他最后一天都收拾好了，唯有位于宝山的公司中央厨房，突然通知不让开门，“里面还有准备好的物料，还有一些刚刚做好的。”封闭了 45 天的厨房。我脑子里出现绿毛菌菌抹茶风格的贝果面包和霉菌茂盛宛如波斯地毯的奶油蛋糕，还有尸横遍地的花鸟市场，还有学校里养着小动物的实验室和自然角。

除此之外还有房租。小顾飞快地替老板算了算。

“长乐路房子私人的，肯定不能免；公司那边是政府的，估计能免；商场的店是香港公司的，估计老板要去谈。”

他不敢乐观，又庆幸自己不是最悲惨的那一类人。起码他的老板还没有跟员工谈什么变动。虽然没法出去赚钱，但起码不会像跑闪送的朋友们一样，突然无法回小区，只能借帐篷住在路边。小区已经变成了防范区，煤卫独立，也不会像杨浦的那些老小区一样，突然集体转移，有家不能回。

他和很多人一样，在底线里找一些乐观安慰自己。有吃有喝。还好。

5 月 10 日本来应该是小顾家的小区解封的日子，不过这个名号连形式都没走，当天就宣布进入静默期。

因为杨浦控江街道数据被查出造假，小顾说，好几个小区半夜被拉起来重做核酸。杨浦所有小区提升为封控模式，禁止团购外卖，一切商业场所关闭。

小顾说，就一直不觉得这是上海能干出来的事，看不懂，就离谱。

### 05

5 月 13 日，阿力家的“大哥”满月。新乐路潮店老板阿力，在朋友圈发出在上海封控时出生的儿子照片，骄傲地说“这是我大哥”。

“大哥”出生一波三折。阿力住的小区离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直线距离不会超过 300 米，之前也一直在那里产检，却因为所在楼栋有阳性居民，临时拒收，临到生产才知道必须去定点医院六院，手忙脚乱，好在母子平安。

上一次见阿力，还是临近封城前的 3 月末。马路已经空空荡荡，绝大多数店铺被要求闭店，绝大多数餐馆不接受堂食，唯有从菜场和超市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匆匆走在街上。阿力站在店门口，在往车里运着一些什么东西。

后来看他朋友圈，3 月 31 日的时候还有摄制组去新乐路店里取景。如今看上去觉得阿力和客户都够争分夺秒，其实在当时当刻，大家想的不过就是现在拍一点，剩下的内容反正 4 月 5 日以后还可以继续做。

“疫情就当在家陪老婆坐月子了。”阿力说。

他的生意变成了抖音专场。用自己之前积累的大量粉丝替外地的同行卖货，货也是同行在发，他拿个提成。上海的货都欠着没发，客户体谅，也不急。

“亏目前肯定还是亏的。但目前还能勉强支撑。”听我说了几句世道艰难的阿力突然叫我不要多愁善感：“所有人都好那是乌托邦！中国目前不现实！”

就好像通行聊天结束语一般，他说，这次影响肯定不小，估计熬过今年会好起来吧！

### 06

小赵经营一家烟酒回收的小门店，就在长乐路一妇婴对面，原本应该也是母婴用品商店，如今诸如“月嫂”之类的广告胶印还残留在二楼窗玻璃上。小赵的门面在这排楼的最西边，紧邻一条走道。事实上他自己的店面也就是一条窄道那么宽，一张一米左右的木桌占去了大部分位置，上面摊着一本辞海一样厚的大画册，讲解不同种类的名酒。书桌旁边是红黄配色，上面印满茅台五粮液等各种酒瓶，还有巨大手机号码的易拉宝。小赵就坐在这两样东西后面的靠背椅上，成天抱着手肘，看手机。他的背后空空荡荡，就好像如果房东允许，他其实也可以只租这张桌椅大小的店面面积。

如果不在这张书桌后面，小赵就在往返某个居民楼的路上。不像那种拿着大喇叭走街串巷的回收贩子，他做的是守株待兔式的生意，如果有人希望卖掉家里的烟酒，就可以打易拉宝上的电话让他上门去收。也有人本意不是卖货，只不过为了掂掂行情，把头伸进小赵坐着的那条窄道：“2000 年的茅台现在多少钱？”

这是小赵在上海第 11 年，他做过餐厅服务员、闪送快递员、烟酒店售货员，最终依从家族生意，做了烟酒回收。他的大舅和小舅都是干这一行的，但是比他要根深叶茂得多，不仅在上海置业，还可以把外甥需要的一切一手打点好。小赵只需要坐在那张书桌后面，学习这一行微妙的报价技巧——自从互联网打破了他们二手回收行业信息不透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一章已经翻页了。一个手上有好年份茅台的人轻易就可以知道自己应该卖什么价位。但是假货的迷雾一点没散。原本容易的便难，原本难的变得更难。他说他也在学习。

5 月 10 日的时候，他说，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居家隔离中。

他用词挺专业。为啥说居家隔离，感染了吗？

“没有啊，就是在家里不出去。”

他听说我在防范区，偶尔能出门，他挺羡慕，说自己关久了，有点急。不是急物资，他就一个人在上海，团购一点，政府发一点，能过。也不是急生意，他的房租便宜，能对付过去。他就是对一个人住在房间里一个半月这件事感到有点透不过气。

我问他在哪里。

徐汇区，天平路街道。我说这地方好，发得多还都是正经东西。小赵认可。

“我们天平路街道领导家属比较多，可能是沾光了。”

“听说宝山闵行发的不咋好，我这边现在就是十来次的样子，就是肉不多。”

“牛奶鸡蛋蔬菜水果日用品，米面粮油，都发，按户发。我一个人比较划算。”

听说外面没有东西卖，还有很多封路和随机检查，他不再提居家隔离带来的憋闷感。

“嗯，还是在家里呆着安全。”

### 07

5 月 12 日晚上，小李水果店的公众号公布了两张经营报表和一段话，标题《15055》。

报表显示 4 月 29 日，小李水果店收入 9346.64 元，4 月 30 日收入 1269.66 元。在下面的曲线统计图里，有一条贴地而行的直线，在 4 月 29 日突然耸立出来一个锐角，在 30 日又几乎掉到了三角形的底部。

那段话是这样的：

“我们一共收到了 15055 元。  
房东减免 2000 元加水果店的储蓄，刚好够缴纳房租。  
非常感谢大家。  
解封后记得来水果店吃雪糕！”

这是小李上上篇公众号《没钱交房租》的后续。他的爸妈在巨鹿路开了 20 多年水果店，去年夏天他和朋友接手，改卖鸡尾酒和新疆手工冰淇淋，不定期发布风格相当朋克的社群活动，比如把“丰县锁链”做成徽章，又或者把女性自慰的抽象画贴在大门上做海报。封控以后房租告急，小李和朋友们提前售卖冰淇淋券，15 元一份，解封后凭转账截图到店兑换。也接受爱心捐款。

冰淇淋券一共卖了 1003.67 份，助力小李封控之后的打怪第一关过关——这有点像对小李水果店的某种肯定。就好像同名水果群封控以来向来是社会动态信息汇总第一线，那些到小李水果店做过编织、卖过二手、相亲（但是没有成功）、看过乌克兰反战纪录片的男男女女，对这个水果店的信任要远远超出对一家小酒吧的眷恋。如果单看水果微信群的信息记录，你会看到上海自 3 月末疫情逐步封控以来一路的社会起伏，可能上海人都有很多群把几乎是同一批信息传来传去，但是这里的特殊性，恰恰在于纯粹只有信息分享，没有任何团购、交易，甚至也很少有情绪发泄，如果有人说话，那也是一两句，如果有人说了大量的话，那一定是求救或者求助，甚至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流浪者或者其他弱势群体。

长乐路周边的各种群里，我还加入了联华超市的购物群，以及 DoubleWin 的咖啡群。后者在 4 月中旬之后再无声音——在 4 月刚开始的那几天，大家在里面互相问，哪里可以加入团购群。长乐路附近小弄堂和小新村很多，通常要好几个才能凑够团购数量。这个需求之后，DoubleWin 的群就沉默了。

维系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这可能是小李的执念。小李水果店这个名字，到这个 1999 年出生的男生身上已经是第二代，他从 5 岁开始在巨鹿路生活，从水果店到襄阳北路那个丁字路口的家家户户还有半条小马路，就是他的游乐场。

小李和女朋友自 4 月 1 日封控之后就被隔离在江苏路的女朋友家。他的妈妈程女士在 3 月底的时候重操旧业，只不过改卖蔬菜，封控之后小李的爸爸——第一代小李——成为拥有防护服的志愿者，店里因此得以重新塞满水果、牛奶和烟酒，也就是去年小李接手前这个店的功能。不过小李爸爸无法走远，只能在长乐路周边给邻居送送，为数不多可以出门的那几次，我去小李水果店门口拿过一次水果。

小李爸爸让我把共享单车推到远一些的地方。他绕过封控的铁栏杆，把装好的水果递给我。告诉我街边现在有监控，工商已经来警告好几次，再卖东西就要把店强行关掉。

不过就好像小李爸爸依然可以进得到水果，本地生存智慧总是默默发挥作用，小李水果店不可能真的封闭，因为它不光光是一家店，它还是楼上和里弄好几户邻居出门的必经之道。之前在水果店参加活动，外面放着凄婉的纪录片，里面穿着红内裤的爷叔就着水池在刷牙。就好像这一片的精品店楼上可能悬着某户人家的内衣或者腊肠，这都是一抬手就能看到的混搭景象。

小李爸爸似乎也没有那么紧张。把水果递给我之后，他溜过马路去和对面栏杆后面的邻居讲话。那时候悬铃木的叶子萌发不久，果球还在爆毛，就像上海过往每一个春天一样，三两下就迷住眼睛，刺痛非常。

小李妈妈程女士，对儿子主导下的水果店转型怀有一种基于爱意的纵容。如果是基于生意，她完全不看好。放手交给小李，有点像他们夫妻俩主动进入半退休状态。然而封控之后，他们又重拾往日忙碌，眼看小李入不敷出，程女士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解封之后还是我们来做吧？”

“小李怎么说？”我问程女士。

“一口拒绝了我！”她大笑，全然是骄傲的。她让我跟小李有空说一说，别成天想着溜出小区，也别成天瞎嚷嚷。“让他不要乱说话！”

## 08

我把小李水果店那条筹款的《没钱交房租》转发到朋友圈之后，留言的人里有叶师傅。“前几天路过看到波波在溜达以为开门了呢。”

波波是小李的狗。叶师傅是小李水果店斜对门的邻居。说是邻居，其实还有点距离，小李水果店对面大兴里一直往里走，就和大门开在延安中路上的模范村接壤，两片矮疏铁杆挡住了机动车的轮子，人和自行车从来都是穿行无虞。黄昏时分自大兴里穿堂而过，可以在模范村的尽头看到那颗一度象征中苏友好的耀目红五星，在将暗未暗的天色里有魔幻的美感。

叶师傅住在模范村。他和太太 Serena 在新乐路西班牙式的老房子底楼开了一家中古店，叫“干垃圾”。因为这家店原本是整栋楼的停车间，1949 年以后被改成住房。Garage，干垃圾。

干垃圾在那条弄堂的尽头，也是黄昏的时候经过，叶师傅装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亮起来，忍不住往里走，就看到一个安排得满满当当，好像每一件东西都无法再动分毫的小店。里外两间，带一个小院子。在里面逡巡要小心翼翼，不要带到什么或者刮到什么，唯一可以优雅穿行的，是那只驻店吉祥物金吉拉。

这房子是叶师傅夫妻俩买下来的。当初听到的时候还略觉得诧异，他们倒是轻松：就跟模范村的房子一样，看着喜欢，也买得起，还有买房的配额，就买了。老房子底楼潮湿，为了让收藏的中古品不发霉，四台抽湿机 24 小时运转。

这样来说，抽湿机早就应该到了储水量自动停机了。好在黄梅天还没有来。

上一次见 Serena，她说怀孕四个月，那是春节前。我在封控之后想起这件事，一问，果然就是 4 月底的预产期。好在离一妇婴近，但是聊天那会儿，正好是就医问题甚嚣尘上的档口，也替她捏把汗。Serena 说已经小区居委都报备了，“我觉得因为之前有铺路人，我真的要生了肯定给我出去的。”她会先尝试出去产检。

这个奥秘克戎宝宝——这是他们给的一个定义——最后选在 5 月 7 日出生，之前困扰 Serena 的问题已经基本纾解。他们的女儿裹在纱布里的照片出现在叶师傅的朋友圈里。两天后母女出院，回到半个街区外的模范村。

## 09

Nicholas 提前毕业了。他说把他小区团购写进了作业。

认识他是在 Dippers 店里，那天他穿白衬衫，系着红领带，远看以为是中介，还在思虑为何这位中介没有因为吃盒饭而变得粗壮，熟门熟路坐下之后才看清衬衫上绣着校徽，原来是协和国际学校的校服。

算上那一次，也就见过两次。

Nicholas 住在巨鹿路的四方新城，站在小李水果店门口可以看到小区大门。它大概是上海最早一批顶配公寓，就是不知为何，门口一尊公共厕所保留至今，甚至还有倒粪口。我很爱看这个组合，每每路过都要感慨，也许只有上海有这样的搭配。

Nicholas 爸爸是律师，妈妈全职太太，还有一个姐姐。他读 IB，可以理解为那种最后要参加全球统一高考的课程。说起小时候去旅游，是做学校历史作业的时候爸爸看到他在研究罗马，为了帮助儿子有更具体的认识，随即买了去罗马的机票。听起来是有钱人。在我们聊天的那会儿，他说他爸爸和他都觉得牛津剑桥没什么好去的，如今水分下降，且是只会死读书的无聊好学生才会做的选择。Nicholas 第二次见面，是在办公室。说话的时候三楼邻居咚咚发出巨响，他惊惶失色，你们这种老房子都是这么吵的吗？你邻居有没有事，要不要去帮他？

4 月初的时候，料想四方新城这样的小区，论实力论规模生存都不是问题，但我还是问 Nicholas，怎么样，也靠团购活着吗？

“是啊。”又说周边小弄堂团购艰难，物资是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朋友圈，我们语文课也有讨论到。”

“语文课讨论这个？”

“IB 嘛，口试要拟一个全球性话题。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拟定的话题在上海已经呈现了。例如，困境之下人们价值观的改变，社会群体需求与社会矛盾。困境对于群体物资的影响。”他稍后又说，“我们文本分析都是刘瑜的作品。总体来说如今教育现状之下 IB 学校有点危。”

“危是政治风险？”“嗯，我们语文老师都有跟教育局碰面，她抱怨说现在一点权力都没有了。”

再说起话，是 5 月 7 日。一则消息说“上海体制内中高考都要延期，而体制外三大国际课 IBDP、A Level 和 AP 全部取消”。我转给 Nicholas，问他听说没有。

他说他 4 月 12 日就收到了 IB 的官方通知。

我这才想起来，他上一次开场就说学校考试取消，他已经毕业了。有了四个月的暑假，完全不知该如何处理。那是 4 月 14 日的对话。

我问取消对他有何影响，他就好像隔着微信耸耸肩，说成绩可以按照预估分和之前交的论文，七月初会发成绩，自己大概率会去曼彻斯特大学。他唯一的苦恼，是想从经济学转社会学。

“我们体制外的其实是赚了。因为就上海不让考试，全球其他地方都考，搞不好评分标准会对我们有利。”人生赢家，他说他当时听说考试取消的消息之后就是这个反应。到那一天的晚上，我仔细看了不少人的讨论，忍不住再转给他，问：“好像看这些说法，并不完全是人生赢家式的遭遇。”

他好像还是耸耸肩的样子：“那肯定，每一件事情都有正反面。有些同学打算到大考再爆发，论文也没有好好写，现在也没有机会爆发了。”

又晚一天，《财新》的一篇名为《多地 AP 考试因疫情取消，数万考生遭困》的文章被很多人转发，那篇文章提到，“中国国际教育体系中最顶尖学生数年来朝着海外第一梯队高校的努力付诸东流，情况几乎无解。”

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确定，Nicholas 是片叶不沾身的洒脱，还是侥幸脱身的庆幸，或者很多事情对他来说，就好像小区团购一样，是一个无需做出唯一解的课题？

## 10

去问候王老师的情况，是在看到淮海坊的消息之后。

前一天有一位勇敢的阿姨，她跟居委会社工和警察交涉的视频，让人看到文明之光。我们上海，现在就是这样，每天都在文明之光和“怎么会这样”之间被来回撞击，每个人都泪腺发达，流了一生的眼泪，看文明之光，看“怎么会这样”。那位阿姨来自淮海坊，警察在她的视频里，表示不会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进门消杀。

第二天早上，水果群里有人求救，这一次是为自己和邻居。一段长长的文字发在群里：

我住在黄浦区淮海中路一个叫“淮海坊”曾名“霞飞坊”的美丽小区。当初租下这处房子时，是因为它不仅有便利的位置，也有着厚重的历史：竺可桢，巴金，徐悲鸿，许广平，周建人，胡蝶等等皆曾居住于此。这次疫情，这个小区的居民展示出了空前的隐忍和规矩，面对只发过寥寥数次的物资，面对从不公开确诊信息的社区，他们唯一做的就是规劝，等待和自救。他们从不曾集体拒绝核酸，也几乎不曾团购过非必要的物资。可在封闭了整整 41 天后，他们此刻却身处炼狱之中——就在今夜 8 时左右，大批的大白来到小区，挨家挨户敲门要求转移，只给一个小时时间准备。顷刻间小区里呼救声哭喊着争吵声不绝。早在几日前，这个小区就开始了转移动员，一段居民冷静和警察沟通的视频也被当成上海文明的典范而广为流传，当全体居民都相信了“自愿”自觉的号召后，一切却变了样子——他们并不打人，但他们在深夜上门逼人；

他们嘴上不说强制，却对居民威胁说若不转移后面还会有更严厉的措施。他们甚至告诉居民，如不转移，后续将封锁物资，断供食物。。。他们不告知居民将被带到什么地方，甚至不告诉居民们要隔离几天，而转移本身更是荒唐且儿戏——就在两天前，小区同意转运的一位母亲带着他的儿子穿好防护服坐上了转运车，却在被带到苏州后被苏州告知不予接受，在凌晨两点多折返回上海。就在昨天，他们告知将把居民转移至松江酒店，却把居民带去了只有一张硬板床的毛坯房。这些居民有很多一直保持着阴性，家中有独立的厨卫，完全具备居家隔离的条件，却因为转移而被告知成为了“密接”。小区有多位百岁老人，有若干独居老人，也有可爱的猫猫狗狗和襁褓中的孩子，他们却在此刻全部要沦为“难民”。自疫情开始以来，因为对确诊信息的完全不知晓，小区居民屡屡被感染，全小区自四月五日起，每一日都在核酸，只在四月13日因为暴雨暂停了一天！！疫情开始至今，已有两位老人因为疫情身故——一位老先生因阳性得不到及时转运而离世，一位老太太方舱回家后身故。虽然疫情形势严峻，但究竟是怎样的措施，可以在此刻依旧不追究失职的工作人员，持续不深挖感染的具体原因，保持不倾听百姓的呼声，只对他们一刀切地提出要求：转移！转移！还是转移！他们的呐喊没有人听见，他们的需求不被人知道，此刻留给他们和自己即将百年的老宅相处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

还记得刚刚搬来淮海坊的时候，一位台湾导演来到我们家，路过淮海坊徐悲鸿故居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呆住了，几分钟的沉默过后他对我说：好了不起啊，你们住在这里，看到的是和徐悲鸿一样的月亮呢。。。。而今天，徐悲鸿看过的那轮月亮被乌云遮蔽，大雨之中响彻小区的一声声呼救，又是否会被那些曾经居住在这里，爱着这里的灵魂听见呢。。。。。

王老师家里有人住在淮海坊。她退休后的日常，是每天下午去淮海坊姐姐家坐坐说说话，然后兜回茂名路一个站点取线上订好的蔬菜，再走向长乐路的蒲园。一圈下来浑身是汗，王老师矮矮胖胖，总是拿一条手巾随时揩汗，在蒲园门口看见她，十有八九就是一边大包小包一边揩汗的样子，“我刚刚从淮海路回来呀.....”

“王老师，刚刚看到淮海坊的消息，他们怎么样了？你们都好吗？”

“只能说坚强地活着。”

我一时不知道她说的是自己还是淮海坊的家人。不过这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蒲园没有阳性居民，不曾暴力扰民，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地方。

“昨晚是有人敲门打电话，但我家人机智勇敢拔电话线故没找麻烦！据说是原动迁组来做工作，让去宾馆住3~5天，因共用下水道要加强消杀。”王老师回我，而白天不来晚上来的缘故，是怕像之前一样被居民拍视频。

王老师的哥哥姐姐两家人还住在里面。她妈妈以前和姐姐同住，已经过世了。王老师谨小慎微，疫情稍起就基本不再出门，就连蒲园里的团购和外卖，也是尽量少参加以免增加她难以把握的风险。淮海坊的事情发生之后，她对我说，现在要靠斗智斗勇。不开门总不见得破门而入。

大约她还没看过那些破门而入的视频。也是一种幸运。我想了想，说，希望是这样。

题图由作者拍摄；插图作者：陆冉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凉山深处

非虚构

# 阿母的故事 | 彝族女性的生命叙事①

冯琳 | 田野中国

“我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个女人悲惨的一生。”

犁完最后一块地，待我们把土豆块根埋进土里后，便完成了今日的劳作。阿母和妹妹都松了一口气，春耕总算完成了。立春后的这天傍晚，我在火塘边听阿母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她故意放慢语速，柔缓的语调让人误以为是在回忆美好的往事，但内容却是苦涩的。这缓缓流淌着的一个多小时时光里，我都在静静聆听，妹妹边听边哭，最后，深叹一口气，对着我无奈地做出了上述评价。

尔后，每当倾听其他彝族女性和家庭的故事时，一种如芒在背的情绪一直伴随着我。这些彝族女性的经历和遭遇，往往都呈现出一个特点，即与家中的男性、自己的子女相关联。她们生命的叙述，不仅仅围绕着自身，而是以整个家庭的生命史多面向地逐一展现出来。而她们口中的寻常日子，常常伴随着迁徙、吸毒、贩毒、驱逐、奔波、劳累与艾滋。

这些已经大大超出了我对“多灾多难”的想象与认知，阿母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回溯那段彝族男性在外“闯社会”时期女性们的生存境遇与所呈现出的生活世界。她们的生活经验和个人故事，活生生就是一部检视这段岁月的显微镜，展现那不为外人道也的此般人生。

01

“大户”之女

阿母出生在当地的“门望大户”。阿达（父亲）是阿博家德高望重的家支头人，母亲从邻县吉次家嫁入后，共育有五个孩子。1972年出生的阿母是家中的幺女，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改革开放后，阿母的阿达率先开始在西溪河区上从事简单商业活动，在各村之间通过倒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赚取差价，挣得家里的“第一桶金”。阿母8岁那年，家里在区上的银行存下五百块钱，成为村里唯一一家存钱的人家，从此成为村里的“经济大户”，引起了不小轰动。那时，家里有三头牛、两头羊、两头母猪和两窝猪崽，家境逐渐殷实。特别是1981年“包产到户”政策的实行，实质上解放了被迫束缚在土地与村落里的男性，阿达带着家里唯一的儿子，逐步摆脱地域区位的束缚，朝着更广阔的地域范围流动。

福祸相依，在慢慢累积财富、增长见识之时，哥哥接触到了海洛因。如同人类学者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中指出，1990年代在凉山地区兴起的海洛因，在出现之初是时髦的潮流现象。在当地彝族人眼里，毒品不尽然是负面印象，夹杂着彝族集体历史记忆中对“鸦片”这个同时兼备经济利益、等级地位的印象，在此时以“高级”

分享物的形式得以呈现。

对他们而言，吸食海洛因就好比汉族男性常见的递烟和聚众抽烟，是一种分享式的社交行为。毒品迅速成为哥哥对其同辈兄弟展现家里财力、物力的指标，也成为在同辈间炫耀、“长脸”的资本，成为了村里的“吸毒大户”。

好景不长，吸食成瘾后，哥哥便无心跟阿达一起外出找钱，开始整天懒散地躺在路边上吸毒，跟兄弟喝酒，过着醉生梦死的逍遥日子。到后来，挣钱的速度赶不上吸食的速度，毒瘾与耍酒疯双管齐下，哥哥偷走了家里的存折用以换取毒资，喝醉酒便自行宰牛、宰羊招待兄弟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以风云残卷之势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并开始负债累累。

哥哥沉溺在“吸毒——戒毒——复吸——再戒”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看见宠溺的儿子落得如此田地，阿达在痛心的悲哀中，早早地撒手人寰。阿母家也从此没落。

02

成为“传统”妇女

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阿母是在大姐背上养大的。父母疼爱、兄姐陪伴的童年无疑是快乐的，但在依然刀耕火种的彝族高寒山区里，劳动时刻与生活相伴。尤其是1981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大锅饭”的日子，核心家庭逐渐成为村落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一举措彻底将女性束缚在田地里耕种劳作。

阿母在7-8岁便开始从长辈口传身授中掌握生产、生活经验和技巧，11岁时便较为正式学习耕种牧畜，并逐渐跟着母亲和姐姐开始在土地里劳作。阿母在12岁时学会了捻羊毛，13岁便在家里跟着姐姐学习针线、缝纫、织布、绣花、做衣服。17岁的阿母已经多才多艺，会吹阿都口弦、会织布、会做衣服，农务活更是不在话下：喂猪、放牛（虽然是男生干的活）、撒种、割草、挖土豆、种苦荞和燕麦。

虽然阿母掌握了在彝族社会生活的一切必须技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传统彝族妇女，但阿母没接受过现代教育，不识字、不会汉语让阿母在在外“混”日子的时日里，吃尽了苦头，也让阿母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的子女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当然这是后话了。

20岁时，阿母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自己在洛觉的舅舅。作为彝族典型的姑舅表婚，这桩阿母13岁时便早早订下的娃娃亲，在阿母去过三次之后便草草收场，以离婚告终。从小按传统文化规训出来的阿母，对此的解释倒不那么“传统”，就三个字，简单干脆，“不喜欢”。

在这个被视作彝族女性生命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的关键时刻，阿母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不想勉强自己。因为这个“任性”的决定，阿母家为此向吉尔家支付了4500元的巨额赔付金。阿母笑着说，“那时候4500相当于现在40万咯”，以此为代价换回了阿母的“自由身”。

这是阿母第一次为作为个体的自我对“传统”发起了反抗。

03

迟来的“叛逆”

1966年出生的尔日是且沙家的小儿子，原本有个大哥早年夭折，于是便成了且沙家的“独苗”。尔日年轻时仪表堂堂，是标准的彝族帅哥：深邃的眼窝、大大的鹰钩鼻、挺拔的身形。

尔日的童年与文化大革命时间段相重叠，这期间尔日一直在山上帮公社放牛放羊，他自己形容就是无拘无束、甚是自由。但是，尔日是读过书的，“文革”结束后，在民办老师的督促下，尔日开始了小学学习。虽然小学期间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毕业后却没考上区上的初中，也就作罢。

17岁时，尔日便与早先父母订下的补恩村李子家的姑娘结婚，在连续生下三个女儿后，冒着超生的风险，终于艰难地追加了一个儿子，却在刚出生没多久便夭折而亡。由于尔日是且沙家的单传，他的父亲开始着急，担心就这样被“吃绝业”[1]，于是找毕摩算命。毕摩说，尔日与现在的妻子命里生不出儿子，即便生下来，也会生一个死一个。

这让尔日的父亲揪心不已，“无后”的焦虑促使他想尽办法找各类理由“逼”自己的儿子和现在的妻子离婚：开始嫌弃她有精神不正常的父母、担心被别人说“闲话”。于是在家支的支持与安排下，尔日家强行花钱离了婚。这次离婚双方家支闹得并不愉快，差点发生家支械斗“打冤家”。虽然在德古从中调解后暂时得到了缓解，但也为日后尔日与阿母的故事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如若按照家里给阿母所规划好的路径走，做个听话的“乖乖女”，阿母或许早已过上安稳祥和的日子。谁也没料到，看似柔顺温和的阿母，却也有叛逆和倔强的时候。阿母离婚后不久发生的一次“约会”[2]事件，让本来处于平行线的阿母与尔日有了交集，一次因“赌气”而开始的恋爱，也无意间改变了阿母的人生走向。

阿母说，那天自己跟着家支里的姐妹相约赶集，之后便与尔日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上山喝酒聊天，随后散去各自回家。不曾预料的是，这次“约会”事件却被尔日的前妻没来由地煽风点火，到处造谣本来毫无关系的两个人其实私底下有一腿，更有甚者，她还动员自己家支的亲戚去阿母的前夫家告状，说阿母给他带了“绿帽子”。

阿母听了这些事后莫名的火大，不甘心自己被诽谤，想着就算真的跟尔日有关系，他的前妻又能怎样呢？于是阿母做了一个惊人的叛逆决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真的跑去跟原先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尔日处了对象，并在自己25岁的时候未婚先孕怀上了大儿子后，象征性地以600元的身价钱嫁给了尔日。

按照彝族传统婚俗中的约定，未经男女双方家支和父母同意、未经夫岬（媒人）介绍，男女双方自主恋爱是伤风败俗的行为。两家人相亲，如果没有夫岬在中间介绍就相当于私奔，属于异常婚，犯了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忌讳。因此，虽然后面得到了双方

家支的承认，但在当时，尔日与阿母的结合在传统彝族社会仍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那时候觉得很安逸，我想跟哪个（要朋友、结婚）都我自己决定。不过那时因为我小嘛，又是女的，家头那时候哪有空管我，哥哥吸毒，然后阿达要找钱，姐姐都嫁出去了，怎么说呢，就是……自由。他（大儿子）出生的时候我难产，差点就没了，所以取名的时候就想，要让自己的娃娃晓得他们是怎么来的，不容易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阿母与尔日婚后的日子倒就磕磕绊绊地展开了。尔日赶上了赤脚医生制度盛行的时期，成功通过考试成为当地的赤脚医生，每月有 50 块的固定收入。虽然过程并不怎么光彩——尔日会一些汉语，与之前下乡驻村的医生关系甚好，因此暗地里提前知晓了试卷答案。

虽然与前妻离婚，但前妻与尔日的三个女儿也一直跟阿母住在同一个村。与前期离婚并不愉快，双方家支甚至还结下了梁子，因此阿母婚后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平。住在这个多为李子家支成员的村子里，阿母显得尤为孤立无助。待大儿子出生后，家庭开支剧增，加之前妻家支时不时的“威胁”，尔日放弃了赤脚医生稳定但低廉的收入，1997 年带着阿母回到了补洛村。

“在补恩村那时有 5 个人的，包产地。以前凭工分，那时困难得很，怎么办呐？我们（后来）跑到补洛住了，不住补恩村。我们是补恩村 2 组，包产地退耕给 5 家人，每家人给我们 300 块钱，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搬回补洛后），没有地了，他们（且沙家支）家族是一家分一点点，凑起来的，我们地就不少了。”

到补洛之后，阿母过了一段相对平和的婚后日子。尔日在县城里“找钱”，做起了倒买倒卖的“中介商”：

“在县城头就是，比如把东西买起来是五毛一斤，我给它卖起走是一块、一块五，就有钱了。当时还要去铲沙子，一天八块钱，（但）不是每天都（有）。”

阿母在家打理农地、操持家务、喂养孩子，没有尔日前妻和家支的纠缠，经济上收支略有盈余，虽然大儿子身子弱，时不时需要揪心以外，但总体上来说，阿母一家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正在慢慢步入正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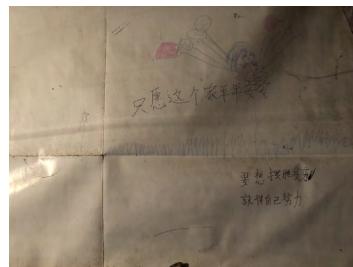
但是，平静美好的日子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个体命运总能折射出特定时代背景，时代命脉与走向也深刻地镌刻在个体身上。阿母怎么也不会想到，时代给她的人生开了一个巨大玩笑。生育，这个看似个体的行为竟成为阿母，乃至一家人重大的生命转折点。

1979 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地区标准不一，除了能反映城乡差异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所差异。执行初期，由于对少数民族宽松的政策影响，加之执行力度不大，布拖人口的出生率一直高居不下，在 4% 上下浮动。1981 年，凉山州加大了计划生育执行力度。198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因此，1982 年后，布拖县人口出生率出现悬崖式下跌，基本维持在 1.5~2.2% 的正常增长区间内，但期间出现过三次“异常值”，分别是 1990 年、1995 年和 2000 年。极值的出现意味着前一年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松动，以及当年政策执行力度的随之加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彝族人对子嗣，尤其是儿子的追求与汉族颇为类似。在彝族“多子多福”、重视子嗣繁衍的文化下，一般而言，在高寒地区的农村，法定允许生 3 个，而当地计划生育政策之实施过程中也保持着适度“弹性”。对尔日家来说，1997 年出生的大儿子作为且沙家唯一的男性后人，虽然尔日已有 3 个女儿，大儿子属于超生范围，但当地计生委与村干部适度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太过为难，杀了头猪招待便草草了事。

2000 年 8 月，当阿母的肚子渐渐变大，所有人都知道且沙家的第五个孩子 [3] 即将到来。但这个千禧年却没那么幸运，阿母的这一胎恰恰“生不逢时”地赶上了 5 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收紧、执行严厉的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暴风雨”即将袭来。显然，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准备。

计生委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交涉了一次又一次，态度从商量逐步转为命令和威胁，超生罚款从 460 涨到了 880 最后变成 2680，尔日又按照之前的样子依葫芦画瓢，让家支里的人帮忙，杀了猪来招待，最终还是交涉无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房子被拆了，家没了。



妹妹写在墙上的愿望

“补洛村那天拆了 4 个房子，我们的（被）拆了。那些人来要超生罚款时，家里面还是忌惮他们。我姐姐的儿子他们家，赔给了我们一头猪。那次我们家都是乡上那些干部，来了 20 多个的样子，就杀了个猪招待他们。不仅家里生了火，院子里也生了火，该烧烤的烧烤，该出钱就出钱，这样子招待他们，但最终还是把房子拆起走了。那时超生不是要罚款吗？然后家里面就罚不起款撤，那些人就把房子掀了抵债，家里的牲畜也牵走了，把家里面都抢光了，相当于洗劫一空。”

接着，阿母一家开启了长达 8 年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

## 04 何以为“家”

作为且沙家的家支头人，2000 年“被迫”外流的尔日是村里出去“闯社会”的彝族男性中年级最长、辈分最高的。不似刘绍华笔下昭觉男青年 1990 年代初期便开启了离土又离家的都市“探索之旅”，这个高寒山区男性的迁徙流动显得稍微滞后了些。与那些主动外流的 15~25 岁的彝族男青年不同，尔日以 34 岁的“高龄”，拖家带口地开启了“离土不离家”的“流浪岁月”。

而阿母，挺着大肚子在即将临盆之际，失去了自己的“家屋”，在县城亲戚家中生下妹妹，短暂停留一个月稍作休整后，这支“超生游击队”便沿着金沙江辗转来到了攀枝花。

离开故土的阿母，跟着尔日住进了一个小山丘上自己简易搭建的大棚屋。这里是彝族人口中的“贩毒圣地”，周遭充斥的全部都是赌博的、吸毒的与贩毒的；这里不仅充斥着大量彝族人，还有汉族贩毒与吸毒者；由于过分集中，鱼龙混杂，这里也是公安打击和围剿的重点区域。

自打经历补洛自家房子被拆用来抵超生的罚款的事件后，尔日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自此一蹶不振。他对那时的自己，形容是“一滩烂泥扶不上墙”。对于尔日而言，作为一个男人，房子被拆被迫外流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层面的受损，更隐喻着自尊心与自信心、他在意的“脸面”也随之崩塌。尔日开始将内心的苦闷诉诸于海洛因。即便因毒品成瘾而潦倒，但尔日透过海洛因得到愉悦与痛苦的减缓，这也成了他继续保持“过瘾”的动力，以此成为“毒虫”也在所不惜。

“按我们彝族的说法，那个是心病，心里面想的事情多了，相当于用毒品麻醉。以前是超生来了，政府要给我们出示罚款，但是房子也拆了。哦，过一天少一天，没有办法了。”

但这就苦了阿母。为维持生计，阿母在大棚区里做起了小生意，开始贩卖彝族人爱吃的炸火腿肠、炸洋芋（土豆）、苦荞粑粑，好不容易有点收入，也全部让尔日吸完了。渐渐地，尔日吃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在身边“狐朋狗友”耳濡目染之下，开启了“以贩养吸”的模式：每天从出租屋的小老板手中拿货，然后分装成一次性吸入的小包贩卖给有需求的“毒友兄弟”。原先本就苦不堪言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在温饱线上挣扎，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还要开始过起担惊受怕的日子。

“管你是做啥子的，像我就是做点小生意谋生，煮粑粑、炸洋芋这些，人总要吃饭嘛。但是因为那个地方，相当于集中在那一片的都是毒贩子，差不多都是罪犯那些。所以说每一次警察来围剿，像我们这种身上没得毒品，正常谋生那种，就要统一包车，送到本县（户籍所在地），比如说我就被送到西昌，然后西昌那边再送回去。如果是吸毒贩毒那些，（像）他们阿达就是，把你抓到、查到了，就直接送进监狱。”



随处可见的禁毒宣传

任何生活在这个“贩毒圣地”的人，在这个“小社会”中有着两个很重要的共识：一是“等级有别”，这里“社会”等级的分割不是按照传统彝族家支等级、也非最为常见的经济社会地位，而是以所掌握的毒资——包括毒品拥有数量、下线个数与毒品网络的资源为划分依据。最为简单明了的直观判断，来自大家居住的区位与房屋类型：

“最富的大老板是住在城市里面了，有钱，不需要操心（海洛因）卖不出去，我们也见不到。小老板住在（这里），出租房子里面，（我）拿货都是找他们。我们这些倒一天吃一天的，就住在棚棚里面。在那座山上待的，没得实体房的，就是自己搭棚住。”

二是“泾渭有别”。彝人口中的这个“贩毒圣地”，干净与肮脏的划分就是他 / 她在公安眼中的形象与地位。具体来说，就是这个人是否吸引公安注意、是否会因涉嫌贩毒被捕成为核心内容。这些能顺利从公安手中过检、不涉及贩毒吸毒的、仅被遣返回原籍地的，是“干净的人”，而那些大大小小未逃脱公安追捕的吸毒、贩毒者，则是这里“肮脏的人”。

于是，在不幸被各类围剿逮住之际，这个家庭内部出现了异质性的归属地路径：干净的人——阿母、儿子与女儿——返回原籍地；肮脏的人——尔日——戒毒所——监狱。不断地辗转往复的过程中，阿母一家过上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在攀枝花不到短短两年时间，阿母带着儿子和女儿，前前后后遣返回西昌了 5 次，每次一到西昌，阿母便又带着子女们溜回攀枝花。阿母记忆深处有这么一段记忆深刻、现在听来也惊心动魄的“围剿事件”：

“记不倒是好久了，按日子算是来这（攀枝花）过的第一个彝族年后吧。这里没得家那边冷嘛，（所以）感觉不出来，也没得条件杀年猪。那一次天有点黑，公安又来扫山。尔日刚刚吃完毒，躺起的，我收了摊要弄饭，然后他们（邻居）就有人大声喊，说公安来了，快快跑，拆房子了。我一慌，对着他们阿达泼了盆水，没顾得上妹妹，牵起大儿子就往外跑。妹妹被尔日抱起，我们就往山里头跑，结果天又黑，看不到嘛，跑的人又多，就走散了。”

“后头儿子跑不动了，我们就在松树丛后面躲起，分开的，结果哪个晓得被公安逮到

了我儿子。我担心他丢了，我也就跑出来了，就被公安抓了。公安说我们是‘盲流’，就把我弄回西昌。一到西昌，我就马上买票再回来。火车站到山上的路上打车，我汉话不好，当时说的 50，要下车了，那个师傅要 100，我肯定没法给啊，没得那么多钱撒。”

“这个时候，他转头就说要把我们载去派出所。到这个地方的，都晓得肯定是不敢去派出所的嘛。去派出所的路上，儿子把车门打开了，用汉话说：‘阿母，我们跳下去’，吓到那个师傅了，把我们丢路边。那时他才 6 岁（彝族虚岁，真实年纪为 5 岁）（欣慰地笑）。等我回来了才晓得，尔日也被逮到了，戒毒所去了，妹妹就甩在丛丛头，还好邻居看到，抱了回来，不然就不晓得在哪里了。”

这次尔日在戒毒所待了半年之久。然而，尔日前脚刚踏出戒毒所大门，后脚就又吸上了。由于这次围剿力度大，很多老板都还未刑满释放，这个“贩毒圣地”元气大伤，慢慢没了往日的光辉与盛景。人少了、散了，阿母的小生意自然便维持不下去。2002 年，“几个娃娃和我们找不到饭吃，就回来了”。

两手空空，甚至有些狼狈地回到了补洛，但是尔日带回了海洛因。直到 2003 年阿母的第三个孩子出生，阿母家住在补洛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尔日作为家支头人，海洛因顺着且沙家的关系网络不断攀爬、入侵，成为家支里“带头”吸毒的老大，一批且沙家的同辈和小辈迅速沦陷，开始尾随尔日落入被海洛因控制的“陷阱”中。日作便是其中一个。

第一眼见到日作，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高大的身型十分突出，卷曲的头发懒散地搭在帅气的脸庞上，高高的鹰钩鼻上架着一副眼镜。他是全村唯一一个戴眼镜的彝族人，一副知书达理、文质彬彬的柔弱模样。事实也是如此，作为前任村长的二儿子，日作从小受过良好的“双重”教育：在村里德古家学习彝文和习惯法调解办法，并接受了现代教育，小学文化毕业，写得一手漂亮的彝文。

虽然身体一直虚弱，但作为远近有名的帅小伙，也不妨碍他成为众多年轻姑娘歆慕的对象。日作吸食毒品完全是“猎奇”的心态所致，传统彝族社会一直都是“共享式社交”。在一次家支男性的聚会中，日作在好奇心驱使下，抽了舅舅尔日递来的裹着毒品的烟，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染上毒瘾。

阿母在生下弟弟之后，由于生产过程中的不当操作，落下了妇科病的病根。回到补洛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尔日裹着阿母的哥哥以及家支里的毒伴，整天躺在坝子里吸毒，昏昏欲睡，毒瘾发作了，便大吵大闹，一家人不得安宁。

阿母一家 5 口挤在尔日父亲家中一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旁屋，没有耕地、没有收入，同时还得时刻与计生委的人斗智斗勇。2004 年，当阿母发现自己再度怀孕，他们便知道，若再不离开，计生委的人找上门来，又得一番“腥风血雨”。这次这支“超生游击队”并未单独踏上旅程，尔日在区里认识的朋友介绍和推荐，以“包工头”的性质，带着一群家支里的年轻男性，开启了去内蒙古砖厂的“闯”社会之旅。

“以前去内蒙古的时候，借了他姐 200 块钱，借起胆子跑出去的，要躲超生的嘛。那个时候他们阿达在区上认到了个砖厂老板，说可以去他那个厂子打工。我们就去了，（反正）在家头他（尔日）裹起吃毒，家头的事情也不管，（妹妹插话：坐吃山空），嗯，就是。”

在这批年轻人里，日作也在其中。体弱的日作在未曾吸毒前便不能干重活，吸毒后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按理说，他不应该外出打工，特别这种重体力活。日作的“什莫”（媳妇）么此作娓娓道来其中缘由：

“我们相亲夫呷介绍认识，我一眼就看上他了。结了婚后，3 个娃娃一直夭折，我们这边（毕摩）说屋头有‘鬼’。那种缠小娃娃的，必须要出去，不能在家头娃娃。之前我们都是在外找钱打工，后来他（日作）染毒了嘛，一直都是我出去，家头太困难了，造孽得很，全部被他吸完了。我就跟他吵嘛，然后那次舅舅（尔日）准备去内蒙古，我又有了，6 个月吧。他那段时间身体还多好的，就主动跟我说让我在家头待到，他出去找钱。那是你哥哥（对着妹妹讲）唯一一次主动晓得家头恼火出去打工哦！”

但在内蒙古的日子却并不顺遂。刚到砖厂没多久，日作身体便开始出现浮肿，全身

开始长疮疹、发烧、浑身无力 [4]，便折返回了家乡。在内蒙古呆了快半年后，尔日因工资与先前谈妥的不一致而跟原先的老板闹翻了脸，一气之下，他带着自己的人，去了山西。

频繁地颠簸与迁徙让阿母受尽折磨，更要命的是，在山西砖厂打工的这一年，尔日

经常不干活，还预支工资当毒资，家里还有 3 个孩子嗷嗷待哺，阿母那柔弱娇小的

肩膀抗下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接替尔日在砖厂里搬砖、打杂。

“以前（山西）我们跑去的那个地方叫啥子忘记了，反正就是大儿子 9 岁（实际年纪 8 岁，2005 年）的时候待了一年，那时候要搬砖、铲灰那些，娃娃些就让大儿子带着，一天回来累得慌。尔日把家头值钱的拿出去卖，换吃的（毒品）。毒瘾发了就砸东西，还打妹妹。造孽哦，有啥子办法嘛，都出来了。回去，那些政府的又要罚款。那几年管得严得很，不敢回去，没得钱嘛。”

脱离土地的阿母一家，所有物资必须通过货币获取，阿母打工所得就成为一家五口唯一的经济来源。城市，即便是城郊的生活，也艰辛且不易，更何况家里还有一条毒虫。“这边啥子都贵，啥子都要花钱，我汉语说不好，别个就把你当哈子（傻子），吃的、用的、穿的、喝的、住的全部都要钱，遭不住。他们阿达好的时候就后悔啊，说自己要戒，不连累家里，过一会毒瘾来了，啥子都不管了，就这样子嘛。一直这样子过来的，扯古他们也晓得，毒瘾来了是啥子个样子，苦得很。”

艰难地勉强维系了一年，实在是入不敷出，正值阿母一个人打工养活不了一家五口之际，尔日得知自己在攀枝花的“毒友”在西昌发了财。于是 2006 年下半年，阿母一家连同大伙，颠簸了近 40 个小时，从山西回到西昌。

彝族人喜欢“抱团取暖”，他们习惯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熟悉的亲缘脉络，并将自己镶嵌于其中，以获得适应外地生存的依靠。2000 年阿母一家在攀枝花时，生产于泰缅边境“金三角”的毒品，多数是顺着云南经金沙江上游进入攀枝花中转后，再进入凉山分散至各乡各村。2006 年之后，以攀枝花为据点的毒品市场也已转移至西昌，毒品运输轨道也主要沿成昆铁路从云南途径峨边、甘洛、喜德进入西昌和成都。

尔日在经历了攀枝花小打小闹的贩毒初体验，又在这几年来回穿梭于西昌与全国其他城市，积累了人脉、地域熟知度。一掌握贩毒货源，尔日便又摩拳擦掌，重操旧业，打起贩毒的算盘。生机勃勃的毒品交易开始顺着尔日这几年积攒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地域迁徙范围，定向运送到更多吸毒者手中。

尔日的毒品买卖主要定向输出供应两个点：一是尔日把毒品运往山西的大女儿家，经由女婿再散卖出去；二是区上的毒品包销。这时的阿母暂时松了一口气，因为尔日贩毒的收入不仅够全家花销，同时也能维持他自己吸毒的开支。当尔日辗转于区上——西昌——山西来回奔波之际，国家在 2006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该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在政策红利的影响下，阿母趁机将已经 9 岁的大儿子送去读小学，了却自己让小孩接受现代教育的夙愿。

安稳的日子维持到了 2007 年，虽中途尔日因为吸毒被抓去坐牢了 3 个月，但相比于之前的跌宕起伏，这些小磕小绊难不倒阿母。2007 年底，大女儿家那边出了篓子：大女儿那边的下线在倒卖海洛因时被抓，然后供出了女婿，女婿因涉嫌贩毒被判处了 2 年有期徒刑。尔日最为主要的贩毒分销渠道被迫终止。这也意味着经济来源的中断，阿母一家再次深陷贫困危机。

“当时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办法了，在西昌，他妈妈要‘捡垃圾’[5]。我有时候就打工，有时候就没工，（靠就）他们妈妈养到。”

而 2008 年初一封来自戒毒所的病危通知单，结束了阿母一家长达 8 年的外流生活，成为阿母一家返回补恩的导火索。

## 05

### 一波多折的中年岁月

阿母的哥哥是凉山彝族男性青年最早接触海洛因的那批人之一，到 2008 年，他的吸毒史已长达 17 年。这 17 年间，他是戒毒所、监狱的“常客”，以妹妹的话来讲，就是“不是在坐牢，就是在戒毒所”。阿母的哥哥在 2005 年默沙东艾滋病项目中之际被查出有 HIV/AIDS，因为身体并未出现明显症状，当时的他不以为然继续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2007 年因吸毒被抓，关进监狱后身体状况直转而下，2008 年初更是一度到了病危的地步，因贪念海洛因而一生未娶的哥哥，膝下无子，于是家里商量让年纪最小的阿母承担起照顾哥哥的重任。

“（我们）在西昌待到的嘛，我哥就是因为吸毒被抓进戒毒所里面了撒，好久我搞忘了，反正就是经常，但是好像判了三四年样子吧。后头他身体快不行了，（公安）怕（哥哥）死在（监狱）里头才被释放的。因为我两个姐姐各自要忙各自的农活撒，也嫁人了，然后我们家的话，在西昌过一天算一天，捡垃圾度日的嘛，也没得啥子农活需要忙，所以喊我们家。”

“而且，这边的话，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基本上都是小的照顾父母撒。我又是这边最小的一个，然后我哥生病就喊我们家回来照顾我哥，在家里面待了差不多半年才死的。在家里面照顾的，因为他没娶什莫，没得子女嘛。阿母这边年纪也很大了，也回不到西昌那边，最终就在这（洛恩）待到。后面在家里，你看那个情况，（阿达）又在吸毒，我一个人又没得啥子收入，日子就快过不下去了。”

阿母家唯一的男性去世后，为了防止被“吃绝业”，尔日以“入赘”的形式落脚于补恩，象征性继承了阿母家的家产。因为哥哥并未留下任何财产，甚至还有一屁股债。在外婆尚未去世的这三年间，阿母一家 5 口挤在我目前住的这间狭小阴暗又潮湿的土夯屋里，没有火塘不能生火，冬天只能窝在床上瑟瑟发抖。没有了长时间颠沛流离的地域迁徙，阿母的生活也开始逐步走向常态化，但日子却过得并不轻松：家里的农务活全包、家务活照做、还要打理年迈母亲的起居饮食、关注三个子女的健康与教育。

“后来就一直在家干活嘛，都是我在干，犁地也是。那时家头没得牛，只有等亲戚那些都犁完了再（借来）用。儿子和女儿那时候都在干活哦。我一个人，家头的地都是我哥当时留下来的，在山上好远的地方，天不亮就要爬上去干，野猪那些的，要弄坏（田地），洋芋收的也不多。收的时候也是我一个人在收，刚收回来就被他（阿达）偷去卖了吃毒，洋芋挖完时就没得了大半，苦养也是，打完还没来得及晒，



家内



阿母的家

都还没吃到新苦荞就被他偷得差不多了。造孽啊简直！日子真的太苦了。”  
阿母也曾挣扎过。2009年，在哥哥去世半年后，阿母不愿再继续面对天天躺在家里混吃等死的尔日，于是给妹妹留了口信，留下一张写有一个座机号的纸条，丢下这一地鸡毛的烂摊子，“抛夫弃子”，离家出走。虽然这次离家出走仅维持了十几天，但这是阿母在外漂泊这么久后，第一次觉得生活有了阳光，未来还有希望。“想不到那么多，就想走，去西昌，挣些钱。我记得那时候哥哥四年级、妹妹二年级，弟弟刚7岁还没读书（虚岁，实际年纪6岁），然后哥哥就带着弟弟妹妹来西昌找我，看到我就一直哭，说‘阿母不要不要他们’。我受不住，（心）一哈就软了撒。那段时间第一次不担心惊怕的，就带着娃娃些在西昌耍了一下，转了一下，还拍了照片。喏，我翻出来给你看哈（下）（微笑）。”

人生总会经历高低起伏，但生活的苦难似乎一直赖着不走，揪着阿母不放，并从未有触底反弹的一天。2010年，还处于育龄期的阿母（38岁）被带至乡卫生院强制安环。不知是因为安环过程中出现失误，还是卫生消毒未满足条件，安环后阿母瘙痒难耐，出现严重过敏，赶紧连夜去了县医院，做了一系列阿母不知道的检测。在将节育环取下来的同时，她得到一个噩耗：阿母被确诊为子宫癌。

对于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而言，是无法承担治疗高昂的医疗费用。阿母说，当时她甚至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想着两眼一闭就什么都不管了。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活没了盼头。

从西昌回来后的这几年，阿母与尔日经常吵架、打架、闹离婚。在传统彝族婚俗中，男女双方离婚，如果男方提出，则不能索要身价钱，如果女方提出，则需要退回身价钱。阿母与尔日的结合本就属于私奔的异常婚性质，即便退还身价钱，当初也只收取了600元，阿母要离婚易如反掌。

但是，阿母忍住了，她担心自己的子女，不忍看到他们跟着吸毒的阿达挨打挨饿。不到5年时间，尔日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换毒，其中包括阿母之前在西昌辛苦苦“捡垃圾”，一点点攒下来，为给阿达的二女儿做嫁妆、大儿子和小儿子做衣服所准备的银扣子。

“哎呀，那个时候我实在气不过哦，问了（尔日卖给谁了），就跑去找了那家人，跟他说把（尔日买毒的）本钱拿给他们，（让他们）把扣子还给我。人家不干，然后我说你不还给我，我上吊吊死在你们门口。跑了3、4次吧，才把扣子弄回来。有啥子用嘛，弄回来了没得好久就又被他（阿达）偷出去卖了换毒，没钱（换回来）了。”



阿母与丈夫尔日

当然，阿母也曾绝望过。对于一直沉溺在海洛因中的尔日，阿母一直无可奈何。在一次毒瘾发作后，尔日在家又打又闹，翻箱倒柜的找钱买毒，在当掉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物件——阿母为哥哥准备的察尔瓦，吸食完海洛因的尔日迅速安静地沉溺在海洛因所营造的“人造天堂”中。

阿母看了看尔日，转过身来，以绝乎冷静的语气对自己的子女说到：“实在不行了，我就杀了他，然后自尽，反正也活不到好久了，哥哥之后照顾好弟弟妹妹吧”。

刘绍华认为，许多彝族男性在有了孩子或超过三十岁后，都比较甘愿稳定下来，开始对外的世界和海洛因失去兴趣，然后尽职尽责地扮演好丈夫与父亲的角色，从而完成“转大人”的通过仪式，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男人。或许是厌倦了跟阿母的争吵、或许是心痛了儿女们畏惧惊恐的眼神，年近半百的尔日，幡然醒悟般仅凭借意志力和一天两包的香烟作为替代品，戒掉了海洛因。2012年，在自己46岁的时候，尔日完成了自己迟来的“成人礼”。

“侄女你听我说嘛，你叔叔我这一生坏，除了没杀人其他啥子都做了。我吃海洛因了，老婆娃娃我也害到了，就是这样道理，但是我们这种情况，哎呀，记在心头都是心痛得很。好几年我忘记了，那时要禁毒防艾，要把我们吸毒的关去派出所。村里面（动员）说，不要吸了不要吸了。我把老婆、娃娃害惨了，就戒了哦，不吸了，家头也没得东西卖掉了。”

“改邪归正”的尔日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虽然身体依然焉耷耷的，但精神头保持不错，状态好的时候，还会帮阿母撒种、放牛，偶尔去区上的水泥厂或建筑工地上打打散工，挣得的收入除满足日常抽烟的需求外，剩余的都主动“上缴”到阿母手中。日子慢慢地回到尔日吸毒前的状态，虽然依然贫穷，但不再担惊受怕：不用担心尔日发毒瘾后的打闹，不用活在时刻会被警察临检的恐惧中。

由于超生的缘故，家里一直没有给妹妹上户口。2016年，因妹妹中考在即，需要提

供户口报考，老两口结束了长达19年的事实婚姻，去县城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在艾滋病的高发以及重点监测地区，所有婚前体检中都有涉及对HIV的检测。几乎是毫无意外地，尔日和阿母都被确诊感染HIV/AIDS。但这并未影响阿母一家正常的生活节奏，依然是子女们该读书的读书，阿母照样该种地还是种地，该“捡”垃圾“捡”垃圾。2017年，平淡的日子波澜不惊，虽然被查出HIV/AIDS，但好消息冲淡了本该难过的心情：成绩优异的妹妹提前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成为村里甚至是区上唯一一个继续读高中的女生。但转折也同时来得过于凶猛，以至于阿母一家几乎没有做好准备：当时阿母正在西昌挖洋葱打工，尔日在补洛参加一次聚会的时候，没经受住“毒友”的诱惑，再度复吸了。

复吸后的尔日再度变得暴躁易怒，毒瘾发作后对着阿母拳打脚踢。阿母唯一觉得庆幸的是，是自己的三个子女都在外读书，这样不会挨尔日的骂，也不会遭尔日的打。阿母默默地承受着，“子女好了就是自己好”，这个唯一的信念支撑着她强打起精神，继续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复吸没多久，尔日前往补恩村那边讨之前亲戚欠下的毒款，以补助子女们在外读书的生活费，因吸食毒品，在回程的路上走路东倒西歪，掉进了水沟里，恰好被来回巡逻的警察逮住，因吸毒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在监狱呆了三个月，尔日也有所收获，就是靠着强制性方法再度戒除了毒瘾。

但是，副作用也随即到来：由于HIV/AIDS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尔日开始全身浮肿，皮肤呈现乌紫色，吓坏了狱警。那时恰恰监狱里有人被打死，狱警们担心尔日死在监狱里，连忙慌里慌张地藉由运送尸体的“空子”将尔日送了出来。就这样，说来也颇为讽刺，尔日因吸毒被抓，又因吸毒感染的HIV/AIDS被提前释放，免去了之后的牢狱之苦。

当尔日从监狱里被抬出来的时候，所有人包括阿母都觉得尔日过不了这一关。说来也奇怪，尔日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后，“奇迹”般地开始好转起来。对此，尔日常有的说辞是，迷信做得“到位”，把“魂”找回来了，祖先庇佑让他此时命不该绝。

尔日的这次“死里逃生”，开启了阿母一家开始触底反弹的大门：哥哥高考虽然分数不高，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加分政策，顺利读上了大学专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妹妹在外地中学继续高中学业，成绩不错，有望成为村里甚至是区上第一个走出来的女大学本科生；弟弟中考后，在国家“9+3”教育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免费进入德阳一所中专院校学习计算机专业。给小儿子结婚用的房子也在2018年顺利建好，了却阿母的一桩心事。每当说起这些时，阿母的脸上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们是小的养老嘛，要给他准备好（房子），娃娃有出息了，（给我们）争面子了。”2018年初始，在全面实施艾滋病防治三年攻坚行动下，当地开始全面实施乡民健康体检建档。所有之前和这次体检中HIV呈阳性的乡民，都必须强制进行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阿母和尔日自然也在其中，于是两人开始互相监督，认真吃起药来：

“吃了这个（抗病毒药）头晕得很，全身没得力，干活很恼火，我都不想吃了。妹妹鼓捣（坚持）喊我吃，还（威胁）说不吃她就不上学了，说是可以活长撒。我倒是无所谓了，就这么个情况了。你们比我们强多了，我和他们阿达还是想活到看一下嘛，苦了他们了，（死不死）无所谓了。”

阿母讲完后，叹了一口气，对着火塘冒起的熊熊火焰，搓着手微微一笑，说出了她常说的口头禅：“再咋日子也要过下去不是？”好日子应该要来了吧？

[1] 吃绝业是凉山彝族特有的习惯法：由于财产以父系子嗣继承为原则，一般是幼子继承，女性没有继承权。由于同一家支内，家支成员又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因此如果一个核心家庭内男性成员绝户时，其财产由家支继承。其优先顺序是先由血缘最近的男系亲属哥哥、弟弟及叔伯均分，如若没有男系亲属，再由家支中血缘最近的支系平分。

[2] 彝族男女约会是以群为单位进行，少则4-6人，多则8-12人，更类似我们理解中的聚会”。

[3] 对尔日而言，是他的第5个孩子，对阿母而言，是她的第2个。

[4] 后来知晓是HIV/AIDS侵蚀了免疫细胞引起了带状疱疹，加上水土不服所致。

[5] 这里的“捡垃圾”是阿母及一起捡垃圾的其他彝族女人们共同的说法，这里的垃圾并不是真正的“垃圾”，而是建筑工地上建筑材料。

题图及文内图片由作者拍摄

冯琳

人类学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  
致力于医学人类学与性别研究。2016-2021

年持续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关注疾病、健康、社会/文化与凉山彝族女性的生命境遇。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图为 1979 年 8 月，黑龙江省大庆市，两名工人站在一家炼油厂的铁门后。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 退休工程师一家 | 三线建设者的生命史①

刘博 | 田野中国

他们是一群被历史的列车载着的乘客，  
驶向了谁也不知终点的旅程。

“三线”是新中国建立后一场浩大的建设运动，这一运动的初衷是为了缓解 1960 年代中国遭遇的严峻国际军事压力，平衡国家工业布局，打造第二套国防工业体系，所以将东南沿海和东北等一线地区的重点工业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关等搬迁至西南和西北等三线地区。

这场建设运动横贯四个五年计划，持续 20 余年，动员了 400 余万企业职工和科技工作者，带动 3000 余万人口内迁。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是主要部分，指建立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小三线”指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战略后方地区建立以轻武器生产厂为主，包括为武器配套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等在内的地区后方基地。

我故事的主角就是工作生活在吉林省一个小三线企业的退休工程师一家，他们经历了企业的艰苦创建，也感受过工厂的峥嵘岁月，最后在外迁和破产浪潮的裹挟下艰难维系着自己“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他们的人生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在市场浪潮中坚守那过往的“荣光”？

## 01 一本日记

2017 年 12 月 7 日，我从长春站出发前往吉林市，前去拜访原三线工厂的退休工程师孙树青先生。我到达后，孙先生已经在楼下一个废弃的沙发上坐着等我多时。他中等身高，戴着一副老派知识分子常见的深棕色塑料宽边眼镜。对于我的到来，他应该是早有准备，从沙发桌的抽屉里给我拿出了一本红色塑料皮日记本。那个日记本，据说是 1968 年作为工厂劳模发给他的纪念品，记录了从 1968 至 1973 年的生活工作经历，日记本是当年少见的塑料皮，经过半个世纪的打磨，断裂的塑料皮下露出泛着土黄和水浸痕迹的纸张，有些甚至已经粘连，需要小心撕开。建厂年代的记录正好完整记载在了这本日记中，而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本日记开始。

孙先生的家位于一个典型的“单位大院”中，这里集中了几十栋如出一辙的老式居民楼，住户现如今也主要是以退休老年人为主。目前，79 岁的孙先生与 77 岁的老伴赵大妈单独居住在一起，同城还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大儿子会时常看望两位老人。作为典型的三线家庭，孙先生一家共有四人曾工作于同一个工厂，由于原企

业在 2002 年彻底破产倒闭，目前大儿子和二儿子也早已转行谋生。虽然工厂早已倒闭，但在老人家的沙发上，他却向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曾经工作和生活的细节。“我属于是大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的，1962 年我从吉林工业大学毕业，班里一共 4 个人分配到吉林市机械厂。当时，这个厂也是属于一个军工大厂。我进厂以后，正好赶上‘鞍钢宪法’全面落地，所以最开始给我分配的工作还不是技术工作，都是先下车间当工人。”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机床上加工枪械零件，因为我本身懂技术，再加上年轻、有文化、学习快，不到一年时间我加工零件的数量和成品率就跟老工人差不多了。干了两年车工后，我就去了车间技术室，主要工作是测绘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枪械零件，我们第一步是测绘，然后交给车间生产零件。”

对于我提及工作之后的业余生活问题，孙大爷说：“我们那时基本都是小伙子刚上班，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谁结婚了，才能分房子搬出去住。平时下班以后，也都是在厂子里活动，跟其他人下棋、打打球，尤其是每周末俱乐部都放电影。厂里啥都有，吃饭在食堂，还有澡堂和理发馆，理个头发只要两毛钱。那时候也没对象，我是到了三线以后才成的家。”

作为大学毕业生，孙树青在企业中迅速成长，一年半后就从一线操作工转岗为厂技术处专职技术员，并且开始独立负责国外某型枪械的逆向仿制任务。但随着 1960 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国家开始着手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方向从吃穿用转变为工业企业内迁，打造第二套国防工业体系方向。为此，三线建设开始展开，而他所在的工厂也成为援建三线的重点企业。回忆起当初外调支援三线的经历，他仍然历历在目。

“在机械厂工作三年后，我就听说开始搞三线了，当时厂里已经有些技术骨干去了四川。当年有个口号，叫‘好人好马上三线’，因为我当时还是年轻技术员，所以第一批抽调名单里没有我。那时候年轻，一心想的是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干革命，心里挺着急的，所以我记得 1965 年底，我还专门给厂领导写了请战书。”

“请战书写了没多久，1966 年春节以后就通知我参加三线了。跟我同一批抽调的工人和干部基本达到 200 多人，但我们不是去一个地方，具体去哪最开始自己也不知道，调令都是省国防办下达的。调令下达后，我们厂里就开始组织设备搬迁运输和重新调整车间人员，调令下了一个多月以后，我才接厂里通知出发，这回才知道我去的就是省内的三线基地。”

实际上，通过后续研究和文献查阅，当时孙树青老人调去的吉林省小三线基地是自 1965 年始，出于战备考虑，国家协同吉林省出资 8700 余万元，用五年左右时间在该省蛟河县、龙井县、辉南县、吉林市和桦甸县山区建设了共计 17 家“三线”工厂、供应站、医院和学校等设施，并从全省各地和邻近省份共计调入技术、管理和工人约三万余人。

孙树青和其所在的吉林市机械厂恰是当年吉林省小三线建设的首批人员，当问及孙先生接到调令时的心情，半个多世纪后，他还是清晰记得当时复杂的心境。

“老实说，当时接到去三线工作的通知，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最开始是我自己交的请战书，知道自己真去三线，肯定是有点激动，但还是有不少担心。那时候没成家，所以家庭负担倒不大，更多是以后的工作岗位自己能不能适应，说实话心理还是有点忐忑。调令下来后，基本工作就停顿了，准备走，有一个多月。那时下班后经常去其他同事宿舍下棋、聊天，其实就是怕自己单独的时候会想东想西。”

“既然心情那么复杂，那如果当时选择不走行不行呢？”我追问道。“我们那时候可不会那么想，那个时候非常讲政治，我进厂后也一直努力入党，工作上任劳任怨。调令来了，不管当时自己有什么想法，觉得这个就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你怎么能拒绝呢？况且，当时的宣传政策就是三线建设是国家的中心任务，你拒绝了这个机会，以后在厂里怎么生活和工作啊？怎么入党呢？当时不仅是我没想过拒绝，我们厂里也没有人说不去，后来虽然有调回来的，但都是有一些特别原因，那也都是过几年的事了。”

彼时，作为高度保密的三线工程，多数职工和家属在接到内迁的通知后往往只知道要去的省份，至于具体工作和生活在什么地方往往一概不知，并只有短短数天的准备时间就要举家搬迁。对此，孙大爷当时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是一直到出发前十几天才收到具体调令，调令实际上还是写的省国防办，但是厂里已经告诉我说是去 951 厂，这也是一个代号。当时也知道 951 厂是归五机部（即第五机械工业部，主管兵器工业）管的，所以肯定还是常规兵器这块，应该是属于我的本行。”

“能从事本职工作我就很满足了，那时的想法是党叫我干嘛就干嘛，没有想自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组织肯定会安排的，是不能跟组织讨价还价的。至于家里的东西，能方便带走的都带着了，带不走的家具之类，不是给亲戚朋友，就是暂时放置到别人家里。因为我当时单身，所以行李不多。那时很多人是拖家带口去三线，真是大包小包啊，好多三四岁小孩身上还挎着两个小背包。”

## 02 一枚弹壳

“1966 年 3 月 26 日，我随厂里抽调的三线技术人员和工人先遣队 18 人踏上了行程。下午 4 点多，951 厂接站人员与我厂一行人进行了简单交接。据前来交接的同志介绍，该厂位于蛟河县附近的山区中。对于自己未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同行的各位同志和自己都是没有什么具体概念的。”

“当夜被 S 厂暂时安排在县里的一家旅馆中，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坐上厂里派来的大卡车就上路了。一路颠簸，午饭后就进入了山区边缘。路况陡然变差，摇摇晃晃中听前来接站的同志介绍该厂的基本情况。了解到 951 厂属于蛟河北线的军工厂，包括七个厂，具体为零件厂、泵厂、大华厂、工具厂、供应站、胜利医院和木工厂。这是省里在去年开过会议后由周光副省长确定的，据说他曾在这附

近的山区打过游击。”

“951 厂是生产 7.62 通用型子弹的军工厂，当时大概已经有将近一千名员工和家属了。到达 951 附近时由于公路中断，一行人步行了约一小时才到达了一个类似于牛棚的驻地。当时已经天黑，由于没有灯光，完全看不到周边的景致。”

“在牛棚中的大通铺挨过了一晚后，第二天天一亮就被周边嘈杂的声音吵醒。我披着棉袄走出一看，覆盖着白雪的山沟中大量的工人正在加紧建设工厂，厂房的地基已经成型，工人们将水泥和沙土人背肩扛的运往工地，好一派火热的劳动场面。既然组织把我派到这里，那我让我在这里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吧！”

这是孙树青 1966 年初春的一篇日记，记录了他刚到 951 厂时的情景，作为第一代建厂职工，他们当时是边建设边生产。最开始借住在老百姓的家中，随后学习大庆会战精神，建起了简易的干打垒泥草房。在访谈过程中，孙大爷特意向我展示了这一盒子弹样品，都是他们工厂应用各种喷涂工艺生产的弹壳，有手枪、高射机枪和 56 式、79 式冲锋枪的子弹。

为此，他还特意拿出一个黄铜色的弹壳告诉我，这个就是他们刚建厂后第一枚生产出的子弹。在我的引导下，他开始回忆起建厂时的经历。“最开始的时候是建设。城里建厂主要是建设公司干活，但是我们吉林这些三线厂除了有些盖楼的技术活除外，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我是 1966 年初进厂，有大半年都是在工地盖房子，一直到当年十一之后，第一批设备才开始运转生产。生产后，我才算捡起老本行，开始在车间里做技术指导工作，包括零件制图、设备调试，后来一直负责厂里的涂层技术品控。”

在老人的回忆中，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更多是靠着意志和精神来克服困苦条件，但当意志与生理极限产生冲突时，各种“变通”手段甚至成为那个艰困岁月的趣事之一。

“当时条件跟城里的工厂是不能比的，山区平地少，车间都是遵循着‘靠山、分散、进洞’的布局原则，每个车间都不大，一般也就二三百平米，就能放几台机床。而且车间没法集中供暖，管线距离太远，都是烧炉子和小锅炉来加热暖气水，尤其是冬天早上刚上工的时候，炉子都冷了，屋里温度都得零下。”

“最遭罪的是工人，加工时候不能戴手套，只能弄个热水袋，工作一会手冻僵了，用热水袋暖暖手，接着干。我记得最开始投产的时候，我还是厂里工地的青年突击队员，有时候车间没活，还去工地干。有一次实在感觉要挺不住了，自己又不好意思不干，我就想着请个病假休息两天，结果休息那三天，自己心理那个煎熬啊！”

在身体极端疲惫的情况下，孙大爷曾用请病假的方式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在谈及这一经历时，他笑着跟我说了当时的“细节”。

“当时是找医生给我开的病假条，我还不好意思直接跟医生说给我开个假病历，我是用热水袋先夹在腋下一会，然后就赶紧穿上大衣往医院跑，跟医生说我发烧了。结果医生给我温度计，让我测一下，一测 41.5 度，给医生吓坏了，赶紧给我开了假条，要求我必须休息三天，还给我车间打电话特意交代我必须休息。”

“那您当时这么拼命，有没有别的职工磨洋工或者偷懒呢？工厂里有没有什么制度防止这种行为呢？”作为研究者，我更关心的是工厂内部的生产纪律是如何管理和预防此类行为产生。为此，作为前 951 厂的总工程师，孙大爷解释道：

“其实消极怠工在哪里都有，我在城里工厂工作时，车间里也经常发生消极怠工的情况，反而在三线厂，消极怠工的情况我认为没有我在城里工厂严重。大家刚开始热情都挺高，而且来的人一般都是骨干，政治素质也比较好。我们是军工厂，基本上多数军工厂都有军代表驻厂，他们不属于厂里，是部队派到厂里监督生产的。因为最后货要被部队接收，然后部队把货款给厂里拨过来，所以军代表就像现在的质检员一样，决定部队收不收这批产品。那个军代表权力可大了，就能决定这个产品收不收。因为军代表懂技术，也会利用厂里设备抽检产品。”

在持续一周的访谈过程中，孙大爷基本主导了整个对话，我更像一个倾听者，听他讲述许多生产的细节和经历。其中所夹杂着的大量专业术语我不甚明了，但却对一个获奖证书印象深刻，这个证书是五机部发给他的科技进步奖证书，奖励他在革新“弹壳磷化电泳涂漆”方面所做的贡献。

据介绍，这一技术彻底改变了子弹只能用黄铜制作的工艺标准，使用钢制弹体加上化学喷涂，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进口黄铜的外汇，也极大降低了军队的用弹成本。说起这些荣誉，他仍然带着难以掩饰的自豪和骄傲，仿佛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专门来宣传他事迹的官方媒体记者，全然没有自己的生活和记忆已被时代抛弃的怆凉。我凝视那双有神的双眼，心中五味杂陈。

### 03

#### 一本相册

与孙大爷滔滔不绝向我讲着各种生产细节不同，他的老伴赵大妈显得有些沉默寡言，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没文化，不便插嘴。因此在访谈过程中，除了不停收拾家务之外，也只是在我和孙大爷的谈话过程中，一遍遍翻看家中的老相册，偶尔会把相册里的黑白老照片拿给我看，用来向我指认孙大爷提及的人和地点。与孙大爷总工的身份不同，赵大妈更符合一个家庭妇女的典型期待，感性、沉默、干练，却又不失泼辣。她只断断续续上完小学，作为家属工一直在厂内从事后勤工作。在数日的共处中，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微胖、短发，穿着一身红色的手织毛衣，说起话来嗓音洪亮但缺乏逻辑。

为了避免尴尬和冷落，也为了更多了解一些当时三线时期职工家属的生活细节，我也会有意引导她讲一讲三线生活时期和现在的生活感受。我注意到她的相册中有一张是在工厂门口的留影，借此便让她介绍了一下年轻时在工厂从事的工作。“我来厂里比较晚，是 1968 年年底才来厂工作的，当时已经建好了，连家属区都建起来了。我来了以后，不算国营职工，是属于集体工。当时我们这种没什么文

化的家属都是做后勤工作为主，最开始厂里副食品短缺，我就种菜养猪；1971 年后条件好转，北线几个三线厂一起集资建了一个冰棍厂，我就在厂里生产点汽水冰棍；冬天的时候，厂里就改蒸馒头给食堂送。再后来，厂医院缺人，正好我年纪也大了，我又去药房抓中药，医院哪个部门需要干活，我就打打杂，最后就在医院退休的。”

彼时，为了缓解三线企业极其悬殊的男女比例，同时也为了解决工厂男工的婚配问题，各省国防办和企业都想尽办法开拓岗位引进女工，其中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扩大“家属工”的比例。

为此，赵大妈给我解释：“我跟你孙大爷不一样，我是家属工，家属工不算全民所有制职工，属于单位内部的大集体。当时厂里男工都没对象，城里有工作的姑娘也不愿意来大山里。周边农村姑娘愿意嫁过来，但是农业户口进厂以后，厂里还不能给解决身份。所以实在没办法，厂里才在城里招聘了点集体工。我家里孩子多，我也没工作，所以就来了。后来也是厂里工会一个大姐介绍，我俩才认识结婚的。”对于大山深处的工厂生活，我原以为也会如周边荒僻乡村一般的困苦，但在赵大妈的口中却是另外一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

“我们厂里啥都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而且我们北线这几家三线厂还合办了高中和技校，厂里有医院、澡堂、俱乐部、理发馆。而且我们食堂只要晚上加班到 11 点以后，还有烙油饼，谁饿了都可以去吃两张。赶上逢年过节，厂里就派大卡车去南方拉橘子、午餐肉罐头、带鱼。那时年前每家都是几大筐苹果橙子，还有半扇猪肉，一点不比城里的厂子待遇差。”

似乎她还沉浸在过去工厂红火的日子里不能自拔，还向我继续补充道：“你不知道，那时候国家和地方都特别关照我们三线厂，1970 年代援越抗美之后，厂里有两三年都是 24 小时连续生产，夏天时候我们就从冰棍厂打几十个暖瓶的汽水，放车间里让工人随便喝。那个年代随便喝汽水啊，冰棍也是随便吃，每年夏天都不少小孩吃出肠炎呢！你就想想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吧。”

在持续数天的访谈中，老两口每次谈及过去的生活时，情绪都比较激动，我虽理解他们的心情，也不忍打破他们对过往美好的追忆，但我知道，这种表面上红火的日子也一定伴随着创业的艰困、生活的艰辛，在这方面，作为家属工的赵大妈感触更深。

“跟你孙大爷这种干部不一样啊，我们家属工可是太遭罪了啊！厂里没有菜，我们种菜，还得养猪。我那时每次都拎着两大桶猪食，一爬就是半座山，腿最后都没有知觉了。有一次我干完活下山，腿一软就滚到路边的坡下去了，当时是秋天，树枝啥的都特别硬，给我腿上划了好几个血道子，就那样还得继续干活。”

除了工作方面的艰辛，大山深处封闭生活所带来的不便给这位家庭主妇留下的印象显然要比作为工程师的丈夫深刻得多。封闭、大山、严寒成为她回忆里经常出现的词汇，似乎像是梦魇在记忆中挥之不去，我虽不能切身感受，但也能理解其中的不易。

“当时七十年代厂里生产任务很重，像你孙大爷那样的技术骨干有时候都是好几天才能回家一次。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晚上孩子发烧四十多度，我只能用板车拉着孩子去医院，路上都是雪。有一个上坡得有两里地，后面下坡我腿实在不听使唤了，我怕连人带车滚下山去，我是一边扶着板车的把手，一边跪着往路下面滑，等到了医院才发现棉裤都已经磨得露棉花了。”

当赵大妈红着眼圈回忆这一幕无助的经历时，我原以为孙大爷也会同样感动，但也许是出于对过往生活极端的热爱和不舍，或许是不愿当着我这个“外人”诉说三线生活的缺点，孙大爷当场就打断了老伴几欲滴下的泪水，并向我反复强调这只是特殊情况，一度还引起了两个老人的口角，在我的劝说下，方才恢复如初。

为了证明自己经历的真实性，赵大妈还向我叙述了平时在大山中生活的诸多不便。“就是平时上班也是很辛苦的，我们家跟厂区虽然只隔着一座山，但是上坡下坡，走路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车间。冬天的时候，上班下班路上经常是连滚带爬，自行车没法骑，孩子小时候还得抱着孩子去幼儿园，别提多遭罪了！”

怕我不相信她的话，赵大妈还特意强调了一个事实，即之所以孙大爷不认同她的观点，是因为那时孙大爷作为总工，不是经常驻厂，就是早出晚归，根本不了解日常生活的艰辛。

“那时过日子虽然也是物质上不太愁，但生活挺不方便。当时我们在城里家里都有冲水马桶，但是在山里，我们住的是平房，厕所在外面，冬天出去上厕所特别冷。做饭要烧柴，冬天还得烧炕，跟农村生活是一样的。这些家务事都是我干，在厂里我还是女子突击队的小组长。每天早上，我推着自行车把孩子送去学校和托儿所之后，还得在单位干一天的活，晚上带领女工政治学习后，赶紧去接孩子回家，劈柴、做饭。有将近十年，我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才能躺下。每天躺炕上时，都感觉胳膊、腿都要断了。”

显然，作为家庭主妇的赵大妈年轻时就承担起了家庭中繁重的家务和养育工作，加之其所从事的家属工无论在工作量还是工作性质上的边缘性，使其对大山深处的三线生活有了更多艰辛回忆。

从后续我对其他 951 厂家庭的访谈来看，多数家庭的生活经历与轨迹都高度重合。作为三线厂的“女人”，她们承担了多重角色和期待，付出了远超同时期城市女性的艰辛和不易，而这些艰苦和不易构成了更为完整的三线生活图景。

### 04

#### 一顿饺子

在访谈的过程中，虽然我极力避免打扰老两口的生活，但热情的二老在我结束访谈的返程前日，还是执意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这在东北几乎是最为正式和隆重的送客礼仪。为此，在本地开出租车的儿子孙先生，专门回家与我们一起吃饭。饺子是白菜肉馅的，味道既熟悉又家常，得知我是专门采访三线生活的学生，孙先

生在饭桌上就开始向我讲起他对三线生活的记忆，这些记忆让我感兴趣和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三线厂回迁和倒闭后的那些叙述。

其中的一句话让我十分震撼，孙先生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很平静地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厂子刚倒闭那两年，有一次国庆节，我家包的是一顿白菜馅饺子，那饺子里都没有肉。”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追问道：“还记得那是哪一年的事吗？为啥当时生活突然就变那么困难了？这跟你们在山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啊。”

“具体哪一年已经记不太清了，大概是 1992、1993 年左右吧。其实我小时候厂里的情况还不错。我从记事起就在厂里上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没离开厂子，当时也没考上大学，就直接进厂当工人了。那时是八十年代末，厂子已经开始不行了，经常有家属因为医疗费厂里没钱报销，找厂长去闹。”

“后来我上班一两年以后，工厂就搬回吉林市了。我们搬回来以后，跟一个当地的小国企合并后，就一直没有活干。当时工资也开不下来，我们所有职工都只开 30% 的工资保证基本生活，所以家日子一下子就难起来了。而且，城里也没法种菜、养鸡，我们吃点啥都得去市场买，还没有钱。”

对于儿子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赵大妈还是忍不住红了双眼，补充着那些她从未单独向我提及的经历。

“当时我跟厂里那些邻居们，每天晚上去菜市场按墩买菜，都是剩的菜，便宜。回来捡一些能吃的留下，你孙大爷是清华毕业的总工，我不能让他跟我去捡菜吃，都是我等着夜市散了，去捡点还能吃的一些菜拿回来。1993 年那年国庆，家里实在没钱，也没买肉，那时候就大白菜便宜，我就包了一顿素馅的饺子，就算是过了一个节。”

“那当时生活都这么困难了，企业也没有活了，你回城以后都做什么工作维持生活？”我继续问孙先生。

孙大爷一改刚才沉默不语的低头吃饭，这个原本并不是针对他的提问，却略带激动地抢着回答：“要说我们这一辈，我真觉得问心无愧。但是我一直对我这几个孩子挺愧疚的，当时工厂在深山里，国办下发的招工指标主要优先生产，像医生和老师这种岗位都是次要部门。所以厂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老师，甚至有些老师和大夫都是集体工，孩子也就是被这么给耽误了。”

“我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没考上大学，当时全北线三万多人，每年也就能考上几个大学生，剩下的孩子没处安排，都是安排回厂工作。但他们进厂以后，国家都开始裁军，撤销三线建设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活干。进了城，坚持两年，不仅没改善，马上就倒闭了，孩子们就都下岗了。”

停顿片刻，孙大爷欲言又止，但还是补充道：“我当年大学同学，身份和成绩都没我好，所以没法去三线和军工厂，多数人都安排到大学当老师去了。后来，退休时候都是博导、教授，然后我们这些人的孩子还全都是下岗职工。我们现在每个月还给二儿子、孙子 2000，给大儿子 2000，剩下的钱攒起来也填补给各个家庭。”

“我其他同学退休都是游山玩水，我们两个是根本不敢奢望。奋斗了一辈子，现在这个生活，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你有机会写写文章也帮我们呼吁一下，你不是搞研究的吗？那你说为啥这样呢？”

孙大爷的问题让我一时间感觉如鲠在喉，更不知应该如何回答他，我既为两位老人感到可怜，也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厘清的复杂问题。好在饭桌上没有人等待我的回答，孙先生在吃了一大口饺子后甚至神色飞舞地跟我讲他做过的种种职业。“你要说厂子倒闭以后我干啥了？那可是有话说了，也不都是过的苦日子。我这个人脑瓜子活，1993、1994 年我就自己坐火车去广州，从那批发南韩和日本的二手牛仔服拿回来卖，还有最新的磁带。你知道吗？我去一趟广州回来，挣的钱比我爸当总工一个月的工资多不少呢！全家跟着过了两年好日子。”

“然后我妹妹干啥呢？倒腾国库券，从西安啊，还有上海，收国库券，然后拿回来卖，也有差价。但没好两年，我们这生意就遍地都是了。后来我妹妹找了一个小厂当收纳去了，日子过得也还可以吧。”

“我最开始跑中巴车，开从市里到县里的班车，一直对付着过日子。后来孩子大了，光我媳妇一个人看孩子不行，我就回来盘了一个出租车干着呢。我现在自己每年得交一万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就等退休开劳保呢。”

“我们就希望能健康点，多活两年，不给子女添麻烦。我们多活几年，就能多帮子女几年，等他们都退休了，孙子、孙女也都立业了，生活就能好起来了。我们对自己没有啥想法，对付活着就行了。”听着儿子说的话，赵大妈补充道。

在我看来，“活着”，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无比沉重的词汇，就像你对生活抱有最大的希冀和最大的无奈，这个词汇似乎都能准确形容那种微妙的心境。余华也曾说过：“作为一个词汇，‘活着’在我国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去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与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这种平静的忍受我在很多三线人的眼神和语气中都感受过，那是一种似乎对生活不公和命运不济毫无波澜的反应。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阶层的型塑就如同一场永不停止的马拉松，每一段赛程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出赛道，再也无缘获得能够带来利益与荣誉的机会。

我想，三线人生命的轮回和进程就像这场马拉松。虽然精疲力竭，虽然被甩出赛道，但是他们仍旧乐观而坚强地“活着”。



刘博

吉林大学社会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后，现任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单位制与社区治理研究，曾获第七届时休优秀博士论文奖、省社会科学三等奖等奖励，发表多篇与单位制相互主题相关核心期刊论文。

####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4月24日，马里乌波尔被破坏的街道。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 马里乌波尔的送别 | 战时日记①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 | 生活亲历者

我们只有这样一条准则，成为人，  
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人。

译者按：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是我在俄调查时最亲密的报道人，他是出生在波兰、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我们相识于2015年，他当时60岁，是教会学校的俄罗斯文学老师。在此之前，他曾是顿涅茨克州马里乌波尔大学的俄语教师。2014年，谢尔盖为躲避战争来到顿河罗斯托夫，但妻子和儿女还留在乌克兰。他来俄罗斯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能顺利获得俄罗斯国籍，最后在俄罗斯定居。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不久以后，教会学校关门，谢尔盖也失去了工作，他又回到马里乌波尔，后又到了基辅。谢尔盖告诉我，再回乌克兰，很多事情都变了，学校里只能用乌克兰语教学，而他的乌克兰语达不到教学的水平，只会俄语的他失业了。谢尔盖的“文化间性”给他造成了苦恼，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他都成了“他者”，失业者、失意者。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我通过邮件联系上了正在逃难途中的谢尔盖，他正带领一家人一路向西回自己的故乡。他说，路上都是逃难的人，他们被困在路上24小时。在故乡小城，他们全家租了间房子落脚。夫妻俩目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

谢尔盖喜爱文学创作，一直坚持在LiveJournal上写日记。战争中，谢尔盖笔下平和优雅的文字变得时而激愤，时而哀婉。我试着把他其中的某些段落翻译出来，以飨中国读者。俄乌冲突不只是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政治的波诡云谲。在他的日记里，我们能感到战争中普通人的脉动与呼吸、心灵深处的情感，以及战争阴云下的悲惨命运。

马里乌波尔和顿巴斯

3月18日

今晚，我得知了住在马里乌波尔的堂姐的死讯，她于3月6日去世，一枚从俄罗斯战机上投下的集束炸弹在四楼爆炸。堂姐的一位女儿说，房子的院子里就像“尸山”。悲剧发生时，堂姐的女儿们都不在家，在外寻找食物。只有堂姐的外孙和她在一起，爆炸发生时，他在走廊里，捡了一条性命。堂姐的半个颅骨被炸飞了，尸体葬在阵亡者的集体坟墓里。

堂姐名叫塔基亚娜，她是那么善良、聪明的人……如果读者中有信徒，请你们为她祈祷，让她魂归天国！

我和身边的人们十分困惑：俄罗斯的奥尔德洛夫斯克军团为何对马里乌波尔有如此

之深的“特殊仇恨”。

罗马教皇称我们的城市为“烈士城市”，显然，袭击者的残忍降临这座以圣母玛利亚名字命名的城市（虽然词源不同，但民间始终将城市名称“马里乌波尔”和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

马里乌波尔自18世纪建成以来，就一直与众不同。直到19世纪末，城市中只允许希腊人定居。这些希腊人从克里米亚汗国迁至俄罗斯帝国，独居马里乌波尔是他们获得的优待之一，而这一点对于城市的自治和文化发展至关重要。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德意志人只能在亚速海沿岸的北部的农村地区定居，他们与希腊人达成协议，在四分之一世纪内，希腊人允许其他民族在其没有使用的土地上定居，但不允许他们住在马里乌波尔。

19世纪下半叶，在顿巴斯的尤扎夫卡开始出现煤炭工业和冶金厂，而马里乌波尔还保持着贸易城市的形态。甚至这里出现了冶金工厂以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马里乌波尔仍然与顿巴斯的其他地方不同。//

不过，苏联时代为马里乌波尔增添了一些特色，这些特色没有使它达到乌克兰其他城市同等的水平。相反，它出现了巨型的工业基础设施。

显然，顿巴斯和马里乌波尔也有地理和气候特征上的区别。一面是顿涅茨克山脊和草原，另一面是海滨地带。

亚速海北岸和顿巴斯的居民也是具有不同民族特征，也将顿涅茨克和马里乌波尔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两地产生了“自我”和“他者”的感觉，虽然不是完全的“他者”，至少是“不同”。

2014年，马里乌波尔没有落入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特殊地区（ОРДЛО）并非完全偶然的事实。人们给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基本的解释在于文化、历史和民族特征领域。

这些天，马里乌波尔陷落。

被国家宣传机器愚弄的俄罗斯民众根本不承认他们的军队和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特殊地区的军队一起摧毁了马里乌波尔，向它投掷炸弹。几天前，他们还向躲藏着数百人的剧院里投掷炸弹。俄罗斯人看不到他们国家的罪行。是的，毕竟，这样的洞察会让世界天翻地覆，以后还如何生活？！

马里乌波尔和……

3月21日

每天，都有关于困在马里乌波尔的人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越来越多。当然，所有这些文字都是重要证据，但对于海牙国际法院来说，这些文字根本什么都不是。为了同情，为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人民，我希望乌克兰和全世界了解他们。

特别是，我希望这些真实故事能够讲给俄罗斯人，他们一次又一次对战犯表达忠诚，对乌克兰战争表示支持，支持人数如此之多！这深深地震惊了我们。

如果你要和居住在俄罗斯的亲戚交流，你就会明白，所有这些证据一点效果都没有。我想效仿乌克兰摇滚乐队“艾莎的海洋”主唱斯维亚斯托拉夫·瓦卡尔丘克，他最近在接受《乌克兰真理报》时表示，他已经停止向俄罗斯人发表讲话，因为这些呼吁没有意义。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的俄罗斯熟人、同事，没有一个人给他写过一封支持信。开始时候，你可能看到，俄罗斯人不知道在乌克兰发生了什么，只是说：“嗯，只是攻击武器库。”然后，你会注意到，他们已经知道不仅攻击武器库，死去的不仅仅是士兵，还包括平民，但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看法中，这都是有理由的，是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因此，无论向他们提供多少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会对俄罗斯人的思想或良心上产生任何影响。他们确信，这是应该做的行动。“你们自己人是罪魁祸首”，是你们的“亚速营”在炮轰自己的城市，而不是来自俄罗斯的集束炸弹。

昨天，我们送走了一家人。他们开车来找我们，然后从我们这里乘坐公共汽车去往希腊。家里的成年男人留下，其他人离开了乌克兰，轰鸣声响彻整座车站。他们从马里乌波尔离开，在途中不断寻找燃料，在前往波扎洛热的路上要通过13道俄罗斯军队的检查站。这些故事将会成为他们生命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还包括前几天在马里乌波尔的生活。他们曾在马里乌波尔住在长长的、五层的楼房，如今从楼房到地基都被损毁，楼房已经裂成两半。

在马里乌波尔被炮击的第一天，他们试图待在楼房下面的地下室，但他们意识到，地下室出口只有一个，如果房子塌了，他们就彻底出不来了。为此，他们搬到另外一座楼房。他们只有在没有战机轰鸣（每次空袭间隔15分钟）和炮击声时，才敢进入房间。其他时间，他们全家，包括爸爸、妈妈、十一岁的儿子和孩子的祖母，都待在公寓走廊里。

他们无时无刻不为了活下去在坚持着，他们也为获得“拯救”做一些事情。这指“幸福的意外”：他们住过的“第一处”房子被摧毁时，他们并不在里边。当冰雹般的火箭弹飞过第二处房子时，后边的房子和前面的房子都被摧毁，但他们住的房子却完好无损。他们去泉眼打水，向着路人指示的方向，去建设大街、喀琅施塔得路、高加索胡同走去……如果他们早几分钟来，现在也会像那些死去的人一样躺在路上。弹坑还在冒着烟，水还在瓶子里汨汨流出……

一般来说，居民楼旁边埋着很多尸体。通常，这些尸体裹着床单，被抬到路边，殡葬队从此路过的时候把尸体抬走。但很多尸体没办法从被损毁的房子里抬出来。很多住在被毁掉的房子里的老人，无法下楼，因没有水和食物而死去。

想象一下，还住在马里乌波尔的或逃出围城的熟人的经历，和网上的新闻是有多大差距。网上的新闻说：只有我们这样，而乌克兰的各个地方都在坚持着。

总之，这个世界分为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地方。马里乌波尔即将审判这个世界。

送别

3月23日

我发现，我在计算战争的天数，就像我在计算“诺娜”炮弹爆炸的次数。“诺娜”炮弹

正从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特殊地区向我和父亲所在的小谢多夫卡射来。数炮弹的数量没有意义，但我还是继续数着。在第一次炮击时，正好是五十发，炮手喜欢整数。第二次，是在调整“火力”之后，他们发射了二十五枚。我和父亲无处可藏。父亲喝了一杯白兰地，邀请我也来一杯。但奇怪的是，处于某种原因，我想在我生命的这一刻，也许是最后一刻，保持清醒，如实看到这一切……

今天我们送走了另外来自马里乌波尔的熟人到希腊。这是一对老年夫妇，太太是我大学的同事，我们一起创建了教研室。这也是所有思想和言论还没有被眼下生活，和如何成为难民的故事占据时，留下了一些记忆。他们的脚边放着三个装着全部家当的小旅行袋。他们的寓所已经不在了。在达到乌克兰边境以后，他们把自己的那辆旧“起亚”车送给了志愿者。

在马里乌波尔，他们从被俄军猛烈炮火袭击的地区搬到离和平大街有三四个街区的大学宿舍。和平大街？是的，当他们离开时，和平大街正有一支队伍在行进，周围被炸开的地方被再次炸开。

宿舍里住着外国留学生，可能，现在他们还住在那里。每一天都在为生存而斗争。我的同事说，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宿舍指挥官发的茶包数量以及其他物资。马里乌波尔的居民分成两类，抢劫者和分享者。抢劫，你懂的。比如，有一群人打破药店窗户，把里边所有药品都装到口袋里，最可能的情况是，人们用这些药品交易。分享者，情况是这样：警察把一家商店敞开，把店里所有货物都分给人们，人们排着队，每个人都能领到一些东西，直到把商店的所有货物都领空。有时，店主也会这样做，然后在门上和陈列柜上写着：“空的”，当然，是这些柜台和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

大学生们把酒带到宿舍，交给指挥官，指挥官用它来换食物。见到此景，两个加纳留学生吓得浑身发抖。

看着我们送走的人，我明白：人们永远陷入这个历经生存和逃亡的“陷阱”，失去、恐惧和痛苦的“陷阱”，还有“仇恨”的陷阱。我的同事不止一次地低声地说：“我讨厌它！”这种仇恨已经落在整个俄罗斯，而且越来越多地覆盖在它之上。还记得《魔戒》上乌云聚集在魔多城上空的镜头么？仇恨、痛苦和恐惧的乌云正在俄罗斯的上空聚集。在这乌云之下我看到了什么？甚至有些有趣：是的，得到了？！这种“得到”只是那些俄罗斯之外的人，是那些俄罗斯富人，至少现在还保持快乐的俄罗斯人。

他们中间，有些仍然是人类，有些则不是了。我们只有这样一条准则，成为人，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人。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

1955年6月15日，出生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军官家庭。1972年，毕业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喀尔巴阡州斯瓦利亚瓦市中学。1981年，他毕业于日托米尔国立师范学院俄罗斯文学系。后在日托米尔和马里乌波尔的学校任教。1992年5月24日，获得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副博士学位。之后，在乌克兰的多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史、对外俄语、教育学。2015年至2018年，他在俄罗斯的一所私立东正教学校担任教师。其间，他在乌克兰和希腊出版童话故事。自2019年以来，他一直住在基辅。

译者

米沙

####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 季民和春生 | 定海桥往事④

路明 | 生活亲历者

谁知道有没有明天。  
能把握住的，只有这杯中酒了。

陈禾说，现在把你个球，会踢吧。季民不响，咽下一口冷粥，又从塑料瓶里夹了一筷子咸菜。吃完，瓶盖拧紧，放进冰箱。伸手取餐巾纸，擦嘴，纸巾扔进垃圾篓。季民对陈禾说，走吧。

冬日的早晨，阳光斜射进弄堂，照在一百年前的砖瓦和木窗上。陈禾推着季民的轮椅，从滴水的棉毛裤下穿过。动迁在即，几个老兄弟坐在陈禾家里，等季民来商量。

上次见到季民是三个月前。初秋，空气已经转凉，季民坐在轮椅上，看定海路川流不息的人群，神情淡漠，嘴里含一根光明牌赤豆棒冰。这是光明集团曾经的拳头产品，如今很难在便利店见到。陈禾说，季总，吃冷饮啊。季民点点头。陈禾抛过一根香烟。季民接住，收进上衣口袋，指指胸口，示意“现在不能吃”。

二月份他动了手术。心脏积水是老问题，可能是老酒吃出来的，可能不是。从前生龙活虎一个人，就此铆定在轮椅上。隔天去杨中心（杨浦区中心医院）报到，做血透，“每趟抽出7斤水”。医生关照，少喝水，避免浮肿。季民常感到焦灼、烧心。吃根棒冰，会让他觉得好受些。

他跟陈禾说，争取明年把埋管移到手上，走动方便一点，没准还能踢几脚球。

季民出生在这条弄堂——杨浦区定海路449弄，祖辈来自江苏泰州。同定海路港、虹镇老街、“三湾一弄”类似，449弄也是有名的苏北移民聚居地。74年初中毕业，碰到“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上头两个阿哥、一个阿姐都在上海，季民只好去外地。好在运动接近尾声，政策宽松不少。季民回原籍泰州插队落户，比起那些北大荒、西双版纳的插兄，算是幸运的。

79年知青大返城，季民回到上海，分配在梅林食品厂当临时工。没人不晓得梅林厂，午餐肉罐头有名的。一到天热，原材料保质期短，厂里做不过来，就招临时工。除了午餐肉，梅林厂还做蘑菇罐头、清蒸猪肉罐头，出口到苏联。苏联人嘛，一听猪肉，一瓶白酒（伏特加），季民比划，天气冷得像鬼，老酒下去，好比身体里装了只火炉。此外，厂里生产了大批蚕豆罐头，专门出口伊拉克，属于战时物资（两伊战争）。

季民做产品检验。封装好的罐头，拿根棍子一敲，就知道质量合不合格，有没有漏气变质。有工友抱怨，说交关辰光没吃肉了。季民说，这个便当。一听午餐肉拿过来，往桌角用力一敲，铁皮瘪掉。瘪掉就不能出口了。跟小组长打声招呼，中午拿到食堂，撬开。再花一角铜钿买客蔬菜，午餐肉吃吃，蛮开心的。还有橡皮鱼罐头，其实不是罐头，装在玻璃瓶里。玻璃瓶有碎掉的，食堂就便宜卖，五毛钱一大茶缸。带回家去，洗掉玻璃渣子，过老酒吃，“赞得不得了”。

84年季民转正，每月工资30块6角。他去找领导，凭啥人家拿36块，我要扣掉

5块4角。领导讲，政策有规定，知青插队满五年，拿36块工资。领导讲，你五年没满，差了7天。季民跺脚，我又不晓得，晓得么就晚7天回来了。领导笑笑。季民一肚皮窝火，干脆请了长病假，不高兴做了。当初插队时，季民就给当地的社办工厂跑业务，推销些产品。他找到一家泰州的工厂，厂里生产自动折叠伞，当时属于高档货。季民自告奋勇，拿了些样品回上海，一家家商店跑。季民脑子灵活，口才又好，折叠伞很快打开销路。他记得，去南京路上的第十百货公司——现在改回从前的名字，叫永安百货——带了一箱梅林厂的罐头，碰到谁就发几个，“大家开心”。到后来，从第一百货到第十百货，统统卖季民的折叠伞。

业务做得好，收入自然可观。季民一个月拿三百多块，老婆得不得了。衬衫袋袋里都是大钞票，香烟么抽大前门。后来梅林厂大概知道了，停掉季民的病假工资，等于开除。季民无所谓。

季民跟厂长、会计一起去广州，参加广交会。高级点的伞，伞面要有防水涂层。当时上海没有这种材料，广州有。季民看中一批台湾伞，轻巧又时髦。他对会计讲，进。商标撕掉，换成自己厂的牌子，摆在上海的商店里卖。进价10块5角，卖13块4角。一记头抢光。

后来生产折叠伞的厂家多了，生意难做。厂里进了一批防水面料，季民提议，干脆改行，生产滑雪衫。又是一抢而光。老板赚得多，在如东新开了一家服装厂，叫季民负责。季总季总，就是那时候叫出来的。

钞票多了，应酬也多。季民跟几个当地的老板一起，天天吃老酒。喝的是十五块一瓶的五粮液。碰到过几次假酒，季民发了狠，干脆去趟四川，搬了好几箱回来。

季民在如东呼风唤雨之时，春生正住在新余钢铁厂的招待所里。春生是陈禾的邻居，原来在朝阳百货公司当采购员，后辞职下海。在陈禾看来，这两人颇有相似之处：都喜欢穿西装，外型儒雅，一副斯文相；都爱看书，属于弄堂里少有的“读书人”；都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449弄的居民大多只讲苏北话，或者带苏北腔的上海话。季民对自己和春生相提并论不大乐意。他觉得，自己是正经的生意人，至于春生，“多讲不讲了”。

坊间传闻，这两人一度很要好，一起踢球，一块抓蟋蟀，老酒碰碰，牛皮乱吹。后来闹掰了。据说有一次，一大桌人吃饭，最后剩下季民和春生。春生假装去撒尿，先溜了，是季民付的账。也有人说，谁都没买单，混了顿霸王餐。总之从那以后，两人就不大往来。

春生下海后，没做成啥生意，就去了新余。春生的哥哥在新余钢铁厂当供销科科长。春生住招待所，吃饭睡觉自然挂在他哥账上。当时钢材供不应求，来厂里订货的客户多。春生就搭讪，朋友，要钢材不？我有门路，可以搞一点。谈好价码，就去找他哥，死乞白赖，多少批一些，赚个差价。等钞票到手，人就失踪。外头吃光用光，再住回招待所。

时间一长，他哥不愿再理他。招待所也提醒住店客人，留神那个某某。春生开过几回空头发票，拿了定金就消失，让他哥来擦屁股。结果自然是兄弟决裂。新余待不下去了。

季民喜欢成都。除了五粮液正宗，川菜好吃，这座城市仿佛处处蕴藏商机。走到哪里，生意就做到哪里，季民有这个本事。有个人，号称成都军区的——那时候部队也经商——军装笔挺，跟季民谈生意。递上名片，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第几经营部负责人，上头印五角星。生意谈妥，定了一批服装。对方伸出一只手，收起一个手指，意思是回扣，四万块。季民没办法，只能给。对方满意，答应打预付款。支票开出来，拿给季民看，当着季民的面送进银行柜台，说三天到账。其实是买通银行的人，等季民一走，支票又收回去。

季民回到如东，等了三天，钱没到。又等了一个礼拜，季民晓得，出事体了。人找不到，报案也没用。四万块钱需要季民自己拿出来。那是在八几年，人均收入几十元，饭店里三角五分炒一盆肉丝，谁家里有一万块存款就了不得了，叫万元户。有人给季民出主意，说你也跑吧，这赔到哪天去。季民说，我想办法。

服装厂没法再做了。季民找关系，承包了如皋的一家乡镇塑料厂。上点年纪的人可能记得，有一阵子塑料粒子特别紧俏。季民跑到废品公司，买进垃圾塑料，七百块一吨。弄到厂里去，融成塑料粒子，再做成打包带，一吨卖四千。季民踌躇满志。那一年季民的女儿出生。有段时间他没去如皋，在家照顾老婆和女儿。等再回厂里，季民的头大了。有工人把塑料粒子拿回家去，当柴烧。其实那个气味是有毒的。食堂也用这个烧，省掉买煤的钱。更有甚者，内外勾结，把塑料粒子偷偷运出去卖掉，钞票几个人分。财务一塌糊涂，外债欠了一屁股。厂只好打烊。打烊懂吗。时隔多年，季民的表情无悲无喜。就是关掉，没有了，结束。

一败涂地的季总回到上海，在杨树浦路盘了一家店面，开起熟食店来。钱还是要赚，债还是要还的。批发来红肠和方腿，剩下的自己动手烧：盐水花生、烤麸、猪耳朵、酱牛肉、三黄鸡、酸辣菜……每天一大早买菜，辛苦得很。附近有些小流氓，从来不付钞票，拉白板。夏天，过来吃夜宵，一桌子人，两箱啤酒不够。吃好喝好了，立起来要走。季民赶紧讲，今朝啥人付账。手一挥，老板，这点钞票算啥，以后再说啦。人家的地盘，有啥好讲，季民苦笑，等于倒贴为人民服务。有天晚上，季民跟这帮人吵起来，丢了句狠话。半夜有人砸家门，咣咣咣，半只弄堂都听到。女儿被吵醒了，穷哭。撑不了多久，熟食店关门大吉。

春生回到449弄，专心从事赌博。在定海桥，万物皆可赌。麻将可以赌，扑克可以赌，足球可以赌，蟋蟀可以赌。实在没东西赌了，直接赌钞票。一刀百元大钞，抽出一张，尾号单数，拿走；双数，留下。夜里，路灯下，牌桌连绵不绝。一天进出万把块，不算稀奇。

“赌”这个字，仿佛流淌在定海桥的血液里。当初背井离乡，来上海滩讨生活，凭的就是孤掷一注的血性。赢了，才有资格留下。这种赌徒心态，深刻地影响了定海桥人的财富观。手头有点钱，不愿作长久打算，没这个概念的，情愿一局定输赢，情愿博一记，出老千，骗低保，闹拆迁，搞七捻三，一锤子买卖。赚到大钱的是这批人，迅速败光的也是这批人。

陈禾输了钱。春生晓得了，说，交给我。春生去找对方，打了一晚上牌，不但把陈禾那份拿回来，还多赢了几百。春生说，动手脚，一定是动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两个人见面，彼此不服，于是开赌。用谁的牌都不放心，当场叫人，去商店买。殊不知，店员早就串通好了，拿出事先准备的那副。乃么好，这副牌买回来，随便怎么洗，总归比你大一点。陈禾点头称是，从此不敢再赌。

那几年春生过得挺滋润。凭他的智力，从牌桌上赚点钞票，不算难事。有人说，春生在外头，女人不少。陈禾旁敲侧击问过，春生就笑，岔开话题。

陈禾有个远房娘舅，嗜赌，绰号炸药包。人家开盘赌蟋蟀，他来晚了，虫都不看，剩下多少份额，全部吃进。等正式开斗，他躲在屋外头吃香烟，听房间里动静。赢了，拿钱走人；输了，掏腰包。爽气得很。娘舅跟单位请了长病假，早上准点出门，晚上准时回家，家里人当他照常上班。出 449 弄，左拐，骑上内江路，直奔长白一村，那边有个固定的聚赌点。一帮小赤佬叫，娘舅来啦，也叫他娘舅。娘舅来了就有饭吃，有烟抽。

那几天，娘舅手风特别顺，赢了几万块。结果被输家举报。碰到“刮台风”，娘舅送去大丰农场，劳动教养三年。到年底，陈禾去探监。春生说，我那边有亲戚，陪你一起去。

两人在十六铺码头坐船，二等舱，有单独的淋浴间。春生洗完澡，换下棉毛衫和棉毛裤，团一团，直接扔进黄浦江。陈禾目瞪口呆。第二天早上到南通，转长途车去东台。春生的伯伯是东台某银行行长，见面就拉住春生的手，叫“小少爷”。行长给农场领导打过招呼，又安排了一辆丰田，送两人到大丰。事情出人意料地顺利，陈禾很是感激。

回程再经过南通，春生提议，去华侨商店转转。八十年代的华侨商店，只对国际友人和拥有外汇券的阶层开放。陈禾讲，斩外国人地方，有啥看头。春生笑说，你不是有几张外汇券。陈禾晓得，这赤佬是惦记着了。离友谊商店还有几十米，春生叫三轮车停下。春生理理头发，昂首走进店里。大冬天，春生一身灰色法兰绒西服，衬衫雪白（陈禾：这赤佬倒不怕冷），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乱。领班赶紧上前迎接。春生器宇轩昂，对身后的陈禾说，陈主任啊，过两天 Christmas 了，这次打算送局长什么礼物呢？字正腔圆，略带卷舌，一听就是北京来的领导。“陈主任”只好硬着头皮说，那就来两条烟吧。最后选定两条登喜路，外汇券九百多。结账时，春生问领班，你们没有礼品吗？（陈禾：这个赤佬都懂的）领班赔笑，送上一只飞利浦电动剃须刀。春生点点头，收了烟和剃须刀，满意地走了。

回到上海，两条登喜路在黑市出手，净赚一千多。陈禾彻底服帖。

陈禾收藏了不少好邮票，包括整版 80 年的猴票。黄梅天刚过，陈禾搬出集邮册，打算晾晒一番。春生也集邮，瞧见了，说能否拿回家看看。有啥缺的，没准他能补上。陈禾手一挥，拿走。自己上班去了。等陈禾下班回到家，春生不见了。

90 年代，季民和朋友合伙开公司，做起房地产生意。主营业务，是寻一些废旧厂房，重新装修，改造成宾馆、饭店，再卖出去。当时国企开始走下坡路，第三产业兴起，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季民出手阔绰，名酒、名烟不离手，频繁进出夜总会。季民一进门，乐队齐声奏乐，欢迎季总。钞票来了。夜总会有驻场女歌星，底下的老板们，不时送个花篮上去，价格从五十、一百，到五百、一千不等。季民觉得，一个两个花篮没啥意思，要送就送满堂红，五千块，等于包下所有的花篮，是顶顶有面子的事情。一声鼓响，主持人宣布，季老板送上满堂红，祝咪咪小姐天天开心，永远开心。乐队高奏东方红，彩灯闪烁，纸屑飞舞，气氛达到最高潮。

麻烦也不少。附近几个流氓，晓得季民发了财，动不动来敲竹杠。季民惹不起，包几个红包，客客气气送走。最怕那几个戴国徽的人，过一阵就来寻仇，笑眯眯讲，明朝夜里一道吃饭，好吧？好的，总归好的。人家寻好饭店，酒要洋的，海鲜要生猛的。还没吃完，讲，一唱歌去，好吧？好的。进 KTV，熟门熟路，给每个人点上陪唱小姐，自己要两个。唱到后半夜，自然要开房。季民心领神会，先行告辞，一个信封递上去。对方嘿嘿笑，季老板到底，啊，够意思。

那一年春节，春生没回上海。出了正月，陈禾收到春生的信，信纸皱巴巴，是在火车上写的。陈禾闭上眼睛，想象摇晃的车厢，昏暗的灯光，温暖浑浊的气息。春生说，他在去贵阳的路上。春生说，他爹妈身体不好，万一有什么事，请陈禾多关照了。春生说，对不住陈禾。春生说，那些邮票还在，等做完这笔生意，就回上海，当面奉还。

陈禾没等到春生。数月后，春生在贵阳被捕，判了八年。

季民寻思，女儿一天天大了，老房子总共二十多平，诸多不便。自己做这一行，也晓得，房价要起来了。问题是，手里但凡有点钞票，就要消费，要拿去还债。人家叫侬老板，老板的腔调要有吧。旧债还清，永远有新的债要还。钱从这只手进来，从那只手出去。生意场上，你骗我，我骗你，谁知道有没有明天。能把握住的，只有这杯中酒了。最近买房的一次，是隔壁邻居有个房间要出手。十多个平方，价钿都谈好了，一万多块。最后是煤气过户，要出两千块，对方坚持由季民来付。季民心里恼火，干脆不买了，拉倒。

夜里，季民在朋友家喝茶、吹牛皮。警察悄悄完成布控。季民出门，感觉不对。两个便衣靠过来，左右一夹，押上弄堂口等候的轿车，绝尘而去。

审判结果很快下来，季民因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一天，陈禾的儿子站在家门口，看见一个男人向他走来。男人瘦到脱了形，背佝偻着，问，认得我吧？一笑，牙齿全没了。小家伙看了他半天，讲，春生爷叔，是侬啊。

春生的父母去世了，哥哥嫂嫂住在南昌，家里剩下他一个人。回到 449 弄，春生深居简出，除了买点饭菜，买些便宜的白酒，几乎不出门。过往的朋友大多断了联系。陈禾不时去看他，送一碗面，送几个汤圆。

有天早上，陈禾买了烧饼油条，打算拿一份给春生。推开门，春生坐在床上看书，手边一杯白酒、两个冷锅贴。陈禾说，老酒么，少吃点。春生笑笑，不吃老酒，那做啥呢。

没过多久，春生查出糖尿病。送去医院时，一条腿溃烂的不成样子。医生摇头，说

太晚了，只好截肢。有个在钟表店上班的女人，此后常来照顾春生，煮饭、洗衣服、整理屋子。午饭前来，做完事情，匆匆离去。邻居说，这是春生修来的福气。女人从不跟弄堂里人说话，问她什么，她只轻轻地摇头，任凭人们去揣测。有人讲，这个女人，像是老早朝阳百货公司的售货员。

季民出狱后，淡出生意圈。他加入陈禾的老年足球队，司职边锋。后来身体吃不消了，就当领队。陈禾他们出去比赛，季民负责接洽场地，联系大巴，预订饭店。还是老脾气，上了大巴，香烟穷发，都是好牌子，听大家一口一个“季总”。他喜欢这种被簇拥的感觉。关于动迁，定海桥待了十几年。居民为此上访过，拉过横幅，敲锣打鼓上过街。如今石头落地，真的要动了，大家心里不是滋味。按现有的补偿标准，很难在周边买到像样的房子。只好天女散花，搬到乡下去。以前叫“拆迁”，还能跟开发商搞一搞，当个钉子户，多争取一点利益。现在是“旧改”，换了政府跟你谈。有什么好谈的？政策一条条摆在那里。再强硬，能硬过国家机关？

这些天，449 弄的老街坊见面，是这样打招呼的：

——解放了？

——解放了。

——没花头？

——没花头。

季民家属属于特困户，有资格购买安置房，也只能摇到南汇、奉贤、金山这种乡下头地方”。他去惯了杨中心，挂号、付费到诊疗，一气呵成，闭着眼能摸到血透室。季民担心，以后换了地方，会不会被医院拒收。再说，“乡下头”医院水平哪能，也吃不准。朋友建议，可以在杨浦租个房子住。季民摇头。最近几个月，定海桥周边房租飞涨。人人晓得，大批“旧改”居民需要安置，需要过渡，三十多平方的一室户，月租敢叫到六千。不上路，季民对此下了结论。

他叹息，那间小房间若是吃下来，硬碰硬多拿两百万，解决所有问题。或者更久远一点，当初要是留在梅林厂，后来也分房子了。这段时间，季民尽量避免跟老婆吵架。吵到后来，老婆总归要搬出那档子事来。季民只好闭嘴。

时近中午，有个老兄弟提议，干脆去平凉路“来香缘”搓一顿。毕竟几百万身家的人了，吃个饭吃不起？大家穷笑。于是起身出门。陈禾推着季民，走在最后面。路过春生家，门窗紧闭，春生已经去世多年了。



路明

大学教师，物理学博士，写作者。

####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题图来自 [Steve Pancrate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我们的未来也在这里吗?”

Christopher St. Cavish | 局外人

美国人 Cavish 和他 7 位朋友  
在上海封城至今所经历的事。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我的微信上热闹得很。我和朋友们在线聊天，聊各种物资供应，聊各人的心情，聊各家的计划。我们看各种资讯，看谁被送进了方舱，看谁将离开这个国家，看这次封控会给上海留下怎样的心理创伤。一开始，我们用闪送互送食物。现在，我们只会转发预估未来趋势的负面新闻。我们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心灰意冷，像过山车一样，沮丧一会儿，然后回归正常心态。以下例举我们数人的实际情况。

(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

Angela 是香港人。她和丈夫在中山公园附近潮人热衷的马路上开了一家小西餐馆。三月下旬，她和一大帮朋友聚餐，没想到，那是一顿决定命运的晚餐。几天后，好几个同桌共餐的人核酸检测呈阳性。招待他们的那间餐馆的老板被送进了方舱。安吉拉的丈夫检测结果也呈阳性，按照规定，他也要等待被遣送。但到了说好转移他的那天，谁也没来，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人再打电话来。他们没什么好抱怨的；后来，他在自己家里康复了，再去测核酸时已呈阴性。

在家隔离了四十天后，安吉拉夫妇决定逃离上海。上星期，他们开价 14000 元，雇到了两个司机，深夜离沪，在车里坐了 16 个小时，目的地是广州，因为安吉拉的家人在那儿。虽然他们的证明资料都没问题，广州的居委会也答应接纳他们，但他们还是想尽可能地避开白天的防疫检查。行车途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下车，甚至不能用公共厕所，否则就不得不先在当地城镇通过检疫流程。他们说再过几个月会回上海，等疫情过去再说，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在广东寻找新的商机。

\*\*\*

Brenda 是东北人。她的丈夫 Charlie 是英国人。去年，他们刚把上海市中心的顶层公寓装修好——那套豪宅有个 150 多平米的屋顶露台——还投资了一家网红餐厅。今年，他们投资了第二家餐厅，满心希望能赚个钵满盆满，以后，他们早晚是要搬回英国的，就盼着能存点钱，到时候派上用场。他们是从三月初开始封控的。起初的那段日子，他们过得还不错。Charlie 学中文，在阳台上做运动。他不让自己去看社交媒体，以免受负面新闻的影响。Brenda 做饭，在朋友圈里发照片。看上去，宅家的小日子好得不得了，但现在开始逐渐崩解了。Charlie 不健身了，也不再学习，每天熬夜到早上七点，紧紧盯着加密货币的价格浮动。Brenda 把时间都花在团购上了，团的套餐里大部分都不是她真正想要的，她只是为了买到某种零食而已。他们投资的第一家餐馆兴许能存活下来，第二家肯定不行了。Charlie 留在中国是为了 Brenda。但随着他们的投资失败、餐饮业的崩溃，就连 Brenda 自己也很难找到继续留在中国的理由。她说她暂时还不会走；我觉得他们一年内就会走。

\*\*\*

Dana 是四川人。她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白领，收入颇丰。因为太独立、太西化，她在四川待得不爽，就在几年前搬来上海，工资涨了一倍。去年，她搬进昔日法租界，在绿树成荫、静谧迷人的街巷里租了一套大公寓。她从来都没有什么政治意识。

Dana 和 Angela 都参加了那次聚餐，四月开始全城居家隔离后，Dana 和 Angela 的丈夫一样，头几天测核酸就呈阳性。在短视频里看到启用没多久的方舱实况后，她变得极其忧虑；她给我打电话，哭得都喘不上气来了，说她不肯去。

但她所属的居委会和疾控中心不同意。他们让她收拾行李。但 Dana 用她的方式进行了抗争。她研究了其他人的做法。于是，她要求再做一次测试。然后再测一次。到最后，接驳车的司机打电话通知她十分钟内就能接上她，她又谎称自己还没收拾好，起码还要几小时。司机没辙了，“那我们明天再来接你。”说是这样说，但第二天他们并没有去接她。

她胆战心惊地开始阳性后的第二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很害怕。楼组的微信群开始对她恶语相向，她不得不退群，也因此放弃了团购的机会。她的室友因为她不去方舱而跟她翻脸。她完全被孤立了，变得压抑、焦虑、不服从，情绪始终在波动的循环中。她每天要给我打好几通电话，每次接起电话时，我都猜不到她当时的情绪如何。即使在同一通电话中，她也会从接受现实到否认一切，再变得愤怒，极力为自己辩护。

她对医药研究行业还是很了解的，所以知道自己如果能坚持到第二周结束，PCR 测试就很可能呈阴性。这倒不是说她肯定不用去方舱了，但至少意味着一线希望。难以置信的是，接驳巴士再也没来接她。居委会接受了她不测核酸的种种借口——痛经严重，或是仍在等待前一次的测试结果。等到她被迫再次测试时，距离她最初感染病毒已超过了两周。结果是阴性。又过了一周，他们拆除了装在她门口的监控设备——只要她开门，这套设备就会向居委会发送一条信息。

然而，伤害已经造成了。邻居们的尖刻，室友的敌意，整整两周的焦虑不定时发作，时时刻刻处在不确定性中。但这都是为了什么？只有一天，她有类似感冒的症状，然后就好了。她住的公寓楼里没有别人核酸呈阳性——甚至与她共用浴室和厨房的室友也没有。她没有殃及任何人，却被污名化了。现在，甚至在她感染新冠病毒七周之后，邻居们依然会避开她。但她不在意。她早就受够了。

虽然她以前没在国外生活过，但她心意已决，要离开中国。因有专业背景和技能，她算是亚洲医疗公司的理想人选——而且已经通过了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三轮面试。以前，Dana 从未想过要离开上海。如果她得到这份工作，今年夏末，她就会在新加坡了。

\*\*\*

Edward 是加拿大人。大约十年前，他来到中国当专业摄影师，已有了不错的声誉。他热爱中国，为了工作，始终在旅行。他的事业与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紧密牵连，还为不少大企业和科技公司拍摄过照片。

三月下旬，他本想逃去昆明。在机场办登机手续的队伍里排队时，前面只有两个人了，他的助手发来一条信息，说明昆明将对上海飞去的游客实施两周隔离政策，立即开始执行。也就是说，这个航班上的每一个人都将被隔离，无论他们是否预先知道；大多数人将在云南降落前得到这个消息。但 Edward 不想在昆明的酒店客房里隔离两个星期，所以他不排队了，转身离开，打车回家——从四月到现在，他就一直待在家里。对他来说，不出门 = 没收入。他现在没活儿可做了。

所以，他打算走。不是永远离开这里，他说，只是去加拿大待几个星期，看看家人，然后在美国和欧洲跑一跑，干些活儿，好歹要在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初回中国前挣到一点钱。他花了 9000 元买了一张去温哥华的单程票。

但他很矛盾。等他回到加拿大时，肯定会被问及一些有关在中国生活的问题，但现在，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势必隐含评判的味道。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解——为什么在上海，在居家隔离的封控状态里待了这么久？既然要走，他为什么不早点走？他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他赞同清零政策吗？

Edward 将在六月离开上海。

\*\*\*

Fiona 是东南亚人，已经在上海住了十多年。她在美食媒体工作，和供应商、餐馆的良好关系使她在封控期的日子过得极度舒适，坐拥鱼子酱、和牛、进口海鲜、还有一箱又一箱的葡萄酒。

她住在昔日法租界的老房子里，几周前，一楼和二楼的邻居都测出了阳性，被转送到了方舱。面对疾控中心人员，Fiona 据理力争：整个三层楼都是她家，而且她把前门关上了，还进行了消杀，她没有与任何共用浴室和厨房，所以没必要把她送到隔离酒店。她在阳台上吊了根绳子，把快递给她的食杂用品吊上去。紧张的拉锯战持续了几天，最后，疾控中心同意对该楼的其他区域进行消杀，任由她留在三楼家中。谁也说不准她会待多久。她的事业不大，与餐饮业息息相关，但偏偏这行前景堪忧，她已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似乎已经准备好带着积蓄回国了。

\*\*\*

Grant 是美籍华裔。他家很有钱，他不需要工作。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健身、拔草新餐馆上面。他已婚，有个女儿，但已与妻子分居；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女朋友。但是，Grant 嗜酒，在封控期禁足的所有朋友里，他熬过的苦日子几乎没人能比。

麻烦是这样开始的：他和女朋友都住在古北小区，小区很大，女朋友单独住一套公寓，但他发现她在封控期邀请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过来同住，她说那家伙只是个“朋友”，言下之意昭然若揭——她想有个秘密情人共度足不出户的日子。Grant 知道竟有此事，一怒之下罔顾小区防疫政策，冲过去与他女朋友——还有那家伙——当面

对峙。门一开，Grant 对准那家伙的腿就踹，接着把他扑倒在地，压在他身上，对准他的脸一顿胖揍。惊恐万分的女朋友赶忙把 Grant 从新情人身上拉下来，那家伙扬言说要去告 Grant。之后，Grant 就回家了。

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他迷失于酒精的麻痹。他最亲近的一个朋友要搬回欧洲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Grant 差一点就在最后一秒钟买张机票和他一起走。可他非但没走，还开始尝试与女朋友和好，两人都将隔离政策抛在脑后，到小区共用的地下停车场见面，坐在他的豪车里聊天。

那之后，我就没收到他的消息了。过了几星期，他才冒出来。“七天没喝，”他告诉我，“这么多年来，这是我没喝酒最长的时间。”Grant 是个爱走极端的人，所以决定采取最极端的强硬戒酒法——突然就滴酒不沾了。戒断反应让他痛苦不堪，最初的几天里，他无法入睡，无法进食，但他忍了，竟能一改平素的起床流程——把清酒或伏特加当早餐——并且坚持下来。他说，连他的心理医生都对他如此迅速地戒酒感到震惊。Grant 的家族企业在亚洲和北美都有分部和房地产，他很有钱，完全可以选择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定居，而且根本不用工作。对他来说，全城封闭俨如开启了压力锅，逼他往两个方向走入极端——积极的和消极的——而且谁也猜不到他今天、明天、下周或下个月会往哪个方向走。

但 Grant 并不傻，我想他很清楚——无论他选择在哪里生活，他的这些问题都会尾随而至。这些问题比封城更严重，虽然确实是封控带来的压力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不打算逃离。

\*\*\*

Heidi 的护照是香港的，其实她从小在上海长大，在国际学校上学，日常生活中基本都说英语。她正在职场换跑道，即将跳入科技领域。

就在四月封城前，Heidi 刚开始和 Greg 约会，所以决定封控的那几天住在一起——本来说好只有四天的。然后，五十天过去了，他们的感情关系还不错，但 Heidi 的身体出了问题：她长了一个巨大的血栓性外痔。

不仅痛得要死，还很危险，因为这种状况可能破裂并造成大量失血，通常的治疗方法就是做手术。她和医生商谈后，找了一家愿意做手术的私立医院——因为公立医院认为这种程度的失血不会危及生命，继而宣称这是“非必需”的手术。但是，私立医院的费用高达 35000 元，一共要去三趟医院，每一趟都要花 1200 元坐黑车，而且她没有医保。她不想问家人要 4 万块钱，也没法去价格较低的公立医院做手术，别无选择，只能干等。万一血栓破裂呢（或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会发生什么情况？她很害怕，就和邻居交代了实情，以便意外发生时能请他们帮忙。（Greg 的中文水平不足以胜任这个重任。）

可是，太疼了。她想试试别的公立医院。给几家医院打过电话后，她终于找到沪上最著名的某家医院，发现那家急诊室至少同意她前去问诊。于是，她走完整套充满官僚意味的流程，从居委会拿到了出门证，上周的某个夜里，她和 Greg 走出公寓，步行两公里到了医院。（她的状态不好，骑不了自行车。）

到了医院，她又遇到了阻挠。第一个挡住她的是医院门口的保安，他们没有正大光明的理由，但就是不让她进。她只能在门外等。最后，等到一个明显有生命危险的人被送来，保安为他们打开大门，她才尾随而入。

进了急诊室，她发现里面已设立了分诊站，每个站点都有护士为病人做初诊筛查，然后打电话告知不同科室的医生。Heidi 很尴尬，或许还有点叛逆心，或者两者都有，反正她不肯把病情的细节告诉护士，并要求亲自用电话与医生交谈。护士最终是让步了，但这样做并没有用。医生听完病情却告诉她，这种症状没有威胁到她的生命，医院现在不能为此安排手术。

没有别的选择了，她和 Greg 转身离去，步行两公里回了家。

\*\*\*

我。我是美国人，据说因封控而逃离上海的美国人最多。看完新闻、刷完社交媒体的我也有过沮丧的时候，封控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也让我很难受。多年前，我有过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也一直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保持警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还好。

白天，我想办法让自己有事可忙。我在网上冲浪，为写作找资料、做研究，也能找到些好玩的，也会靠油管视频来杀时间。能写的时候我就写，但经常写不出来，因为我始终在试图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以及我的朋友们经历的事，以及这些事对我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我会做饭。我以前就是当厨师的。但这些日子里我懒得做。我每周都吃好几次罐装豆子、保供大米，一天两顿。我住在徐汇区的一栋小楼里，老房子太小了，小到没有保安，小到没法团购。在将近 50 天的时间里，我只买过三次食杂，还把其中的大部分送给了那些食物断货的朋友。我靠库存活了下来——多年来，我在美式双门大冰箱中攒了好些罐头和冷冻食品。我知道，大部分人过得比我好。我的邻居们都会叫外卖，知道附近哪家餐馆偷偷地接外卖单。我只试过一次，靠着他们转发给我的一家意大利小餐馆的联系方式。吃了一个月自己做的饭后，我手捧两只热腾腾的披萨走回家的路上心想，这将是我此生吃到的最好吃的披萨，因为一个月没吃外食了，嗷嗷待哺的味蕾必将餐馆的滋味放大到极致。

我回到家，打开盒子，香味扑面而来，但我并不觉得饿。无论如何，我还是吃了。并没有烟花和音乐闪现出来。这只是相貌平凡的披萨，吃起来也一样平平如也。出于需要，我吃了三片——因为我没有备餐，也不想饿着肚子睡觉。第二天，我把剩下的都扔掉了。

在吃到披萨前的一个月里，我可没这么浪费，我很纳闷，为什么一夜之间我竟会把食物——而且是昂贵的餐馆里的食物——扔进垃圾桶？想到最后，我明白了：披萨是希望。代表世界恢复正常希望的，代表我不用再做一日三餐的希望，代表一切事

物恢复如初的希望，而改变已经开始了。为了享受披萨，我就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生存模式，放弃为了抑制对特定食物或特定活动的渴望——以免我沉迷其中、欲而不得乃至失心疯——而调整好的心态。我要把自己的世界缩小到公寓这么大。我需要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而不能去渴望我家里没有的东西。我并不需要那只比萨。它的存在让我浑身不自在。它让我想起了以前的生活。我必须把它扔掉。

我问我的中国朋友们是否食物充足，是否能去散步，刚刚团购了什么？他们却只是反问我：你要走了吗？问得好，因为现在外国人都会这样互相问。

要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我就是在说谎。我有一本蓝色封皮的美国护照。只要有必要，我就可以搭下一班飞机回去。但我在中国扎根了，就像我的许多朋友那样。我没法把那些根装进一只手提箱。

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特权的。我们离开时不会在机场被拦住，问我们是否有必要离沪。但也许我们也该接受这种质问。有必要走吗？这是萦绕在我们所有人心头的一个问题。大多数根基较浅的人已经走了。事到如今，想逃的人大多都走了。

剩下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对我们来说，取舍斟酌更复杂。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我们的记忆也在那里。

现在，我们必须好好想想：我们的未来也在哪里吗？



Christopher St. Cavish

美国作家，2005 年移居上海。他写美食，也写作为一名“局外人”的生活。

译者

于是

局外人

Christopher St. Cavish 以前是个厨师，他也是这样开始他在中国的生活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作家、编辑或者随便怎么称呼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他与他感兴趣的人交谈，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也写下了这个剧变中的国家不少变迁故事——直到他发现自己和中国的更多关联。



5月22日，日本东京，民众举行反对日美首脑会晤的抗议集会；文内图片由作者拍摄

## 非虚构

# 开门！东京警视厅！

##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世上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  
如何保护它”

半夜家门被警察敲响怎么办，在路上被警察盘问要注意些什么。朋友参加某种活动后被捕，你也被传唤到警察局，该不该去。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在你身上，但人生充满不可预测性，有些事情还是要事先理解，以免碰到了不知所措。日本有一本书叫《救援笔记》可以给你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这是一本没有书号的出版物。《救援笔记》出版于1969年，最近刚出第十次改版，它能够坚持五十三年之久，其背后原因很简单，总有人需要它。据东京一家独立书店“模索舍”介绍，该书就是半世纪一直以来的绝对畅销书，有时候一个月能卖出二三十本，尤其是在大规模游行前或在媒体报道一些法律改正消息之后。没有书号在日本不违法，只是意味着它是一种自主出版物，不在大型发行商的配书系统里，想要这种书籍你得知道哪里有卖，或者直接和出版方联系并进行邮购[1]。

《救援笔记》就如其副标题所言，是一本你在“被逮捕之前必读”的书。从第一章开始介绍被逮捕时的应对方案和刑事拘留期间的注意事项，第二章内容涉及到被起诉后的刑事手续，我认为第三章《对抗镇压》最硬核，详细介绍2017年日本参议院强行通过的《有组织犯罪处罚法》（通称：共谋罪法案）、面对学校或职场的有形无形镇压案例、日本公安警察侦查阶段的诱供或骗供等具体手段、面临警察搜身检查时的应对方式，以及参加游行时的注意事项等。第四部提及收容外国人入国管理局设施，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外界的协助方案，介绍在“外面”的亲朋好友如何帮助到“里面”的人。附录中有日本全国的拘留所和刑务所（监狱）的所在地和联系方式列表，也有各种书面资料范文，如选任律师申请书，以及警方进行抵押或没收个人财产时必须向市民所提示的许可证。《救援笔记》内容简短明了，一共120页，价格含税500日元（约合人民币27元），比一杯咖啡还要便宜。

读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记住在书中被多次提到的一个号码：“东京〇三，撒，够酷毅力一米偶意”。这是一种日本的文字游戏，利用一至十的读音来串起意思，便于记忆。“〇三”是东京的区域号，接下来的“撒（来吧）”与3的发音比较像，“够酷毅力一米偶意（入狱意味着很多）”就是5911301，共十位数字，串起来是东京一所“救援联络中心”的电话号码。至于这一组号码的用途，该中心的事务局长山中幸男（Yamanaka Yukio）解释道：

“比如你参加游行时被警方带走，当然我们生活中没参加游行也有被逮捕的可能性，根据日本国宪法有一个法律叫刑事诉讼法，保障每个人拥有申请律师的权利，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有聘请律师的权利，你没钱也不用担心，通过国选辩护人制度请来的律师是不收费的[2]。但这个制度分配来的律师对你的立场不一

定有足够的理解，而我们合作的律师对学生运动方面的知识相对比较丰富，有的律师就是以前参与过学生运动的[3]，现在他们的子女也当律师并跟我们合作。所以有时候还是透过我们请私选辩护人比较好。日本警察逮捕嫌疑人并进行讯问时间期限为四十八小时，其间他们会问你要请哪位律师，你是不能自己打电话给外界的，所以要告诉警察这一句话，‘本人选任救援联络中心指定的律师’，同时要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警察调查审问的四十八小时、送到检察院进行审查的二十四小时，然后是起诉之前的十到二十天的拘留，记住啊，被逮捕之后的这二十三天里千万不要慌张，要保持‘默秘’（缄默），进行任何解释对你是不利的，跟警察的随意聊天都不行，告诉对方刚才这句话和电话号码，然后等律师的介入才是保护你的合法权益的方式。”

### 01

#### “因为当了学生，所以参加了运动”

救援联络中心是一个民间组织，位于东京繁华区“新桥”（港区）一栋水泥杂居楼第五层、离车站走路两分钟即可到达。该组织目前共有四位成员、包括山中幸男在内，晚上的来电会转接到值班成员的手机，一接到警方的电话，他们为被逮捕的市民安排持有国家资格的律师。

“不过现在不像以前，真的需要安排律师的，疫情前的话每年顶多一百五十人，去年有五十，今年就没有几个了，前几天的游行（笔者：指冲绳回归日本五十周年之际，在冲绳、东京等地进行的反对美军基地的示威游行）中有三个人被抓，我们正在为他们安排律师。其他电话都是来咨询的，比如一个大学生深夜单独去散步，遇到警察的‘职务质问’（盘查），就急切忙乱地打电话过来问我该怎么办。其实这没什么的，我会跟他说，警察问你什么当如实回答即可，除非你携带毒品不会有什麼问题的。”

但这例子也说明，“够酷毅力一米偶意”的普及度之高。该中心接的电话不一定来自东京，从北海道到冲绳都有，有人把这十位数字留存在手机通讯录里，有人参加游行时把它写在手掌上，因为他们知道，在被捕之后的审问和拘留期间，它将是当你面对行使权力者时的唯一支撑，也是留给你机会与外界接触的通道。

今年五月某一天，我来到救援联络中心的事务所，有一位该中心成员正在打电话，向对方咨询驾驶证更新事宜：有有期徒刑中的某某先生，他的出狱时间没法赶上驾驶证更新期限，有没有办法给他安排更新的机会。该事务所的面积并不大，入门右手边是办公处，小小的空间被四张电脑桌和一堆资料占满。隔着一个大书架，事务所的左手边是和小厨房共享的接待处，放一张四五个人勉强挤得来的办公桌。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山中幸男气喘吁吁地走进来连忙给我道歉，说是上午有一场关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会议，大家讨论得非常热闹。得知这次是为中国媒体供稿用的采访，山中幸男感叹到：“中国呀，其实我学过一点中文。当时我们的大学有个老师叫竹内实[4]。”

山中幸男1949年生于东京，父母开一家杂货店卖香烟和小点心，店面在公交车站前，冰箱还没有普及，夏天在店里摆放一个大木盆，用井水拔瓶装可乐卖给客人。“当时的香烟是不带过滤嘴的，二十根一包三四十日元。很多客人买不起一整包，一根两根买来抽。你有没有看过《ALWAYS 三丁目的夕陽》，那就是我小时候的日子。不过这么说恐怕给人感觉有点伤感”，他眯起眼跟我说道。1964年东京奥运那年，他升入东京都立九段高中，复读一年后，于1968年升入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院。这段时间，日本全国各地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山中幸男与救援联络中心的偶遇以及以后并肩相伴的路线，几乎是在这个学生阶段已



《救援笔记》目录



《救援笔记》最新版本。改版之前的封面有漫画风格，那位插图师去世之后的封面设计变得更直接。  
救援联络中心事务局长山中幸男。现居于埼玉县，每天坐电车花一个多小时来到该中心。

经定下来的。

“我在复读的 1967 年，发生了阻止佐藤荣作首相（当时）访问美国的羽田事件 [5]，到大一那年又发生很多事，三月份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第一次被（学生）占领，‘阻止美军燃料桶’[6] 斗争是六月份，到十月份就是新宿斗争 [7]。新宿我也去看过，六七百名学生以‘骚乱罪’被警方抓起来。所以你问我为何参加学生运动，我只能说是因为时代，你升入大学，成为一个大学生，所以参加了学生运动。就这样。”

中山幸男在大学本科研究都市社会学，以调查的名义到日本各处贫民窟，如东京的山谷”或大阪的“金崎”并进行观察。“我认为城市的犯罪率之高，是各方面规划的不完善导致的，并不能完全归责于个人。但学生的时候并没有过这么明确的想法，这是后来在运动中遇到很多人、看到各种情况之后才明白过来的，”他谦虚地说。当时日本学生运动中有各种派系，比如日本民主青年同盟 [8]（略称民青）、日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革马）或三派全学联 [9]，据他的回忆当时的都立大学是民青派的天下，而他选择“全学共斗会议”（全共斗）[10]，是由无党派激进系的活动家和一般学生组成的全国学生统一组织。

若换到现在的日本，这些青年活动家的斗争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恐怖分子的极端暴行，但当时有不少市民认为他们是公然反抗权力和不正之风的英雄，也会帮助学生运动家。中山幸男说，在这些表达共情的市民中，家庭主妇起的作用并不小：“被抓起来的学生真的很多，有时候一天就有六七百个人，一个拘留所是不够的，警方进行分散拘留”，有的学生被安排到埼玉县那么远。我们（救援活动人士）打电话给警方，他们会告知公安警察当日抓来的一共有几个、这些人被带到哪里的拘留所。我们把这个信息转到拘留所附近的市民，比如说‘杉并警察署有一个学生，拘留号码为五’，当地市民接到这则信息就带日用品去探访。”这一系列的应急救援活动在学生运动中被称为“救对”（救援对策），据说当时这样的市民组织在东京中心二十三区都有，全国也有近一百 [11]。

## 02

### 监狱订阅排第一

救援联络中心设立于 1969 年，中心人物是一对学术夫妻——水户严（Mito Iwao）与水户喜世子（Mito Kiyoko），初版《救援笔记》也几乎同时问世。水户严是 1933 年出生的核物理学家兼市民活动家，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曾担任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副教授。水户喜世子比他小三岁，1954 年升入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却在三年级办自愿退学，次年考上东京理科大学物理学科，1960 年毕业同时与水户严结婚，并就任于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文部教官助手 [12]。中山幸男处于复读期间的 1967 年 10 月 8 日，反对越南战争的左派人士在羽田机场与警察发生冲突（即羽田事件），水户严与妻子携手组织“羽田 10.8 救援会”并帮助被捕的学生们，亲自自带日用品探监或去找律师。

水户夫妻善于沟通与协调，又持有广泛的人脉，能够把学生、教授或律师等学术界以及一般市民的三方联合起来、并肩参与救对活动。后来反战和平运动在日本各地风起云涌，但一般家庭主妇白天要做家务看小孩、有点忙不过来，各地组织经常面临人手不足的情况。救援联络中心在其中担负起把握信息、分配人员等对活动的核心位置，水户喜世子担任第一代事务所长，据她的回忆 [13]，该中心安排的嫌疑人与辩护人的见面在前三年（1969–1972）达到 14000 次。该中心事务所从这个创办时期开始就在新桥，电话号码“够酷毅力一米偶意”也没变，只是在九十年代东京中心地区的电话号码多了一个数位，于是在前面加了“3”。

至于水户严，他设立救援联络中心之后继续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路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核能发展，水户严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尤其是在茨城县东海核电站计划的反对运动中，他从物理学者的立场帮助当地市民准备起诉所需材料，故此有人叫他“行动的科学家”。1986 年 12 月他五十三岁时与二十四岁双胞胎儿子 [14] 一起攀登“劍岳”（位于富山县，标高 2999 米），并不幸遇难。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与两位前程似锦的物理专业学生，这父子三人之死引起了媒体的瞩目，至今还有人怀疑背后另有原因。水户喜世子在此之后离开救对活动，但在 2011 年发生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她时隔二十五年回到人们视野中，至今继续开展反核能运动 [15]。

中山幸男与救援联络中心的接触大约在 1972 年。1968 年升入大学的他，按道理来说在七十年代初期应该可以出社会，但实际上他一共花了八年才结束学业，主要原因是学校没有开课，此外他自己忙于学生运动。“那时候公立大学的学费一年 15000 日元，是父母帮我付的。中间四年我申请到每月 5000 日元的奖学金，实际上是一种贷款，毕业之后还要还百分之六十。当时忙什么呢，主要是都立大学全共斗的救对活动，也会去救援联络中心帮忙接电话、探望被拘留的学生们。救援联络中心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毕业之后我一边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一边来这里做事。”救援联络中心的运作经费，创办当时主要来自律师或水户严社交圈的捐款，也有部分成员各自负担。现在的收入来源除了捐款之外，还有机关报《救援》的订阅费（4500 日元 / 年）和会员费（每月 1000 日元起）。“我们也在面临高龄化问题，现在的会员人数大约在 150 人左右，比以前少很多”，中山幸男说道。

《救援》五月刊上有记载，该中心 2022 年 4 月的收入总额为 510491 日元，支出总额为 699287 日元，等于是这个月有将近人民币一万元的亏损，并由上月的滚存结余来吸收。支出中占最大比率的是《救援》的印刷费二十万日元，其次是房租约十九万日元，在收入项目中捐款（258991 日元）占比最大，其次为《救援》订阅收入（94000 日元）和会员费（59000 日元），看来该组织的经济压力并不少。《救援》目前的发行量为 2000 部，其中 600 部每月邮寄给各地监狱里的订阅者，“在监狱里他们订阅的刊物中，我们的这个数字是最多的，”中山幸男有些骄傲地跟我说。



高举《毛泽东语录》进行街头宣传的日本左翼青年。出自《人民画报》1968 年第 4 期。



关于水户喜世子参加反核运动的《每日新闻》报道（2012 年 9 月 18 日），该报道中有介绍 1986 年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际水户严接受采访时的言论，他当时严厉警告，类似的事情在日本也会发生。（图片出自《图书馆新闻》2013 年 4 月 13 日号）



现在还是有人举办各种游行，但其氛围比上世纪 80 年代轻松许多。图为今年 5 月在东京杉并区进行的抗议游行，当地年轻人反对 JR 高圆寺站周围的大规模游行情景，警方镇压示威现场并使用“毒气弹”。

## 03

### 个人主义和救援活动

走过半个世纪，人们对救援联络中心的需求和过去不一样，对政治运动的看法和五六十年前相比也迥然不同。一个转折点就在 1972 年的浅间山庄绑架事件 [16]，它暴露出了“左翼青年”另一个面貌，日本市民发现一个组织的理想何等崇高，也无法抵抗其中成员思想的极端化并导致严重后果，当时救援联络中心的参与者也纷纷来电来函，表示退出“救对”活动的意愿。人们不再把理想托付给青年人，当代青年也对政治运动的意义感到怀疑和失望，之后更加倾向于带有自虐情绪的个人主义。2011 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电站事故确实推动了公民政治意识的复苏，反对使用核能的抗议浪潮蔓延至日本各地。接下来日本内阁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2014）、《安全保障关联法案》（2015）以及“共谋罪法案”（2017），对这些重要政治案件都有过相当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没能引起广范围的共鸣，六七十年代的“老左翼”和年轻社会运动家之间始终无法破除隔阂、携手共进。

据日本内阁府最新调查 [17]，现在日本年轻一代（13–29 岁）的政治意识并不强，远不如欧美韩各地区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的政治很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的日本年轻人占 43.5%，在调查对象的七个国家中最低，反而面向政治时的无力感比较明显，在“为了更好的未来，我认为自己要主动地去参与问题解决路径”、“作为扶持国家未来的年轻人，我要积极地参与政策决定过程”、“若自己参与政治，我认为眼前的社会问题可能会产生变化”等项目中，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回答“否”，六成以上的日本年轻人认为“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能影响到政府的决定”，其占比在其他国家年轻人的回答中最高。

但救援联络中心坚持当时的两大原则，依然持续运营，五位成员承担志愿服务，每个月花一大笔钱印刷机关报，每隔几年推出《救援笔记》改版。问他这个动力到底来自何处，中山幸男回道说：

“确实，在一个抗议游行中被抓好几百个人那种情况，现在不太会发生。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完成了所有任务，因为世上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如何保护它。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救对对象从小范围的伙伴扩大到其他嫌疑人，尤其是公安警察说的‘潜在违法案件’的嫌疑人。其实我们早期就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当年被逮捕的运动家在被拘留期间发现，在那里还有其他人，比如一般刑事案件的嫌疑人、被判死刑的犯人、替人背黑锅进监狱的、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逮捕的，他们更需要别人的帮助。活动家自己本身还有点知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因为

主张自己该有的权利而被抓起来的，如何和警方的沟通、向外界求救，知道的也比较多。但别人不一定有这种事先准备，既然如此，救援联络中心也不能束手旁观。现在出版《救援笔记》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日本有这样的法律、拥有的权利有哪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考虑太多法律或宪法的存在，这就是正常状态，但一旦遇到必须意识到其需要时、尤其是当权利的拥有者开始滥用某种权利时，反而不知所措并容易被控制。所以知识还是很重要。我们的机关报《救援》也有助于促进在监狱里受委屈的人之间的连带关系。”

山中幸男接着说起《救援笔记》读者群的一个变化：

“救援联络中心刚设立的那几年，大部分的救援对象是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救援笔记》也是为了帮助政治斗争人士而出版的，但这个目标读者群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明显少很多。听说现在的《救援笔记》读者中有一群人是吸食大麻的，他们拿这本书来研究被逮捕之后的所谓对策（笑）。与学生运动相关的‘救对’和其他中心成员都比较熟悉，也能找到适合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律师，但请到这些私选辩护人至少要六十万日元，一般由他所属的政治组织成员一起分担。而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大不一样，他们一般没有所谓的伙伴或朋友，是在社会中比较孤立的存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所谓犯罪、包括刑事案件在内，我认为是一种社会病理现象，不应该把相关责任全归于个人。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尽量聆听对方的话，只要没有被法官宣布《接见禁止令》（笔者注：指禁止嫌疑人除了律师之外的人见面的指令）我就去拘留所看望他们。我会跟他们说明，我们中心介绍的（私选）辩护人还是要付费的，然后建议他们利用国选辩护人制度。现在国选辩护人的总体水平比过去提升不少。”

## 04

### 作为左翼，相信政治

《救援笔记》上明写救援联络中心的二大原则，从创办当年一直没变：第一，国家权利对基本人权的侵害，哪怕只对一个人民的，皆视为对全人民的镇压。第二，面向国家权力的镇压行为，不管牺牲者的思想信条或政治立场，都应该进行救援活动。我在东京一家图书馆翻到《最易懂的极左·右翼·日本共产党用语集》[18]，是警察人员参加晋升考试时常用的参考书之一，该书“极左”项目中可见“救援联络中心”一词，三百多个文字把它介绍为“由极左各派来利用”的地方。我问山中幸男对“极左”这个头衔有何感受，他淡定自若地表示：“也没错，别人叫什么就让他们叫什么。但我想请你明白一点，我对社会没有抛弃希望的，也相信政治，尤其是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

在过去几十年，山中幸男有几件事件参与其解决方案的，就如 1970 年的淀号事件。日本赤军（共産主義者同盟赤軍派）的九名成员把日航客机“淀”号劫持到朝鲜，其中已有三人死亡，二人潜回日本后被捕，仍有四人留在朝鲜。山中幸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赴朝鲜共有数十次，并参与这些成员与其子女的归国请求活动，其中二十名子女在 2001 年至 2009 年之间成功办理归国手续。

“早在七十年代有很多年轻人离开了学生运动，这是个人选择，我也没意见。淀号事件也好赤军也好，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历史，他们认为这和日常生活根本不沾边。那我为什么对这些还有些固执呢，这是为了总括，是个人的总括。”

从他嘴里出来“总括”（sōkatsu）一词，让我有些震撼。这是曾经在日本新左翼运动中的惯常用语，词义相当于中文的“总结”，但日文的“总括”还有另一种意思，指自我批评或在某个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批评。这个单词我们现在很少用，所以一听就自然会想到浅间山庄事件，当时联合赤军十二名成员在其他成员的暴力之下丧生，也可以说是内部“总括”的结果。山中幸男看到我的脸色破颜一笑，说不是这个意思，换另一个说法跟我解释。

“也可以说我自己感到对那段历史有一种责任。大部分的日本人认为学生运动都彻底结束了，是只存在于书上或电影里的事。但实际上当时参加运动的人都还活着，一小部分的人还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环境里，比如淀号事件，赤军派成员到朝鲜后生的二十个孩子，说是孩子但已经到中年时期了，他们现在回到日本继续生活，而且



采访中我们谈及各地防疫政策之不同。山中幸男从书包里拿出《关于新宪法》，1947 年施行新宪法之际日本文部省发表的文章，现在收录于岩波现代文库系列。“第 25 条规定了基本人权的生存权，同时说到国家的责任，它负责国民生活面相关的公众卫生。有的城市好像采取了完全控制的措施，有的国家采用极为自由的态度，而我认为日本目前采用的是处于这两者中间”。



也有人不时地打电话进来，这个月的山中先生忙 新版《救援笔记》插图。

还有四名成员还在平壤，听说那里的待遇不错，但他们一直表示希望回国。再比如东亚反日武装战线[19]，其中一个成员叫黑川芳正，比我大一岁，也是都立大学的学生，参加中核派之后因 1975 年的爆炸事件被判无期徒刑，现在还在宫城刑务所里。你能说这一切都结束了吗，我不这么认为。谁都不能选择自己要活在哪个时代，这是偶然的产物，我们只能接受眼前所进行的一切，同时也负责任。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开的那家店，我就学会了这种态度，你今天遇到什么客人发生什么事，其实没有太多必然性的，历史和社会也一样。我今年七十三岁，很可能没法看到所谓的结局，不管怎样，我会尽力的。”

有一则新闻，也在证明那时代“还没结束”。今年 5 月 28 日，曾经的日本赤军领袖重信房子将服刑期满被释放，进行本次采访时也有两位日媒记者来到救援联络中心，他们想知道山中幸男对“重信房子出狱”这件事的看法，以及出狱当天是否会开记者会。重信房子生于 1945 年，在明治大学在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随着日本赤军派的衰落去了阿拉伯，担任赤军的首领，因多次引起恐怖袭击，她在潜伏于大阪的 2000 年被逮捕并被判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至于重信房子出狱之后的想法如何，其实已经有几个媒体介绍过她在监狱里说的话，被释放之后只希望过一个安宁的生活。而山中幸男面向穿着整齐的媒体记者，调皮地抿嘴一笑说：“我个人比较期待她以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应该有个想法的。”这与年轻男子记者极为困惑的表情产生明显的对比。

#### 受访者简介：

山中幸男（Yamanaka Yukio），1949 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 1968 年升入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现任救援联络中心事务局长。救援联络中心设立于 1969 年，2006 年获第 18 届多田稻子反权利人权奖，2007 年获第 21 届东京律师会人权奖。救援联络中心官网：<https://kyuen.jp>

[1] 也有部分人，尤其是不想告诉别人自己住处的购买者，会通过一般书店订购该书。

[2] 日本刑事诉讼法成立于 1948 年。山中幸男这部分的谈话内容指的是其法律第四章（关于辩护以及补佐）第三十条和第三十六条内容。

[3] 其中最著名的律师是弘中惇一郎（1945），1968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1970 年登录为律师。他一开始为反战运动中被逮捕的学生进行辩护。曾经打赢过社会瞩目的几个大案件，被誉为“无罪辩护人”。

[4] 竹内实（Takeuchi Minoru，1923-2013）：中国文学暨现代中国社会研究者。经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院。曾担任过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立命馆大学教授以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5] 1967 年（昭和 42 年）日本左派人士与警察在东京羽田机场发生冲突的事件。分别于 10 月 8 日与 11 月 12 日，两千多个学生堵截前往羽田机场的高速公路，要阻止佐藤荣作（当时的首相）访问南越和美国，借此反对越南战争。

[6] 1967 年在东京新宿站发生美军航空用燃料运输列车发生冲突事件，起因为类似的故事曾经也发生过、威胁市民生活，另一方面这些美军燃料是用来支援越南战争的，后来“阻止美军燃料桶”成为新左翼派主导的反战运动中的要求之一。

[7] 指 1968 年 10 月 21 日在东京发生的暴动事件，由新左翼派主导，约有 2000 人集合到新宿站并与警方产生冲突，共有 743 人被捕。

[8] 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是日本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以 1923 年组织的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为原型，二战后改名为日本青年共产同盟，后来又改为日本民主青年团，从 1956 年至今使用现在的名称，略称民青。民青是以 15-25 岁的青年自愿参加的日本全国组织，也是日本共产党系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全学联）的组织母体。

[9] 由思想激进的三派组成，包括主张发动群众斗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略称：中核派）、隶属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略称共产同、ブント /Bund）的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略称：社学同）诸派以及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略称：社青同）解放派。

[10] 在 1968-1969 年之间的学生运动最活跃的团体，略称“全共斗”。用和制英文别称为“non-sec”、“non + sect + radical”（无党激进派）的缩写。

[11] 这些数字出于《水戸喜世子·原救援联络中心事务局长专访》（采访者：作家 小嵐九八郎），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3 日《图书新闻》。

[12] 指教授。国立大学隶属于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时的职称。根据 2003 年国立大学法人法，2004 年全国 99 所国立大学重新被组织为 89 所法人并进行自主运营，“文部教官”的职称从此消失。

[13] 出处同注 11。

[14] 水戸夫妻的双胞胎儿子共生是京都大学硕士课程学生，共生是大阪大学本科生。该夫妻还育有一位女儿。

[15]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水戸喜世子在江苏省建东学院担任外籍日语教授。出处：支持“儿童被爆裁判”之会西日本代表官网（2015 年 6 月 9 日页面）

[16] 指 1972 年 2 月在河合乐器制造公司的保养所“浅间山庄”（长野县轻井泽町）发生的绑架事件，五名日本联合赤军（新左翼的其中一个分支组织）成员胁持山庄管理人的妻子作人质共十天。当时来到山上现场进行报道的媒体人数到达 1200 多，还有不少围观的民众。后来被发现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以“总括”之名清除了十二名同伴。

[17] 出自《关于我国与海外各国年轻人意识形态的调查》（2018 年度），调查对象为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瑞典等七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抽样数为 1000。

[18] 《最易懂的极左·右翼·日本共产党用语集》（五订版）的作者为警备研究会，2017 年由立花书房出版。ISBN:978-4803715415

[19]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是反政府主义组织，主张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以各种革命手段（如安下爆弹等）试图颠覆日本政府与大企业。

### 吉井忍（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场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2008年5月16日，震后的北川中学新校区遗址。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非虚构

# 汶川地震后读北川县志： 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

熊景明 | 小鸟文摘

我们以何种方式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  
多少被践踏的生命？

一座座刀削斧劈般的山峰，陡峭险峻，湍急的涧水溪流从山间奔出，汇流成川。川边狭长的谷地上人烟稠密，白云深处亦住有人家。百姓生计之艰难，不待言说，他们在地动山摇之后，却引起举世震撼；大灾大难中表现出的勇气，面对伤逝的镇定，劫后余生的达观，令人感动不已。爱和善意在伤痕累累的土地上升华，让我们在人性光辉之中，看到民族的希望。

北川中学五层教学楼轰然倒下，校长刘亚春组织及时逃出来的师生救人。他向从废墟下传出呼救的同学大喊，“不要抵抗，保存体力，等待救援”。此刻，他的儿子压在附近另一所教学楼下。事后凤凰卫视的陈晓楠问起他死去的独子，他说：“他的成绩很好，最大的愿望是考取香港中文大学。我和他有个约定，只要他考得上，我会全力支持，但要他永远不回来”。一位姓宋的物理老师，失去深爱的学生，也失去了他的妻子、儿子。“我不想当教师了，还得活下去，因为有老母亲在……”音乐老师地震中失去的女儿，是北川中学的优秀学生，15岁，1.7米高，会弹钢琴，活泼美丽，5月12号上午刚刚拿到国家奥林匹克英语三等奖。许多学生对他说：“老师，你要记着，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一个额头上贴着纱布，满脸稚气的高一学生，讲述他怎样和被困的同学一道唱班歌，彼此打气，唱周华健的《朋友》。他设法救当时被压在水泥板下的物理老师，“找一个支点”，老师对他说。他最后成功救出了老师，“如果我救不了他，今后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老师像你们的父母一样重要吗？”，“是的，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和我们在一起”。校长、教师都很年轻。从一位老师博客上，看到地震前几天学校集体运动游戏的照片，师生亲密的关系是在大城市中学不能想象的。地震让我们见识了这些北川出色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学生性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职责。一位教师用肩膀顶住跨塌的门槛，让三十多学生得以逃命。面对记者、镜头，北川中学的师生都没有豪言壮语。回顾不堪的两周，校长说，“开初是大悲大难，是痛苦，也是坚强和勇气；后来就是一个字：爱”。“北川中学学会站起来”，接着，出乎预料地，他告劝准备高考的同学道：“好好考，考出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回来，心里有北川就行了”。

地震后的第十天，“北川城最后的拉网式搜救未发现幸存者，救援部队陆续撤出，残存建筑将爆破掩埋，这座建县1400多年的小城即将彻底消失”[1]。感慨之余，翻开《北川县志》，这个隐藏在重重青山后的小县，曾经历过如此之多的罹难……

## 汉番之争

连绵的高山峻岭形成川西平原的天然屏障，“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或为逃避战乱，

或寻找桃花源，南来北往的人躲进林深更深处，在此安身。自古以来，北川是羌人和藏人聚居地，秦汉之际，西北的羌人南下至此；唐初，大批吐蕃留居繁衍，并相继占领了羌人的地盘。后来，羌人和吐蕃在强大的镇压者，汉人的官兵面前，结成联盟。汉番之间大小规模的武力斗争从公元8世纪连续到15世纪。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官方大规模围剿吐蕃的战役在唐贞元十九年（803）。为防备少数民族武装攻击县城，1118年，北宋在此地筑了九个军事碉堡。历史记载的重要冲突包括：

1460年，羌番攻劫石泉。

1476年，“番民又起事”。朝廷用兵余二万，“先后破灭五十二寨，贼魁皆歼。余一百五十寨悉献马纳款，诸番尽平”。

1517年，土官节贵纠合十二寨生熟番数千人，攻坝底堡，毁四山民居百余，男妇死者无算。这次进攻打退后不到两年，“羌番又来犯，官军招募村民精甲八百反击”，“所过碉寨尽毁之，斩级八十有奇”。

到十六世纪中，少数民族对汉人聚居区的滋扰和官方对民族的无情镇压，以官方军事压倒优势和政策调整告终。最关键的征剿在1547年。官方出动精兵九千，分三路进兵，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其余逐北坠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殚记”，“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获马、牛、器戒，储积各万计”。碉房即羌人和吐蕃的民居。这次征剿称为走马岭一战，“使草番受到毁灭性打击，完全丧失反抗能力”。此后，明军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番民便相继归附成为收知县管理的“熟番”。

归顺并不罢休，武力制服后，开始推行强行汉化，对投顺的番民，地方官员首先要求他们“变易其姓，从习汉仪”，实行强制的汉化措施，令少数民族“渐与汉民一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北川，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七万八千多人中，只有59人申报为羌人，1698人为藏人。“1981年以后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羌、藏族群众陆续恢复和改正其民族成分，羌、藏族人口迅速增加，1987年，羌人超过五万，占将近三分之一人口，藏人3170。从公元803年到1547年，七百多年的厮杀，血腥镇压，是以民族大义的名义，以天朝的名义，生命不足惜。名义的后面也许是争夺地盘，对非我族类斩尽杀绝保证了自身的安全。那个时代人类的野蛮，反映在世界许多地方民族之间、民族内部无情的争斗和屠杀之中，也反映在北川的刀光剑影之中。”“坠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殚记”，是令胜利者何其骄傲的成就。现有的记录，都是汉人所书，无法听到羌人和吐蕃的记述和讲述。

17世纪中叶，进入北美的白种人和印地安人在你死我活的拼斗时，中国的文明推进了一步，改土归流在北川推行。“二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强者的横蛮，弱者的无奈，与今天民族平等，保护多元文化的共识，背道而驰，但最起码保住了那个时代多少人的性命。君不见，三百多年后，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自1988年1月起北川按少数民族待遇，政策上给予优惠”[2]。

## 革命根据地

1795年有人口记录以来，北川的人口变化大起大落。曾经在十七年间，从四万多增加到八万多，据说是外地来了大量拓荒者。到1912年，又回落到四万六；四年后再神奇地高达近12万。人口大变动的后面是兵荒马乱，是饥荒，是流离失所。1935到1936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县志中到可以看出那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代价。1935年，北川人口不过五万，红军来的四个月，驻军数万，过境的军队一共八万。这么多人的补给哪里来？先是“打浮财”，没收“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财物。按当地人记忆，陈家坝乡三个村庄共63户人家，就有8户被定为“土豪劣绅”。“共没收粮食三万公斤，肥猪三头，铜元八夹背半，衣物、用具若干。铜元交红军；肥猪当即宰杀，用于庆贺老杨村苏维埃成立”。

就算将八分之一的人家定为土豪劣绅，这穷乡僻壤也没有多少“浮财”。接下去收集物资的运动称为“打粮”，“各级苏维埃组织游击队打集（收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以支援红军。地主豪绅埋藏于地下和转移至深山岩洞的粮食、猪膘也被挖出了。苏维埃号召群众向红军捐送粮、菜和猪、牛、羊。”存粮用尽后，开始“打嫩粮”。山区农民一年种两季，春天种豆，待熟透、晒干，当主粮食用。打嫩粮的意思是不等豆熟，收获青豆来救急：“各地先打地主、豪绅地里的嫩粮，次打佃户该交租的部分，再打农民地里的。所打粮食，全部送交红军”。打嫩粮的后果是断了农民一季以上的口粮。青壮年则负责替红军背运物资。“红军离境后，大批群众为红军运送粮食、武器、辎重。全县当时男劳力出动三千多人，随红军西去未归者2000余人。陈家坝一个运输队共50人，为红军背运盐、布等物资，其后返回的仅10余人。县志叙述道：“途中处处悬崖陡坡，深涧密林，负重行走，异常艰辛”。看过北川地震的电视观众，多少明白个中艰险。当地民工还担负修路、架桥等战时工程。全县还有1500多人参军，县志上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共1097名。

红军留下的文告有的保存至今，包括一份布告“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

1. 参加红军分好田好地；
2. 参加红军有人代耕；
3. 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
4. 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发财人牛马；
5. 参加红军人人尊敬拥护；
6. 参加红军家属受苏维埃优待；
7. 参加红军子孙孙不出款子；
8. 参加红军保护穷人自己利益；
9. 参加红军穿吃不穷；
10. 参加红军穷人坐天下（207页）。

红军1935年4月2日入境，7月23日撤离，在北川共103天。“红军为阻止川军追击，烧掉北川峡谷内地几座蔑索桥，烧毁了龙凤场和鸳鸯树的木及运走的粮食，还烧毁了治城，漩坪、桂溪、龙凤、贯岭、都坝。小坝，片口、坝地、白什等处接房即沿途一些大院落”。渡河的蔑索桥被毁，断了进出北川的通路。被烧毁的治城即北川县城，建于唐贞观八年（634页），元末毁于战乱；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

重修，到民国 16 年（1927）城内建“模范马路”，1932 年，城区有 400 户人家，茶、旅、商店 30 多户。县志的编撰者带着怎样的心情，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记录这段历史：“民国 24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时房屋被焚毁殆尽”（609 页，本节其余引用段落出自 190 至 211 页）。

北川建县于北周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北川和汶川都称大禹在本县出生，唐代以前，北川名胜石纽山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大禹诞辰，均在禹庙前祭奠。明嘉靖四十年，1561 年，立禹碑，高 2.55 米，宽 1.55 米。上刻蝌蚪文 77 字“此系大禹所书，千古奇字县志特别强调了石纽山禹庙，千百年来每年六月六日大禹诞辰祭奠从未间断，是北川人身份认同的标志。1935 年禹庙被毁，县志编撰者只提到这一年红军在禹庙的石碑上刻标语，只字未提禹庙被何人所毁（699 页）。

县志说，“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一个红军接待站，昼夜不停为红军抄油米，两个多月炒制数万公斤，供红军携带用，孕妇也捐出自己准备坐月子用的酒酿等。

当时红军准备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吃住在此之外，在北川开展翻天覆地的革命，迅速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对地主富农，商人无情打击。四个月后，民间和官方储存的粮食早被大批军人吃完，夏收作物为待成熟就被“打嫩青”打掉了；青壮年去为红军运输物资，修路，三分之二人一去不返，田园荒芜。这时，川军来了，北川这个共匪根据地，成为镇压的对象，联合过去几个月被蹂躏的富人，组织“清共队”，开始血腥镇压。对各级苏维埃当干部的，这时被当作共匪处置，乃至枪杀。还有跟着红军去抢浮财的，这时遭殃也不奇怪。川军“烧杀奸淫，估吃罢赔，劫物拉夫”，恶行累累。不过三个月，分掉的土地又物归原主，耕种的季节却误了。这一年的饥荒，正像十八年后另一次饥荒，是人祸所致。1936 年，北川县长冯康写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县内人口骤降，出现若干死绝户、无人村”。

1935 年夏秋，灾荒的同时，霍乱、痢疾流行，“尸横遍地，收葬无人，……由县府捐资造万人坑二处，共掩埋城周围骸骨 300 余具”（672 页）。35 到 36 年，北川人口减少一半，这一页惨烈的历史，至今只能猜测个大概。地震存活者的哭声，令人联想到 70 多年前数万家破人亡的北川人。

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打天下，人道性命太不足道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为革命而牺牲性命是烈士，阻挡革命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须迁灭之。进入北川的红四方面军，听命于张国焘，他的左倾，打着时代的烙印，不过更为过火、激进。

## 打倒地主富农

从县志记载看，红军来到之前的二十多年，北川已经渐渐走向由乱到治之路。民国建立之初，这里仍处军阀势力之下，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十多年后，地方政府似乎开始有所为，以工代赈，整修道路，救灾。1926 年，县里设了图书馆，平民读书处；1927 年，县农会、工会、商会相继成立。这一年，首部《北川县志》开始编撰，到 1932 年印制完成。1928 年除原来的三所小学外，设第一女子小学校。到 1949 年有 200 家作坊和手工企业（1971 年，全县也仅有工业企业 85 家，产值占全县社会总产值的 9.6%）。从民国 24 年的“六年禁烟规划”说起，到民国 31 年“五家连环互保”制度，政府及民间禁烟的努力未曾间断。1948 年，县财政收入的 11 亿元中（法币），大约 2 亿用于行政，4 亿用于教育，近 6 千万用于卫生和社会救济（568 页）。

1950 年一月，解放军进入北川，三月即爆发一场全县性的武装暴乱，各地抵抗者的队伍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地方农民鲜见的强烈反抗，不知是否和 15 年前红军来的记忆有关。最终“两次平定暴乱，深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紧接着的清匪运动，枪决 17 人，反霸运动判处恶霸 53 人。然后就是减租退押，按当时颁布的条例，通过诉苦、算账启发阶级觉悟。并成立工作团，吸收农民积极分子 260 人参加，政府每月发给大米 110 斤，称“百斤米干部”（343 页）。当时米价每 100 斤约 6 元，而人均收入每年不到 60 元，故这些乡村积极分子得到的补贴也很可观。

减租退押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同时开展反霸斗争，“采取大会诉苦斗争，小会清算追缴，对个别罪大恶极这斗争追缴后判处死刑，打击地主阶级的威风”，也“明确了租佃关系”，按二五减租、三五衡量的政策定出减租方案。最重要的是成立了各级农民自治组织，不少地主富农还被村民推选为农协委员。当时，对大多数地富还客客气气地开座谈会，讲明政策，结果都“自愿”退出粮食、黄金、银元和各种财物。县志均有记载：耕牛五头、生猪 3 头，衣物 426 件（52 页）。出乎意料的是，当一个个地主富农乖乖地交出财物，接受新的租佃条件，推荐了乡长村长，成立了农协，各地村民开庆祝大会，庆祝翻身，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时，真正的土地改革“暴风骤雨”才开始。

县志记录了土地改革的细节。1951 年 2 月，162 个工作队进入 162 个村庄。头 25 天发动群众，建立贫雇农代表会，行使村行政权力；第二个 20 天划成分，从农协组织中清除地主、富农。工作组的领导下，这些干部中清除了 27% 的地富分子共 981 人。即平均每个村庄曾经有六名地富分子去年被村民推举作为农协干部。第三步就干脆地没收、征收了地主、富农土地、财物。“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 6525.5 公顷（占他们原有土地的 96%），粮食 3437.7 石，耕牛 776 头，农具 2974 件，家具衣物 11223 件。第三步 32 天，“分配胜利果实”，每人分得 3、4 公顷土地，地主富农分割的是坏地。山区农村好田与坏地的产量差别数倍，而且一般越坏的地离村子越远。不过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令土改失去意义：或者说，对当局而言，土改动员了群众，取得大多数民心，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3] 1952 年 4 月 8 日，土地从收回来到重新分配的工作便完成了。剩下两个藏族村的土改推到 55 年 10 月，也在短短三个月内大功告成。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54 页，614 页）。县志 391 页则说“1952 年土改结束时，全县农村共有房屋 12300 间，户平不足一间，其中草房近半”。

县内一万三千多户人家中，家境比较富裕的有 1541 户，占 11.8%，他们拥有的耕地占 42.5%，不到平均占地的 4 倍。按许多年后的说法，这些富裕或者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可被称为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中有的对租户刻薄，甚至贪婪而不近人情，但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大都是世代辛勤耕作，慢慢积累所致。尤其是“富农”，多数人属于省吃俭用、老实巴交的农民。出租土地，并没有触犯法律，他们的主要罪行就是比邻人富有。如果中国的土地改革在今天进行，一定不会再用“消灭一个阶级”，将原有的土地主人定罪，强行夺走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种“残酷斗争”方式。县志完全没有记录北川如何斗争地主富农，至今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土改的研究也极少，不知道全国被斗死的地主富农有多少。被划为地主、富农分子，不仅只土地、房屋、财产被没收，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孙辈从此沦为备受歧视的异类，失去许多公民权利，低头做人，沦为几乎未曾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

北川土改“划”了地主分子 611 人，富农分子 466 人，加上以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揪出的反革命分子 84 人，1957 年反右运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到 1979 年，对全县 1851 名五类分子进行清理，1777 人恢复社员身份，其余 74 人，于 1983 年全部摘帽，解除监督改造（287—288 页）。北川薄弱的私营工商业，也在 1953 年到 1957 年间，用比农村相对温和的手段收回国有（56 页）。

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在北川，土地在 17 年内以强夺的手段三易其主，在乡亲邻里之间，造成多少新仇旧恨？北川历来土匪为患，乡民曾组织自卫队抗匪。打家劫舍的土匪行径为人不齿，而今却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夺取他人财产、土地，将之赶出家门，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都成为正当。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对之产生疑问是“阶级觉悟低”，对之不赞同是“阶级立场问题”；被逼害的一方，则毫无反抗之力。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在夺取政权后，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义下，摧枯拉朽；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个人的生命从属于某种伟大的事业，在乌托邦的理想国中，微不足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跃进与饥荒

1958 年 9 月 6 日，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北川成立，以后半个月内全县便成立了 28 个人民公社。农民 1952 年欢天喜地拿到的土地证不久，便没什么选择地加入合作社。此时，还算是自己那片地的主人，两年后，1954 年，被赶进初级社，土地证也还算数；1956 年，莫名其妙地，连自家的牲口，大农具也要交出来，因为成立高级社了。再过两年，不由分说，几天之内，那张神圣的土地证成为废纸。最不堪的是原来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收回集体。紧接着，一个月后，家里的锅碗都得交出去，粮食也交出去。1958 年十月底，北川建起 1129 个公共食堂。

北川是典型的穷乡僻壤，五十年代粮食亩产平均不到 60 公斤，到 80 年代种子改良，使用化肥也只是 100 多公斤，而且一半耕地坡度在 25 度以上，水土流失严重，几乎每年都有灾害，不旱即涝。1969—1976 年之间，中度到强度的地震就发生过十余次（98—99 页）。

北川森林广袤，但山高路陡，个体伐木不可能，故历来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多少收益。农户自己所种的林木果树也保不住，57 年到 82 年农民的林木所有权数次改变。1957 年，全县 6.2 万公顷农民拥有的林木统统按要求折价入社，农民的自留林只剩 6.1 公顷。过了一年，这一点自留林全部收回集体。试想一家人辛辛苦苦种了一片果树，三年后收回公有，没有任何补偿。遭如此折腾，三番五次。那，就是生活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1958 年北川的森林达 16 万公顷，覆盖面积 55.8%，1987 年减少到 12 万公顷，1998 年 13 万公顷。至 1957 年，森林面积减少 6667 公顷，森林的破坏除了“国家建设木材需求量增加”，大跃进期间，因“大办钢铁”而大量伐木烧炭；“大办粮食”毁林开荒，到 1965 年累积毁林 14533 公顷（406 页）。

1958 年 9 月，从全县调集了青壮年一万多，即超过半数的劳动力（357 页），再加上从外县调来的 2 万劳力，共三万人大军，或发薪烧炭，或挖煤开矿……展开钢铁大会战”。实际上是一场人为破坏自然的大灾难。县志在北川水土流失的一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大跃进运动毁林烧炭炼钢即毁林开荒的恶果（464 页）。县委提出要求，将亩产提高从原来的 69 公斤提高到 500—2500 公斤，在这些疯狂的指标后面是对所有民众的奴役。白天长时间劳动，晚上开会，“反保守、反右倾、反畏难、反退缩、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扫除大跃进中度各种思想障碍”。

1959 年粮食征购，国家从北川收走了 8860 吨粮食，超过 57 年一倍以上。征购粮有两层内容，“征”是农业税的意思，“购”是所谓卖“余粮”，其标准是按当年的产量算出来的，即留够农民的口粮、种子、集体支配的机动粮，其余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强制性地“卖”给国家。征购加倍，说明北川县领导向上级报告的产量比上年超过一倍以上，也说明农民的口粮、种子都被拿走了。

到 1961 年，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超过三分之一，只有 42 公斤。这一年的大量征购“造成农民口粮、种子不足（556 页）”。后来虽然国家返销粮食救济，但已经过了播种季节。到 1962 年，饿死人已经非常严重，还征购了 4165 吨，比国家定的任务超过 370 吨。按政府在 1956 年的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是 187 斤半。北川 1961 年人均口粮仅 92—108 公斤，国家返销口粮人均 15—32 公斤。这年统计 1—5 月猪肉人均食用量 0.23 公斤，1962 年 1.2 公斤。人民“普遍以瓜菜和草根树皮代粮充饥（360 页）”。

1958 年 6 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提高 13.8 倍，实际的结果是：“1961 年与 1957 年相比，工农业产值均递减 16.4%；农业产值递减 16.5%，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减 19.4%，生猪出栏率年均递减 35.6%；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减少 36.4%（357 页）”。换言之，离政府的目标差了将近 50 倍。这些数字远远不能说明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对北川的影响。

至今，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练钢。还有雪上加霜的“反右倾”，错过本来可以及时救灾的机会。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到 1960 年，全国绝大部分的公共食堂都停掉了，北川一直维持到 1961 年 7 月。1959 年 8 月的反右倾，县志有生动的记述。县委扩大会议在一个月中开了三次，每次 8—10 天，吸收县、区、公社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六个方面持不同意见者进行现场揭发、批判和斗争。10 月 20 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会后，各地连夜行动，832 名县、区、公社干部和 42377 个劳动力在三天之内分赴两大“战区”、15 个大“战场”和 376 个小“战场”开展“反右倾”。最后 413 人定为“有右倾思想情结”，81 人“有严重右倾思想”，33 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7—58 页）。换言之，这八百多地方干部中，超过一半人曾经多少说了几句真话，于是就成为斗争对象。今天，没有经历过如此场面的人，不容易想象斗争会的恐怖场面。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县志将与大跃进和饥荒相关的史料分别放在不同的章节中，却几乎没有具体的描述。例如在审判工作一节提到，检察机关为了以大跃进的速度办案，实行“一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 6 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提高 13.8 倍员，审判员）；“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局长，法院院长），称为“三合一”联合办案。“正常法律程序被打乱，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293 页）。在大事记中提到“1961 年 2 月 13 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28 页）。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 1955 至 1973 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三十左右，而 1959、1960 年分别是负的千分之 10.6 及 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 5000 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147 页）[4]。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 结语

县志编撰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一页）。看得出他们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处理素材，尽量保存珍贵的史料，又不违反官方对历史的正统解读。本文只涉及了几个历史时期和事件，也不过端倪而已。县志给研究该县及基层社会历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至今学术界颇具争议的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都能在县志中看到有力的论据，“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受到干扰，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 15.9%，农业总产值下降 20.1%，粮食减产 14.5%”。县志记录到，文革中在学校的一打三反运动，全县 442 名老师，就有 115 名受到处分，其中 32 人被清理出教师队伍（641 页）。县志作者的水准常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审判工作一节，用短短 225 个字，精确地描述了几十年中司法制度在戏剧性的变迁。“1955 年贯彻实施《宪法》，审理案件严格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1957 年‘反右’运动中，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制度被废弃。1958 年，要求办案要多、要快、要省时、省力，公、检、法实行‘三合一’联合办案，取消了相互监督和制约。‘文革’开始后，法院工作瘫痪。1968 年法院实行军管，军管会及县革委人保组总揽公检法权力，实行群专、群审、以人、以言、以权代法。在此期间审理案件 280 件，经 1979 年复查，错案为 149 件，占 53.2%（298 页）”。

北川地处龙门山断带，“据现有资料记载，1169—1976 年发生中强地震 10 余次”。县志记录截至到 1987 年，在之前的十年间，3—3.9 级地震就发生过 9 次（98—99 页）。“1977 年 4 月，县境正式列入地震八级度设防范围”，之后几年政府曾拨款给一些办公楼及公共建筑加固（616 页）。从 5.12 地震后的北川看来，当地建筑，尤其学校，离“地震八级度设防”实在太远。地震带来警觉，也带来启示。现代传播手段让生命消失的残忍，让幸存者撕心裂肺的哀恸在大众面前展现；和过往的灾难不同，这一回，死亡不仅仅是个数目字，每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都让人领略生离死别的含义，唤起世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将载入史册。不可忘记这一年 5 月 30 日，成都赈灾晚会打出了“以生命的名义”的旗号。人类曾经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残杀；以种族的名义，乃至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举起武器对准同类。从最古远的因为求生而结盟，为保卫地盘而操戈，到为主义、为理想、为大局而漠视个人的性命，道路何其漫长。在 21 世纪，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并非算旧账，而是明白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确立了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走到尊重个人生命的今天，从人道的立场反省历史，衡量人类的行为。终于，我们可以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多少被践踏的生命了。

[1] 《南方都市报》，2008 年 5 月 26 日

[2] 加拿大政府 2008 年 6 月公开为 1887 到 1976，对原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道歉。

[3] 有关论述见张鸣，“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 年，四月号，32—41 页。“在实际的土改运动中，不仅和平赎买没有实行（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连地主主动的献地也被不允许，非要经过斗争强行分配才行（虽然在政策上所谓开明地主的献地是被许可的），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连号为开明绅士典型的刘少白和牛友兰等人也不能幸免，牛还被斗死。道理很简单，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总之，土地改革必须在激烈的暴力斗争中进行，分配土地的过程就是煽动仇恨的过程，任何导致运动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都被禁止，唯有大规模的暴力，才能使气氛紧张、仇恨升级，也才能达到动员的目的”。

[4] 按杨继绳先生的研究，四川省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在 1000 万到 1200 万之间。《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 年 5 月版，第 222 页。

2008 年 6 月 13 日



熊景明

1943 年出生于昆明，1979 年移民香港。1988—2007 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 小鸟文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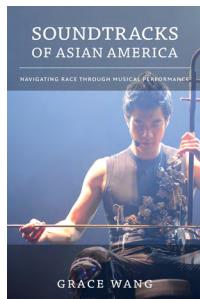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图片来自 [Samuel Sianipar on Unsplash](#)

正如 Grace Wang 指出，音乐本身就具有超越国界、种族的“普适性”，这就为想要跨越社会阶层的亚裔提供了一个不受种族、肤色限制的竞争领域。

东亚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将学习古典乐视为“与西方接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一九七九年美国小提琴家 Isaac Stern 的访华就寓示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启时刻。“能够流畅地弹钢琴、欣赏古典乐是一种身份象征”的观念，在东亚各国早已深入人心。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亚裔家长，迅速将古典音乐树立为目标，迫不及待地砸重金将孩子送去专业院校学琴，甚至把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预科入学名额占走一半。



《亚裔美国之声：应对种族问题的音乐表演》封面

# 非虚构 高雅的边缘人： 为什么亚裔 热衷学习古典音乐

Xuting | 小鸟文摘

## 古典乐又和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有什么样的关系？

二零二一年九月，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终于迎来了因疫情阔别一年的复演首秀，当晚音乐总监、指挥家 Robert Spano 特意挑选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作为开场。他的选曲理由不难理解：“贝五”既是大众耳熟能详、最直击人心、最适合为新一轮演出季拉开序幕的经典，也蕴含着古典音乐界从疫情打击中复苏、“与坎坷命运斗争”的寓意。

作为当晚的观众之一，除了有幸在现场聆听“贝五”，我也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现象：交响乐团里有数目超乎想象的亚裔演奏家，观众里也有不少亚裔中学生前来观摩。虽然亚特兰大东北角的格威纳特县（Gwinnett County）是有名的韩国城，亚特兰大却并不像纽约、加州那样街头处处可以见到亚裔。为什么在灯火辉煌、人人西服革履的古典音乐厅里我却看到了最多亚裔面孔？

一周之后，我又来到这个音乐厅看演出，那天的内容则更“Asian”：一位韩裔混血小提琴手演奏一位中国“九零后”作曲家的作品。我不禁感叹，在处处讲究“多元化”的今日美国，似乎没有比古典音乐界更能彰显亚裔存在感的地方了。

为什么亚裔会在象征西方文明精髓的古典音乐界“扎堆”？我带着这个问题翻开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Grace Wang 教授二零一五年出版的专著《亚裔美国之声：应对种族问题的音乐表演》（*Soundtracks of Asian America: Navigating Race Through Musical Performance*）。

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并不难解答：学习古典乐是积累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它代表着高雅、得体、有文化。这一点对被父母逼着弹过《致爱丽丝》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也很好理解。然而，Grace Wang 在书中提出了更值得思考的问题：积累文化资本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什么亚裔偏偏选中了古典乐？古典乐又和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 01

#### 虎妈、鸡娃、古典乐

不难想象，大多数亚裔演奏家是被第一代移民父母逼着走上了古典音乐的道路。尽管亚裔家长们嘴上说着学古典音乐有着种种教育意义上的好处，“今天钢琴练得勤，以后学习也坐得住”，但他们对古典音乐所代表的“高雅”、“上流”的艳羡却显而易见。

除了本身对于阶级跨越的渴望，“学古典乐”也透露出亚裔家长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中的不安：尽管相当大比例的第一代亚裔移民来自于本国的中上层阶级，在美国也从事智力工作，但语言上的磕磕绊绊、反应迟缓却让他们担忧自己的高智商、有文化”的自我认同会被剥夺。这种对于种族歧视的焦虑促使亚裔家长在文化领域投资、押注，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白人父母重视户外运动、足球和游戏。如果孩子可以欣赏、掌握连普通美国人都无法理解的西方古典音乐，那么文化优越感仍能牢牢地掌握在亚裔移民的手中。

但正如 Grace Wang 指出，亚裔父母对种族歧视的自我反抗有时会走向反面，反而加深了种族刻板印象。如果说对于亚裔的刻板印象是“像机器人一样勤奋工作、一丝不苟”，那么每天被逼着弹琴、苦练技术，岂不是反过来又验证了这一刻板印象？虽然音乐具有超脱种族、疆域的美，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放弃了对古典乐的话语权。

在不少白人批评家眼中，勤学苦练恰恰反应了亚裔美国人乃至亚洲人对音乐创造性、个人表达性一面的忽视，缺失对音乐本身的热爱。例如书中提到 Isaac Stern 在一九七九年访华时听了中国学生的演奏，虽然他对学生们技术上的完成度表达认可，但也指出他们的演奏里没有心、没有热情，暗淡无颜色。

如果说红色中国将古典乐的个人特质磨灭成了集体主义操演，日本遍地开花的“古典音乐热潮”也同样被西方媒体讥笑为“从 3C (camera、computers、cars, 即相机、电脑、汽车) 到 3B (Bach、Beethoven、Brahms, 即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不过是将日本工业的技术主义移植到了音乐界，根本不能领略西方古典乐的本真与神髓。

可以说，美国社会对于“亚裔 / 亚洲人与古典乐”关系的论断，本身就形成了一套新的种族歧视话语——将亚裔、亚洲人视为单调、呆板、不能触碰自己内心的模仿者，而将白人放在“能够真正欣赏古典乐、能够借音乐表达个人内心”的高位置。亚裔父母因此也陷入这个种族主义的怪圈：他们越是苛刻训练自己的孩子，子女就越和针对亚裔的刻板印象绑定。

### 02

#### 脸、声音、本真之心

在《亚裔美国之声》的第二章，Grace Wang 采访了诸多亚裔年轻演奏家，从“孩子”的角度重新叙述了学习古典乐的故事。从采访片段中不难看出，亚裔父母的“鸡娃”给孩子们留下不少心理创伤，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段想要放弃古典乐的心路历程。如果说种族主义话语将“本真性”（authenticity）视作亚裔学习古典音乐缺失的一环，那么“不出于自身选择、被父母逼学习古典乐”这一点就成了亚裔古典音乐人的“原罪”。就连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招生官都开玩笑式地感叹，自己必须花一点时间才能甄别哪个亚裔背景的学生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哪个是承载了父母的成功期望。除了要让自己浸润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要演奏的曲目，几乎每一个亚裔演奏家必须要面对的都是如何在音乐中找到、学会自己的独特表达。

那么，从子女这一代的视角来看，亚裔美国人在古典音乐界的大放异彩到底有没有改变他们的种族困境？正如多位亚裔女性小提琴家提到的，一方面她们需要将演奏技艺提升至听不出任何亚洲感（Asianness）、真正以自身能力赢得一席之地，超越自己身体（racialized body）的局限；另一方面，在日益商业化的环境下，她们又需要以亚裔身份作为卖点。

对古典乐一知半解或根本无知的大众，往往听不出谁的演奏更“德国”还是更“亚洲”。虽然亚裔在古典音乐界的比重增加，他们上升的渠道却也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内卷。亚裔在国际大奖赛上取得的名次越多，音乐比赛在古典音乐界的含金量就越低。可以说，亚裔进军古典音乐界的同时，种族主义话语也在相应地“固化”他们原有的位置。然而，古典音乐并不是亚裔音乐人唯一的出路。Grace Wang 在第三章《给 YouTube 的情歌：网络名人和粉丝》将注意力转向了通过 YouTube 成名的亚裔流行音乐人。虽然他们也往往有着童年学琴的“悲惨往事”，新一代的亚裔音乐人却在网络上找到“表达真心”的方式。电脑摄像机镜头对着自己，在卧室里自弹自唱，用

朴实的歌词表达自己——社群网络让默默无闻的亚裔年轻人找到无需高额成本的成名方式，也吸引了不少和自己背景相似的粉丝。

但是，正如 Grace Wang 所指出，亚裔年轻音乐人尽管借助 YouTube“大众化的特征，将自己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声音传播出去，但他们仍然受限于种族身份。比如因为翻唱 Alicia Keys 的 No One 而蹿红的 Jennifer Chung，虽然声乐能力惊人，但她给视频取的标题却是简单粗糙的“亚裔女孩唱 Alicia Keys”。人们对她的赞美，虽然部分出于对她唱功的认可，但更多是因为她的亚裔身份，惊叹为什么一个“亚裔女孩”能唱得这么好？！

与此同时，流行音乐界的种族话语似乎比古典乐还要根深蒂固、理所当然，比如蓝调音乐、爵士乐、乡村音乐都有各自种族文化的印记，一谈到“黑人音乐”，人们就能罗列出各类流派，然而“亚裔”本身却并不能作为一个单独音乐风格或门类被识别，歌手只能诉诸于外貌去区别自己。

虽然 Grace Wang 承认网络给亚裔年轻音乐人带来的机遇和社群团结，种族主义的文化环境留给亚裔的空间仍然非常狭小。如果不能在美国本土打开市场，“回到亚洲”便成为一部分亚裔音乐人的新选择。

### 03

#### 从洛城三兄弟到王力宏：离散的声音

Grace Wang 在第四章将王力宏作为个案探讨了华裔美国人的离散身份认同。二零二二年的我们已经早把王力宏当成微博舆论场里的“内娱”明星，他作为美国华人的这一面却被淡忘了。然而，出生于纽约州罗切斯特、曾入读威廉姆斯学院的王力宏，直到十九岁赴台湾发展，才逐渐拾起中文。从成长经历来说，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始终是王力宏音乐表达、自我认同上的重要构成部分。

尽管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本土处于边缘位置，当他们回到亚洲，“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却成了重要的文化资产。当王力宏来到台湾发展音乐事业，九十年代末的台湾已经挂起了一股“ABC (American-born Chinese) 风潮”。Grace Wang 注意到，“ABC”其实是华人特有的一种表达，在美国反而很少见。因为“American-born Chinese”强调的是华人，而不是像“亚裔美国人”那样落脚点在于“美国人”。

“ABC”这一文化现象要溯源到当时在台湾爆红的“洛城三兄弟”(The L.A. Boyz)。这个嘻哈说唱团体由来自加州橘郡 (Orange County) 的美籍华裔黄氏兄弟 (Jeffrey Huang 和 Stanley Huang) 和他们的表弟 Steven Lin 组成，并在台湾掀起一股 hip hop 热潮。低腰裤、反戴棒球帽、拼接色夹克，英文为主、夹杂些许中文的说唱，不仅让洛城三兄弟美式 cool 形象深入人心，也让“ABC”这个词流入大众语汇。虽然今天的九零后、零零后听众或许从未听说过洛城三兄弟，但“三兄弟”之一的黄立行的名字可能还存留在大家的印象之中。

十九岁王力宏的到来无疑又令大众树立了新的“ABC”幻想。除了时髦的音乐风格，“精英学霸”、“从六岁起拉小提琴”、“婉拒常春藤 offer 毅然决然选择音乐”等等光环，进一步增加了王力宏作为美籍华人的传奇性。正如 Grace Wang 敏锐指出的那样，“勤奋好学”这一特质从来都不会在美国流行音乐工业里作为一个歌手的卖点，但在华语地区却格外有号召力，这或许和华语娱乐圈更重视广告、品牌形象等收入来源有关。而王力宏音乐形象另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他作为“离散 (diasporic) 华人”的身份。他不仅以《落叶归根》等名曲塑造自己“远离家乡”的游子形象，还通过翻唱其表叔李建复的经典《龙的传人》，绕开地缘政治争议，直奔“文化中国”的广泛归属。

王力宏在音乐上的文化尝试并没有“消除”他的亚裔美国人认同感。王力宏将“chinked out”作为自己的音乐宣言，邀请欧阳靖等在美国脱颖而出的华裔音乐人共同合作，并且深入大陆采风获取音乐灵感，反击“chink”这一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称谓。

但对不熟悉美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华语听众而言，“chinked out”这个表述实在太陌生。尽管王力宏常常在采访中谈到“chinked out”，华语媒体还是略过了他的表述，笼统将他的专辑（尤其是《盖世英雄》）称为“中国风”。

本就对王力宏了解甚少的美国流行音乐工业，更不会在意一个亚裔美国人在华语地区的反歧视宣言。虽然离散华人的身份让王力宏这样的亚裔美国人获得跨文化资本和表达途径，这个错置的反歧视姿态却力量不足，难以撼动美国流行文化工业的种族刻板印象。

### 04

#### “本土”和“离散”之外：新的可能

以王力宏作为结尾或许是一个既乐观又悲观的观察：乐观的是，亚裔美国人可以通过“寻根”、“返乡”在大亚洲区 (Pan Asia) 获得事业成功，用音乐表达自己；而悲观的是，尽管王力宏是亚洲巨星，他的成功却在美国罕有人知，也对美国在地的种族主义结构影响甚微。

距离《亚裔美国之声》出版七年之际，书中提到的诸多现象（包括王力宏在内）都已“物是人非”。但 Grace Wang 的许多论断仍在其他领域保持着解释力：我们从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即可发现，亚裔在花样滑冰运动项目上的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取得了不少金牌。但这一发展轨迹似乎也遵循着亚裔在古典音乐界“高雅、小众却边缘”(prestigious and marginal) 的基本状况，仍旧生产着亚裔“柔弱”、“勤学苦练”、“父母砸钱”、“不能参与团体运动”的刻板印象。

与此同时，亚裔在文化领域上的突飞猛进也昭示着新的可能。仅在过去半年之内，《尚气与十环传奇》、《青春变形记》和《瞬息全宇宙》等“全亚裔班底”电影就在好莱坞大放异彩。而 K-pop 席卷美国的态势，也令其中一部分美籍亚裔的韩国 idol 有了反向文化输入的可能，而不像过去“离散亚裔”那样只能将事业局限于大中华区或大亚洲区。这也让更多有志于投身流行文化生产的年轻美国亚裔萌生了希望。在“本土”和“离散”之外，亚裔美国人或许找到了新的表达声音的方式，改写全球文化的声轨。



Xuting

加大圣迭戈分校文学本科，哥大东亚系硕士，埃默里大学法律博士在读。业余时间看看英文学术著作，写中文书评。

####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图片来自 [tangi\\_bertin on Unsplash](#)

## 档案

# 疫情里的次生名词 迷惑了谁

方可成 | Newsletter

这是小鸟 newsletter 的第十三期。

如果你在吉林、上海或者其他经历了较长时期封锁的地方，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

最近，因为上海的情况，人们对抗疫策略又有了很多讨论。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专业、有洞见的分析文章被删除。不过，尽管如此，我相信人们对疫情的认识和理解还是比一两个月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

我想与大家分享我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路径。我认为，我们需要从几项基本的前提出发。

第一，我们不应被“躺平”、“共存”、“清零”、“封城”等概括性的说法迷惑，因为每一种策略都会有具体的措施和复杂的考量，也都面临着真实的掣肘和挑战。以流行的说法“西方国家选择躺平”为例，实际上西方国家内部也是多元化的，美国和北欧不同，欧美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不同，但它们相同的地方在于：流行病学家积极研究、政府主动制定和调整政策，而非眼睛一闭躺下不管。同样，都被称为“lockdown”（封城），但具体的实施策略在世界各地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的 lockdown 是门上帖封条，有的地方的 lockdown 则可以自由出门去超市。

把具体而多样的抗疫策略简化为二选一的选择题，还可能将之演化为“敌我之争”。在只有黑与白的世界里，人们更容易产生对立，也更容易走向极端。而在有多种色彩与灰度的世界里，人们更可能产生同理心，也更可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第二，我们不应以骂蠢人、抓坏人、揪特务的思路来分析问题，对前线抗疫者应该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医护人员和社区基层工作者都是目前承受重压的人群。上海的“拉垮”，不会是因为这座城市里的基层工作者水平不够、能力不行——他们和其他地方的基层工作者不会有本质区别。只不过，压在他们肩头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从广州传出的最新消息是：他们对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精神障碍者、孕妇等特殊人群都做好了应对服务工作。这当然是吸取了西安和上海的教训，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广州的疫情比起上海依然规模小很多。面对上海这样的感染人数，恐怕没有一个城市能明显做得更好。

当然，有人又会说：上海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感染人数，还是说明这座城市不行。甚至有人要以“从人民内部抓敌人”的思路，来揪出背后的“阴谋”。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作为向内地省份转移支付输血的经济引擎，上海探索精准防控，希望将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甚至探索出一些疫情应对的新做法，这是很好的尝试，在整个2021年也都是很成功的探索。只不过，可惜这种措施在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了。

第三，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选择都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关键是，对于代价是什么、收益是什么，应该根据已知的信息，开诚布公地讨论清楚，而不是只谈胜利，对代价避而不谈，或者干脆把那些好不容易讲述出来的代价故事直接抹去。比如，全民核酸固然有重要的收益，但它的代价不仅是医保经费，还有医护人员的人力（对其他患者的挤压），以及做核酸过程中的感染风险。前几天，梁建章对各种防疫策略带来的生命损失进行详细计算和对比，就是一种很好的路径，可惜那篇文章（《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政策》）已经全面404。

坦诚面对收益与代价，还有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根据情况的最新变化，随时计算收益与代价的变化，进而做动态的策略调整，而不是形成单一的路径依赖。

第四，抗疫策略之间应该有一致性，应该遵循同样一套科学决策的逻辑，不应该彼此矛盾。例如，若以“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士的生命至上”为理念，那么的确应该尽可能封锁各类活动，但与此同时，应该尽快为这些人群接种至少三针疫苗，并且应该尽可能接种效力最强的疫苗。如果既要严格封锁，又不提供最有效的疫苗，就难以说得通了。同样，如果秉持这样的关怀弱小的理念，那么如缪晓辉所言，医院绝对不应该关门停诊。

上海不会是最后一个面临疫情挑战的城市，新冠病毒也不会是我们近期要面对的最后一项重大挑战。以上分析的种种——不被简化的名称带入二元对立、不以抓特务的思路分析问题、坦诚比较收益与代价、保持逻辑的一致性——不仅适用于这次危机，也可以在未来面对其他危机时提供更加务实的应对策略。

前面我提到，“不应以骂蠢人、抓坏人、揪特务的思路来分析问题”。最近，令人遗憾（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以这种思路来分析上海疫情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群中流行的话术，并且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段子和10万+文章。

比如，“上海贪把上海滩弄成了上海瘫”，看似很巧妙地用了三个同音字，实则包裹的是极为陈腐的“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最近更流行的说法，已经不仅仅是批评上海的地方官员“贪”了，而是直接称他们为“买办”，乃至称上海为“买办城市”。在这种理论当中，上海发展成今天这副模样，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买办阶层”执行着“资本”的意志、维护着“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在策划“颜色革命”。这些人还说，上海和香港有不少的共性。

怪地方、怪美国、怪资本，常见的几种说辞无非如此。

前两天还看到一种神奇的说法，来自免主席。他在文章中说，“主张‘人不可能胜天’、接受躺平或共存的人，实际上其实已经成为 COVID-19 病毒在人类社会里的代理人（agents）：他们在代表 COVID-19 ‘发声’，呼吁人类社会接纳 COVID-19。”

免主席果然有些理论功底，他把“境外势力”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不支持清零政策的人，便是“病毒势力”的代理人——这个标签一贴，给人的感觉就是站到了人类的对立面去了。

这样的说法让人联想到《自私的基因》。这本四十多年前出版的书说，你以为基因是为生物服务的吗？不，可能恰好相反，生物可能只是基因的代理人。是世间的万千生物为基因服务，让它们得以一直复制下去。

但是，《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并不认为人类只能服从于基因的律令。他在书中说：“我们有力量去反对我们的创造者。在地球上，只有我们可以反抗自私基因的暴政。”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这样一种“以基因为中心视角”的理论当中，道金斯也依然强调着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免主席的文章中写出了“代理人”这个词的英文：agent。而他的理论无视的则是另一个写法极其相近的词，那就是：agency（能动性）。

“代理人”的最高准则是为自己的“主子”服务，不会反对自己的主子，更不会反抗。因此，“代理人”理论核心就是：被戴上“代理人”帽子的人，被否定了能动性的存在，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追求，所作所为都是执行他人的意志。病毒的代理人，行为准则是让病毒长存，而不是分析各种抗击病毒措施的利弊得失，不是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做出务实的判断和调整——这显然是对许许多多认真思考防疫策略的人的污名化。

类似的，“境外势力”的代理人，行为准则是为所谓的“境外势力”服务，而不是思考如何提升同胞的福祉，如何促进世界的大同。然而在现实中，许多被扣上这顶帽子的人，其实是最真诚的爱同胞、爱世人的人。

当然，在这样的代理人理论中，免主席们往往需要把自己摘出来。虽然他本人任职于投行、曾求学于美国并以此为傲，但他可以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西方，而其他很多比他穷、从没出国留学的人，却可以分分钟被扣上代理人的帽子。

免主席的文章看似高屋建瓴，引用了不少社科理论，但内核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那套论述——清零是保护老弱病，是依靠“自上而下进行强有力的管理”而实现社群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上海在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对这种论述已经造成了根本性的动摇。

而这套“买办城市”、“颜色革命”、“代理人”理论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否定人的能动性，将论争的对手贬为他人的打手，这是从根本上侮辱人之为人的尊严，也是对严肃讨论的直接取消。

这两年多的疫情已经让我们知道：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有多么重要，它让我们即时传播病毒出现的消息，让我们科学制定公共卫生政策，让我们拥有疫苗和药物，让我们建立共情和守望互助……我们要想走出疫情，走出苦难，只能尊重和依靠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和意见，而不是贬损和否定这种人之为人的根本，不是将人们的感受、发言与行动视为执行什么大棋和阴谋。这才是“人定胜天”的根本依靠。

我最近读了……

1. [上海被网暴坠楼女孩的母亲：我们想要讨一个公正和公义](#)

最近两周最令人心痛的消息之一。网络暴力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对人性恶在何种状态下被激发，对社交媒体平台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追问，对预防措施的建立，都还远远不够。

## 2、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

昨天看到有人问：上海有方方写日记吗？

也许上海没有方方这样的作家在持续写日记，但最近一个月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上海居民的记录，这些记录以文字、影像、播客、电话录音、视频剪辑等许多方式呈现。这篇根据在方舱录制的播客写成的图文，就是一份勇敢而真诚的上海人日记。

## 3、“清零”or“共存”？C计划盘点疫情中N个争议问题（附多文链接）

C计划的主创们总是有一种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显得“不合时宜”的执拗——不论外面多么喧嚣，不论有多少人已经放弃思考，她们就是要和你摆事实、讲道理。

有她们在，我对这个世界感到更安心，不管她们是不是小众。

## 4、I Tried to Put Russia on Another Path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论述自己当年为什么支持北约东扩。根据他的说法，他一方面在积极主动地与俄罗斯对话、合作，希望俄罗斯走向注重经济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而不是回到帝国的道路；另一方面则通过北约东扩来保证欧洲大陆的稳定安全。前者是“working for the best”，后者则是“preparing for the worst”。

克林顿描绘的当然是从他的视角出发的世界，或者说也是为他当年的决策辩护。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我们理解俄乌战争的历史背景。

## 5、Why American Teens Are So Sad

美国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感到持续悲伤或绝望的高中生比例连年上升。《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给出了四种解释，分别是：社交媒体的使用；线下社交的减少；世界上各种令人焦虑的新闻；家长教育方式的变化。

虽然学术研究的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并没有太大。但是作者认为：社交媒体可能不像毒药那样可怕，但它像是酒精——让一部分人上瘾，而成瘾了之后则会连同其他因素一起加剧负面的心理状况。对于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就像是大逃杀游戏，获胜的方式是得到更多的点赞和关注，这让他们放弃睡眠，为自己的外貌感到焦虑。

“缺乏线下社交”这个因素也很值得关注。在中国的疫情封城当中，人们遭受到的心理影响尚无系统性的研究，但它必然是严重的。

## 6、积极的结论

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25周年。不妨阅读一篇他的旧文。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经作者授权转载，摘自[新闻实验室免费版 newsletter](#)。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新闻学、政治传播和数字媒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政见 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和“放晴公园”发起人。在加入学界之前，他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时政记者。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流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Ehimetalor Akhere Unuabona](#) on Unsplash

# 档案 互联网上， 人人都可能知道你是谁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9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01

科技 / 技术

## IP 属地显示与匿名性的消亡

4 月 28 日，新浪微博发布“IP 属地功能升级公告”。即日起全量开放 IP 属地小尾巴功能，意味着在用户个人主页以及每条评论上都会强制显示其 IP 属地。

很快，抖音、微信、今日头条、知乎、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也陆续上线此功能。

如果说三月时微博对于这一功能的试水（显示带“俄罗斯”、“乌克兰”等关键词内容下评论区的地域 IP），还被视为俄乌战争下一种临时的舆论管控。如今的全面实施显然不再是单一一家平台的意志。

媒体很快注意到，在去年 10 月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已经要求平台“以显著方式，在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账号 IP 地址属地信息”。

比起 2015 年的上一版本，尚未生效的新版《管理规定》多了足一倍的条例。要求也变得更为具体，比如账号不得仿冒机关单位、地区政务号，擅自使用具有新闻属性的名称……还有专门一条，禁止“被依法依约关闭的账号以相同或者相似的账号名称信息重新注册”——也就是网民通常指涉的“账号转生”。条例要求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核验账号主体真实身份，并采取必要手段防止跨平台“转生”。

但所谓“匿名性”并不是此时才消失的。

2005 年，中国网民突破一亿。彼时，就曾爆发过一阵对网络匿名的讨论热潮。新浪网还做过一期“专家激辩互联网实名制”的大专题，引入正反双方的意见互搏。当时的新浪网总编辑陈彤作为反方代表发言，称“匿名污蔑或发表违法言论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没有必要实名制。并且全部实行实名制也有很大难度。”

十年过去，中间地带不复存在。2015 年的《管理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概念，同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草案）》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网络实名制。由此进入了如今人们很熟悉的，身份证件与电话号码绑定，网络账号与电话号码绑定的时代。

可以说自此，已经不存在实质性的网络匿名。陈彤口中的“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违法问题”，更是变得易如反掌——平台可以轻易取缔一个账号，甚至摸着账号找到背后的身份主体。

那为什么还要在前台进一步削弱匿名性呢？“鱼克雅未克”（微博网名）的观点是，“这

件事唯一的意义就是给你贴上了一个标签：境外势力，台湾人，香港人。告诉所有人，你的发言立场来自于你的所在地，贴上标签，也就更便于给我说的话所预设立场。”换言之，标签鼓励了寻常用户之间的互相猜忌，身份立场先行于其真正的发言内容。想见也会进一步激发本就存在的举报。

这里想谈谈晋江的例子。这个老牌文学网站之下衍生出的晋江论坛（“小粉红”一词发源地），一度拥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匿名性“马甲”制度，网友无需注册即可发言，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任何名称发言。身份、过往言论都无可追溯。（[当时晋江论坛最常见的马甲是两个等号“==”](#)，也被称为双眼皮马甲。）

网文研究学者肖映萱在对晋江论坛的研究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规避审查的非实名制，成为自由发言和圈子化的强大助力。在这里，每个子论坛都是更加细化的小圈子，入门前提是了解和遵守内的游戏规则；所有圈内“黑话”都是飞速更新的“常识”，圈外人难以窥得门径……正是在这个层层把关的私密空间里，女性读者过剩的主体意识、参与诉求和怀疑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从而，粉红色页面的晋江论坛成了管理员、编辑、作者、读者角斗的平台，多方力量参与，互相制衡。直到 2014 年，铺天盖地而来的“净网行动”将其打破。空前敏感的举报系统成为一个分散的权力机制，来自利益冲突方的举报放在过去，会经过“绿晋江”和“红晋江”两方读者与管理者更充分的权衡讨论，此时却必须采取对网站整体最安全稳妥的解决方式，争取内部消化。换言之，任何一个读者哪怕过激的意见都需要得到重视，“小粉红”（论坛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和决议权。

这种权力机制借由外部力量的进入而逐渐扩散，“大神”和排名靠前的作品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获得了更大的被举报可能性。

粉丝监察机制作为被隐去的力量，本就无法与外部公然对峙，又因权力的分散而被削弱，只能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叛徒”（举报者）的清理上，缩小至隐匿的读者内部空间。（[《中国文学网站生产机制与粉丝文化考察》](#)）

## 马斯克与自由广场之死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明，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曾被寄予厚望的自由广场正在死去。无独有偶，[以 440 亿收购推特的马斯克](#)，也野心勃勃欲恢复其往昔荣光。而他所主推的核心理想，就是将“言论自由”推行到底——对应的是这几年各大平台为管控谣言和激进言论进行的审查。

在一条超长的推文串中，[知名论坛 Reddit 前 CEO 黄易山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如果 Elon 接管 Twitter，他将进入一个他从未知晓的痛苦世界。”

他接着说明，为什么人们最初对“自由”的想象在 Twitter 上不再奏效。

今天许多年长的科技领袖（马斯克、马克·安德里森等 X 世代的人），与互联网一起成长。对他们来说，互联网代表着自由，代表着新的疆域，代表着人类精神的绽放，代表着技术可以诞生人类全新黄金时代的巨大乐观主义。

但这不是今天言论自由的意义。

不是说这个原则不再有效，而是围绕这个原则的实际问题已经不同了，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互联网不再是人们可以去探索“自由”的“边疆”，现在它就是整个世界的所在，每一场文化战争的最主要战场。

每个平台都肩负过打造自由阵地的理想。但一旦到达一定规模，他们会发现自己由于种种不可抗拒力而被迫审查某些东西，不是因为平台本身有任何立场，“他们不关心政治。他们真的不关心。”而是因为人的聚集和讨论会对现实世界造成真正的影响。

这是一个泥潭，不要踏足其中，用你宝贵的时间和影响力去做一些更值得的事情。他这样劝马斯克。

但好消息是什么呢？人们总会找到新的去处，寻找新的方式集结在一起。在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当天，开源社交媒体平台 Mastodon（长毛象）破天荒地涌进了近 30000 名新用户。突如其来的增长一度给服务器造成运维压力。这是一个类推特的社交网络服务，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家长式的单一平台，而是由成百上千个分散的独立社区组成。每个社区之间可以互通，但也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管理规则。这是一场实验，[WIRED 作者 Arielle Pardes 写道](#)，“以检验社区是否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以及通过自我组织成志同道合的团体来更好地运作。”

## IN THE NEWS

“棱镜门”中被摧毁的计算机硬盘在大英图书馆展出。2013 年，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决定通过泄露文件的方式，揭露各国从政府层面对平民的大范围监控。他率先联系《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进行媒体曝光，随后，这些机密文件被保留在《卫报》编辑部地下室四台断网的笔记本电脑上，被全天候守卫。在受到英国政府施压时，为避免文件被移交给政府，《卫报》高管决定用角磨机和电钻将电脑硬盘摧毁。

近日，硬盘残骸作为展品之一出现在大英图书馆新展 Breaking the News。展览利用 1619 年至今的 4.5 亿页报纸作为基本档案材料，讨论了新闻媒体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灾难”部分，展览展出了格伦费尔塔火灾后的影像，愤怒和痛苦的民众在镜头里，指责记者没有在灾难发生前就监察建筑物本身的不安全，“只有当我们死了，你才会来。”在名为“混乱”的部分，1640 年代英国内战与脱欧运动期间的报道被联系起来。“两者都处于新型媒体出现、旧模式崩溃之际，展现出当时的分裂和混乱。”

“展览展示了从都铎王朝到现在，新闻如何一直将我们作为公民联系在一起。它显示出面对官方的审查和控制，直面真相是多么得有价值。”展览小组主席萨米拉·艾哈迈德说。

[大流行期间，员工监控软件成为新常态](#)。屏幕共享、位置追踪、记录鼠标点击和移动、

远程激活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居家办公的背景下，一些激进的员工监控手段被顺利部署。而即便回到了办公室，澳大利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手段也没有被撤回，而是成为了常态化管理的一部分。

“一旦安装了，它就很难被卸载。”工作场所技术研究者 Lauren Kelly 表示，“监控软件已经成为管理基础设施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过去，这种手段更多地是针对蓝领工人，如今它也适用于白领阶层。

技术提供方深受激励，开发出更多功能。Zoom 最近就推出了一种工具，让主持人在会后可以根据录屏进行“情绪分析”；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软件，能通过检索电子邮件和 Slack 消息，来监测员工情绪水平，是快乐、愤怒、厌恶、恐惧还是悲伤。“情绪监测非常有争议，技术存在缺陷。”Kelly 说，“但无论如何，这种产品有市场，一些雇主正在购买它。”

**维修权的胜利。**谷歌表示，将开始销售 Pixel 2 到 Pixel 6 Pro 手机的维修部件，以及未来任何 Pixel 设备的部件。这其中包括了原装的可更换电池，以及摄像头、显示屏的替换零部件等。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手机背板还能打开的年代。年轻人如今对电子设备的体验通常是一个封装的神秘小盒子，但近几年，对维修权的立法推动逐渐占据上风，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巨头对生产线作出改变，以支持更可持续的电子产品消费。

**荷兰城市禁止 15 分钟快送服务。**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在内的六个荷兰城市制定了严格的新法规来禁止这种服务。对于愈发习惯生鲜快送的人们，这似乎是个反直觉的要求。但在城市管理者看来，快递服务意味着大量的普通店面会被改造成前置仓，15 分钟的送达承诺意味着它们必须被设置在社区内部。这些门店原本是开放明亮的餐馆、书店、咖啡馆，如今逐渐被一个个黑暗的小仓库所取代，“若任其扩大，将对城市生活的原本意义带来损害”。

**俄罗斯大银幕上映盗版电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多家娱乐公司宣布暂停在俄业务，派拉蒙、迪士尼、华纳兄弟等也暂停新电影在其境内的发行。这意味着《蝙蝠侠》这样的片子本不该在俄罗斯的银幕上出现。

但 4 月中旬左右，一些地区电影院却开始火热上映《蝙蝠侠》、《不要抬头》、《青春变形记》等新片。据报道，这些都是从网络上下载的盗版资源。尽管官方部门仍试图与这种行为保持距离，但随着各类文化机构和公司的撤出，大规模盗版似乎重新回到了俄罗斯人的日常之中。

## 02

### 环境 / 生态

**塑料回收失败了么？**环保组织 Last Beach Clean Up 和 Beyond Plastics 一份新报告显示，2018 年以来，美国塑料回收率已从约 8.7% 下降到 5% 到 6% 之间。“塑料行业必须停止在回收问题上向公众撒谎。它行不通，永远行不通……我们需要的是消费品牌和政府采取减少塑料生产、使用和处置的政策。”Beyond Plastics 总裁 Judith Enck 在新闻稿中表示。

这是个近几年被屡屡曝光的问题：石油和塑料行业花费数千万美元投放的广告宣传下，民众误以为塑料是可以被有效回收的，因此毫无负担地去使用它们。但实际上，塑料的回收率一直未能超过 10%——与此同时，纸张回收率约为 66%，金属取决于类型，约在 27% 到 76% 之间。

随着 2018 年中国实施塑料进口禁令，美国国内的塑料回收出口量急剧下降，更加剧了整个产业原本就存在的问题。该报告发布之际，加州司法部也对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发出传票，旨在调查其是否在塑料的回收和环境影响上向公众撒谎。塑料回收神话是时候终结了，报告作者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数据阐明其低效和不可持续的性质，以激发政策的转向。

紧迫的环境危机面前，人们对概念化宣传变得更为警惕。**“中外对话”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对于“生物可降解塑料”，中国官方的态度从拥抱转为了观望。

报道指出，禁塑令之下，这种替代性的材料大受追捧，但在现行的标准和指南中，它的定义和标准并不明确；而且虽然名为“可降解”，这种塑料实际上仍需要非常特定的环境条件才能够真正有效降解。使用现有的可生物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来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很可能是一厢情愿”**。

**超 1000 名科学家走上街头，发起针对气候危机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最新一份联合国 IPCC 报告发布后，全球来自 25 个国家的科学家决定奔走呼号，像《不要抬头》中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科学家一样，向世人警告当前的危机。一直以来，科学家群体采取的都是跟活动家不太相同的路线，他们选择理智冷静地用一份份报告和研究说明现实，但事态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伦敦**，25 名科学家将自己的论文张贴在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的窗户上，并将自己的手粘到了玻璃上，逼迫政府看看他们一直以来无视的气候研究；在马德里，超过 50 名抗议者走上街头，在众议院的台阶上投掷假币；在柏林，科学家们将手粘在地面上，封锁了议会大楼附近的一座桥；**在洛杉矶**，NASA 科学家卡尔姆斯将自己用链条锁在摩根大通银行的大门上，呼吁其撤出在化石燃料上的投资。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警告你们。”在抗议直播中，卡尔姆斯声音颤抖而沙哑，“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被忽视。我们没有撒谎，也没有夸大。”抗议活动导致多人被警方逮捕。

**人类正在改变海洋里的声音。**海洋里，鲸鱼互相交谈，通过聆听海岸线上的海浪来导航；海豚利用回声来定位自己的猎物；生活在珊瑚礁里的鱼，利用礁堡之间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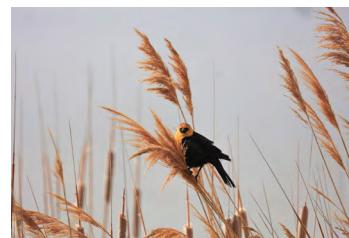
杂的噪声来找到其所在。直到近 10 到 15 年，人类才开始认真观测这些声音，思考它们对于生物活动的影响。

三月底发表的一篇新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在极地附近，冰层融化产生的淡水稀释了其下海水的盐度，进一步改变了声音在其中的传播方式——到 2100 年，部分海域水下声音的平均速度可能会跃升 1.5% 以上。此外，巨大的船只、石油钻井平台和四通八达的桥梁原本就已经在向下源源不断地注入噪音，破坏物种利用声音来进行活动的能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洋学家开始持续采集海底的声音，试图利用对声音的理解来更好地保护海洋动物，比如识别出敏感区域，划定静音区，让船只在范围内减速通过。

**2004 年以来，英国飞虫数量下降了近 60%。**这项研究是基于对汽车车牌上飞溅物的调查，没错，就是通过统计撞死在车上的虫子数量。参与者可以下载一个名为 Bugs Matter 的应用程序，记录他们的旅程以及车牌上的飞虫尸体。

这种研究方法来自于“挡风玻璃现象”的概念——2000 年以来，人们发现自己清洁挡风玻璃的频率越来越低，进而推测出全球昆虫种群数量正在减少。昆虫能够回收有机物、授粉、控制害虫，2019 年的一项全球科学评论称，昆虫数量的广泛下降可能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灾难性崩溃”。



图片来自 [Patrick Hendry](#) on Unsplash

**鸟类也在大量消失。**全球约有 11000 种鸟类，其中一半的数量正在下降，只有 6% 数量在增加。鸟类被视为全球环境变化的最佳活指标，飞行轨迹和啼鸣让它们易于被监测和研究，同时它们也深受各种人类活动的影响。据估计，仅在加拿大，每年就有 270 万只死于食用杀虫剂。

《环境与资源年度评论》杂志上的一篇评论分析了长期监测数据，发现自 1970 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的鸟类数量减少了 30 亿，欧洲则自 1980 年以来消失了 6 亿。每个国家都拥有至少一种全球受威胁鸟类，有 10 个国家拥有超过 75 种。

**亚马逊森林砍伐仍在激增。**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 INPE 发布的数据，4 月份巴西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面积超 1000 平方公里，是自 2008 年以来最高水平，大约是去年同期的两倍。2012 年以来，该地区的森林砍伐一直呈上升趋势，并自 2019 年总统博索纳罗上任以来加速。越来越多研究表明，这片热带雨林正接近转向热带草原的临界点。

**Twitter 禁止与气候变化科学相矛盾的广告。**“广告不应影响有关气候危机的重要对话。”新政策的声明中如此说道。此前，Twitter 已经设置专门的气候话题以应对相关的错误信息。在未来几个月，它预计将提供更多说明，关于自己将如何为用户参与的气候对话“提供可靠、权威的背景信息”。

## 03

### 文化消费活动

**美国青少年组建禁书俱乐部。**自一月份以来，宾夕法尼亚州的八年级学生 Joslyn Difffenbaugh 每隔一周都会和朋友聚在一起，讨论有争议的经典和现代作品。近几年全美范围内轰轰烈烈的禁书运动引发了年轻人的反击，保守派的抵制反而更大程度地激发人们对这些书籍的兴趣。多地涌现出这样的“禁书俱乐部”。

“人们总是想让他们的孩子远离某些话题，如性侵犯、性暴露、亵渎、种族主义、LGBTQ。”一名俱乐部组织者说，“但我的论点是，儿童和青少年总归将以某种形式与它们打交道，这些书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在他们在不得不真正处理这些问题之前，体验或了解它。到时候才可以更好地去处理。”

不仅如此，它也启发年轻人围绕审查制度进行更广泛的讨论。Joslyn 所在的俱乐部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作为首选书目，尽管它并没有在美国受到封禁；另一个青少年中心则选择了《华氏 451 度》，一本关于政府对书籍审查制度的反乌托邦小说。

**佳士得通过全息图在海外展示拍卖藏品。**佳士得五月的拍品中，一件来自埃德加·德加的青铜雕塑备受瞩目。雕塑主题是一位年轻的芭蕾舞演员，身着平纹细布裙，麻花辫上系着一条白色的缎面发带。身姿挺立，头微微上扬。

如今，这尊雕塑正在全世界巡回展出，以全息投影的方式。佳士得与洛杉矶初创公司 Proto 合作，实现了这项技术。Proto 开发的大型展示柜和软件让过去昂贵的全息投影变得便捷许多。舞者在展示柜中缓慢旋转，展示出惊人逼真的 3D 图像，观

众则可以通过点击屏幕来暂停旋转，查看细节。在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跨境运输正受到巨大的挑战，这种设备的投用或有望减少艺术行业的碳足迹。

**中银胶囊塔开始拆除工作。**位于日本东京银座地区的中银胶囊塔，是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建筑界代谢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种建筑理念围绕可拆换的模块组成，以期在未来使用的过程中达成一种动态更新，就像活的有机体一样。

中银胶囊塔便是如此，远看就像是一粒粒方块组成的积木建筑，走近后每一颗胶囊都是内置家居和一面圆形窗户的独立生活单元。然而，在这座塔 50 年的历史中，并没有一个单元被拆除或更换。如今 144 个胶囊中只生活着大约 10 位居民。

去年，黑川纪章建筑事务所与千代田区城市设计办公室[宣布了拆除该塔的决定](#)，并表示，重生计划仍会遵循“代谢运动”的理念，将拆除的单元重新配置，尽量保留并打造成位于世界各地的住宿单元和博物馆设施。

**美国国家妇女历史博物馆收集了 500 条大流行期间的女性日记。**当各种历史博物馆开始收集和展示新冠疫情记忆时，Lori Ann Terjesen 发现，没有机构专门记录女性的经历。然而，从护理、育儿到社会工作、远程教育，女性在大流行期间承担起了最重要的一些工作——[《纽约时报》报道](#)，三分之一的女性从事的是对于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基本工作，但其价值却时常被低估。

“女性的历史有些被男性主导的历史所掩盖，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Terjesen 指导该机构开始收集日记。日记长期以来都是女性经历的重要来源，但往往在教科书中被遗漏。在两年的时间里，[博物馆收集了 500 个条目](#)，日记、信件、视频、绘画、语音短信、播客、手写的诗歌。“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希望女性会觉得她们的故事很有价值。而我们会好好守护这些故事。”Terjesen 说。

**街头艺术成为盗窃的抢手目标。**或许有人会认为，街头艺术正是因为在街头才有其价值，涂鸦和破坏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抵抗和表态。但近年来拍卖市场的几次高价成交都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再纯粹。今年以来，围绕街头艺术的盗窃案件激增，来自纽约的 Phase 2 和英国的 Banksy、Stik 等艺术家的作品都成为劫匪的目标，或以此勒索赎金，或在黑市上出售。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档案

# “只有付不起钱的女人才会受影响”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4 条新闻。

女性堕胎权在美国一直争论不休，近几年，一些州已经出台了严厉的堕胎限制令，比如得克萨斯州、爱荷华州、俄亥俄州等。反对堕胎的群体通常将堕胎视为对新生命的谋杀，而生育权利活动人士则认为，女性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

本月，一份草案的泄漏再次点燃了这个话题。5月2日，由最高法院大法官 Samuel Alito 撰写的一份近 100 页的意见草案被泄漏给了 [新闻媒体 Politico](#)。该意见虽然不是最终决定，但表明最高法院 9 名法官中的 5 名保守派将投票推翻 1973 年使堕胎合法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1970 年，律师 Linda Coffee 和 Sarah Weddington 为 Norma McCorvey (化名 Jane Roe) 起诉得克萨斯州地方检察官 Henry Wade，指控该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该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并以 7 票对 2 票胜诉。“罗诉韦德案”的胜利让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使得堕胎在全美合法化。

所以，如果该案件被推翻，意味着各州立法者将有实质性的权力将堕胎定为犯罪。支持堕胎权利的研究机构 [Guttmacher Institute](#) 分析，一旦“罗诉韦德案”被推翻，至少有 23 个州会立即颁布全面的堕胎禁令。

政府方面，最高法院草案泄露后，一些州的官员重申了他们为寻求堕胎者提供避难所的承诺，并准备迎接来自具有限制性法律的邻近州的寻求堕胎者的涌入。“对于任何需要获得医疗服务的人，我们的州将张开双臂欢迎你”，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 Kathy Hochul 在[一份声明](#)中说，“纽约将永远是一个堕胎权利受到保护且堕胎安全、方便的地方。”

活动人士方面，Planned Parenthood、UltraViolet、MoveOn 等非营利组织已经联合组织了数场示威活动，他们的集会口号是“[Bans Off Our Bodies](#)”。此外，包括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在内的 370 多场抗议活动正在计划之中。Ariana Grande、Billie Eilish、Selena Gomez 等名人在《纽约时报》联名支持堕胎权利。

最高法院则证实了草案的真实性，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不代表法院的决定，也不代表任何成员对本案问题的最终立场”。[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则对媒体提到](#)，这次泄密破坏了法院成员之间的信任。“当你失去这种信任，尤其是对我所在的机构，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机构。这就像一种不忠，你可以解释它，但你不能消除它”，他说。

在那份引起了巨大分歧的草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宪法没有提到堕胎，要保护宪法中没有提到的任何权利，就必须证明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而

堕胎不符合这一标准。根据 Samuel Alito 的说法，“管制堕胎的权力必须归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柳叶刀》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最高法院的裁决基于一份 18 世纪的文件，却对 21 世纪妇女的现实情况一无所知。”该文章认为，“投票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法官不会成功终止堕胎，只会成功终止安全堕胎”。

这与已逝的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 的观点不谋而合。

[《金斯伯格访谈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雅众文化 / 2021-10 出版）一书曾记录她与美国法律事务评论员 Jeffrey Rosen 一次关于“罗诉韦德案”的讨论。

Jeffrey Rosen 写道，“金斯伯格辩称，如果最高法院在 1973 年只是推翻了该案中有争议的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并抵御住了将一种全国性框架强加于堕胎问题之上的诱惑，该案可能会引发较少的反弹，同时也能允许越来越多的州立法机构自行承认生育的选择权。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批评她的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金斯伯格正在为生育选择权奠定一种更为坚实的宪法基础，即这一选择权植根于女性的平等权，而不是隐私权。”

在那次的采访中，关于“罗诉韦德案”是否会被推翻的问题，Ginsburg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如果它被“推翻”，后果会有多严重？她回答道：“那对不富裕的女性来说就很不利了。”“总还有其他的州会提供这种便利，只要承担得起费用，女人们就可以去做。只有付不起钱的女人才会受影响。”

## Also in the news

### 意大利的冠姓权之争，孩子随母姓成为可能

位于罗马的意大利宪法法院表示，自动为孩子指定父亲的姓氏在宪法上是不合法的。当地时间 4 月 27 日，意大利一家最高法院做出裁决，默认情况下，新生婴儿应该随父母双方的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随父亲的姓。该规定应适用于已婚和未婚父母所生的孩子及被收养的孩子。

法院表示，父母双方都应对孩子的姓氏有发言权，因为这是个人身份的基本要素”。今后，在双方同意姓名顺序的情况下，孩子将随父母双方的姓。当然，如果双方同意，孩子也可以只取一个姓氏——这将首次使随母姓成为普遍可能。

在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 (EIGE) 的最新指数中，意大利是排名最低的欧洲国家之一，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意大利家庭与机会平等部长 Elena Bonett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支持这项裁决，这是“我们国家实现男女平等权利的又一重要步骤”。她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一直有“男性传记故事”。“姓氏是一个人身份和个人历史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可以用女性语言来书写这个故事了。”

### 年轻的 LGBT+ 人士认为，现在的苏格兰比五年前糟糕

一份报告指出，苏格兰 LGBT+ 年轻人的生活“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要糟糕”，原因包括公共场所的恐同氛围、校园霸凌以及媒体对跨性别群体的报道等。

这项调查始于 2007 年，由苏格兰政府资助，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新报告收集到了 1279 份完整的回复，受访者的年龄从 13 岁到 25 岁不等，其中 35% 的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31% 的人认为自己是双性恋，19% 的人认为自己是酷儿。报告称，年轻人对苏格兰的好感度从 2017 年的 81% 下降到了 65%，这也是 15 年来的首次下降。与同性恋相关的欺凌却在上升，因此离开学校的参与者数量从 2017 年的 9% 增加到 13%。受访者还对主流媒体持高度批评态度，因为他们“未能准确反映酷儿人群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传播错误信息”。该报告出炉之际，正值苏格兰议会考虑修订《性别承认法案》，以在苏格兰引入一个新的性别承认法律系统。

### 极端高温正在影响印度和巴基斯坦

印度与巴基斯坦正被前所未有的热浪席卷，超过 9000 万人受到影响。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高于 40 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不断出现，而这两个南亚国家一年中最热的阶段还没有到来。

根据印度气象部门的数据，4 月底到 5 月初，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 43–46°C。巴基斯坦也出现了类似的温度，大片地区的白天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 5–8 摄氏度。不寻常的高温将加速冰雪融化，或造成河流干涸，此外还存在火灾风险，甚至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尤其是老年贫困人口。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在最近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出，本世纪南亚的热浪和湿热压力将更加强烈和频繁。[联合国新闻提到了](#)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的部分举措，包括关闭学校、向公众发布健康建议以及数个“高温行动计划”——首先识别城市中的热点地区，定位这些区域中的弱势群体，并评估他们面临极端高温的状态。但据 CNN 的报道，仍有大量农民、工人无法远离炎热，部分地区还出现粮食减产以及煤炭短缺。

### 波兰示威者们向俄罗斯大使泼了油漆

上周一，当俄罗斯驻波兰大使 Sergei Andreev 前往华沙苏联军事公墓献花时，数百名反战人士高喊着“凶手”和“法西斯分子”包围了他，两袋红色油漆从背后击中了他的头部。Sergei Andreev 和他的代表团很快回到了车上。当天是盟军 1945 年战胜纳粹德国纪念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Maria Zakharova 谴责了这次袭击，她说道，“我们不会害怕”，而“欧洲人民应该害怕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但波兰现任内政部长 Mariusz Kaminski 指出，波兰政府曾建议俄罗斯大使不要在公墓献花，并补充道，“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合法的”。

### 泰国爆发性侵丑闻，超过 15 名女性指控政要

泰国前民主党副领袖 Prinn Panitchpakdi 现在面临多项指控，包括性骚扰、猥亵

和强奸，超过 15 名女性对他采取了法律行动，第一位原告是一名 18 岁的女性。四月中下旬，Prinn Panitchpakdi 辞去了民主党所有职位，并被警方拘留，但他否认了全部指控，后被保释。然而到了 5 月 5 日，据《曼谷邮报》，他承认三年前曾对一名 17 岁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原告称，Prinn Panitchpakdi 在 2019 年让她乘坐自己的车前往火车站，在途中对她进行了侵犯。

Prinn Panitchpakdi 是泰国前副总理、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 Supachai Panitchpakdi 的儿子，于 2019 年加入民主党，并迅速成为党内的“后起之秀”。该党领导人 Jurin Laksanawisit 已就丑闻发表道歉，并表明“不会干预司法程序”。但代表受害者的法律援助组织人民律师基金会的 Sittra Biabungkerd 告诉路透社，“还有很多人仍然不敢站出来”。泰国社交网络随之兴起了关于 #MeToo 运动的讨论，人们对 Prinn Panitchpakdi 的行为以及司法腐败表示愤怒，一些活动人士希望年轻一代能带来新的女性主义浪潮。

#### 数百名罗兴亚人逃离拘留所，六人死亡

4 月 20 日凌晨 4 点 30 分左右，528 名非法移民逃离马来西亚北部的移民拘留中心，其中大部分是罗兴亚人。在他们逃跑后，附近的村民逮捕了其中的 88 人，并将他们交给了移民局。警方也发起了搜查，随后共有 300 多名非法移民被再次关押。

在他们匆忙逃跑的过程中，包括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试图穿过附近的高速公路时被高速行驶的车辆撞死。“尸体被扔得到处都是”，当地居民 Atan 在开车送孩子上学时看到了这起事故，Atan 告诉当地媒体《新海峡时报》。“那是一个悲伤的场景。无辜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马来西亚，大约有 18.1 万人被登记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中大约有 10 万名为罗兴亚人。马来西亚并未签署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因此那些没有证件的难民均被视为“非法”移民。罗兴亚人是主要居住于缅甸的穆斯林族群，在 2017 年一场残酷的军事镇压之后，许多人冒着危险乘船来到马来西亚。[海牙国际法院正在进行审判](#)，以确定缅甸军方是否对罗兴亚人犯下种族灭绝行为。

#### 纳粹字符在澳大利亚被禁止

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成为该国首个禁止纳粹符号（卍）的地区。周三（当地时间 5 月 11 日），司法部长 Jaclyn Symes 在宣布这项改革时表示，纳粹和新纳粹意识形态在维多利亚州没有一席之地。

政府推出了一项全新的禁止法案，民众故意在公共场合展示纳粹的标志符号（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可能会被处以近 2.2 万美元的罚款或 12 个月的监禁。但新法规也将有“适当的豁免”，包括用于教育、艺术及历史方面。国际犹太人非政府组织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主席 Dvir Abramovich 告诉《卫报》记者，“对于大屠杀幸存者来说，看到纳粹的十字记号就像面对一把枪一样危险。它在他们的心上撕开了一个洞。”



2021 年 3 月 17 日，札幌地方法院裁定，  
政府不承认同性婚姻有违宪法。

#### 东京承认同性伴侣关系，但不承认同性婚姻

东京市政府上周公布了一项计划草案，从今年 11 月开始接受同性伴侣的登记，承认性少数群体的伴侣关系。申请者将仅限于首都的成年居民，也包括外国人。其目的是“促进东京居民对性别多样性的理解，减少围绕性少数群体的日常生活不便，为他们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条件”。

2015 年，东京涩谷区成为日本第一个向同性伴侣颁发伴侣证书的地方。据倡导团体说，此后日本约有 200 个其他城市（约占总数的 12%）采取了类似措施。[共同通讯社报道](#)，东京市政府正在考虑允许同性伴侣申请市政住房，并有权在医疗机构为其伴侣签署知情同意书。但伴侣关系的认可仍然不等同于合法婚姻，日本法律尚未承认同性婚姻。[《日本经济新闻》](#)引用了同性婚姻活动人士寺原真希子（Makiko Terahara）的说法，“如果同性伴侣中的一方是外国人，另一方是日本人，那么这个外国人将没有资格在日本居住。”如果这对夫妇是已婚的异性恋，这就不是问题了。”

#### 因为游客太多，威尼斯推出了 10 欧元的门票计划

为了更好地管理每年夏季涌入的游客，威尼斯当局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对进入这座城市的一日游游客收取最高 10 欧元的费用。预订系将今年六月开始，试行半年，或许会在明年一月全面实施。试点项目目前属于自愿性质，旨在帮助该市更好地了解如何设置门票费用。

早在 2018 年，意大利政府就批准了这项措施，但疫情的到来推迟了计划的实施。然而就在今年复活节，人们发现游客已经回来了，据 CNN 报道，仅在复活节当天，就有超过 15 万游客进入威尼斯。当局表示这是为控制旅游业而进行的“艰难实验”。也有反对者讽刺道，“这是威尼斯作为主题公园的神圣仪式，你需要支付门票才能进入。”

#### 一个新的基金会成立，旨在帮助音乐界的性虐待幸存者

音乐行业资深人士、大西洋唱片公司首位女性艺人开发主管 Dorothy Carvello 宣布成立一个名为“Face The Music Now”的基金会，旨在为音乐行业中遭受性骚扰、性虐待的受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空间，帮助她们找到法律顾问，并专注于改变几十年来在音乐界普遍存在的、没有任何公共责任的制度化虐待。

据美通社的报道数据，在音乐产业中，72% 的女性表示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歧视、67% 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尽管 #MeToo 运动在多个行业蔓延，但音乐界尚未给出太多的反馈。为什么？调查记者 Tamanna Rahman 在给《卫报》的文章中写道，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男性掌握着通往迷人、有趣和性感的音乐制作世界的钥匙。”她采访了众多音乐行业的女性工作者：有的人发现男同事会在办公室观看色情影片，有的人在演出中遭到猥亵，有的人在颁奖晚会上收到性暗示。近期，英国著名 DJ Tim Westwood 刚被多名女性指控有不当性行为。就像 Tamanna Rahman 所说的，大部分音乐公司并不会去审查那些施害者，缺乏内部支持让女性只有两种选择：公开经历并承担所有的风险，或者保持沉默。但她也提到，随着女性高管越来越多，业内人士正变得团结，人们已经厌倦了看到自己的同事遭到骚扰后反而被贬低和解雇。

#### 英国推出首个药品检查服务

本月，英国首个由内政部授权的、正规的药品检查服务将在布里斯托尔启动。从五月底开始，人们可以将非法药物秘密地拿去接受免费检测，以减少与毒品有关的危害。自 2016 年以来，非营利药物检查组织 The Loop 一直在英国各地试点这一计划。

近十年来，英国因滥用药物而死亡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人们通常并不清楚他们购买的药品的成分与强度。除了药物检测，这项服务还将结合非评判性的、个性化的医疗咨询，帮助人们做出更安全的选择。

#### 西班牙或将成为欧洲首个提供月经假的国家

西班牙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有关生殖健康和堕胎权利的法案草案。草案提出了有关妇女健康的措施：在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女性每月可以休三天的疼痛病假，如果出现特别剧烈的疼痛，可以延长至五天。此外，它还计划取消部分卫生产品的增值税，以及规定学校、监狱等公共中心需要为女性免费提供卫生巾。这项草案预计于本月获得内阁批准，但政界人士告诉西班牙媒体 [El País](#)，发展还不确定，可能会有变化。

#### 柏林人正在记录俱乐部历史

在柏林俱乐部委员会（Clubcommission Berlin）和非营利组织 BerlinHistory 的合作下，一个全新的项目记录了柏林 60 年来的俱乐部历史，并追溯这个城市的酷儿文化。发起者们利用现有的应用程序 BerlinHistory 传递这些信息，在其中详细介绍了城市中超过 80 家业已关闭的俱乐部，包括在 90 年代末活跃的 Cookies、WMF、Imprint 以及最近关闭的 Greissmuehl 等。他们还强调了多年来住房开发和中产阶级化进程已经对柏林的俱乐部文化构成威胁。柏林俱乐部委员会在 Instagram 的项目公告上写道：“自 21 世纪以来，有一种被称为俱乐部死亡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Ryoji Iwata](#) on Unsplash

## 档案

# “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源，就是培养完整的人”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1 条动态。

### 职业教育法修订之后

5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该法自 1996 年颁布以来，首次大修。消息一公布，有媒体将新法的“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引起热议。后来，教育部专门辟谣，称其为“误读”。但是，“误读”背后反映的社会心理和教育焦虑倒是十分写实。

所谓“普职分流”，指的是中考过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要分离。简单说，学生上不了普高，就只能上职高。在过去一些年，这种分离甚至是强制的，而且要保证“五五分流”的比例。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比如 2021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普职比是 6.5 : 3.5。即使如此，许多家长仍然非常恐慌和焦虑。原因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所分析，当前的职业教育某种意义上成为阶层分化的工具。过早或强制分流使得一个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大概率被锁定在低回报行业和社会底层。没有一个父母会心甘情愿让孩子走这条道路。

所以，修订的新法放弃“分流”的说法，以“协调发展”取代，被看作是把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上升为类型教育，取消了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之间的差别，迈出改革的第一步。“立法都是原则性的，不会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明确，所以就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下一步搞高中教育，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值得好好探讨。立法还是第一步，只是打开了一扇门，开了门之后你走进去，怎么来设计高中阶段孩子们的教育，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姚洋说。

比如民办非营利组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熊丙奇就提倡建设“综合高中”。他称，“把所有高中都建设为既有普高（学术）课程，又有中职（技职）课程的综合高中，综合高中多样化办学，实行学分制教学，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普高课程与技职课程。在高中毕业后选择普通高考或者职教高考。这也就解决了中考后的分流问题——所有学生都进综合高中；又解决了中职教育问题——以融通方式开展技职教育；还整体提高高中教育质量，原来的普高学生也选择部分技职课程，原来的中职学生，也可以选普高课程了。”

但是，综合高中要办好不容易。熊丙奇认为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对技职教育的投入与技职课程的质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 3 倍左右；二是建立并完善职教高考制度。除了高职院校、职业本科，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以及综合院校培养技能人才的专业，都应该进行职业教育。这些院校、专业都应该通过职教高考招生，由此引导社会转变对职业教育、职教高考的认知。

相比之下，姚洋的改革设想和熊丙奇有类似的地方，只不过看起来更激进一些。他心中的理想方案是，6 岁上学前班，然后实施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等

到 17 岁之后再分流，这样孩子们完成了高中教育，心智也比较成熟，家长也认了，自己的孩子努力过了，考不上北大清华就认了。高中生的出口是什么？本科或者专科，专科包括高职，或者也可以去上中专或技校，甚至什么也不想上，就业也可以。有些人没上过大学，也做得很棒。”

如果说熊丙奇、姚洋的观点太“顶层设计”，那么服务中职学生与老师的公益组织“HOPE 学堂”组织的讨论“[《职业教育法》修订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要更接地气和具体一些。比如讨论中提及，新法强调企业的力量，但原本就没有处理好的“校企合作”乱象（如学生被学校当作廉价低端劳动力输送到企业‘实习’）存在恶化可能性；新法提到社会力量参与，那公益组织未来可以做更多事情，帮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回应更多职校青年的成长需求。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主任的刁文撰文则称，“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只有教育、人社部门的努力远远不够，我们的社会评价机制必须抓紧时间调整与改变。例如职校毕业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录、社会岗位招聘中非理性提高学历门槛、社会福利待遇如积分落户中的分数差级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凸显着职业教育的层次地位，客观上影响到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选择”。

重要的还有观念上的改变，像“HOPE 学堂”发起人梁自存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都提到了社会需要去除对职校学生的污名（觉得他们智力低下、道德不佳、坏学生、混日子等），职业学校的很多做法（比如定位是管住学生，怕出事）也不合理。

[梁自存回忆](#)：“去年在我们的协力营活动中，两个学生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在公交车站旁栽倒在地，立马过去把他扶起来，商量要不要打 120。我们的一个实习生后来说，事情发生时他自己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我和职校学生接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事，道德水平和学历没有关系。另外，关于智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智力类型，比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等等，学习成绩不好只能说明不适合学这类东西。此外，‘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划分也会影响到同学关系，大家会以老师的视角来评判身边的同学，‘好学生’和‘坏学生’不交往，激起同龄人之间相互不认可。”

苏熠慧表示：“批判教育社会学里面有个‘符应’理论，讲的是学校往往会提前为劳动力市场去打造适应的人格。今天一些职业学校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也是在打造一个个温顺的劳动力。但吊诡的是，这种军事化管理往往与其目标相悖，形成相反的结果。我在田野研究时发现，这也往往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甚至影响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我们很需要对这种管理进行反思，回到黄炎培先生他们所倡导的职业教育初衷上来。在黄先生看来，职业教育培养的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劳动力，而恰恰是一个自尊自强、有创造力的劳动者。”

其实，不仅是职业教育，究其根本，所有阶段和类型的教育都应该尊重劳动，重视人的尊严。“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源，就是培养完整的人。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教育是让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高尚的人、有远大理想的人，而不是蝇营狗苟的人，不是为眼前刷题所束缚的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培养的目标。”姚洋说。

###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 01

[上期](#)，我们探讨了防疫的代价，提到许多经济学者的思维方式是计算。这个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算账”惹起了争议。他从保生命角度测算称，“过去两年（中国防疫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10 天，平均每年 5 天”。而且，通过保经济，“人均消费每年增加 0.1%，折算成寿命能够增加 6 天”。

“怎么保？各地有各地的办法，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不要居家隔离，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还有“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上海市 2500 万居民，平均 4 口人住在一起，有 600 万家庭，我们政府能力这么强，600 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 10%，选出 60 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你一万块钱现金，60 万家庭 60 亿。……上汽一年交的税在 150 个亿以上，拿出上汽集团交税的 60 个亿给最穷的 10% 家庭补助，同时给被集中起来需要隔离的人现金补助，通过这种方式稳住未来消费，不要产生心理阴影”，李稻葵说。在[提问环节](#)，社科院学部委员（院内最高学术称号）余永定说：“我不能展开回答你的问题了，我已经连续做了十几天核酸，现在又弹窗，我得出去跟他们交涉。”李稻葵则称：“我只是算账，怎么看待人民至上、生命之上。至于具体措施，余教授的弹窗我解决不了。”李的这番言论受到许多批评，像对工人的隔离举措、上汽的税收变补助，包括算的账，经济学界内部也有不同声音，比如梁建章撰文[《和李稻葵商榷防疫政策的生命账》](#)，就觉得李忽视了过度严防死守的政策造成总的人均寿命损失。

“避免死亡的收益为 1 天，减去因经济下降造成人均寿命损失 5 天，答案等于负的 4 天。按照上述计算，每个月就会损失 4 天的人均寿命。可以说，过去两年成功攒下的人均寿命增加 10 天的盈余，几个月的封城就会全都被还回去。”梁在文中写道。

#### 02

上海等地长时间的“静态管理”，使得[疫情下人们的心理健康](#)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早在 2020 年 2 月到 3 月，中科院院士陆林的团队就对近 6 万名受访者展开调查。[研究](#)发现，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与心理健康的风险有关。在疫情期间有过隔离经历的受访者中，34.1% 的人至少会产生一种心理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失眠和急性应激障碍。最近，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提及团队做的两个调查。其中一个是在 2021 年 11 月调查了三十多万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心理问题的伤害上升很多。“孩子们‘四无’——学习无动力，没有家长和老师逼着，孩子们就不爱读书；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对真实的人和事情没有兴趣；第三，社交无能力；最后，对生命价值无感受。我们下一代受到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青春三年时光在疫情中度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经历过的一个悲剧，焦虑、抑郁、情绪失控、自杀现象都在上升。”彭凯平说。

另一个是今年 2 月到 4 月，他们在几个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做

了成人调查。“因为疫情的不确定、大规模暂停社会活动和经济的冲击，大家的心情的确不愉快，我们叫‘中产阶级不开心’。但是，反过来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变化，比如意义感加强，大家开始思考人生为什么活着、如何让自己活出积极的生命。总的来讲，社会情绪的低落比较普遍，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叫创伤后成长‘PTGD’(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创伤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们带来成长的力量，重新关注家庭、亲情、健康。”

彭凯平是国内积极心理学的代表，类似的，76岁的历史学者萧功秦在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也从积极角度分享了这段时间他在上海的经历和想法，称“每天看微信中种种消息，往往让我心焦，我也会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与读书。……可以说，我是疫情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中的一个。我力争做一个‘乐天知命’的现代儒者。”

在反思层面，萧功秦批判的是“国人的恶根性”，认为“专制文明千百年来，以及文革极端时代以来，积淀了许多看不见的民族劣根性，这种文化习性太深厚了”。这种说法也引来一些批评，比如微信公号“大家谈游学”发了一篇《[蒋瑞：与萧功秦老师商榷](#)》，就认为国民性这个概念本身太模糊，国民性也会受到制度环境影响，萧把当前问题归咎于国人恶根性，不从制度方面找原因，非常错误。

### 03

上个月，《小鸟文学》刊发王竟的《[谁能幸存于这个冬天？](#)》，讨论了德国对于俄乌问题的争论。这个月，围绕93岁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发表在《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关于乌克兰：战争与愤怒](#)》，争论继续发酵。

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乌克兰正在就德国前几任总理的对俄战略“误判”对德国进行道德勒索，而西方在决定不参战时，就已经注定陷入两难：西方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对乌克兰的武装援助。他赞成德国总理朔尔茨坚持“负责任的权衡”，认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对乌克兰的“仓促认同”实际上代表着德国和平主义者正在发生深刻转折，这一转折有可能预示着以对话和维护和平为主旨的德国政治模式的终结。

批评哈贝马斯的一方，像《[再见，哈贝马斯——德国是时候与战后的和平主义告别了？](#)》的作者朱易就认为，哈贝马斯和同龄的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坚定地信奉和平主义以及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历史的经验不应变成僵化的教条，以及“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要多”的优越感。更关键的是，像温克勒批评的那样，德国所谓的东方政策有被神话和美化的地方。它并不是和平主义理想的具体体现，倒更像是“闷声大发财”。

支持哈贝马斯的一方，如历史学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文章《历史转折之后：哈贝马斯与德国的新认同危机》(After the Zeitwende: Jürgen Habermas and Germany's new identity crisis)中称，事实上，平衡俄罗斯和德国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人比哈贝马斯更能体现这段历史。哈贝马斯反对的不是要求为乌克兰做更多事情的呼吁，而是这样做的方式，他担心德国道德上的不满者追求保守联邦政府的自信，自我意识会背叛自己，升级是一种可怕的风险。

“不久之后，欧洲可能会面临一场混乱的历史和政治时代冲突，不是在东欧，而是在大西洋两岸。正如哈贝马斯提醒我们的那样，马克龙的连任打开了另一扇机会之窗。欧洲会抓住它吗？”图兹写道。

### 04

被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堕胎权裁决草案，引发许多讨论，知识界尤以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发言为代表。83岁的她在《卫报》和《大西洋月刊》都发表了文章，认为强迫生育是一种奴隶制，需要捍卫女性的自由与权利。

她称，写作《使女的故事》时，中途几度停止写作，因为觉得太牵强。“然而，事实证明当时的我太愚蠢了。神权专制并不仅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如今在这个星球上也存在着这样的专制，又有什么能阻止美国成为其中一员呢？……如果阿利托法官想让你受17世纪法律的约束，你应该仔细研究一下那个世纪。你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吗？”

### 05

2022年普利策奖公布，其中，小说奖颁给了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的《内塔尼亞胡家》(The Netanyahus: An Account of a Minor and Ultimately Even Negligible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a Very Famous Family)。这本书重新想象了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亞胡的父亲参观一所大学校园的情景；获得非小说奖的是《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城市的贫困、生存和希望》(Invisible Child: Poverty, Survival & Hope in an American City)。该书源自作者2013年在《纽约时报》做的报道，讲述纽约一位无家可归女孩的故事；传记奖是已故黑人艺术家温弗雷德·伦伯特(Winfred Rembert)的口述《追我到坟墓》(Chasing Me to My Grave: An Artist's Memoir of the Jim Crow South)；历史奖则由讲述1772年一名印第安人被两名白人皮草商谋杀故事的《夜幕笼罩》(Covered with Night)和《古巴：美国历史》(Cuba: An American History)获得。

相比“正统”的普利策奖，颁给39岁以下年轻作家的狄兰·托马斯奖更新锐。今年该奖授予的是帕特里夏·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的《没人在谈这事》(No One Is Talking This)。这本书探讨现代网络文化，聚焦一位不具名的叙述者如何看待她在社交媒体上的名气，以及她在一个类似Twitter的平台“the portal”上的生活。

### 06

几条教育界的新闻引起争鸣。一是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二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撰文称，国内马克思主义呈“畸形”发展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越来越萎缩，但各个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发展，从2012年的100家发展到2021年底的1440余家，增长14倍；三是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今年9月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平

均每周不少于一课时。课程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型劳动三大类，具体内容包括做饭做菜、打扫卫生、种菜养殖。

### 07

几条出版界的新闻让人忧虑。一是考古学者许宏在《中国文化》上发文批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毛峰编著的《中华古代文明之光》存在诸多问题，揭露学术乱象；二是浙江大学副教授王慧敏撰文批评《美国高等教育史》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版，收入“甲骨文丛书”）错译太多。目前该书已下架；三是网传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钟焰的文章《[翻译出版不能为反华学者及其著作洗白——从白桂思<丝绸之路上的帝国>的中译本说起](#)》，该书疑似近期被下架。

### 08

几本英文世界的新书值得关注。一是谢尔希·浦洛基关于核灾难的全球史《原子与灰烬》(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s)；二是探讨21世纪暴政的《权力的复仇》(The Revenge of Power: How Autocrats Are Reinventing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和《操纵舆论的独裁者》(Spin Dictators: The Changing Face of Tyranny in the 21st Century)；三是杰夫·戴尔讨论自己和其他作家、画家、运动员、音乐人等中晚年的《罗杰·费德勒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Roger Federer: And Other Endings)。

### 09

4月27日，美国作家爱默生逝世140周年，他的思想被看作确立了美国精神文化，所写的随笔影响深远；4月30日，《申报》创刊150周年，上海学术界举行了一场云座谈纪念；5月14日，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逝世110周年，他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戏剧的先驱，著有《斯特林堡文集》(全五册)；5月19日，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逝世60周年，他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常被人提起。

### 10

5月2日，文物专家谢辰生(1922—2022)去世，他一生致力于文物保护，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5月9日，演员秦怡(1922—2022)去世，她见证了百年中国影史变迁；5月16日，沙漠地貌学家夏训诚(1934—2022)去世，他曾38次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驻疆超过50年，对沙漠研究及治理做出很大贡献。

4月23日，美国学者谢尔顿·克里姆斯基(Sheldon Krimsky, 1941—2022)去世，他一生探究科学、伦理和生物技术之间的关系，著有《私利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Private Interest)等；5月2日，以色列法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 1939—2022)去世，他是当代道德、法律与政治领域的杰出学者，法律实证主义最强有力的辩护者之一；5月8日，韩国诗人金芝河(김지하, 1941—2022)去世，他曾因民青学联事件入狱，致力推动韩国民主化进程，一生想用诗的力量改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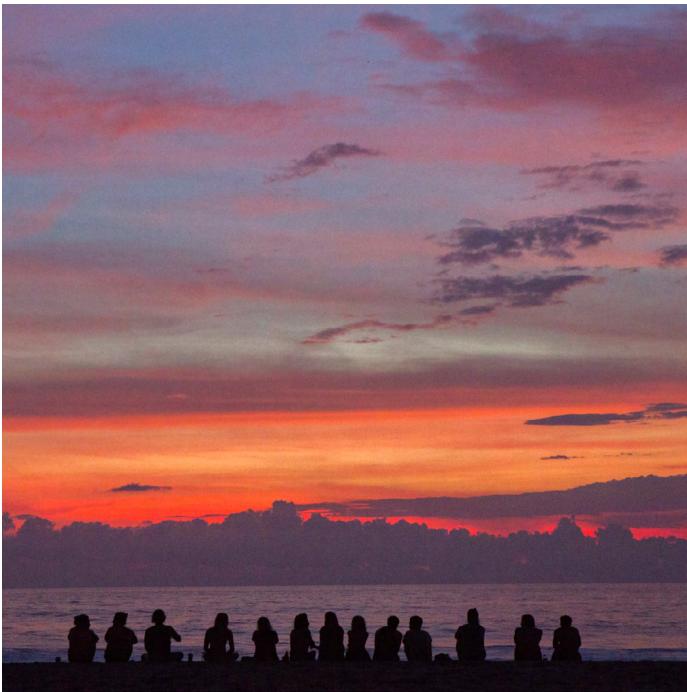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Cristina Cerdá](#) on Unsplash

## 档案

# “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的”

方可成 | Newsletter

这是小鸟 newsletter 的第十七期。

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好自己的精神状态，保护好自己的内心。长期的封锁对人的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和重视的。尤其是那些和同学一起挤在狭小宿舍的学生，那些被迫露宿街头的同胞，那些手停口停、没有铁饭碗的劳动者。

甚至都不只是心理健康层面的影响，还包括我们的世界观。今天读到一篇[文章](#)（《孩子是这场大流行病最大的受害者——反思德国疫情封锁措施的得与失》），里面有很多洞见。我在这里最想分享的是这一段：

以上种种以保护之名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的措施……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了一种扭曲的道德观和对人的定义，即人只有放弃工作、学习、文化艺术和宗教活动等等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这些活动据说是病毒传播的元凶，尤其是年轻人的‘派对狂热’成为了感染率居高不下最方便的替罪羊），他们才能成为一个道德上完善的人。然而，正是这些活动使人区别于动物。也就是说，只有当人放弃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他们才能成为大流行病期间的“新人”。

这样的论述是很深刻的——防疫措施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应该”。在一些情况下，赤裸裸的排外、歧视和暴力，可以变得“正常”和堂而皇之；而人之为人的一些基本需求和特质，则可以变成“不正常”、“不应该”乃至“不道德”的。所以，如果你受到了长期封锁的影响，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是：尽量保持正常，不仅是心理健康意义上的正常，而且是人性本质上的正常。

怎样保持呢？我最近的一个心得是，沉下心来看一些好东西，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欣赏的智慧与美——那是我们一辈子都欣赏不完的。触发我这个想法的，是获得今年普利策新闻奖解释性报道奖的一篇[文章](#)（*The Webb Space Telescope Will Rewrite Cosmic History. If It Works.*），出自科学媒体《量子》杂志，讲的是人类迄今建造的最大的太空望远镜。我为了在[付费会员通讯](#)里面介绍这篇文章，花了快两个小时阅读，那可能是我最近花得最值的两个小时了。我在这里忍不住想要分享我翻译的文章开头给大家：

要想回头看看宇宙的婴儿时代，见证最初的星星是怎样开始闪烁的，你首先需要打磨一面像一座房子那样大的镜子。这面镜子的表面必须非常光滑——光滑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一个大洲那么大，那么这个大洲上的山丘和峡谷的高度都不能超过你的脚踝。只有这样一面巨大而光滑的镜子，才能收集和聚焦那些从天空最远处的星系传来的微弱光线。这些光线在很久很久之前就离开了它们的源头，因此能够展示这些星系在很久很久之前的样子——那时，宇宙还很年轻。我们能看到

的最微弱、最遥远的光线来自一些星系还在形成的时候，那时，神奇的力量在黑暗中共同作用，最初的一批星星开始发光。

是不是很棒？读完全文，我的感受是：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的，只要我们把时间和注意力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

向你问好。祝你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保持内心的稳定和正常。

我最近读了……

### 1. [A Teacher in China Learns the Limits of Free Expression](#)

何伟在《纽约客》的新文章，以他遭遇的举报事件为由头，对比了自己二十多年前在涪陵教书以及最近两年在川大教书的经历。就像他的所有作品一样，有的是故事和深描，没有什么黑白分明的结论——二十多年前的学生其实更加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又有一种初入新鲜世界的好奇；现在的学生其实懂得更多，对体制的运行更谙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老大哥狂热支持者，但是他们又更加现实主义。何伟认为，高强度的竞争实际上对年轻人有一定的驯化作用。但是，他又认为，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完全被剥夺主动性，他们还是能读能写，能观察能思考。

结尾是他和川大学生媒体《常识》的同学们的对话。他发现，这些同学几乎都是女生，他接触过的女生是小粉红的概率更低。虽然不少同学觉得最后还是只能逐步适应这个体制，但仍然有一个最小的女生说，将会改变它。

### 2. [The Only Five Paths China's Economy Can Follow](#)

北京大学教授 Michael Pettis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分析。他认为前方有五个选项，有的选项会陷入更深的负债当中，有的选项能提供很好的前景然而需要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深度改革，因此最有可能的前景（也是此前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是陷入长时间的缓慢增长。

### 3. [A Remedy For FOMO](#)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是一种社交媒体年代常见的情绪——如果不刷朋友圈、不看微博，我是不是会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篇文章试图给身患 FOMO 病的人提供一种解药，文章本身的讨论深度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交媒体本身，而是到了一个哲学层面，那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心里在想“如果我看了 / 做了那个会怎样”的时候，这种问题是不是从根本上就是无意义的？

作者介绍了法国哲学家 Henri Bergson 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的自我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成熟的，我们每做一个决定、每进行一项行动，我们的自我都会发生成长。只有发生了的行动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实现了的事情才能称为可能性。所以，去想那些“我没有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略有删改，经作者授权转载，摘自[新闻实验室免费版 newsletter](#)。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新闻学、政治传播和数字媒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政见 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和放晴公园发起人。在加入学界之前，他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时政记者。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流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Thought Catalog](#) on Unsplash

## 专栏

# 上苍保佑他国人民不饿死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 思想问题解决了，再来解决肚子的问题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很多平时不劳动的人以为这一天就是要让他们劳动的，但我相信他们不是这么头脑简单的人，否则七一八一十一为什么不见他们建党建军建国呢。上海人民就不要参与劳动了，最好躺床上歇着，就像 1959—1961 全国人民挨饿的那三年，学校提倡“劳逸结合”，学生们只上半天课，下午回家休息，老师还一再嘱咐少活动，尽量躺在床上歇着，说白了，就是怕折腾饿了还要再吃粮食。那时候大家很少串门，即便春节也不留在亲戚家吃饭，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今天多吃一顿明天就要少吃一顿，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张楚有一首歌叫《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吃完了饭有些兴奋，在家转转或者上街赶赶”，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解封以后的上海人民，想象一下那普天同庆的祥和气氛，甚至我都觉得上海市民从此以后会变成陕西关中平原白鹿原上的老汉白嘉轩，一到饭点就端着个大海碗蹲在淮海中路的梧桐树下吃裤带面，讲究生活品质的上海人，右手边还会放着甘肃民乐县的紫皮独头蒜，左手边是一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Gr-1 级耶加雪菲咖啡，柑橘味和花香融合着蒜香，让身处经济中心的人民时不时地怀念起政治中心。

人民吃饱饭太久了，反而容易忘了吃饱饭后的幸福感以及吃饭前该感谢谁，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我想大家都明白了，除了感谢自己勤劳的双手或者父母的恩赐，还要感谢那些不封堵拦截阻碍你的工作人员。张楚的词写得很好，好到连接历史预见未来，“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历史经验表明，吃得再饱，也不能说自己撑，饿的时候一定要喊出来，否则就会造成 1958 年那样的“误会”。1958 年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各地粮食亩产的卫星纷纷上天，给人的感觉是粮食太多了，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农村公社食堂出现了放开肚皮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同时国家还增加粮食出口以及援助别国。事实上，这个时候全国缺粮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当然不是什么误会，也不仅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和选择，但饿的时候，一定要喊出来，就像当年武汉疫情发生时，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的那句名言，“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要到处说”。

对于挨饿这件事，我们是有经验的，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传统的先进性经验，但我们的人民群众却是麻痹的大意的，似乎有忘记这种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的倾向。要知道，饿是比包更神奇的东西，现代人总说“包治百病”，而古代劳动人民早就有“饿治百病”一说，“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一直被认为对生命的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看到这里，你大概能明白上海人民前段时间为什么“食物短缺”了，不得不说，用心良苦，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在物资储备充足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海，会出现“食物短缺”这种现象。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药饿肚也利于病，连花清瘟胶囊你以为只是药，它其实也是粮，吃太饱会影响药效，中国人有很多病都是吃饱了撑

出来的。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世界粮食价格一直在攀升，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全球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粮食危机。我也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粮食危机的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说，俄乌冲突将在全球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说，俄乌冲突将对今明两年粮食价格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对贫穷国家的民众生活造成最大冲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供应问题正在加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困境。前几天我们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开了新闻发布会，要求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工作。

写完上面一段，其实我停下来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我给了老家堂弟一些钱，让他为亲属们多囤些保质期长的大米和午餐肉，一个是我把文章标题从“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改成“上苍保佑人民吃饱饭”，后来又改成了“上苍保佑人民不挨饿”，最后还想改成“上苍保佑人民不饿死”，考虑到国情现状和伟大复兴正在进行，我觉得还是改成“上苍保佑他国人民不饿死”最为贴切，毕竟，挨饿，我们是有经验的。

解决群众挨饿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让群众知道自己为什么挨饿，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某些敌对势力在下一盘大棋肯定主要原因。此外，国内的经济其实依然逆势上涨，但也有一些问题，问题在于群众自身，比如说日常的浪费，比如说懒惰，比如说年轻人只向往城市的灯红酒绿而不愿留在老家乡村振兴……，可以拿出 1960 年的《人民日报》再学习一下话术，“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 1958 年和 1959 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这就是当年解决挨饿问题的思路，首先保证思想不挨饿，一如既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另外就是合理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缺粮，要让群众知道缺粮是国际形势和自身太能吃造成的，其他的就好办了。思想问题解决了，再来解决肚子的问题，以往的经验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当年在推广“代食品”时，尽量不提它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是将“代食品”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比如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所以，很多不会种地的音乐人不用担心自己将来会挨饿，只要肯为社会做贡献，肯定给你优质馍。

下面是科普时间，知识改变命运，而且是生死之命。在挨饿的那三年里“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磨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我以前听我奶奶和爸爸说起过他们当年吃的东西，基本是第一类里的小麦壳、红薯叶茎根再加上第二类的榆树钱、洋槐叶和野苋菜，当然还有野地里其他那些能吃的东西，吃这些即使饿不死，也会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我奶奶有几个孩子死于那个时候。

民以食为天，所以在管理民的时候，食更要管，官方不止一次说“粮食安全”是国计民生的“压舱石”、固国安邦的“稳定器”、民族复兴的“顶梁柱”、全球博弈的“定盘星”……所以当年上面指示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时，我跟几个做美食工作的朋友说，你们要提高思想意识，增强全局思维，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把食评人的身份安放到时评人的角落，学会自我审查自我阉割自我检讨，粗茶淡饭就是美食，清粥小菜就是美食，勤俭节约就是美食……千万不要搞什么美食盛典，这绝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安全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

1959 年，有些地区组织群众到野外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称为“小秋收”，《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上海的媒体真需要好好学习下这篇文章，当网友发布“外滩长草”的消息时，你们要做的不是紧急辟谣，而是做好调研工作，找植物学家辨别是什么草，是否可食用做代食品，是否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外滩长草不丢人，饿坏了上海人民才丢人。

上海市民对于媒体这种连夜辟谣的行为很不满，其实他们不满的并不是媒体更在意外滩长不长草，而不管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他们不满的是你们居然可以随意走动，随意到外滩长没长草而走动，这对于封闭已久的上海人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事情，这可是随意走动，这可是外滩……这种事情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和诱惑性极强，明明派个无人机就能干的事，你们居然派人类前往，明明可以借此展示科技性，你们非要展现人性。能不能学一下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他们收到求助信息，一位家住徐汇区的老年癌症晚期患者缺药，需要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领取紧急配置的药品。经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协调，上海市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应急通信保障分队立即规划航线，出动了两架无人机接力，飞跃黄浦江，执行了一次约 20 公里的飞行运输任务。

这是非常克制的一次任务，明明派个人类也能取回药品，但为了不让那种“人类自由活动”的假象引诱到尚在封闭中的人们，让他们继续克制肉体对自由的渴望，组织上最终选择了无人机，无人很重要。对于这件事，有些群众不理解，说什么“为什么不派两个人匍匐前进去取药”“为什么不派五千个大白手传手接力递药”“怎么，桥是被炸了吗？”这类群众的觉悟是极低的，是参与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他们连外滩上的野草都不如，的确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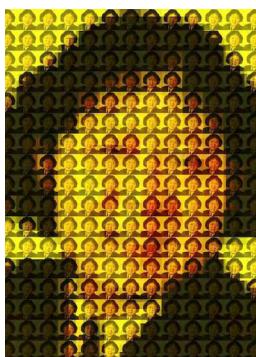
外滩上的野草长高了，而连桑家乡的樱花也开了。连桑就是最近很受关注的离岸爱国微小电商从业者连岳。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微信公众平台新增了基于 IP 地址显示文章发布地区的功能，这让大家知道了连岳是在日本，其实去日本也没什么，即便

连岳说过“我对那些移民日本的人说：别去，你迟早会被类似奥姆真理教的组织毒死。”但连岳在这件事上撒谎了就变得有意思了。他先说自己是去旅游，但日本自疫情以来，就没有对旅游者开放过，后来连岳发文说是去日本治病，强调自己“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弄得好像自己得了绝症一样。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病，连祖国都治不好他。连岳最新的文章里说“我前半生好静，后半生静极思动，倒是想不时走一走，以后若是看到我的 IP 属地显示是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伊朗，是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再骂我了。”很多人读不懂连岳这段话的意思，我简单翻译下，我前半生没挣到什么钱，现在靠“爱国”在你们身上挣到钱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走走了，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古有隔岸观火，今有离岸爱国，其实连岳从未隐瞒过自己，只是你们不识拼音而已，连，lian 即是离岸，岳，yue 即是余额，离岸爱国，余额充足。其实真的不想说这个人，因为一些交集甚至希望他安好富足，但这两个字，以及它们名下的文字，又那么让人鄙夷和不屑，面对那两个字，我只是要求我自己，既然提到了，就应该有明确的立场，不是为了进攻，而是守住自己。

我朋友圈有位上海的朋友在四月即将结束之时总结了一下：核酸 19 次，抗原 18 次，团购 20 次，接龙 18 次，收到政府物资 6 次，公司暖心物资 1 次……封闭管理 49 天；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我把罗曼·罗兰的话借着他的生活修改了一下，“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做了三十次核酸检测认清病毒的真相之后，依然在做核酸检测”。

五月来了，不知道上海市民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我知道他们一直在等待，就像《站台》里唱的那样：

哦～孤独的站台  
哦～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专栏

# 你们看到了世间的烟，却没看到人心里的火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仿佛在问，是生存还是毁灭，  
没有人关心人性。

前几天，5月16日，日子突然文艺起来了，或许是因为汪曾祺老先生的加持，1997年的5月16日，他留下众多抚慰人心的句子，离开了越来越令人生厌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一天发了一篇《今天，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为什么爱读，读完了可以不用做核酸检测，读完了可以往家领两箱可乐，读完了可以上外滩散散心，读完了上海可以早日解封……那你读的不是汪曾祺，你读的是科幻小说，你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文艺界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老先生更像是用文字开了一个茶馆，而他本人就是阿庆嫂，“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当然，他有自己的唱腔，“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简言之，汪老是文学按摩师，而且还不是那种藏在深闺和庙堂的按摩师，他开的是街边店路邊摊，他按摩了这个社会最大多数人们的焦虑，抚慰了他们意最难平的时代情绪。

都说乱世读鲁迅，平淡的日子里，读汪曾祺，我觉得却应该反着来，平淡的日子才需要刺激，而乱世之中却亟需心灵港湾。鲁迅的文字里充满了挣扎和呐喊，汪老的文字里没有抗争和撕裂，而是充满了对世人的悲悯和抚慰，看上去温馨又从容，但又不是现在小清新们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岁月静好风格，他的文字中有独立和对抗的意识，只不过是被包裹的严严实实，就像不沾阳春水的十指，偶尔也还是会为君做一下汤羹的，就像他在《人间草木》里写的栀子花那样，“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是有烟火气的，或许是人民网的记者读了太多汪曾祺，想在这世事纷扰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写一篇充满烟火气的稿子来抚慰人心，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报道，“5月16日起，上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早餐店、烧麦店、小吃店、快餐店、菜市场、理发店、大型超市、门口小店……人间烟火气，正袅袅升起。”看完这段相声贯口，我感觉作者应该是受了工伤，可能写了太多的清零、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一类的稿子，我以前只是分不清清零的种类，现在连小吃店早餐店快餐店门口小店也分不清了。

媒体记者这么写，无非是想在经历了重重磨难的上海街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复苏景象，营造出大国抗疫取得胜利之后，各类社会活动开始有序推进的氛围。其实，氛围可以营造得再热闹一些，但恐怕人们早已心灰意冷，心中那团火灭了，你看到的就只有烟了。不是说烧火做饭的早餐店多了，生活就有烟火气了，汪老先生说的烟火气不是

烧烤摊上的，而是“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汪老先生的意思很简单，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做真实客观的报道，总是一味涂脂抹粉胡说八道，人民根本不相信，更不会仰望，没有人民的信仰，国家哪来的力量，民族哪来的希望。

上海人民应该是真不在乎什么烟火气，他们闻得多的是咖啡的香气，我们不能像春节联欢晚会一样，动不动就“家家户户都在吃饺子”，中国也有吃不起饺子的，更有不吃饺子的地方。人间烟火，明明可以像“我有酒你有故事”“我吃饱面你吃瑞士卷”一样浪漫：我有烟，想找你，借个火。但却经常被宣传机构演绎成烟雾缭绕的烧烤摊上，扒蒜小妹和金链子大哥的东北乡村爱情。我们不能只顾人们身上的烟，更要关注他们心里的火，心里的火灭了，想要再次燃烧起来就难了。

看了那些关于上海复苏的宣传报道，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但在很多上海人看来，那番景象，宛若平壤街头，哪有什么烟火气，上海人民心里现在更多的应该是火气。更为压抑的是，以往在各个领域被我们拿来对比，用于安抚自己情绪的朝鲜，这次在抗疫这件事上，居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并且这种领先是发生在我们外交部发言人郑重承诺“作为同志、邻居和朋友，中方随时准备为朝方抗击疫情全力提供支持帮助”，这就好比作为学习委员的我们，考前跟班上倒数第一的同学说，我会帮你补课的，别担心自己的成绩，反正也不会更差了。结果成绩单一出，居然比你考得还好。

有些事就怕对比，就像国足就怕比赛一样，不比，我们永远可以宣称自己世界第一。朝鲜是一个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过去几年，国际卫生组织还有中国几次向朝鲜提供新冠疫苗援助，都被拒绝，理由是“朝鲜现在不需要，把疫苗给世界上更需要的国家”。这就好比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拒绝了同学们帮助其补课的机会，还对同学说“我不需要补课，把机会留给其他更差的人”。不过从最近朝鲜公布的防疫数据来看，他们考得好像还真不错。特别是在全世界都以为贫穷落后封闭的朝鲜，在面对疫情爆发时，唯一能做得起的事就是让朝鲜人民多喝热水。曾有过这样一个观点，假如朝鲜能够战胜疫情，那么地球上其他国家最终也会战胜。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对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跟朝鲜相比，虽然财大气粗，虽然有大面积的接种新冠疫苗，虽然有全社会反复多次进行核酸检测，虽然有大量的方舱收治隔离感染者和密接人员……但是他们没有白头山天降伟人。有伟人的国家，毫无疑问会彻底消灭病毒，是消灭，不是战胜更不是共存。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接受的，那就是朝鲜真的在没有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战胜”了疫情。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但相比我们的动不动就停工停产停业停课停下了生活，以及各种级别的封闭管理措施，足不出户、足不出小区、足不出社区、足不出市区……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天的惶恐不安，那么多亲人间的并非死于病毒的阴阳两隔，如果我们的人民承受着这样的痛苦，结果最后取得的成绩还不如面对疫情时顺其自然躺平且躺赢的朝鲜，那我们真的无言以对和无颜以对了。西方的抗疫成绩和现在的开放程度，我们可以熟视无睹可以不予承认可以严正警告他们对本国人民生命的不负责，但和我们友谊万古长青的朝鲜交上抗疫答卷时，我们先是震惊，然后……把他们的相关信息封锁了，连朝鲜都封，听到这个消息时，比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被封还令人震惊，或许朝鲜也都没想到，怎么连朝鲜都封，病毒也没想到，你们连朝鲜都封，病毒，已经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几乎存在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什么风浪没有见过，如今，他们被人类的行为震慑住了，人类一病起来，比病毒还毒。

跟病毒一样被人类疯狂行为震慑住的还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麻雀。1955年，毛泽东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这其实不算指示，这是提出一个问题，还好当时的干部是有专业科学素养的，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学森回答说，“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这才是严谨的科学的管理理念。但就在几天后，毛泽东同14位省委书记共同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要不是病毒个体太小，现在估计也被我们捕杀得所剩无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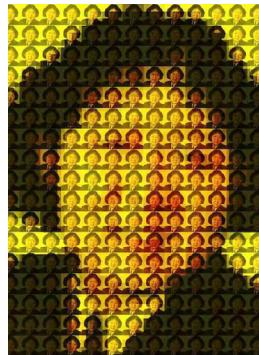
1956年10月，在全国动物学会会员大会上，实验生物学家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大多数科学家也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1957年10月，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关于麻雀的内容改为‘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上海就是其中之一。都说群众运动可怕，但我们得看到所谓的群众运动，群众只是演员只是提线木偶，背后的权力之手才是罪魁祸首，不尊重科学知识，不走科学发展观道路，不执行科学发展纲要，这样的权力不仅使麻雀遭殃，还让人民群众跟着承担恶果，上海自1958年4月27日至29日共捕杀麻雀五十万余只。这直接导致1959年春，上海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这件事放到现在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对于病毒，是不是也该“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与麻雀共存，与病毒共存，把消灭病毒用的劲头和成本节约下来，好好发展一下经济改善一下民生不香吗？

当然，如果你们还是想消灭病毒，当年消灭麻雀的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首先发动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都上阵，做到人人手里有弹弓，不会使弹弓的就敲铜锣，没有铜锣的就敲脸盆，没有脸盆的你就扯脖子喊，为啥这样做？为了吓唬麻雀，不让它落地，不让它落在树上，不让它落在房檐，不让它落在水边，不让它落在庄稼地……累死渴死饿死它们。对于病毒也可以这样，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天三次核酸检测，大棉花棒子捅，早上一大早，晚上深半夜，中间一次随机，让病毒早上睡不好，晚上不敢睡，中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睡，捅死它吓死它累死它折腾死它。这样以来，不知道病毒害怕了没有，反正人类是怕了。

或许是真的研究过当年消灭麻雀的战术理论，5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的署名文章《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坚决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文章称，“完善常态化监测机制，省会和千万级人口以上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每周定期检测，重点人群加大检测频次。……收治隔离能力再加强，提前规划准备定点医院和亚定点医院、永久性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点，把防控的人力物质资源备足备齐，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迅速启用。”很明显，当大家都觉得疫情快过去了上海快解封了，政府已经开始在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了，不灭病毒誓不收兵。这让我想起罗大佑的《恋曲1980》，“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病毒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卫健委马主任给你答案了，永久性方舱。

2015年，“我想静静”曾入选年度网络用语，谁能想到七年后，我们实现了全民静静，就连种地的农民也实现了静静，5月15日有人在人民网向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县委书记留言：我是住在磁县鸿翔家园的一位家庭农场主，我在岳城村承包着一百多亩地，现正值小麦灌浆的管理期也是春玉米的播种期，我想问一下咱县是否可以给办理通行证。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县委办公室社情民意办5月16日回复：网友您好，您反映的问题我们感同身受，但是目前我县正处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全县全域必须保持静默状态，民众必须做到足不出户。目前还不能办理通行证。保持静默、足不出户就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尽快将病毒传播链斩断，就是为了尽快将病毒扑灭，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还希望您及其他农民朋友多理解。其实我并不理解，但好像又有点理解，不让种地跟斩断病毒传播链这两件事如何产生关联呢？谁是病毒传播链，人类，不让种地，就是饿死人，人死了，传播链就断了呗。这当然是玩笑，肯定是玩笑，但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这样的玩笑在历史上被实现出来的次数不少了。现在，在各地消灭病毒的战场上，依然有那么多人不讲科学不讲法治不讲道理，在夜以继日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层层下达层层加码层层扭曲的指令，他们在废寝忘食地干着些因噎废食的事。很多事是常识，但有些人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不按常理出牌做得久了，大家就会怀疑自己的常识，反而觉得对方高深莫测，但事后一品味，其实就是一个蠢字。这个过程特别像一个词：入室消杀。入室原来是指学问或技能已达到高深莫测的境界，加上消杀二字，就立马变得愚蠢起来。当然，也很可怕，比引狼入室、入室抢劫还可怕。很多科学家说入室消杀没有效果，难道现在入室消杀是为了阻止病毒传播吗？不是。是为了用实际行动和无比坚定的意志震慑病毒吓死病毒，病毒有病，我们比你们还有病，病毒有毒，我们比你们还毒。人类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它们，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躲进人类家里，就可以长期与人类共存，你是躲进了家里，但是你没有房产证，即便你沾染在了房产证上，小区门口的保安大爷也会告诉你，别以为你有了房产证房子就是你的了，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是我们的总方针。病毒在人间游荡这三年，若是稍微有点良知，看看这人间惨剧和众生蠢相，就应该早日主动退去。或许病毒面对这人间疾苦，也早已心灰意冷，这阳间比阴间还冷，这人类比病毒还能折腾，它累了倦了，它想回家了，它写信给家里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每个入口都有人在审问，是阴性还是阳性，仿佛在问，是生存还是毁灭，没有人关心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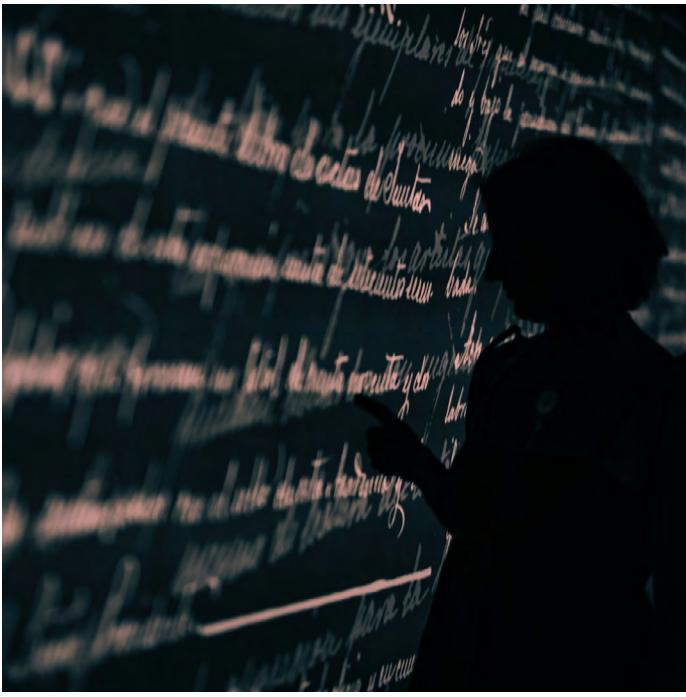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良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 档案

# 天气不错啊，各位长官！

伊险峰 | 荒诞笔记

要辨认一个地方是否粗鄙、残忍、被污染，  
那你就看这里的语言是否粗鄙、残忍、被污染。

### 01

有一天看到一个词，叫“婚驴”，脑袋嗡一下，这是什么？如何会产生这么恶意的文字？它有点像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粗鄙的语言一日多似一日。大多数人都从瞠目结舌到容忍到随波逐流了，像“屌丝”这种词，最初我们开会时大家都张不开嘴说这个词的，后来假装成了现象，就都会咬得又准又狠地吐出这两个字。再后来，各种逼都不在话下了，这种文明交流中所不能容的，不管男生女生不管什么会上，大家都谈吐自如，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出来一个词叫“逼格”，它竟然不是骂人话，你知道吗？我们前面说的词在很多语境里都是骂人话，至少带有强烈的歧视性——你会说有些人用来自嘲，这其实更残忍，因为自我矮化也是歧视的一种。

说到“逼格”的时候，它不是骂人话了！你说这堕落的。说文字有阶级性，意识形态化，不足信，但如果粗鄙语言必定是对应着一个粗鄙的人群，我觉得这就没错。在这一点上，粗鄙倒是称得上准确的，它就是现如今粗鄙人生的一种自然反应。

因为各种粗鄙的词大都来自于民间，这个结局总是会被怪到唯流量是图的自媒体身上，仿佛资本操纵着流量又犯下一宗重罪。百多年来，与知识民主化潮流相伴而来，语言简化和平民化是大趋势，人人都可以在语言上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原来的精英主义风格消散，这也正常。但简化和平民化未必等同于粗鄙，还有一些文学，看似粗鄙，其实极为精细，比如王小波。如果不谈文学，谈田间地头的笑话，那和“逼格”也不一样，这其中可分辨的挺多，归纳来归纳去，只能说我们相当不幸，如今日渐主流的语言风格就是实实在在的粗鄙本身。

粗鄙有自己的原因，还包括了一种荒诞的宿命感。

当年文明倒退，语言粗鄙化，三个可能的原因：革命化的口号；农村包围城市的乡土文化，确切地说是流氓无产者的农村乡土文化包围城市和精英的乡绅文化；少教育一代，特别是少教育一代占社会总人口多——别人婴儿潮一代是跟着经济腾飞，顶多在年轻时空虚荒芜，到了中年立马中产，稳定代表资本利益和社会中坚，转眼成为各种新旧保守势力的中流砥柱（虽然寅吃卯粮三十年之后终归有点茫然）……我们这里婴儿潮一代影响发力晚，但一旦发力，从文化到文明，从庙堂到江湖，所过之处天翻地覆。宿命，就在那里。

### 02

我看秦晖教授的公众号，经常有一些莫名的字，比如“民煮”“舆论尖都”“陷正”“砖制”等等——这还都出现在标题中，内文里更是葩葩癞癞触目惊心。我以为秦先生文字是要留在历史中的，不用隔几百年，隔五十年，有人翻起这些文字，会想那时候秦先生在忙什么？

熟悉前朝旧事的人会介绍当年种种：先贤秦晖先生皓首穷经，与助理探讨到底是哪个词出了问题，是不是“民煮”改成“皿煮”就发得出来了，或者哈哈笑着得意，今天一遍而出，规避了所有敏感词……后人眼中，这得是一个多可笑的时代？怎么赞美看着也不踏实。有了“清风不识字”，还有脸说康乾盛世？这事，两个感慨，一是替前辈心痛，很多文章不能发布，沦落到自媒体来指点世人迷津，不止于此，还要时刻检点毕生所学到底哪些是敏感词不能公诸于世；二是觉得我们的知识共同体，自己处境倏忽间就已经给糟蹋到这一步了，这共同体把自己逼到这样绝路上，自己灰心绝望之余，真的不想想共同体到底哪里不争气？

所以，眼下“观止”离现世可能要十万八千里，我们能说想说的话，准确——不论是字、词、还是思想逻辑，表达准确，才是第一要务。这就跟 1980 年代初中国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假装的“礼仪之邦”并不存在，现实是要从“五讲四美”、从学会说“你好、谢谢、对不起”开始一样——它让人眼前一黑，而且充满荒诞：我们这些年都忙什么了？几十年了，社会文明了很久，为什么不能让一个学者大方地写“宪政”二字？当然，这个提法也不够准确，更准确一点的说法是，为什么容不下一个人说他可以说的话，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

上海 2022 年 4 月疫情的时候，有一首诗飞快消失了，前两行是，“试着勇敢一点，把 zy 写成自由。”

恐怕这已经是深入一代人骨髓的习惯。他们未必想到自由表达的权利，未必是在规避文字审查，甚至未必在说一些但凡需要勇敢一点的话——他们只是理所当然。这是最可怕的。

### 03

另一个我们不自知的是，我们的吵架语言和吵架逻辑。现代白话文开始就论战，两大白话文大师——鲁迅和毛泽东，嘴都跟刀子一样。毛有辩证法，偶有诡辩，你要跟他较真，他跟你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鲁迅是天才，又是我爱的大作家，但从白话文的杀气这一点看，他的贡献是负数。

所以，作协主席网路上吵起架来，顺嘴一说，就是“粉蛆”这样的词。从作协主席嘴里出来和从市井嘴里出来都是一样的。我即使一万个赞同方方，我也不能觉得她说别人是“粉蛆”是对的。“粉蛆”既是骂人话，又是吵架的工具语言。连“粉红”都应该慎重使用，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标签，是吵架用的标签。

我们做采访，研究年轻人行为或者思想。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这么问，我就必须得是。

或者

——你是小粉红吗？

——我不是小粉红，我是红。

另外一个词是“极左”。我们因为主张多样化，经常被自动扫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垃圾堆里。我可了解我们的一些同好在使用“极左”这个词的时候的恶意。我是觉得，任何人都没有啥必要祭出但是又无法自控使用毛时代语言来说话，谁要说“极左”在中国仅仅只是一个定位一个政治光谱的词汇，我觉得没有谁相信会这么简单。

在中国，“极左”不光是个骂人话的问题，它是一根大棒子，随时准备抡上去：1) 如果你怕了，那么我赢；2) 定位于你是一个靠着政治吃政治饭的不学无术者，我赢；3) 吵嚷起来，一旦有了强力的人来干涉，我先说你极左，我占据道德制高点，我赢。自由派用这个词来对付他的论敌，是自由派的耻辱。

当然，我只是拿“极左”来举例子，如果想让语言好起来，我们信奉“多样化”的人，应该多做一些事，信奉自由派的人，应该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少用这种吵架的语言——虽然多数时候会沦为“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这样的悲剧，但总比在屎里恶性循环要好那么一点点。

我说的多数时候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指责对方“极左”呢，他已经用了“自由化”来说你，艰难探索时期他会说你是“走资派”，现在就说你是“公知”……何止是污名化问题，简直是炮决你至灰飞烟灭。你哪里是他的对手？尽管用了“粉蛆”用了“极左”，我也有一个理由站在方方这边，我对那些躲在公权力后面跳着脚骂街或者说风凉话的老成熟国派持永久性的鄙夷态度。

### 04

很早以前看阿城说苏童，“他的叙述中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没有这四十年来的暴力，或者说，即使苏童描写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语言来描写暴力”。以前看，似懂非懂。现在看理解了阿城的赞美本质是夸奖苏童作为作家的定力：“苏童的阅读经历应该是在几十年来的暴力语言的阴影下，他从阴影里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如此饱满，有静气，令人讶异。如果了解四十年来暴力语言的无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苏童是当今自我力量最强的中国作家之一。”

### 05

有的时候不自量力地会想一些对抗这种粗鄙的、暴力语言的办法。结果是想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除了自己看些好东西，还能做些什么呢？

而劝人读书就跟劝人吃饭一样，又是一个多苍白而且可笑的事！

能说的大概也就是：阅读是有成本的，好东西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事儿用更多强调吗？一心可以二用的事，大部分都不是那么靠谱。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知识播客，它特别白领，特别精英——这个评价来自于一位“粉红” up 主，他在提这句话的时候，流露的都不是愤世嫉俗，而是向往。像他通常表现的那样。他一点偏激也没有：他说，他们好像都是成功人士。

任何替你做事的人，都要画个问号——包括替你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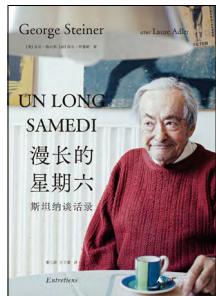
减少别人为智力投入的事，替人读书，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做善事。那句老话说“别人嚼过的馍不香”，何止不香，还恶心呢。我来替你做力气活，这是分工，代价很简单，比如你原来可以扛二百斤麻袋十里不换肩，现在就不行，有得有失。现在别人替你做智力活，你原来过目不忘的本领可能就差些了。

关键是自己所做的事，总体上是增加了人类的整体智力，还是降低了。如果总体上降低了，那基本上可以定之为失败，如果是以降低别人智力来获得你的收益，毫无疑问那就是邪恶。邪恶虽然有大邪恶与小邪恶之分，但勿以恶小而不为——这句话小时候我们都当真理学过，现在没有人把它当回事。

## 06

对乔治·斯坦纳的一句话印象深刻：

伟大的文本可以等待几个世纪。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那篇出色的文章中说的：“不必心急，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书籍终究会到来，处于危险中的不是书，而是读者。伟大的文学文本包含着再生的可能、不断追问的可能，但它并不会在那儿静静等着成为大学研讨会的材料，或一份被解构的文件。那是本末倒置。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 07

坏的东西罄竹难书，好的东西凤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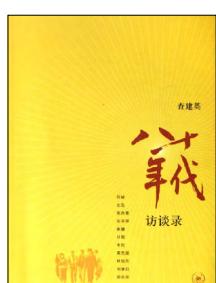
随手记下来一些感觉还不错文字。为它们停留的原因各有不同，各有趣味。  
附在这里作为。

马修·阿诺德

最开始是看到一首诗。在一本叫《中世纪人》的书里，写奥克苏河。唐诗之后，写景色写得大气磅礴的诗不多。这个算是一个。

但那条大河继续奔流，  
流出迷雾，流出低地，  
流进结霜的星光，之后继续前行，  
欢快地，流淌过花刺子模的荒原  
在清冷的月光下，他奔流  
向着北极星，经过希瓦  
闪闪发光，宽阔非常：接着，细沙  
围住了他的水道，  
让他分流；很长很长  
奥克苏一直流向前方  
流过河床的细沙，和灌木丛生的小岛——  
奥克苏，不再有山间奔流时的气息，  
迂回前行于田野之中：直到最后  
听到涛声依旧，  
大海向他打开大门，明亮  
而且安静，那些刚出浴的星星  
挂在空中，把星光洒进咸海。

这诗的作者我最初以为是当地人，后来发现马修·阿诺德是牛津的诗学教授，虽然如今诗名不彰，但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翘楚人物。奥克苏河，在中亚，流入咸海。现在写作阿姆河，在中文互联网上很多时候它与铁人精神之类的概念在一起，讲的是一个关于挖矿的中石油创业故事。



《八十年代访谈录》

那时开始，就想应该把看到的好东西记下来，这样挺好。坚持了几天，发现不靠谱：太像金句赏析，满满的功利心，想着盖棺论定一锤定音，好了当然“古文观止”，做不好就是一读者文摘。查建英回忆八十年代，说甘阳一众人狂妄，见到别人先要比各自看过多少书，那时候书是能读得完的，这都是前现代社会的事。现在书那么多，你看到的挂一漏万，还要指指点点，只能显得井底之蛙。所以这事就算了。

\*\*\*

王鼎钧

还是文学批评。

文学界一定有一个简洁共同体。E.B. 怀特的老师威廉·斯特伦克教人写作，他倡导：“文章简洁始有活力。句不应有冗词，段不应有赘句，如同素描无多余线条，机器无多余部件。此非要求作家句句写短，或略去细节，泛泛描述，而要他字字精当。”王鼎钧说他少时念作文课，又爱又怕，担心“妙手偶得”的佳句不能通过大老师检验。比如他写：“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一站。”大老师并不作批改，只是回头跟他说，“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清明到了。”这种巴洛克风格的花腔可能是年轻人的心头好，王鼎钧并不思悔改，隔不久，作文里又写，“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这回大老师在作文簿上画了杠杠子，直接改成“今年八月”。



《昨天的云》

王鼎钧是台湾写副刊文字写出来的文学大师，晚年在美国写回忆录，他在二十世纪经历并没有出奇到独树一帜的地步，但个人命运之于时局变幻甚至历史，多有投射，把握得到而又拿捏得当，王鼎钧是聪明人。同样写回忆录，同样是台湾背景，不像龙应台《大江大海》过于恣肆最后没了分寸，也不像齐邦媛富家小姐把波澜壮阔化入娇滴滴，历史像个沙盘一样放在后花园中，间或投过去一眼，娇嗔一句，扭身出去了。

\*\*\*

海明威

海明威也讲了差不多一样的故事。他让自己儿子试着写作，他像所有的爹一样检查作业。

“非常好，吉格。比我在你那个年纪的时候写得好多了。我看要改的就是这个地方。”  
“你是这样写的，突然之间它发现自己可以飞了，你把【突然之间 /all of a sudden】改成【突然 /suddenly】。用字越少越好——这可以保持动作的持续性。”  
“你可以得奖了，孩子。写作需要钻研，需要训练，需要想象力。从这篇小说看来，你有想象力，你写这一次有想象力，那么写一千次也会有想象力。想象力不会轻易离开你，也许永远不会离开你。陀思妥耶夫斯基 57 岁才写《罪与罚》。”

格利高里·海明威，就是那个吉格，海明威的儿子事后说，得奖的应该是屠格涅夫。他不想写作文，就在书架里找了一本屠格涅夫的书，还没有裁边，断定老爸还没读过，改了人名背景，“我并没有优胜者的感觉，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对那篇小说唯一的贡献就是把【突然】改成【突然之间】。”

\*\*\*

加西亚·马尔克斯

准确。大家理解起来各有千秋。马尔克斯说，如果说有一群大象在天上飞，人们是不会相信你的，你得说有四百二十五头大象在天上飞。人们大概就会相信你了。他是记者出身，拉美文学爆发，与记者有关，他们全都以写独裁者为己任，记者接触得多，得天独厚，我觉得人家大爆炸得相当有道理，不是记者有多厉害，而是人家知道这个社会里最准确的问题在哪里，这个说得有点远，回头说马尔克斯的准确是小说家的准确，自有迷人之处。比如，即使在自传里，他也会信手拿来一句：

当年，波哥大是个偏远、阴郁的城市。细细的雨丝从十六世纪初就开始下，绵绵不绝。

我上大学那会儿，有些老师来历不明，精神家园在哪里不太好说，人都是不错的人，在新时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是很谨小慎微，但就是讲的东西有点不着边际。教明清文学的一位就是，他人生大部分时间是讲西游记，改革开放，西风东渐，他也知道了魔幻现实主义，有魔有幻，以为是竞争对手，看了，不屑。想象力不如咱们写猴子的。我当时就觉得这扯得有点离奇。只是没有能力来解释这到底为什么有点扯。后来看马尔克斯回忆，“不过随着年逝月移，我发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因为这很危险，会谎话连篇，而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谎言更加后患无穷。事物无论多么荒谬悖理，总有一定之规。只要逻辑不混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

现在如果我是个国粹派，就是“不论你们拿出来啥东西我们都古已有之派”或者“不论你们拿出来啥东西，都不如我们有的”派，如果要跟马尔克斯比，那就不应该拿吴承恩，我们明清有现成的像石涛这样小型武器，他在自己涂的画上随手再写几个字，都非常厉害，比如：老树空山，一坐四十九劫。什么叫劫，佛教说，每劫十二亿八千万年，怕你对数字没有概念，还有人给你分解：“假设有一座非常坚硬的岩石山，体积比喜马拉雅山还要大，有个人每个世纪都要用一块布轻擦那座山一次，那么他把整座山都磨掉的时间跨度就是一劫。”我以为这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有趣，一坐四十九劫，不比马尔克斯差。



《活着是为了讲述》

马尔克斯讲述自己文学的起点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外祖母，另一个是外祖父。外祖母那个比较知名，他说他师承于卡夫卡，而卡夫卡的技巧就是外祖母的技巧：马尔克斯还非常小的时候，有个电工到他家，他的外祖母就说，每一次这个人来，他总是会让房子里充满蝴蝶。马尔克斯的贡献就是做记者和非虚构悟得的那四百二十五头天上的大象：“当我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不说那些蝴蝶是黄色的，人们就不会相信它。”

来自外祖父的那个起源是这样的：一个总是跟外公下象棋的比利时人自杀了，外公领着他去看比利时人的尸体，离开时，马尔克斯对外公说：

“比利时人再也下不了象棋了。”

像所有外公一样，马尔克斯从此被视为家族里的文坛奇才。“那句简简单单的话是我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成就”。

相比之下，我觉得马尔克斯获得的来自外公的更重要的支持，是外公的语言。虽然这也是马尔克斯复述而来，但姑妄信之。马尔克斯说，三四岁时，外公领他走过骄阳下一片荒地，突然眼前出现一大片绿色的水面，还冒泡，“上面漂着一大群溺水的母鸡”。

“这就是海。”他告诉我。

我很扫兴，问他海的那边有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海没有那边。”

\*\*\*

#### 纳博科夫

中文里“色”是个好字。颜色之外，用得多的，可以与景象相连，也可以与欲望相连，欲望又与女子美好相连。每个都很勃勃生机的样子。虽然它跟“情”在一起的时候，多少有些降了自己的身价，但公平地说，色情这个词，从字面上看也没有如今搭载得那么油腻。

色情是文学里的大事。日本文学编辑根本昌夫给初学者讲做小说的道理，“常有人误认为只要写一些反社会的事或泥泞不堪的内幕就是小说”，内心住着一个“色老头”，这是天大的误解。所以，我说近来看到的最好看的色情描写，来自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要往洛丽塔那里去想，不是一树梨花压海棠这类港式油腻——是《说吧，记忆》里，纳博科夫回忆他的母亲。

当我仍在注视着雪橇的时候，我看它在特罗曼商店（卖书写用具、青铜小玩意儿和牌）外停了下来。不久，母亲从这家商店出来，男仆跟在她身后。他拿着她买东西，我看着像是一支铅笔。这么一件小东西她自己都不拿，我感到吃惊，这个有关尺寸的不愉快的问题重新引起了微弱的、我本希望它已经和发烧一起消失了的“头脑膨胀效果”，幸运的是时间很短。当她再一次坐上雪橇，让人掖好盖着的熊皮的时候，我看着大家，包括马在内，呼出来的水汽。我还看着她为了使那绷得太紧的、紧贴着脸的面纱松动一些而做的那熟悉的振嘴动作。如今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当年每当我吻她戴着面纱和面颊时，我的嘴唇所感到的网状的温柔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伴随着一声快乐的叫喊，从雪蓝的蓝窗子（窗帘还没有拉上）的过去中飞出来，飞回到我的记忆之中。

#### 五光十色。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现在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而且还是活动家，经常签个名发起个动议什么的，我对她的印象跟她所代表的民主党左派一样，就是觉得他们个个长着一个四方眼睛，这个四方小框框有个名字，就叫政治正确，有点僵硬。这个东西不重要。她回忆有一天——1977年7月2日，“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因为，第二天，唐纳德·巴塞尔姆，另一位作家很随意地对她说：“高兴吗？纳博科夫死了，我们全部上了一个档次。”



《导师，缪斯和恶魔》

欧茨写这事的时候觉得巴塞尔姆刻薄，我倒觉得这是最真挚的赞美。这说明欧茨僵硬的姿态由来已久。因为这句赞美，我买了巴塞尔姆的书来看，说老实话，我觉得很不成样子，至今也没读进去。当然，这也说明了金句思维古文观止的想法有多幼稚。

\*\*\*

#### 奥登

巴塞尔姆对纳博科夫之死的评价当得起“最动听的赞美”。诗人奥登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回忆他的高光时刻“以一种最不寻常的方式到来”。奥登的一个朋友参加示威活动，关进了女子监狱，那是一个星期天……

在这个地方，女孩们排队下楼去洗淋浴。一群人被领进了门，这时，一个妓女在高声念诵：“很多人无须爱也可苟活，但没有水则万事皆休……”那是我一首诗里的句子，才刚刚发表在《纽约客》上。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白写。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4》

可以想象，奥登此时此刻有多满意自己。迷醉。当然看《纽约客》而且背下诗来的妓女，更让人感动。纽约此时此刻该有多满意自己。迷醉。

\*\*\*

#### 布罗茨基

从那首萨克苏河的诗之后，我一直找特别配得上的诗。有一天找到了。

约瑟夫·布罗茨基《大理石像》，普勃利乌斯的台词，也跟景色相关，特别庄严：

天气不错啊，各位长官！台伯河蜿蜒流淌，群山一片青蓝。罗马城，这条母狗，近在眼前。

看着就高兴。

####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 荒诞笔记

荒诞凝视我们，而我们也回之以凝视。读书和观照现实，这个栏目由此交汇而来。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七，2022.05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